

# 目 錄

## 第一章 日本投降与美軍佔領

第一節 日本投降及其意義 .....	1
一 戰爭的災難 .....	1
二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宣佈投降 .....	5
三 东久邇內閣 .....	10
第二節 美國佔領政策的本質 .....	12
一 麥克阿瑟的花言巧語 .....	12
二 “八千万人的集中營” .....	15

## 第二章 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節 第一次革命高潮 .....	23
一 日本投降以後的慘狀与人民組織的萌芽 .....	23
二 从幣原內閣垮台到五一勞動節与粮食勞動節 .....	33
第二節 工農組織的發展与二·一總罷工 .....	41
一 从第一次吉田內閣到十月攻勢 .....	41
二 二·一總罷工 .....	45
三 麥克阿瑟的佔領理論 .....	50

## 第三章 日本反動勢力的復活

第一節 修改憲法 .....	54
一 美製的日本“新憲法” .....	54
二 日本新憲法与天皇制以及軍國主義 .....	57
第二節 “土地改革” .....	63
一 “土地改革”法 .....	63
二 農民並未得到解放 .....	70
第三節 財閥的“解散” .....	76

一 美軍總司令部与日本財閥 .....	76
二 日本壟斷資本的復活 .....	79
<b>第四章 新的法西斯主義的萌芽</b>	
<b>第一節 片山內閣</b> .....	84
一 二·一總罷工後的反動和四月選舉 .....	84
二 社會黨首相內閣的成立 .....	90
三 勒緊腰帶生活的實現 .....	93
四 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的產生、片山內閣的瓦解 .....	100
<b>第二節 第二〇一號政令</b> .....	111
一 事實上的購和——“遠東兵工廠”政策 .....	111
二 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民主化同盟的產生、藤田內閣的成立 .....	114
三 三月鬥爭 .....	120
四 吸收外資政策 .....	124
五 警察制度的復活 .....	130
六 麥克阿瑟的信件 .....	133
<b>第三節 走向殖民地化的日本</b> .....	145
一 文化、教育的殖民地化 .....	145
二 民族獨立青年行動隊 .....	150
三 政治腐敗、第二次吉田內閣、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 .....	154
<b>第五章 走向戰爭的道路</b>	
<b>第一節 道奇路綫</b> .....	160
一 一月選舉与第三次吉田內閣的成立 .....	160
二 九原則、道奇預算、索普建議 .....	162
三 第三次吉田內閣与反動勢力 .....	171
<b>第二節 三鷹、松川事件</b> .....	176
一 企業整頓、行政整理 .....	176
二 保衛民族產業的鬥爭 .....	180
三 下山、三鷹、松川事件 .....	187
<b>第六章 朝鮮戰爭的準備与日本</b>	
<b>第一節 朝鮮戰爭的迫近与日本的基地化</b> .....	203

一	解放旅日朝鮮人聯盟 .....	203
二	單獨“媾和”与日本加緊軍事基地化 .....	203
第二節	財政經濟上的備戰 .....	209
一	財政和工業 .....	209
二	農業和農民的生活 .....	213
第三節	反对軍事基地和爭取全面媾和的鬥爭 .....	219
一	勞工組織的分裂 .....	219
二	農民的活動 .....	225
三	市民鬥爭的展開 .....	226
四	政党的重新改組 .....	228
五	共產党情報局对日本共產党的批判 .....	230
六	戰爭前夕的銷压 .....	233
<b>第七章 日本重新武裝与法西斯化</b>		
第一節	加強軍事、警察力量与動員一切反動勢力 .....	237
一	警察後備隊的創設 .....	237
二	警察力量的增強 .....	242
三	反動勢力的總動員 .....	246
第二節	“美日經濟合作” .....	253
一	美日經濟合作的意義 .....	253
二	“經濟復興”的真相 .....	257
三	地主制度的加強 .....	262
第三節	法西斯化的進行 .....	267
一	加緊整肅赤色分子和“總評”的成立 .....	267
二	銷压的擴大 .....	272
三	反法西斯鬥爭 .....	275
<b>第八章 殖民地軍事基地日本</b>		
第一節	單獨“媾和”与美日安全條約 .....	280
一	杜勒斯与吉田 .....	280
二	舊金山會議 .....	285
第二節	“日蔣條約”与行政協定 .....	290

一	兩個條約的批准、社會黨的分裂 .....	290
二	“日蔣條約” .....	292
三	美日行政協定 .....	294
第三節	殖民地法西斯體制 .....	300
一	重新武裝的進行 .....	300
二	殖民地軍事經濟 .....	302
三	防止破壞活動法案及其他 .....	306
四	“開倒車”和“唱復古論調” .....	312
第九章	獨立、和平与民主勢力的發展	
第一節	日本統治階級走投無路 .....	317
第二節	革命勢力的新開端 .....	321
一	日本共產党的新綱領 .....	321
二	統一行動的發展 .....	323
第三節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	
——	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新階段—— .....	333
一	从“和約”生效到五一節 .....	333
二	在廣場上的鬥爭 .....	336
譯者後記	.....	343

## 第一章 日本投降与美軍佔領

### 第一節 日本投降及其意義

#### 一 战争的灾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政府及軍部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对中、美、英、苏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战争至此結束。這是一場長期的战争。日本軍國主義者自侵略中國东北以來整整十四年，自侵略中國全土以來已達八年，而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國人民為对手作战以來也經過了四年；這場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者所發動的非正義战争，終以悲慘的、可恥的、史無前例的大敗而結束了。

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者，給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尤其是給亞洲各國數億人民帶來了無可估計的灾难和損失。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者殺害了數百萬的中國人、菲律賓人和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燒光了他們的房子、村莊和市鎮；掠奪了他們的財產、富源和領土；破壞了他們的獨立、自由和幸福。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在馬尼拉的暴行，只不过是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在全中國、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所犯的無數暴行、掠奪和迫害的典型实例而已。

我們日本人民，也由於本國統治階級的專制和從事非正義的战争，被投入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痛苦深淵，最後甚至連民族的獨立都被剝奪了。

隨着備战工作的進展，日本人民連最後的一點兒自由也全

被剝奪了。最初——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是共產主義者和戰鬥的工農被非法逮捕、拷問、殺害和下獄。不久，從一九三三年前後起，一切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也都遭受了迫害。於是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已在日本絕跡了。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以前，一向認為這種迫害與自己毫無關係，只是使“赤色分子”和“好發議論者”感覺痛苦、並且認為本身還因軍需繁榮而沾了光的人們，隨着戰爭的進行，他們也不得不放棄長期經營的商店和事業而被迫轉業或停業，或者跑到軍需工業部門去做苦工。一切經濟活動，都被軍閥、官僚和大資本家霸佔去了。失業者固然沒有了，然而却有好幾百萬人被強迫徵發去從事奴隸勞動。包括大學生、中學生、女學生甚至連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被徵去從事軍需工業和糧食生產的奴役勞動的，達三百四十三萬人。此外還有數達三百萬以上的青年婦女，被軍需工業強迫或半強迫地奪去了她們的青春。農村的青年和少年也被迫加入了“滿洲開拓義勇隊”或“農兵隊”。總而言之，日本八千萬人民都被驅入一大軍事監獄從事囚犯勞動。而且，強迫性的賦稅和公債把人民最後的一文錢也榨光了。這一切就是“軍需繁榮”給予日本人民的“禮物”。

一九三七年以來的一千八百七十億日元臨時軍事費用，就是拿這筆從人民身上榨取的金錢來抵充的。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被吸收到三井、三菱、安田和住友等極少數壟斷資本家的金庫裏去了。只有這些財閥才靠戰爭——儘管戰敗——大發橫財。對於財閥來說，戰敗使他們蒙受的損失，不過是還未到手的夢幻中的財富而已。他們雖因戰敗喪失了朝鮮、台灣、庫頁島和中國東北等殖民地以及中國本部和南洋佔領地區的設施，但是他們從這些地區搶劫的財富遠比他們所喪失的多得多。當軍閥、官僚和大資本家陶醉於不義之財和權勢而沉溺於豪華生活時，我們人民不得不在貧民食堂門前提着飯鍋排成長列，最後甚至連這

種雜炊食堂都沒有了。代替飯鍋的，我們每日被迫用“防空頭巾”包着頭，戴着鋼盔，打起裹腿，提着水桶去演習如何和美國 B-29 型飛機投下的燒夷彈進行鬥爭。此外，還有疏散的痛苦。我們人民即使想運點兒輕便的行李，也很不容易。爲了購買一張火車票，不得不在冬夜嚴寒的火車站排成長列等上兩個夜晚。與此相反，軍閥、官僚、大資本家和他們的親戚朋友，任何時候都可以自由旅行，不論有多少東西都可以隨時運送。而日本全國各大中城市被疏散的人口共達一千萬人。不論是曾被疏散或接到疏散命令的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飽嚙了幾乎被逼成神經衰弱的痛苦。

儘管遭受了疏散的痛苦，但還能活着的人們，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美國的那種慘無人道的盲目轟炸，使住宅、學校、醫院都不能倖免。像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街道竟有一半被燒光了。甚至連一個軍事目標都沒有的中小城市，也有被燒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因這種殘酷轟炸所燒掉的或因拆遷建築物而破壞的住宅，全國竟達二百九十八萬戶，以致迫使九百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財產傢具等的損失，按當時的公定價格計算，竟達九十五億六千萬日元。我們在四面火海和美國 B-29 型飛機到處投擲燒夷彈的威脅下，孑然一身四處奔逃。最悲慘的，是那些未能逃掉而被炸死或燒死的人們，是那些被原子放射線這種人類從未想像到的慘慘遭遇所殺害的人們。遭受到這種殺害的人至少達五十萬人以上。僅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死於東京東部地區夜間大空襲的人來說，就超過了十萬人。在該區所有的街道上和隅田川河裏全都填滿了被燒死的屍體。凡是見過這種景象的人，將終生不能忘掉那種慘狀。

廣島和長崎更爲悲慘了。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二顆原子彈。原子彈不只是大規模殺人的武器，而且還是最殘忍的殺人武器。

美國總統杜魯門一九五一年九月在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上，曾經一邊高談什麼“和解和信賴”，一邊又說“我們（美國人）決不能忘記珍珠港和巴丹島”。而我們日本人也是永遠不能忘記廣島和長崎的。日本人不僅不會忘記原子彈轟炸的悲慘情形，還決不會忘記連美國戰略家都承認了的、美國軍事當局悍然投下原子彈，並非為早日結束戰爭的必要才不得已而出此。

既是日本民族精華又是一家希望所寄和賴以為生的健康青年、身強力壯的男子，繼續不斷地被徵去當兵。好容易才盼到兵役期滿安然返歸故鄉，剛剛高高興興地結了婚，竟又被徵入伍，這樣一去永不復返的人，在日本到處都是。當日本投降時全國被徵入伍者共達七百二十萬人，按此數目計算，平均不到兩戶就有一人被徵去當兵。於是弄得日本全國人民親失其子，子失其父，無數婦女變成寡婦。根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日本國家統計年鑑，第一回），截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僅已查明的，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陣亡者就超過了一百五十六萬人，而永遠殘廢和失蹤者合計起來竟達三十一萬人。這個數字顯然遠比實際死傷人數還少得多。譬如在這個統計中就有陸軍軍人軍屬二十四萬人，以“情況不明”為理由未被計算在內。這不幸的二十四萬人，毫無疑問是在中國東北和南洋戰死了。所以陣亡和永遠殘廢者的人數必在二百万人以上，那末平均起來每七戶多就有一个人。軍人遺族心情的悲痛和生活的淒慘，直到戰後七年的今日（按指本書在日本初版時的一九五二年——譯者）仍未得到絲毫解決。日本天皇曾贈送軍人遺族一個紀念酒杯，但是遺族的孩子們却喊道：“把爸爸殺掉，送個酒杯是不行的”（見山形縣山元中學學生江口俊一的作文“山彥學校”）。“听吧，這海神的聲音”！死者的悲歌，命令我們還活着的人們要為和平而奮鬥。十五六歲的少年被迫參加少年航空兵和少年坦克兵，為了昏庸腐朽寡廉鮮恥的天皇、軍閥、御用言論和御用教育家去充當特攻隊而喪



失了生命。據說，這些一無所知的少年們被欺騙去“殉悠久的大義”，奮不顧身地面帶笑容地死去了。正因為如此，那末，還活着的我們現在必須教育青少年們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大義和什麼是和平和民主的大義的責任就越來越重了。

## 二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宣佈投降

日本人民付出如此之大的痛苦和犧牲，不但什麼也沒有得到；相反地幾乎喪失了一切，甚至連民族的獨立都喪失了。因此日本民族不得不處於外國軍隊的佔領之下。但是假使我們能夠藉此機會永遠剷除驅使我們進行不正義戰爭的專制主義者及其基礎，能夠在日本建立一個永遠愛好和平和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那麼這種痛苦和犧牲，也還並非完全白費。這不僅是日本人民本身的唯一希望，而且也只有這樣做才是日本人民對亞洲及全世界人民的最大補償。而波茨坦公告對日本所要求的，也是一個和平和民主的日本。在日本投降七年後的今日，我們重讀波茨坦公告，是具有特別深刻的意義的。波茨坦公告中作為“吾人（同盟國）的條件”所要求於日本者如下（數字是“公告”的項目順序）：

六、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黷武主義者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

九、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使其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

十、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在內，將處以法律之制裁。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尊重必須成立。

十一、日本將被許保留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貨物賠償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十二、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後，同盟國佔領軍隊當即撤退。

波茨坦公告表現了全世界愛好和平各國人民對於日德意法西斯軸心國家的統一戰線目標。這個公告既公正又符合日本人民的願望。波茨坦公告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通過廣播向全世界宣佈的。當時日本政府對於戰爭前途已經喪失信心，爲了尋找不是無條件投降的結束戰爭辦法，正在請求蘇聯政府出面斡旋。波茨坦公告對於日本政府來說本應是一隻渡船，但是日本政府和軍部對於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民主主義精神毫無理解，當然更談不到體會這個公告的偉大歷史意義了。不僅如此，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當時的鈴木首相還故意向報界發表談話，宣稱日本政府對於這個公告“只有不加理睬，我們應向完成戰爭任務邁進”。

鈴木首相和天皇等人只是爲了維護他們的地位和面子，對於國民的不幸和悲慘毫不在意。他們發表這種談話，使日本的悲慘情況更加嚴重了。

在雅爾塔三國會談時，蘇聯應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請求，鑒於日蘇中立條約事實上已被徹底侵犯，爲了促使日本迅速投降以結束這場陷人類及日本人民於不幸的曠日持久的無益戰爭，曾經答應在德國投降後三個月內參加同盟軍方

面对日作战。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希特勒德國投降後，眼見着三個月就要到了。但美國却急於想在苏联參战前給全世界以美軍曾予日本以决定性打擊的印象。同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彈實驗首次獲得了成功，於是這就成為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唯一希望。當時美國剛剛製成了兩顆原子彈。美帝國主義者爲了在苏联參战前給日本以嚴重打擊的政治要求，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急急忙忙地向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接着美國總統杜魯門和英國首相艾德禮立即相繼發表廣播演說，大肆宣傳原子彈的威力。日本國民雖然一點也不知道這些廣播，但日本政府當局却因此受到很大的震動。主張早日投降的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在八月八日早晨向日本天皇報告了原子彈轟炸的詳細情況（見一九四五年九月東鄉茂德外務大臣的口述筆記，載外務省編：“終戰史錄”）。

對於以日本軍部爲首的焦土主義派說來，光是原子彈並不能使他們屈服。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後，日本陸軍當局仍然說：“這種炸彈沒有什麼可怕，我方已有對策”。實際上，軍部不但對原子彈毫無科學上的有效對策；即使對於普通的燒夷彈也一點辦法都沒有。但是他們繼續作戰的決心，則的確並未因原子彈而有絲毫動搖。可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黎明苏联參加對日作戰後，立即使在邊境的關東軍全部土崩瓦解，於是連日本軍部也爲之屈服了。因此，日本匆忙地召開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這時連一向認爲原子彈不過是“新型炸彈”毫不足懼的軍人們，對於苏联的參戰也不敢說硬話了。在會議上由首相鈴木報告開會原因，他說：“正因廣島被原子彈轟炸而受到打擊的時候，今晨又有苏联的參戰；從四周圍的形勢來看，不能不承認繼續作戰已屬不可能之事。所以看起來勢非接受波茨坦公告不可了”。當鈴木詢問大家的意見時，並無一人立刻發言，會場繼續着死寂的沉悶。嗣後海軍大臣米內

說：大家沉默也不濟事。他主張以維持國體爲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首要條件。接着从八月九日深夜起召開“御前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八月十日），最後才決定以波茨坦公告“不包括變更天皇統治大权的條款的諒解”爲條件而接受該公告，並立即將這一決定通知瑞士政府託其轉告聯合國。

對於日本政府的這項要求，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答覆說：“从日本投降時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的統治权應置於盟國最高司令官指揮之下”；而“日本統治機構的最後形態應根據波茨坦公告並按照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來決定”。接到這個答覆後，日本政府、“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以及樞密院等自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仍連續舉行會議，熱烈討論應否投降。當時陸軍大臣阿南、參謀總長梅津、軍令部總長丰田認爲這樣就不能保全國體，強硬主張應重行交涉。樞密院議長平沼和軍人出身的樞密顧問官們支持這種意見。另一方面，外務大臣東鄉站在主張立即投降的头陣，首相鈴木及海軍大臣米內則畏畏縮縮地加以支持。此外，在樞密院中日本金融資本家的代表深井英五（前日本銀行總裁），也是主張立即投降的人。

東鄉等認爲利用美蘇的矛盾，投靠美英兩國就可以保全天皇制度。他知道“日本的國體問題也就是皇室問題，在中蘇方面雖顯然有反对的意見”；但在美英方面却並不如此強烈。東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的內閣會議和十三日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曾強調這點說：“根據各種情報來看，同盟國方面雖有一部分國家對日本皇室問題保持強硬主張；但是美英當局的主張大概不會超過貝爾納斯國務卿的答覆的程度”。因此，東鄉認爲假使繼續進行無益的戰爭，有使美英態度趨於更強硬的危險；於是他以不如早日投降還可保全國體爲理由說服了反对派（見東鄉茂德：“終戰外交”一文，載“改造”月刊，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號）。

此外，近衛文麿等大部分重臣，也和東鄉等具有同樣的判

斷。近衛在日本投降半年前，即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曾鼓起不顧性命危險的勇氣向天皇提出一份意見書。其中大意說：“戰敗是勢所必至的，但美英的輿論，現在尚未達到要求改變日本國体的地步。因此，如果只是戰敗，在國体方面還不必過於憂慮。就保護國体的前提說，最堪憂慮的不是戰敗而是隨着戰敗可能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目前蘇聯勢力到處蔓延，這樣下去，則蘇聯勢力勢必蔓延到日本；因此應乘此時機立即對美英投降。為此必須肅清軍人中一部分的強硬派，他們是偽裝的共產主義者和親蘇分子。如果清除了他們，也就可以緩和美英和重慶政府的對日氣氛”（見岩淵辰雄：“近衛公的奏文”，載“世界文化”第三卷第八號）。

這就是近衛奏文的主要內容。環繞着近衛文麿的周圍，吉田茂和第三次吉田內閣的法務總裁殖田俊吉以及政治評論家岩淵辰雄等，當時都是他的參謀和助手。誰也不會相信近衛和吉田等人真正以為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是偽裝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確有決心要迅速對美英投降並認為必須依靠美英來和蘇聯及國內的人民革命運動進行鬥爭，則完全是事實。這批怯懦的傢伙居然密奏天皇要打倒軍閥，是頗不簡單的。吉田和殖田為了這個事件，曾被日本憲兵隊捉去關了約一個月。

東鄉外務大臣的主張，在近衛等重臣和大資本家的支持下，才把毫無焦土決戰的自信的、只是為了顧全面子說說硬話的軍人壓下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終於決定投降，並在第二天正午由天皇在廣播中加以宣佈。他們之所以“忍人之所難忍”<sup>①</sup>而投降，只是為了想靠美英來拯救天皇制度。九月三日日本政府和軍部的代表，在米蘇里號美國軍艦上正式地簽字於投降書上。代表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書的重光葵在樞密院報告

① “忍人之所難忍”是引自天皇的投降廣播文。——譯者

簽字情形時，曾和顧問官們有過如下的問答：

芳澤謙吉(外交官的元老)：“在蘇聯向亞洲擴張日益威脅我們的情形下，與此相關聯的，尚可認為多少有利於我國的地方就是美蘇在亞洲產生了互相牽制的局面。不管怎樣，我們希望把舵朝着爭取美國好感的方向前進。”

重光：“我有同感。”

泉二新熊(司法官的元老)：“美國式的民主主義和蘇聯式的民主主義大有不同；美國是排斥共產主義的，我國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

重光：“關於這類問題，除依賴日本國民的信念外別無辦法。”

芳澤：“同盟國軍所希望的不過是要剔除妨碍發展民主主義趨勢的各種事物而已。關於民主主義的形式等，則並無明確的規定”(見深井英五：“樞密院重要議事備忘錄”一文，載“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號)。

由此可見這些早被視為過時人物的老頭子們，在日本投降後如何準確地抓住了與他們階級利益有關的基本問題。

### 三 东久邇內閣

當日本投降的時候，鈴木內閣宣佈總辭職；由皇族出身的陸軍大將东久邇宮組成了新內閣。有人說：“以投降為轉機，日本專制主義天皇制宣告滅亡了。當重臣派迫使軍部接受投降時，在日本統治階級中的專制主義天皇制的統治權業已垮台了。代之而起的，是壟斷資本家的統治”。然而在鈴木內閣和东久邇內閣之間究竟能找出多少階級性的差別呢？固然日本的國家勢力從投降時起，已轉移到假借同盟國名義進行活動的美國統治者手中去了。換句話說，作為獨立國家權力的天皇制，無疑地已隨着日本投降而垮台了。但是在日本國內的階級關係上，專制主

義天皇制是仍然存在的。至於東鄉等人和阿南等人在環繞着投降問題上的對立，本質上不能認為具有階級對立的意義。他們之間的爭吵，不過是為了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存天皇制度而已。日本投降後，美國佔領軍迅速地解散了日本軍隊，這對於天皇制來說固然是個嚴重的打擊；但在其他方面，例如天皇制的機構和基礎，都未曾有絲毫的改變。

日本政府的重要人員依然由天皇任命並對天皇負責而不是對國民負責。日本龐大的官僚機構對國會及國內其他勢力仍保持着高度的相對獨立性。專制主義天皇制原有的經濟基礎——寄生地主制——雖曾由於戰時經濟本身的要求有所削弱；但是並未因為戰敗而毀滅。至於壟斷資本，不僅沒有取天皇制而代之以的必要；與此相反，當面臨戰敗危機時，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地位，他們越發感到需要利用天皇制這張王牌了。而美國佔領軍方面，正如後述，也採取了儘可能“利用”天皇制的方針。另一方面，日本人民還沒有從戰爭的災害和戰敗的震動下恢復元氣；而領導他們的組織也還未曾開始活動。在這種條件下，如何會有天皇制讓位給壟斷資本家的事呢？

東久邇內閣雖一方面宣傳，依靠它的皇族權威容易解除軍隊的武裝；但實際上，它却竭盡全力來儘量保存一切舊勢力。它任命中島飛機公司的經理去擔任策劃日本工業和平化的商工大臣；它任用惡名昭彰的天皇主義法西斯主義者擔任內閣參事；它委派道地天皇制警察官僚出身的人物擔任內務大臣；它把為準備在日本本土決戰時所貯存的數百億日元——相當於目前數萬億日元——的糧食、原料資材和工業產品分送給大資本家、大地主、官僚、軍閥，並讓他們把這些物資隱藏起來。僅以一九四八年二月在中島飛機公司羣馬縣工廠裏所發現的隱匿物資來說，用投降時候的公定價格計算約值七億日元。此外如一九四八年八月所揭發的原屬於大阪兵工廠的物資，按投降時候的公定價

格計算約達十四億日元以上。但這還只是分送給軍人、官僚、神戶製鋼公司、日本製鐵公司及其他財閥、壟斷資本家等的物資中的極小部分而已。所有這類從國家盜竊的財產，都成為一切舊勢力（包括軍人在內）暫時從事地下活動的政治資本了。

此外，在投降前夕到東久邇內閣的期間，日本政府曾像洪水般地給資本家以“付款”——即對僅僅接受了政府訂貨、既未交貨、甚至還未開始生產的資本家支付貸款。因此，日本銀行的貨幣發行額，自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到該月底，已由二百八十五億日元增至四百二十三億日元；出現了空前的增加速度。實際上僅從投降之日（八月十五日）到該月底就增加了一百二十億日元。於是大資本家們既靠戰爭發了大財，又利用戰敗大賺其錢。

因此，天皇制和壟斷資本家，儘管日本戰敗和投降，依然繼續維持了他們的舊反動統治，甚至還利用它來搜刮不義之財。

## 第二節 美國佔領政策的本質

### 一 麥克阿瑟的花言巧語

在投降後不到一個月內，日本全國各地都被“同盟國軍”佔領了。但實際上正如日本統治階級所希望的一樣，只不過是被美國佔領了。在佔領日本的軍隊中，縱然也有數目微不足道的英聯邦軍隊；但是盟軍總司令部，上自最高統帥的麥克阿瑟和其他高級將校，下至低級職員，全部都是美國人。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作出決定以前，對日佔領政策從製訂到執行，全都由美國一手包辦。根據莫斯科會議的決定，才在華盛頓設立了由中、蘇、美、英等十三國各派代表所組成的遠東委員會，作為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最高機關。此外並在東京設立了由中、蘇、美、英四國代表所組成的盟國對日委員會；它除應盟軍最高統帥的諮詢外，並具有對他提出建議的權限。



但是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委員會的主席，全被美國獨佔去了。遠東委員會雖可決定佔領日本的基本政策，至於執行政策却必須通過美國政府向駐日佔領軍最高統帥發佈命令，而不是由遠東委員會直接對最高統帥下命令。不僅如此，關於對日政策，除若干事項外，美國政府可以不經遠東委員會的討論，單獨對最高統帥發出所謂“臨時訓令”。所以在對日佔領政策上，美國除多少受遠東委員會的牽制以外，可以為所欲為；但如果沒有美國的同意，則什麼事情也做不成。因此美國實際上成為日本的軍事獨裁者了。

日本投降後，美國佔領軍採取了敏捷的行動。日本的正式軍隊，全部被佔領軍解散了。日本政府雖曾企圖把原來的近衛師團的骨幹包括師團長在內，改名為禁衛府，原封不動的保存下來；但立即被美軍總司令部禁止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以東條英機為首的軍閥、官僚巨頭三十八名，被當做甲級戰犯嫌疑犯而逮捕了。嗣後分數次被當做甲級戰犯嫌疑犯而逮捕的官僚、財閥和言論機關的主要專制統治者，總數達一百零四人。其中也有像近衛文麿這樣由於害怕被捕而自殺的人。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美軍總司令部頒佈了“關於民權自由的指令”。命令日本政府立即釋放共產主義者及其他一切政治犯，整個廢除治安維持法、軍機保護法和限制思想、信教、集會、言論等自由的一切法令和制度，並免除和特高警察（按即秘密警察——譯者）有關人員的職務。對於這個給日本天皇制以打擊的指令，東久邇內閣曾公開加以反抗；但美軍總司令部立即下令把內務大臣撤職。因此東久邇內閣也不得不全體辭職。但這時東久邇內閣在保存舊勢力的工作上已把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完了。

幣原喜重郎是日本帝國主義外交界的元老，是三菱財閥的女婿，他以三菱財閥的政治代言人聞名於世。後來在一九四五

年十月九日，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同意成立了以幣原爲首的新內閣。在幣原組閣後第二天，廢除了“治安維持法”並釋放了一切政治犯。當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出獄後，以前把他們下獄的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走進了監獄。距那時僅僅七年，而今天“治安維持法”又以“防止破壞活動法”的名義復活了。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又被送進監獄，七年前被關進去的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又要大搖大擺走出來了！既然歷史的螺旋形發展是如此迅速，那麼誰能保證不必再過七年，即比這更短的時間，出獄者和入獄者不會又掉過頭來呢！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美軍總司令部頒佈了一個包括五項條款的爲保障日本國民的基本人權和政治自由的指令。這五項條款是：男女完全平權和解放婦女，促進工人的團結和組織，教育的自由主義化，把國民從專制政治下解放出來以及日本經濟的民主化（暗示解散財閥和“土地改革”）。以這個一般指令爲起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凍結了十五家財閥公司的財產，並接着下令解散這批財閥公司和凍結了天皇的財產。十二月九日又頒佈了第一次的“土地改革指令”。此外，還承認了婦女參政權；組織了工會和農會；肯定了集體談判、示威遊行、舉行罷工等權利；在年底並製訂了工會法。另外，還頒佈了一連串旨在剷除軍國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思想的指令。例如廢除神道的特權；禁止軍國主義者和極端國家主義者擔任教育職務等。十二月十五日，且用相當嚴厲的語氣，命令割斷神道和國家的聯繫，並禁止天皇和國土的“神化”。十二月三十一日，美軍總司令部認爲過去日本國定的歷史、地理和修身教科書是旨在灌輸極端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思想，下令禁止使用。

美軍總司令部所謂日本“民主化”的指令，以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發出的開始禁止軍國主義指導者在政治、經濟、勞動、輿論和教育界等担当公職的整肅令及解散右翼團體的指令爲其頂

點。表面看來，這好像是讓日本的舊統治者知道“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和勢力，必須永久剔除”的波茨坦公告的厲害。

## 二 “八千万人的集中營”

表面看來，這類冠冕堂皇的一連串的改革指令，好像是在進行着“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似的。當時日本統治階級頗為驚訝，因為他們意料中的美國原來並非如此。而日本人民每當一個指令宣佈出來，也都大為感嘆。然而他們全都判斷得太早了。

第一，美國政府正如近衛和東鄉所相信的那樣，基本上並不反對天皇制度。它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即在美軍佔領日本全國各地並基本上完成解除日軍武裝任務以後所發表的美國對日本之“一般初步政策”中，曾將波茨坦公告中有關日本民主化及和平化的各種政策，就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一切方面加以系統的闡述；甚至还談到其實現方法說：“日本政府或人民如自動改革政府形式，以求修正其封建的及獨裁的趨勢，可予贊許和支持。此種改革運動如受日本政府或人民武力壓制，則盟軍最高統帥僅能在保障佔領軍安全與達成佔領目標之下進行干涉”。這好像是連人民的暴力革命權都加以承認了。

但即使是上項引文，也太抽象了。它既可以解釋為承認人民的革命權，同時又可以認為是承認政府的反革命權。因為這段話的前面一段說：“鑑於目前日本社會的情況，且為使美國以最少之兵力與物資以達到其目標起見；盟軍最高統帥……可以通過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政府及各種機關行使其權力”。還說：“美國之政策乃在利用日本現有的政府機構，而非加以支持。”這就等於說“鑑於”“目前日本社會的情況”亦即半封建的天皇制的情況，為了改變日本“封建的及獨裁的趨勢”的統治形式——具體而明確地說即是改變天皇制度——却要利用天皇制度！這種

自相矛盾達到極點的做法，就是美國統治者所採取的日本民主化的基本方針。這樣怎麼會有民主化呢。

第二，所有的指令，儘管都是用所謂麥克阿瑟的花言巧語連綴起來的；但其中既沒有規定如何進行的具體內容，也不曾明示實行的期限。“土地改革指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麥克阿瑟在這個指令中說：“爲了剷除在恢復和加強日本民主主義趨勢上的經濟阻礙；爲了建立對人民威權的尊重；並爲了消滅數百年以來強加在日本農民身上的封建性經濟束縛；日本政府必須保證耕種土地的日本農民具有享受其勞動果實的平等機會”。請看這是多麼漂亮的文章。然而其中對於“土地改革”的具體內容、執行方法和期限，却沒有任何規定。所以這個指令甚至具有等於通知地主們“趕快收回租地”的效果。而其他一切所謂“改革”指令，無不與此相同。甚至麥克阿瑟所下的禁令，也準備好無數的漏洞。例如一方面規定“神道”必須和國家分開；另一方面却准許日本天皇以“個人”地位有參拜伊勢神宮的自由。

第三，所有重要指令的頒佈，都落後於當時的需要。例如廢除治安維持法和釋放政治犯是在日本投降了兩個月以後。俗語說：“打鐵必須趁熱”；本來乘日本剛投降後舊統治階級陷於癱瘓狀態時，才是推翻它的最好機會。但是在這個五十餘日的寶貴時間裏，日本人民及其領袖和組織，仍然處在一切政治自由全被剝奪的狀態之下。至於禁止軍國主義者任公職的整肅令，直到日本投降四個月以後才向日本政府發出指令；並一再拖延才付諸實行。日本舊統治階級，利用這段時間不僅巧妙地盜竊了大量的人民財產，並且能夠從容不迫地在幕後佈置了代替他們出面活動的人物。

第四，如前所述，既然美國的佔領政策是要通過天皇制度來實現日本的“民主化”，加之所有的指令既抽象又不及時，所以日本政府能儘量想出狡計對改革進行怠工，而使改革變成毫無意

義了。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可以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利用改革指令。這點我們將通過全書來詳細說明，現在僅就幣原內閣的行爲舉出二三例子。幣原內閣在表面上雖聲稱已廢除了特高警察，但實際上它却把舊的特高警察有組織地保存在內務省的調查部和各警察署的警備科、情報科中；至於個別的特高警察官和檢查官，竟若無其事地被調到別的部門仍舊擔任特高的任務。這在“日本日記”<sup>①</sup>一書裏，甚至曾舉出人名詳細加以揭露。此外，名義上一切軍部機關雖說都取消了，但實際上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改名爲第一復員局，海軍省和軍令部改名爲第二復員局，都保存了它們的秘密骨幹。甚至連原來的聯隊區司令部和海軍人事部也以“地方招待部”的名義保存在各府、縣機構中。幣原內閣對於解散財閥，曾公然加以反抗。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外務大臣吉田茂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聲明說，日本財閥不僅未因戰爭而發財，並且是戰爭的受害者；如果解散財閥，日本經濟就要崩潰；所以他反對解散財閥。他雖發表了這種聲明，但竟未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任何懲罰。

第五，美軍總司令部本身，從一開始就直接出面保存了反動勢力。所謂“利用”天皇制這件事情本身，就是意味着保存天皇制度。它不僅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保留了日本反動勢力的基礎，甚至还保存了特高警察和軍隊的“火種”。關於美軍總司令部如何直接命令保存特高警察和對這種事裝聾作啞的情形，則在“日本日記”一書中記載得很詳細。不僅如此，曾擔任美國佔領軍民間情報教育局官員的社會學者羅伯特·鐵克斯特曾報道了下列事實：美國佔領軍的特務組織“反間諜情報機構”(CIC)，不但把日本舊特高警察官當做“最寶貴的部下”，而且“委之以最重要的

<sup>①</sup> “日本日記”(Japan Daily)係美國新聞記者馬克·蓋內(Mark Gayn)所著，書中暴露美國在佔領日本的初期，就一味扶植日本反動勢力及準備在朝鮮發動侵略戰爭的內幕。——譯者

任務”(見“日本的失敗”一書)。此外，美國佔領軍當局對於日本軍閥的潛伏到地下，以商業公司和社交俱樂部改頭換面從事活動的情形，也都裝着視而不見的樣子(關於此點，見“日本日記”及“日本的失敗”兩書)。不僅如此，麥克阿瑟和韋洛比<sup>①</sup>爲了保存舊日軍的高級參謀，甚至还送錢給他們。麥克阿瑟以當過東條秘書官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及其他數名舊參謀本部及軍令部的對蘇作戰的高級參謀爲主幹，並以有末精三(日本前駐德意兩國的武官、日本投降時的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河邊虎四郎(日本前駐蘇武官、日本投降時的參謀次長)兩名前陸軍中將(兩者都是對蘇戰略家)爲顧問，讓他們參加太平洋戰爭史——實際上不過是寫麥克阿瑟個人的榮譽戰史——的編纂工作。而美國佔領軍方面則由韋洛比少將——反間諜情報機構長官、第二局局長——出面主持。該書的編纂所則設在日本郵船公司的大樓上。根據曾參加這項工作的丸山一太郎氏最近公開發表的材料(見“中央公論”，一九五二年五月號)，這項工作純係編纂戰史，其所以選用上述人員，完全由於他們過去所擔任的職務可以熟習關於這問題的日方史料之故，此外並無其他意圖。但按上述陣容來看，事實決非如此。這項工作是具有極其嚴重的秘密性的。丸山說他參加這項工作是由一九四七年六月開始的。即使丸山本人除編纂戰史外並未參加其他活動，但是他對於該所“爲了蒐集資料曾和全國各地數百名舊軍人取得聯絡”一事，也深深“懷疑在美軍總司令部包庇下集合十數名作戰專家的舊軍人暗中在幹‘什麼’勾當”，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實際上這並不是“懷疑”，而是事實。丸山在他自己所寫的文章裏說：韋洛比少將“認爲日本的重新武裝是早晚必至的，所以他爲行將到來的日子作準備，並以使火種不熄滅這種深謀遠慮(1)的眼光看待我們舊軍人”。而

<sup>①</sup> 韋洛比少將是駐日美軍總司令部第二局局長，第二局主管佔領日本的軍政、民政、情報、治安等事宜。——譯者

“当朝鮮战争危机四伏之際，屢次有某些人从編纂室裏失踪了，雖然明知这些人仍在郵船大樓的某处工作，但他們爲了什麼任務在什麼人的房間裏，畢竟不是我所能探知的事情”。“並且有一天，由於偶然的机会有，我看見某人正在他的桌上擬製有關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日本防禦計劃的詳細方案”。这就是說，麥克阿瑟爲了重新武裝日本和对苏作战，並沒有把日本軍閥的“火种”加以熄滅。

關於美軍總司令部在內心中如何反对解散財閥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对於前者的反对，將在下面再加說明。美軍總司令部雖曾一度將財閥巨头們当做战犯嫌疑者加以逮捕，但是旋即以不起訴处分把他們全部釋放了。此外，天皇对战争的責任雖昭然若揭，但是美軍總司令部絲毫也不加追究。至於美國政府及美軍總司令部所導演的“天皇是人而非神”的宣言这齣奇妙的戲劇，其真正用意並非爲了使天皇制民主化，而是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挽回天皇对日本人民所已經迅速消失的威信；同時也是爲了保存天皇制，“擴大天皇的声望”，並替“天皇收買人心”（“日本日記”）。

当日本人民正要開始有效行使麥克阿瑟表面上業已賦与他們的權利時，麥克阿瑟喜欢把这些權利再奪回去。諸如言論自由、遊行示威、罷工、集体談判等權利無不如此，具体情形留待後述。美軍總司令部雖特別強調言論自由，但是既不配給紙張，又無其他任何實際支持；而对書報雜誌的檢查却非常嚴格。我們寫了一百年前西方列強在亞洲幹了些什麼勾当，即歷史上尽人皆知的事實，甚至都被美軍總司令部的檢查官給刪去了。这因爲日本是处在美國的佔領之下！據美國新聞記者約翰·根室的記載，麥克阿瑟本人就曾證过：“日本是八千万人的大集中營（德國納粹黨專爲監禁反对納粹的人民而建造的全世界最殘忍的大監獄）”（根室：“麥克阿瑟之謎”）。集中營內的“自由”和“民

主義”，就是麥克阿瑟給予日本人民的“自由”。

美國爲什麼要採取這種對日政策呢？他們想使日本成爲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在東京的美軍總司令部內部，自佔領之初——不，僅僅是在剛一開始佔領的時候——在對日政策上就有兩派對立的意見。馬克·蓋因遠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本日記”中說：“在美軍總司令部內部的嚴重分歧正在繼續發展着，製訂對日政策的全体人員終於分裂成爲兩個敵對的陣營。一個陣營確信日本必須根本加以改造，另一個陣營則以唯有保守的日本才是在行將到來的對蘇鬥爭中最可靠的盟友爲理由，反對加以基本的改革”。後一陣營的勢力不僅在美軍總司令部內部，並且在華盛頓政府內部也都是日益增強着。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當美軍總司令部討論日本壟斷資本家整肅法案時，庫列斯威爾上校爲反對整肅，甚至說出“把波茨坦公告葬送到地獄裏去！”這種話來。馬克·蓋因說：“其中存在着行將到來的對蘇戰爭這種極不自然的威脅觀念。總司令部對於批評其行動的通訊社特派員的報道，則以激怒相待。‘我們在和俄國人戰爭，你究竟站在哪一面！’他們好像根據不久即將和蘇聯開戰的想像，而認爲無可避免地必須修改預定的改革計劃。至於整肅這一類衷心願意協助對蘇作戰的人物和團體，當然更非他們所期望的了”（“日本日記”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記）。諸如此類的話，在“日本日記”裏還可以找出很多。據麥克阿瑟的“親信派”說，對於麥克阿瑟來說“首先需要將日本變爲美國空軍轟炸整個西伯利亞的基地”。“麥克阿瑟堅信日本可以代替中國成爲美國遠東政策的中心環節。他日益相信爲了阻止中國共產主義勢力的蔓延，應該並且可以使用軍事力量。”他認爲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獲得的唯一積極性的成就，就是對日的勝利。由於這個勝利才鞏固了以日本爲新的跳板，以菲律賓爲背後基地



的美國战略地位（“日本日記”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記）。

儘管腔調各有不同，但是麥克阿瑟等的這類意見，無疑地也就是以杜魯門爲首的美國政府及美國統治階級的基本方針。美軍總司令部和美國政府之間的差別，甚至还不如過去日本關東軍和日本政府之間的差別大。在把日本作爲美國对苏联和对亞洲的基地这种根本問題上，美國國務院和美軍總司令部中一部分“日本改革派”，也都和麥克阿瑟等的意見完全一致。“改革派”之所以反对麥克阿瑟軍人派，只是因爲他們考慮一切事物時過於偏重純軍事觀點，而对複雜的政治問題上則沒有加以足够的考慮罷了。即使曾对麥克阿瑟的“失敗”進行过猛烈攻擊的鐵克斯特所著的“日本的失敗”一書中——此書寫於一九五〇年，序文是由美國國務院有名的遠東問題專家、“改革”派的理論領袖拉鐵摩爾博士寫的——的結論也是：“如果美國想把日本變爲它的可靠的对苏联和对亞洲的軍事基地，除应將日本的軍人統治改爲文官制以外，还必須把对日媾和再拖延數年。”麥克阿瑟之所以被攻擊，並非由於他在使日本民主化問題上的失敗，只是由於他在把日本人民完全拉攏到美國方面來的問題上失敗了的緣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苏联和美英戰爭目的的分歧和对立就開始明顯地表露出來。美、英兩國企圖奪取日、德、意帝國主義的遺產來削弱苏联，並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繼續加强对苏包圍。美國之所以在日本投擲原子彈，不僅限於前述目的，即企圖对日本和世界造成美軍在苏联參戰前已予日本以决定性打擊的印象，同時也是爲了向苏联誇示當時还爲美國獨佔的原子彈的威力，藉以威脅苏联。唯其如此，对日戰爭剛剛結束，麥克阿瑟、美國政府以及整個美國的統治階級隨着立即从事把日本變爲美帝國主義的遠東軍事基地的活動。所以它們雖曾暫時僞

裝了一下改革者的姿態，但旋即努力來保存和復活日本的舊勢力了。

既然日本處於這種佔領者之下，那麼為什麼還實行了若干彷彿像改革那樣的东西呢？這個原因以後將舉出具体事实來加以說明。簡單說來：第一，這是由於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和經常受其威脅的亞洲各國人民以及苏联強烈要求日本和平化和民主化——它的共同綱領則為波茨坦公告——的力量之所賜；第二，這是日本民主和平勢力在國際民主勢力的鼓勵和援助下奮鬥的結果。這就是說只有國際民主勢力和日本民主勢力團結起來，在各種不同的形勢和情況下與國際壟斷資本勢力及日本一切反動勢力的聯合戰綫進行了不斷的鬥爭才使日本的改革成為可能。因此，說日本的民主化是受外部之賜，一部分是正確的。但是這所謂“外部”，是指世界的和平民主勢力，並非指麥克阿瑟等美國統治者。

## 第二章 革命与反革命

### 第一節 第一次革命高潮

#### 一 日本投降以後的慘狀与人民組織的萌芽

在美國佔領軍和它所“利用”——正確的說是作為它的走狗同盟——的日本反動政府下，日本人民的生活遭受了空前的殘酷破壞。除了少數資本家、特權官僚和地主富農外，所有的日本人民無不在飢餓線上掙扎。主食的配給標準，假使以大米計算，僅和兩合一勺<sup>⊖</sup>所能產生的卡路里相等；這還是連原屬家畜飼料的豆餅、馬鈴薯皮的卡路里都計算在內了。人們並非在吃飯，而是吃了由辦公桌上所計算出來的卡路里。由於蛋白質特別缺乏，普遍發生了營養不足的現象。但即使是這種配給，自一九四六年開始，還經常是遲發或者欠發；而到了同年三月以後這種情況就更嚴重了。此外，連燒飯的燃料都沒有，所以在嚴寒的冬天想用木炭暖暖窩棚，那就被認為是太奢侈了。至於添購新衣服，在人民來說幾乎是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了。

由於政府對大資本家的付款——包括軍需品“貸款”、各種軍事“補償費”、美軍設施費以及其他支出——以致急劇的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投降時日本銀行的貨幣發行額高達二百八十六億日元；但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就迅速超過六百億日元了。資本家對於為和平生活而恢復生產實行怠工，並採取了囤積原

<sup>⊖</sup> 十日勺為一日合，十日合為一日升，一日升相當於我國一點八市升。——譯者

料和依靠通貨膨脹坐待原料漲價的手段。生產由於資本家的怠工急遽的減少了，這給通貨膨脹火上加油；同時也給壟斷資本帶來了一個危機。銀行存款急遽的減少了；靠軍需生產支持的戰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系崩潰了；銀行對於企業的支配力量也發生了裂痕。於是日本政府在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部的命令下，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頒佈了一個自稱是爲了遏止通貨膨脹的“經濟金融緊急措施法”。其中規定以新日元代替舊日元，強迫人民將其持有的一切舊日幣概行存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而人民自存款中所能提取的生活費數目，每戶每月只限於三百日元，家族每人只能提取一百日元。至於提取企業資金，一般也是很難辦到的。因此銀行獲得了大量並無被提取之虞的存款；而這種存款的貸借，却要按照政府所規定的企業種類順序辦理，並附有無數的麻煩條件。這使銀行取得了對於企業的絕對支配力量。自然，通貨膨脹並未因此停止。壟斷資本和政府勾結在一起，他們想要有多少新日元就可以有多少。雖然宣傳說不論窮富都得過每月三百日元的勒緊腰帶生活；實際上，資本家的生活並非如此。他們可以鑽無窮無盡的空子，過着隨心所欲的豪奢生活。貨幣發行額在禁用舊日元以後，僅僅降低爲一百五十億日元；其後不久復又急遽增加，到了第一次吉田內閣成立時，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已經增加到三百六十三億日元；而吉田內閣更有計劃地促進了通貨膨脹。

工人的實際工資降低到驚人的地步；生活費指數如以戰前一九三七年爲標準，則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東京上漲了十四點八倍，在大阪上漲了約二十二倍。在同一時期內的工資，每日平均工資從兩日元四角八分增加到十日元七角八分，不過增加了四點四倍。單從這個指數的比較來看，雖可認爲勞動人民的生活程度降低到僅及戰前的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但單憑這一點實際上並不能得到關於工人的工資低微和生活實況的明確印

象。这个所謂一九四六年的生活費，是悲慘已極的生活費用，其中大部分是用在不堪人類食用的、營養不足的伙食費上面。吃的是相當於二點一合到二點三合所能產生的卡路里的主食配給及由黑市買來的若干食品，穿的是襤褸不堪的衣服，住的是原始人的窩棚或兩家合住一間四疊半草蓆的房子。總之，如果用戰後名義工資的指數和物價指數相比較，據此來談論實際工資究竟提高和降低了多少，是毫無意義的。假使以收入來衡量人們實際能過怎樣的生活，那麼從戰爭末期到投降後的工資，簡直連列入“低工資”的範疇都够不上的。

在這種嚴重的糧食危機、通貨膨脹以及一般人民生活在衣食住行<sup>①</sup>各方面都遭受了空前破壞的緊急時期，數百萬人却被無情地拋到街頭變成了失業者。在戰時藉徵用和動員奪去其長期賴以為生的買賣和職業，被迫往鑛山和軍需工廠去從事奴隸勞動的人民，與戰爭結束同時，又以“打了敗仗沒有辦法”為口實，連一文表示同情的退職金都未發給就被解僱了。即使根據一九四六年四月厚生省的人口調查：在調查前的一個月內，完全失業者為一百五十九萬人（其中婦女五十三萬人）；僅工作一日至七日者為九十六萬人（其中有婦女二十七萬人）；工作八日至二十日以下者為二百一十九萬人（其中婦女五十萬人），共計有四百五十四萬人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這個數字，不論從婦女失業者是以極端縮小了的數字來計算的——因為婦女即使失業却被當做“重回家庭”者而不算作失業者——這一點來看，或從小販及返歸農家的人未被當作失業者來看，實際上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的人數將超過這個數目的兩倍。至於就業工人，也因

<sup>①</sup> 當時交通運輸之所以極端困難，不僅是由於戰爭對交通運輸設備的破壞和火車用煤的嚴重缺乏；而且還由於這種貧乏的運輸力量大部分被美國佔領軍所獨佔的緣故。根據馬克·蓋因的“日本日記”所載：仙台美國佔領軍的軍官為了去東京遊逛，竟坐開了專車。——原註

爲資本家對生產怠工，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全體工廠工人整月內的平均就業日數不過十九點一日；其後雖略有增加，但是也僅止於二十二點九日而已。總之，整個工人階級都是在極不安定的就業狀態中。

農民的處境也絲毫未見得好些。有人傳說小生產者的農民，在空前的糧食危機和通貨膨脹下，曾利用黑市交易賺了錢。中農以上，特別是靠近城市的農場主，確實曾有意外的繁榮。但是佔日本農業人口大多數的、經營土地面積不到五反<sup>⊖</sup>的貧農，不僅沒有餘糧從事黑市買賣；而且還得忍受極其殘酷的徵糧制度的痛苦。他們因爲缺乏肥料，收穫大減；並且還得养活從軍隊和工廠（徵用勞工）復員歸來的家族，因此自己的食米都發生了困難。雖然如此，政府仍把空前的糧食危機的責任加在農民身上；一九四六年三月日本政府以強制手段徵購糧食。同年四月政府對東京附近在全國徵糧成績最壞的栃木縣芳賀郡某村發動了第一次的強制徵糧；可是遭到警察闖入的任何家庭，還在四月裏就已經連食米都沒有了。貧農已在吃草度日。一方面小農和貧農遭受了這種殘酷的掠奪；另一方面把持農村權力的富農和地主，却將他們所有的上等田地和貧農的下等田地都按每反相等的數量來攤派徵糧。他們並隱瞞田地、逃避徵購，以便減少自己的攤派額，而把負擔轉嫁到貧農和小農身上。他們從事黑市交易大發其財；但警察對於這些老爺們的所作所爲却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此外，農民大眾並因如後所述的地主們的拚命收回出租土地，以致陷入不安定的深淵裏。

那末，工人、農民和一般市民大眾如何來擺脫這種悲慘的境況呢？他們最初爲了處理個人問題已經精疲力盡了。他們既無有組織的行動，也不會尋求政治上的解決途徑。这也難怪他們，

⊖ 一反合九·九一八公畝。——譯者

因為當時並沒有一個給日本國民指出一條應走的道路並領導他們前進的組織。假使戰時在非法狀態下有一個全國性的人民組織從事地下活動以待時機，並與戰敗同時能出面活動，來集中日本人民大眾的力量追究戰犯，阻止他們盜竊國家財產，並為重建和平民主的國家和國民生活進行有組織的活動，那麼日本國民即使在長期戰爭、盲目轟炸和戰敗的破壞下，大概也能過比目前還要稍好一些的生活。然而這種有組織的民主勢力，戰爭時期既不會存在，而在日本投降後舊統治階級極端動搖的头兩個月內也未曾出現。在日本固然也有許多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是其中最優秀的大部分人們，在日本投降後仍然被關在監獄裏。在監獄外面的人，也沒有一個統一領導的組織。如果說美國佔領軍是解放日本人民的軍隊，那末與日本統治階級投降同時，它必然會釋放一切政治犯，廢除一切鎮壓人民的法令並宣佈其歸於無效，藉以促成人民的革命活動。但這種事情是不應對美國軍隊存有任何希望的。因此對於人民革命最寶貴的兩個月時間就這樣浪費掉了。而美國佔領軍却利用這段時間通過日本政府組成了密如蜘蛛網的反革命佔領機構；日本反動勢力也乘這個時機大体完成了和佔領機構保持有機聯系以便生存下去的準備工作，開始從戰敗的震動下站穩了腳步。美國佔領軍等到將這一切都準備就緒以後，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開始發佈了釋放政治犯，廢除“治安維持法”等的所謂“日本民主化”的抽象指令。

以德田球一為首的共產主義領袖們及其他許多黨員，從多則十八年少則數年的監獄生活中釋放出獄後，立即號召日本人民為打倒天皇制度、建立人民共和國、無條件地廢除寄生地主制度、組織工會的自由、建立集體談判權、廢除維護軍閥、官僚和壟斷資本家利益的統制經濟、建立由人民管理並為人民利益的計劃經濟、實行十八歲以上的男女平等的普選、廢除一切鎮壓人民的法令以及為建立基本人權而奮鬥，而他們則站在人民的前列

開始進行積極的活動。日本共產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恢復了它的機關報“赤旗報”，發行了復刊第一號，在所有的工廠、鑛山、農村和城市建立工會、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以及建立其他為克服糧食危機的市民組織；此外，共產黨除領導羣衆進行了反對解僱、要求提高工資、反對地主收回租地、要求減免地租、反對強迫徵糧制度、揭發軍閥、官僚和壟斷資本家所隱匿的物資並使其歸人民管理等鬥爭外，並召開了整肅戰犯人民大會，活潑地展開了宣傳黨的綱領的活動。根據日共總書記德田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到三日所舉行的第四屆（從日本共產黨成立時算起）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當時日本共產黨黨員人數為一千一百八十一名；“赤旗報”第一號發行數一萬份，嗣後繼續激增，第五號的發行數已達九萬份；而以後要求入黨的人數也迅速地增加了。

戰前的民政黨、政友會和社會民主主義各政黨的舊幹部，在日本投降後雖然立即從事重新組黨的準備工作；但是他們並非用製訂政策訴諸國民的方法爭取同志，而是由他們私下商妥以後來拉攏黨羽。所以他們彼此間勢力的爭奪非常劇烈，很難形成一個統一的政黨。但是當他們看到共產黨的活動有着顯著發展時，於是便張皇失措勉強湊合起來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月底到十一月之間，先後成立了日本進步黨、日本自由黨、日本社會黨和協同黨等。進步黨是以舊民政黨的部分人員和舊政友會的中島派為中心；自由黨是以舊政友會的鳩山派為中心湊成的。這兩個政黨都公然以壟斷資本家、地主和官僚為基礎，而以“維護天皇制”為其最大的口號。這兩個黨在成立時的幹部和議員，其中大部分都由於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公職整肅令被整肅了。

社會黨是由戰前的社會大眾黨及其他各色各樣的“無產黨”幹部合併湊成的。它網羅了為“防止赤旗的暴風雨”（西尾末廣語）由資本家公開派遣到工農陣營的最右翼分子片山哲、西尾末



廣等以及願意和共產黨合作的各色各樣社會民主主義者，而黨的領導權主要掌握在右派手裏。社會黨的階級基礎，是小資產階級和已經爬到半封建性工頭地位的工人貴族，它的口號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單就這個口號來看，好像它比以實行民主主義革命為當前目標的共產黨還要激進；但是它所謂的“社會主義”，並非要打倒資本主義，而是要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政策，它甚至反對廢除專制的天皇制度。社會黨內那批曾充當過大政翼贊會<sup>①</sup>和產業報國會<sup>②</sup>的幹部，並曾驅使工人從事軍事強制勞動的傢伙，後來被整肅並禁止擔任公職。協同黨的階級基礎主要為地主富農，它的綱領號稱提倡“合作社主義”，主張採取保護小生產者的、比右派社會黨還要軟弱的社會政策。

日本人民開始有了自己的組織。雖然在日本投降時，連一個工會都沒有；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工會已經發展到九百二十五個，加入工會組織的工人計有四十九萬人。一九四五年年底制定了工會法，宣佈所有公私企業的工人，都享有組織工會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等。無條件承認這類現代工人應有的權利，對於發展工人組織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底，工會已有七千三百五十三個，加入組織的工人計有二百七十九萬人。在工會中，一部分與戰前的“日本勞動總同盟”有聯繫，主要是以行業為單位所組成的；它們採取勞資協調主義的立場，未明確規定有支持政黨的自自由，且有許多工會公開表示支持社會黨。其餘的大部分工會則原則上是以企業為單位所組成的，它們堅持工人階級立場，公開聲明反對資本家；這些工會幹部多半屬

① 大政翼贊會是日本戰時——一九四〇年十月成立的日本法西斯統一政黨，日本反動政府利用它代替已被解散的各政黨。——譯者

② 產業報國會是日本戰時成立的御用法西斯工會，利用它代替已被解散的各工會。——譯者

於共產黨系統，會員有支持政党的自由。在一九四六年春，這兩大系統的工会，尚未發展到明顯分裂的程度，立場不同傾向不同的各地工会，曾組成了地方工会協議會。

隨着工会的發展，工人反对解僱和要求提高工資的爭議日益劇烈起來。自一九四五年年底起，罷工運動首先在煤礦和金屬、機械工廠爆發；及至一九四六年，所有各地的一切產業部門都展開了鬥爭。工人在最初的爭議中，經常採用了管理生產的戰術。資本家選擇了生產怠工的手段，一方面利用高抬貯存物資和原料的價格坐收其利，另一方面則解僱工人和听任實際工資下降。爲了與資本家相對抗，工人在罷工時並不放棄工作，却實行管理生產，並藉管理工廠生產獲得利益，以保衛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的生活。工人自行管理生產不僅可以粉碎資本家的生產怠工，而且顯示了資本家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不但毫無用处，並且是一種障礙。所以這種戰術非常適合當時的日本國情，因此獲得了人民大眾的一致擁護。這對於資產階級來說，不論在物質上、精神上、政治上都是嚴重的打擊。

在日本農村裏，也到處都掀起了反对強迫徵糧、反对地主收回租地以及要求減免地租的鬥爭浪潮。幣原內閣的農林大臣松村謙三曾在一九五二年三月某次座談會上回憶當時的農村情形說：“我爲了督促徵糧前往新潟、秋田、山形各縣附近視察農民情形時，使我感到情況非常不妙；疲於長期戰爭的農民心理，決非維持現狀所能平息。農民不斷說：‘我們不能安於忍受這種租佃制度’。我看了這種情形，認爲現狀絕對維持不下去，土地問題將一定發生。這使我痛感如果置現狀於不顧……農村將陷於混亂不堪的狀態”（“改造”月刊，一九五二年四月號增刊）。當時的日本農民協會中央委員稻村順三在同一座談會上也說：“農民當時既感到受地主的壓迫，又感到政府強迫徵糧的痛苦。這是由於戰敗使農民產生了類似暴動的情緒。他們說：‘誰會交什麼米，誰會

放棄土地’。這就是他們當時的情形”。這兩個人的談話，並沒有誇張。所以日本政府，爲了緩和農民情緒，爲了維持農村中的反動秩序並使農民溫順地拿出米來，在接到美軍總司令部的“土地改革”指令以前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內閣會議上，就通過了第一次的“土地改革法”。關於這個法案，我們將在下面詳細說明。農林大臣松村在衆議院說明這個法案時曾經說道：“如果不能用最穩健和最可靠的方法”實現“土地改革”，那麼日本農村“不僅在增產糧食上，而且在思想和文化上也有陷於極不安定狀態的危險”。

第一次“土地改革法”的頒佈，實際上起了促使地主加速收回租地的作用。從一九四六年一月起，僅就官方調查的數字來說，發生土地糾紛的次數，每月已超過三萬件。從日本投降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地主收回租地的件數，官方的統計數字雖總計不過二十萬件，但估計實際數目將超過這個數字的十倍。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就是說，每月最少有三萬件反對地主收回租地的糾紛案。因此農民鬥爭的激烈程度是過去所不可能想像的。在這種鬥爭過程中，一九四六年二月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日本農民協會”（簡稱“日農”）組成了。在全國所有的農村裏幾乎也都建立了日本農民協會支部。

一九四六年三月當日本政府決定採取強制徵糧制度時，全國二十多個府縣召開了反對這個措施的農民大會，參加大會的人數從數千人到兩萬人不等，農民的憤慨幾乎釀成暴動。例如在栃木縣曾有農民一萬多人兩度集合在縣政府，迫使縣長答應了在他發動強制徵糧之前，必須先和農村常務委員會商量。

日本農民曾經發揮日本農民協會的組織力量，要求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而非虛偽的土地改革。戰前日本的農民鬥爭，幾乎全部都是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鬥爭。但是現在却環繞着要求徵糧合理化、民主化，以及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這類問題，發展成

爲佃戶、自耕農並包括中農在內的廣大勞動農民羣衆具有政治意義的鬥爭了。

市民也發動了克服糧食危機、揭發隱匿物資並將其實行民主管理的運動，在各地成立了糧食管理民主化聯盟及其他各種市民組織。日本政府對於這類揭發，一面把檢舉隊視爲強盜，一面詭稱所謂隱匿物資實在並無其事。但是實際上則如前所述，高級官僚、軍人 and 大資本家曾盜竊了大量的衣料、糧食、工業器材和原料。在學校方面，一九四五年十月東京上野某女學校學生揭發了該校校長等的不正行爲，並表示反對軍國主義教育。這一行動曾經轟動一時，而以此爲開端，立即在日本全國掀起了與此相同的、排斥軍國主義校長和要求校內民主化的運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運動首先在女學校、中學校和師範學校發動起來，而大學、商業專科學校學生展開反對法西斯教授的鬥爭，乃是以後的事情。

當時日本的新聞雜誌界，曾比較正確地反映了這時輿論的動向。日本報紙像當時這樣激烈地連日攻擊政府的反動，像當時這樣多的報道工人和農民的動向，簡直是空前的舉動。一九四六年一月，當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從十六年的流亡生活返歸日本時，所有的報紙恰如對待一位凱旋將軍似地來歡迎他。

日本的工人、農民、市民及一切勞動人民在新的政治生活面前覺醒了，他們的政治熱情燃燒起來了；這無疑地是革命情緒的高漲。舊統治階級的威信隨着日本的戰敗正在繼續崩潰下去。日本天皇、將軍和大臣，昔日的威嚴喪失淨盡。不論在哪一個縣政府裏，都可以看到身穿工作服的工人、農民和市民隨便出入縣長室對縣長高聲叱咤。對於有組織的羣衆，連警察都不敢過問。至於勞資糾紛，勝利總是屬於工人的。一切人民大眾的威信也開始建立起來了。

假使在這個時候能把工人、農民和市民的單獨鬥爭統一起

來，爲爭取政治權力進行有意識的、有計劃的鬥爭；假使在這個時候能够組成人民民主的統一戰綫，爲保證全國人民獲得民主、職業和土地的权利進行鬥爭，爲建立一個能够負責重建祖國和平的、人民的民主政府而鬥爭；那麼雖然同樣在美軍佔領之下，也可以使民主化稍爲徹底一些。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日本共產黨雖然曾向當時準備組織社會黨的人們提出上述的聯合鬥爭的要求，但是他們藉口建黨以前不能表示意見拒絕了這個要求。接着日本共產黨在十一月八日正式決定和發表了人民統一戰綫綱領，並在十二月六日，由共產黨代表再度向當時業已正式成立了的社會黨（十一月二日成立）提出了聯合鬥爭的建議，其中表示儘管由於兩黨對天皇制的意見不同而在這一點上不能採取一致行動，但在日常鬥爭、勞資爭議、農民運動等能够意見一致的問題上仍可進行聯合鬥爭。然而社會黨對於這個建議的答覆是：“從中央到地方，都拒絕聯合鬥爭”。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東京日比谷公園會召開一次歡迎野坂參三歸國的人民大會，參加大會的約有兩萬人。當時野坂參三曾強調指出在日本天皇政府那種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殘酷迫害下，爲了反對侵略戰爭和爲了民主主義而鬥爭的共產主義者才是真正的愛國者的這一事實，同時並號召團結一切共產主義者以外的無數愛國者，爲了人民的民主主義而不是爲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組成民主統一戰綫。這個號召，曾受到羣衆的擁護。於是，人民大眾要求建立民主統一戰綫的聲浪日益高漲；但是社會黨却誣衊共產黨不講信義和友愛，不但反對建立統一戰綫，甚至仍然拒絕了聯合鬥爭。

## 二 從幣原內閣垮台到五一勞動節與糧食勞動節

美軍總司令部對於日本人民迅速的革命覺醒和在全國各地日益發展的人民鬥爭是密切注意毫不放鬆的。它的判斷是：要

在民主統一戰綫建立之前舉行大選，並必須使保守勢力獲得勝利。曾研究過美軍總司令部當時的对日政策的美國太平洋問題研究會的畢遜，在他的著作中說：美軍總司令部對於一個被輕視為“習慣於威权統治的臣民”的日本人，能够“利用日本投降的機會迅速而活潑地展開了爭取民主的行動”，曾感到“驚奇和惶惑”。此外，他还說：“當時日本人民的新興勢力在解決日本各項問題上，毅然採取了獨立和激進的態度；而同時由於保守派也適當地換上民主的招牌正重新組織起來，所以美國佔領當局在決定第一次日本大選時期的問題上，曾引起決定性的嚴重分歧。反对早日舉行大選的人，認為舊勢力事實上仍舊支配着日本的政治機關，所以他們主張必須給予人民以充分的時間去建立全體國民的組織，使人民的新興勢力能够進行有效的選舉鬥爭。這一派人認為如果早日舉行大選，只會重新加強在新招牌下的舊勢力，使其改頭換面以新姿態出現而已。另一派人主張应当早日舉行大選，他們認為佔領的主要目的，乃是尽可能在短時期內建立日本人的負責政府（中略）。但是我們難道能讓日本民主前途的這件斗篷，披在社会党和共產黨的領導者身上嗎？美軍總司令部根據這種考慮，不顧遠東委員會应当緩期舉行大選的劝告，仍然決定了早日舉行大選。”（見畢遜：“日本民主主義的前途”，一九四九年紐約版）

於是，美軍總司令部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民主主義的形式來保存反民主的勢力。縱然說美軍總司令部對於大選運動的露骨干涉並不太多，但是根據上述考慮決定大選日期，已經是超級的干涉行爲了。美軍總司令部規定四月十日（一九四六年）為選舉日期。根據一九四五年年底所製定的選舉法，在新選舉中，男女的選舉权和被選舉权完全平等，並在大選舉區採取了可以在選舉票上選舉兩名或三名候選人的有限制的連記名投票制。日本共產黨在選舉鬥爭中的基本口號，是廢除天皇制度，建立人民政

府。因此日本共产党成爲以反共和維護國体、即維護天皇制爲唯一招牌的自由、進步、協同各党的主要攻擊目標；社会党也拒絕和共产党進行聯合鬥爭，而參加了維護天皇制的陣營。

當選舉鬥爭進入高潮時，在日本全國各地舉行了由工人、農民和市民团体所主办的打倒幣原內閣的人民大会。參加大会的除共产党员、社会党員外，還有廣大的一般人民。特別是在日本首都東京，幾乎每日都有一萬到數萬名的工人、市民和近郊農民，不斷舉行了旨在打倒幣原內閣的集会和示威遊行。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即在投票前夕，在東京舉行了有數萬人參加的倒閣人民大会，並於會後前往首相官邸遊行示威。儘管守衛首相官邸的警察隊曾經以手槍威脅示威隊伍，但是羣衆相繼擁向官邸門前，而且不肯離開一步。示威隊伍採取了包圍首相官邸的隊形，不斷高喊“要求幣原內閣立刻辭職”的口號。不久約有一百五十名武裝警察馳來增援，警察隊命令示威隊伍立刻解散，最後竟開槍射擊。羣衆的情緒越來越激昂，正當羣衆要和警察相打時，美國憲兵的吉普車闖入羣衆隊伍，並立即用棍棒毆打羣衆。聽到情形緊急的消息後，美軍第一騎兵師霍夫曼准將所指揮的六輛坦克部隊開來增援，他們不僅佔領了通往首相官邸的一切馬路，並且採取包圍陣勢準備在必要時一舉消滅示威羣衆。此外，美國憲兵分乘六輛吉普車在示威隊伍中縱橫馳騁，在羣衆代表正向內閣官房次長要求會晤幣原首相時把羣衆驅散了。當時目擊這種情形的美國新聞記者曾經互相議論說：“這和德國革命及希特勒上台時的情形一模一樣”（馬克·蓋因：“日本日記”）。美國政府僅在離此半年前還發表聲明說：日本人民爲了達到民主革命的目的必須行使暴力時，只要不威脅美國佔領軍的安全和妨礙佔領的目的，美軍即不予干涉。然而連日本人民舉行一次完全非武裝的、根本談不上暴力革命的示威遊行時，美國軍隊竟動員了如此大規模的武力進行鎮壓。美國式的、麥克阿瑟式的“民

主義”就是如此。

美國佔領軍之所以在四月十日(一九四六年)的大選前夕進行了這個鎮壓,不外告訴日本政府及一切反動勢力,它將堅決地站在它們一邊,並對它們加以鼓勵。大選的結果自由黨當選人數為一百三十九名成為第一黨;第二黨是進步黨,當選人數為九十三名;社會黨的當選人數為九十二名,僅比進步黨少一名。社會黨的這種飛躍發展和共產黨雖在其他各黨集中攻擊下仍能獲得約二百一十四萬選票及六名當選者;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完全是意外的打擊。

照例在大選後,必須以新國會為基礎重新組織內閣。但是幣原首相因為美國佔領軍在四月七日替他驅散倒閣示威隊伍,從而增加了勇氣,無論如何也不肯實行內閣總辭職。幣原利用當時進步黨正被黨魁問題所苦惱的機會取得了該黨的總裁地位,他以這個地位一方面裝出要把內閣放在國會和政黨的基礎上的姿態;另一方面表示他的地位是受命於天皇的大權,因而沒有天皇的命令,他就不能離去。幣原公然搬出明治時代官僚內閣的腔調而想繼續戀棧下去。根據社會黨的提議,在社會黨、共產黨、協同黨、自由黨共同參加下,組織了一個四黨聯合倒閣委員會。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聯合力量是偉大的。自由黨之所以能夠採取這一和共產黨聯合的空前行動,是因為自由黨害怕它被擯棄於反對幣原內閣的羣衆鬥爭之外的緣故。在國會以外,工會、農會、市民團體及其他民主組織,也都為了打倒幣原內閣而一齊行動起來,組成了倒閣執行委員會。人民大會不斷地召開,示威遊行連日震撼了首相官邸。假使從這種和國會內外互相配合的偉大鬥爭來看,簡直是人民大眾所期待的民主統一戰綫已經開始走上第一步了。事到如此,不論幣原如何以美軍總司令部和天皇的大權為靠山,也不得不提出總辭職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這是社會黨和共產黨兩黨因聯合而取得統一的人民



羣衆反对天皇專制主義大仗鬥爭的勝利；大日本帝國憲法，也在這時被人民所粉碎了。从此以後，任何一個日本政府，想靠天皇的權威和勢力撐腰已經不再可能了。

幣原內閣總辭職後，自然应当以倒閣主要力量的社会党爲首，組織在野各党的聯合政權。社会党提出由它担当首相的要求，並曾得到共產党的有力支持。當時共產党並不一定想要參加內閣，只是要求由四党就糧食、通貨膨脹及失業等問題有關當前的緊急政策締結協定，並由社会党所領導的內閣來實行。對於這一點，自由党除要求由它担任首相外，並藉口在修改憲法問題上根本和共產党的意見不同而拒絕締結政策協定。它企圖藉完全另外一個問題來轉移共產党建議的目標，以便達到破壞到那時爲止的聯合鬥爭和獨佔倒閣果實的目的。恰在這時，關鍵所繫的社会党開始分裂成爲左右兩派了。左派堅持應由社会党担任首相，否則就應該站在在野党的立場上。以西尾末廣爲首的右派和自由党相勾結，主張排斥共產党，建立以自由党爲首相的所謂全國一致的聯合政權。右派並且認爲，日本目前已陷於空前的危機之中，關於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已無爭論餘地了。僅在幾天以前的選舉中，他們還高唱由於日本已經面臨嚴重的危機，唯一拯救危機的方法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他們一旦當選，立刻就變成這種醜態了。但是假使將西尾一夥人的這種變節行爲，看成只是爲了渴望大臣地位，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了。正如以後（一九四八年一月）西尾本人在衆議院所証實的一樣，他們從大資本家那裏領了金錢，其唯一任務是以“社會主義”的姿態欺騙人民，以便達到“防止赤旗的暴風雨”的目的。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底，由於西尾等人和自由党的共同陰謀，四党聯合委員會僅剩下一個空名了。

這時，日本人民在糧食困難、通貨膨脹、失業等的危機日趨嚴重的環境下，迎接了日本投降後的第一屆五一勞動節——這

是隨着二·二六事件<sup>①</sup>被禁止舉行紀念以來的第十七屆五一勞動節。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在東京有五十萬羣衆集會於人民廣場——日本人民不知何時起把原來的皇宮前廣場稱爲人民廣場了——前，會後並在市內舉行了遊行示威。而在日本全國各地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的工人、農民及一般市民，總數竟達二百万人。大概這在資本主義各國中，要算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五一勞動節了。於是要求“穩定生活和建立民主的人民政府”的口號，震動了日本國內各地。

在五一勞動節以前，右派社會黨和自由黨在四黨聯合委員會中的陰謀活動，由於羣衆爲迎接五一勞動節而日益高漲的壓力，曾受到某種程度的抑制；但是到了五一勞動節以後，他們的陰謀策劃就日益表面化了。他們不但從四黨聯合委員會中完全剝奪了共產黨的發言權，以致使社會黨的勢力比重一落千丈；並且企圖組成以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爲首的自由黨、進步黨、協同黨三黨的保守聯合政權。就在這個時候，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鳩山一郎由於佔領軍最高統帥的備忘錄而被列爲戰犯，並被禁止担任公職。

整肅鳩山，決不表示美軍總司令部對於民主勢力具有好意，這不過是它在表面上對民主勢力的讓步而已。美軍總司令部選擇了幣原內閣的外務大臣吉田茂來代替鳩山。吉田在一九二七年田中軍閥內閣中是鳩山的同僚。吉田最初以日本駐中國瀋陽總領事的地位，成爲東方會議的最中心人物之一，其後他在田中內閣中曾担任外務次官，最後他竟爬上了日本外交官最高地位的駐英大使。他和東條等人物比起來，有傾向美英實力的區別。他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與近衛文麿等大臣勾結，主張迅速向美英投降以便反對蘇聯，這就是他被美軍總司令部看中的理由。他

<sup>①</sup> 二·二六事件，即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少壯軍人殺害政府領袖的事件，這個事件是日本進一步法西斯化的標誌。——譯者

和美軍總司令部的高級官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在幣原內閣中担任外務大臣時所以敢於公開反对解散日本財閥，那是因為他知道美軍總司令部的內心並無实行解散財閥的意思。吉田在性格上是一個典型的官僚，和民主主義既無任何關係，也無絲毫因緣。當時（和今天不同）他沒有多少錢，但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特殊寵信，他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当了自由党的總裁，五月二十一日組成了吉田內閣。

五月十五日，在盟國对日委員會上，美國代表艾奇遜關於如何處理根據東京五一勞動節慶祝大會的決議向該委員會提出的請願書問題，曾聲明說：“美國不論在世界什麼地方，都不歡迎共產主義”。吉田茂當時大概感覺這是美國佔領軍对他就任自由党總裁的賀禮吧。五一勞動節請願書的內容不過是希望建立一個民主政府而已，但是却被艾奇遜扣上一頂共產主義的帽子而表示不歡迎。

在這個時期，糧食危機依然日益嚴重。糧食配給，如在北海道遲發和欠發竟達數十日的配給量——最嚴重的時候，竟達一百四十日的配給量。在全國範圍內則遲發和欠發的達二十日到三十日的配給量。於是在東京、大阪等城市裏，開始出現了因飢餓致死的人。城市裏的小市民最初變賣他們的衣服和傢具，藉以換取些許糧食勉強过着“吃菜根的生活”，但到最後連可以變賣的東西都沒有了。另一方面，如同上述，統治者終日熱中於政治陰謀和憲法議論，他們絲毫不顧及人民的生活。對於日本國民來說，當時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吃飯”而非“憲法”。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東京市民在人民廣場上召開了“突破糧食危機的人民大會”，參加大會的計有二十五萬人。大會要求吉田內閣辭職，建立一個能保障糧食、工作、土地的人民政府。會後並到首相官邸前面舉行了示威遊行。大會的代表德田球一等除对吉田提出放棄組閣、把隱匿的糧食分配給人民及其他要求外，

並要求和吉田見面。但是這個要求被吉田拒絕了。當日數萬飢餓羣衆在初夏的太陽地上一直到傍晚，等候着談判的結果。入夜後在首相官邸外面的羣衆遵照代表們的指揮解散了，但是代表們仍舊在官邸內將鬥爭繼續堅持下去。

據馬克·蓋因在“日本日記”中說：在這種羣衆的壓力下，吉田曾在五月十九日深夜一度決心放棄組織內閣。但是第二天（二十日）早晨，麥克阿瑟發表了一個“警告多數暴民舉行示威和騷擾的聲明”。聲明中說：“他們（示威暴民）不僅是對有秩序的政治的威脅，並且威脅了佔領本身的基本目的和安全”，又說：“我爲了糾正這種可悲的狀態，將不得不採取必要的手段”。日本的資產階級報紙，都把這個聲明大加渲染。它們把五月十九日的示威遊行，儼然說成是暴徒的騷擾，並把這個事件和前此的艾奇遜聲明相提並論，報紙上充滿了藉口反共和在反共名義下的反人民色彩。實際上五月十九日的示威遊行，和所謂“暴徒騷擾”毫無相同之點。就當時的情勢說，不發生像一九一八年“米騷動”那樣的羣衆暴動是不可理解的，但羣衆竟秩序井然地採取了有組織的絲毫不亂的行動。其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爲這時有了爲一九一八年所未有的共產黨的領導和民主性的羣衆組織，即羣衆本身已經成長起來了。唯其如此，麥克阿瑟才企圖採取鎮壓日本人民的步驟。他所害怕的，並不是日本人民的單純飢餓暴動，而是已經發展爲秩序井然的、有組織的並足以威脅統治者的權力的人民力量。

五月十九日夜裏駭得發抖的吉田，由於麥克阿瑟的打氣恢復了勇氣，於是就在五月二十一日，以自由、進步兩黨作爲國會中的基礎，組成了壟斷資本、地主和官僚勢力的聯合內閣。在打倒幣原內閣後，假使沒有美國佔領軍的有力支持，民衆的革命高潮原已迫使吉田的組閣趨於流產，但是就在这最後關頭，民衆的革命高潮却被巨大的反革命勢力所擋回了。

但是通过这场斗争，终于打破了或者显著的削弱了把美国佔領軍認為是改革者的幻想。这就是說把偽裝敌人的假面具揭穿了。也只是因為有了这场偉大的斗争，才迫使美日統治階級不得不重新頒佈一個在數量上比第一次“土地改革法”較為進步的第二次“土地改革方案”，並且不得不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主權屬於國民”。

## 第二節 工農組織的發展与二·一總罷工

### 一 从第一次吉田內閣到十月攻勢

美帝國主義和人民革命之間的假“蜜月”，以第一次吉田內閣在麥克阿瑟直接支持下成立時宣告結束了。日本人民的進步程度，已經迅速超过了偽裝的“改革者”——美國佔領者——所能容忍的限度。反革命的吉田內閣為了抵抗这种革命力量，在其執政後首先發表了一個“維持社会秩序的声明”，其中除宣稱不能承認工人在勞資糾紛時管理生產的权限外，並稱將斷然採取保護“社会秩序”的步驟（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至於吉田所說的“秩序”究竟是什麼意思，則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用武裝警察隊襲擊正在罷工中的“讀賣新聞社”職工的行動中，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了。“讀賣新聞”这家報紙在太平洋战争時期——以及从这次罷工後直到目前為止——即使在法西斯工具的各家報紙中，也可算是法西斯色彩最濃厚並且是最富於战争氣味的報紙了。日本投降後，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讀賣新聞社”就組織了職工會，它除要求从事社內的民主改革外，並要求战犯社長正力松太郎——警官出身，以干預东京市政而出名的大流氓头子之一——及其他一切重要負責人必須立刻全部辭職。当这个堅持不屈的斗争進入最激烈的階段時，

十二月三日（一九四六年），正力接到美軍總司令部把他作為戰犯嫌疑者的逮捕令。於是正力松太郎不得不辭掉社長的職務，由他推荐馬場恒吾繼任社長。於是“讀賣新聞社”的罷工，就以成立一個由社長和職工代表雙方組成的經營協議會，凡有關編輯和業務的重要事項必須經過雙方協議以及其他的條件而告解決。

“讀賣新聞”從這時起，在日本資產階級各報紙中，成為最民主的報紙，因此得到人民大眾、尤其是勞動人民的支持。唯其如此，“讀賣新聞”遂遭到美軍總司令部與日俱增的壓迫，而在為了打破糧食危機的五一勞動節示威遊行和吉田內閣成立以後，這種壓迫就更加嚴重和表面化了。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馬場社長依靠美軍總司令部和吉田政府的支持，突然要求六個編輯幹部辭職，但是他們拒絕了這個要求。六月十四日，馬場社長宣佈開除上述六名編輯幹部，於是引起了反對解僱和保衛新聞民主化的鬥爭。當時職工人員既沒有舉行罷工，也沒有發生怠工現象，報紙仍舊照常發行。但在六月二十一日約有五百名武裝警察突然襲擊“讀賣新聞社”，武裝警察由社長派方面的人帶路，發生了毆打反對社長派的暴行。最後警察闖入編輯室，連一紙傳票都沒有，竟將五六名編輯部人員非法逮捕去了。這即令在聞名世界的日本言論鎮壓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暴行。“讀賣新聞社”的職工人員，最初始終根據言論自由和工會法，對這種警察暴力進行鬥爭。最後各種辦法都想盡了，從七月十三日起進入罷工狀態，職工人員據守印刷廠，使報紙無法發行。當罷工鬥爭進入第四日——七月十六日時，屬於社長派的人員在數百名武裝警察的保護下，率領暴徒數百名襲擊印刷廠，用暴力把罷工人員趕了出去。而“讀賣新聞”從第二日（七月十七日）起，又恢復了和它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完全相同的法西斯反動面目了。在太平洋戰爭中，“讀賣新聞”每日曾用最卑劣的謊言宣傳“鬼畜美

英”<sup>①</sup>的殘暴行爲，但在這次恢復反動面目以後，則竭盡全力從事把美軍當作“民主主義的救星”的宣傳，並大肆散播“赤魔蘇聯”的謊言來代替從前的“鬼畜美英”的宣傳。

吉田政府和美國佔領軍企圖在日本建立的“社會秩序”，不過是像“讀賣新聞”這種靠暴力撐腰的反動秩序而已。日本處在這種“秩序”政府的統治下，糧食配給的秩序越來越混亂，甚至有的地方發現有欠發一百四十天配給糧的現象，結果只有積極地依賴於通貨膨脹了。吉田內閣成立時，日本銀行的貨幣發行額爲三百六十億日元，但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就已經超過停止使用舊日元前的六百億日元。一九四七年一月，貨幣發行額已經突破一千億日元了。大藏大臣石橋一面謊稱通貨膨脹立刻即將停止，另一方面却讓日本銀行大量發行鈔票。日本統治階級利用通貨膨脹這種不易被人發覺的方法，盡量降低實際工資，他們不惜以榨取人民大眾的金錢來培養和復活壟斷資本。一九四六年八月，日本建立了一個復興金融金庫，資本一百億日元全部由政府出資（即是人民的稅款），一九四七年一月起開始營業，一年之內它的資本就擴充到五百五十億日元。它一方面發行“復金債券”促使通貨膨脹更趨嚴重，另一方面將二十億、三十億日元的大量資金“貸給”（與贈送無異）三井鑛山、三菱鑛山、昭和電氣工業、北海道煤礦、住友鑛山等財閥公司，幫助壟斷資本的復活。而日本政府却把這稱爲“重點主義生產”，說是復興工業必須先從恢復一切工業之基本物資的煤鐵工業着手。

在反抗以壟斷資本和大地主的利益爲“重點”的政治所引起的飢餓、通貨膨脹和工業破產的鬥爭中，日本工人加強了本身的團結和鬥爭的力量。在吉田政府和法院的鎮壓下，日本工人仍經常採取管理生產戰術來進行反抗。工會在繼續不斷的罷工高

<sup>①</sup> “鬼畜美英”是照美國人和英國人爲鬼和畜生的意思。——譯者

潮中，名副其實地一天天發展起來。一九四六年八月，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會議（簡稱“產別”）和日本工會總同盟（簡稱“總同盟”）這兩個規模巨大的全國性組織成立了。加入“產別”的工會（以企業為單位）計有二十一個，會員總數為一百六十三萬人；而日本工會總同盟也組織了八十五萬五千名工人。從這時起，以前就有分裂趨勢的日本勞動戰綫的兩種潮流，不僅在全國範圍內清清楚楚地劃分開來，而且左右對立的形勢也明確起來了。一九四六年十月，日本工會會議也成立了，加入這個組織的是那些不屬於前述兩大組織的中立派工會，會員總數據稱有三十萬人。此外，從一九四六年五月到十月，還先後成立了國營鐵道工會總聯合會（簡稱“國鐵”）、日本電氣產業工會（簡稱“電產”）等規模龐大的全國性獨立工會組織。一切勞動部門，從工廠、鑛山、交通運輸、電信部門等起，一直到學校教員、官公廳中不參加實際業務的下級職員以及公司職員等，都建立了工會組織。而在農村中，農民協會也發展起來了。

隨着全國性工會的成長，勞動爭議也逐漸具有了全國性的規模。一九四六年八月，海員工會為了反對解僱四萬三千名工人，舉行了罷工。海員工會幹部中雖有主張為階級而戰鬥的和主張勞資協調的騎牆派的對立，但是絕大多數工人聽从前者的領導。從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起舉行了連續九天的全國性大罷工，並且獲得了完全的勝利。海員工會的罷工鬥爭，為其他產業工人創造了良好的先例。一九四六年七月，日本國營鐵道當局聲明，決定從五十五萬名職工中解僱約十三萬人。關於這一點，“國鐵”工會幹部之間依然存在左右兩派的對立，以致鬥爭的行動不能統一，但是由於海員罷工的鼓勵，完成了如至九月十五日當局仍不全部撤銷解僱計劃，就斷然實行全國性罷工的準備。因此，鐵道當局終於不得不撤銷解僱工人的計劃。

接着從一九四六年秋季起，由“產別”所領導的為要求提高



工資和反对解僱工人的所謂“十月攻勢”的大規模罷工，在電氣工業、機械器具、煤礦及其他幾乎所有的大工業部門都爆發了。同時，東京芝浦電氣工会和日本電氣產業工会也舉行了罷工。這一連串的罷工鬥爭，大体都以工人的勝利而告終。這個勝利之所以為勝利，不僅在於工人達到了眼前的經濟要求，而真正的勝利乃在於使他們懂得了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意義。

## 二 二·一總罷工

當“十月攻勢”大体快要結束時，即一九四六年年底，以教員、“國鉄”、全遞信从业員工会（即全國郵電工会、簡稱“全遞”）為中心的全國官公廳二百五十一萬勞動者要求提高工資、發給年終津貼和建立最低工資制的鬥爭高漲起來了。這些工会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組成了“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簡稱“共鬥”）。約在一星期後，恰好也在進行勞動爭議中的全日本交通運輸工会和日立製作所工会總联合会等屬於“產別”系統的十六家私營公司的工会，和“共鬥”聯合起來，共同組成了“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簡稱“全鬥”）。“全鬥”的力量隨着年終的迫近日益壯大，甚至連“總同盟”的工会也与之聯合起來。於是日本全國數百萬產業工人，結合成為工人階級的整体了。

恰於這時，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遠東委員會宣佈了“關於日本工会組織的十六項原則”的決議。這個決議除認為應將工会當作日本民主化的中心力量並強調工会必須自由發展外，還規定“佔領軍当局只在它認為罷工及其他作業的停止直接妨礙佔領目的和需要時，始能加以禁止”。此外還明確訂出下列原則：准許工会參加政治活動、禁止資本家和政府向工会派遣間諜、取消其他妨害工会的組織和機關等。這個決議鼓勵了日本工人和全体人民。

然而麥克阿瑟司令部和吉田政府，竟置這個決議於不顧，它

們對於工人日益加強了高壓手段。美軍總司令部的軍官在日本工人進行全國大罷工時，曾把工會幹部叫去，口頭要求工人停止罷工。當工人追問這是否是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時，他們就含糊作答。在這以前，吉田政府及其友黨，不願共產黨和工會的反對，製定了所謂“勞動關係調整法”。其中除規定“公用事業”的罷工必須於三星期前預先報告外，還有其他限制工會活動的條款。儘管國會曾有本法案應與即將製訂的“勞動基準法”（其中規定了八小時勞動制、男女同工同酬及其他勞動條件的標準）同時實施的諒解，但吉田政府在“勞動基準法”尚未製訂前，就將“勞動關係調整法”適用於“十月攻勢”中的工會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甚至發生了官方和暴力團體殘害罷工工人的事件。同年十月底起，東洋鐘錶公司埼玉縣上尾工廠發生了勞動爭議；從十一月底起，工會採取了管理生產的行動。這個行動曾予公司資方以嚴重的打擊。在這次行動以前，每當發生勞動爭議時，就有一部分工會人員分裂工會，自稱“重建同盟”，充當公司資方和警察的爪牙，進行破壞罷工團體的活動。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重建同盟”幹部和城市的暴力團體在大宮警察署候補警佐（野呂某）指揮的武裝警察秘密保護下，突然襲擊了工廠。工會會員和在當場聲援的工人們，當時手中連一根木棍都沒有。他們全體只是用手挽着手的和平方法防禦暴徒，當然這種方法是抵擋不住暴徒的。暴徒們在警察保護下，除使包括女工在內的數十人負重傷外，並殺害了從富士產業公司大宮工廠前來聲援罷工的青年工人齋藤三郎。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僅僅手挽着手的罷工工人卻被認為犯了“暴行”而接二連三地被逮捕去了；而真正的暴徒，直到很久以後為了掩飾殺害齋藤的罪行才被逮捕了兩個人。日本的資產階級報紙只報道警察、資本家和“重建同盟”片面製造的謊言，而對於真實情況却絲毫沒有提起。並且，在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美國憲兵乘坐着吉

普車闖入罷工的示威隊伍中進行破壞。美國憲兵在東京芝浦電氣工業公司工会联合会進行罷工時，也曾幹過同樣的破壞活動。（這次罷工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其後每當發生同樣事件時，警察就公然而接襲擊罷工團體，而檢察局則以莫須有的罪名不斷地逮捕罷工工人。在這種暴力下面，以團結得似鋼鐵一般見稱的悲壯已極的罷工團體也終於失敗了。）

吉田政府和美軍總司令部的唯一勞工對策，就是使用這種暴力鎮壓工人和利用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進行分裂工会的活動。它們甚至對於像“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這種溫和的經濟要求，都置之不理（當時教員工会所要求的日薪是六百日元，而普通的工人則為一千日元）。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吉田首相在廣播演說中惡狠狠地大罵工人為“不逞之徒”。這句話曾在全體工人和民主主義者中，引起極大的憤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鑑於一切交涉盡歸無用，所以根據“勞動關係調整法”的規定，預告說：如果到二月一日資方仍不接受勞方的全部要求時，就以這一天為期限進入無限期罷工。兩天以後，吉田自由黨的外圍黨的新銳大眾黨的黨員企圖暗殺“壺別”領袖听濤克己，使听濤受了傷。於是在所謂“民主”日本，右翼恐怖分子又開始橫行了。

吉田茂一方面把工人當作“不逞之徒”，不惜使用恐怖分子進行鎮壓；另一方面他的政府和社会黨不斷地召開懇談會，企圖使右派社会黨人入閣以便欺騙工人。但是“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和“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發表宣言說：即使社会黨參加吉田內閣，它們也將為貫徹全部要求舉行總罷工。社会黨鑑於在這種情況下公開充當吉田的爪牙對於自己不利，所以中途停止了參加吉田內閣的談判。

吉田政府曾動員一切新聞報道、廣播電台、演說會、暴力團體和警察等工具，拚命努力離間勞動大眾和其他國民間的關係。

他們捏造謊言大規模進行欺騙宣傳；例如說工人老是進行罷工使國家遭受破壞、只知要求增加工資使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等等。然而，從事生產怠工、掠奪人民財富、利用永無止境的通貨膨脹把人民逼到窮困不堪地步的不是別人，正是吉田政府和資本家；它們以遠比增加工資快數倍的速度推進通貨膨脹，使壟斷資本在國民生活的破產中大發橫財。日本工人假使不以總罷工來保衛勞動人民的生活，並使吉田政府和資本家領教一下人民的力量，那麼日本這個國家將是不可救藥的；所以這個總罷工是救國的總罷工。這一鬥爭，儘管原來是從單純經濟要求出發的經濟鬥爭，但這一鬥爭後來發展成爲即使在國際勞工運動史上也是少見的大規模罷工時，就必然會帶有深刻的政治性質了。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全國工會聯合鬥爭委員會”主持下，召開了一個“打倒吉田內閣克服危機的國民大會”，參加大會者一致表示信念說：唯有舉行二·一總罷工，才能拯救祖國的危機。

美軍總司令部對於“全國工會聯合鬥爭委員會”和“全官公廳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雖然日益加緊其干涉和壓迫，但是都遭到了工人階級的堅決反擊；而吉田政府却依靠美軍總司令部撐腰，始終採取強硬態度。因此，工人和統治者的全面衝突，已經到了勢所必至的地步。從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早晨開始，一切工廠和一切工作崗位的所有工人，都被時刻高漲的堅決鬥爭熱力鼓勵起來。這無疑是革命情勢的迫近。但一月三十一日午後二時，美軍總司令部發表了一個由麥克阿瑟親自簽名的文件，命令禁止總罷工。

“全官公廳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曾在極短時間內討論了應否服從這個命令。它的判斷是：如果置這個命令於不顧堅決舉行罷工，不但將在自己的陣營內引起混亂，甚至可使整個的形勢陷於不利。因此“全官公廳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決定服從命令

停止罷工，並把“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和“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一起解散了。“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委員長伊井彌四郎（“國鐵”）在停止總罷工的廣播結語中，曾悲痛地号召說：“全体工人必須團結起來，退一步是爲了進兩步”。

二·一總罷工因此以未實行而告終。工人碰上美國佔領權力這個巨大牆壁不得不暫退一步。假使日本工人階級不加強階級內部的統一和團結，不加強工人、農民和市民尤其是工農聯盟，就不可能打破這道牆壁。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組成了一個大家所期待的、全部工会的統一組織，即由參加“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的各工会和“總同盟”等共同組織的“全國工会聯絡協議會”（簡稱“全勞聯”）。二·一總罷工不僅表示日本工人階級在短期內的迅速成長，而且還成爲以後飛躍發展的起點。

而且，二·一總罷工終於使一向被視爲“神聖的”麥克阿瑟本身直接來干涉日本工人階級，這就暴露了美國佔領軍及日本統治階級的反動性和它們的危機的深刻程度。吉田政府也並未曾因此度過了它的危機。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麥克阿瑟寫信告訴吉田說：日本業已接近舉行大選的時期。這也就是說：吉田內閣應當辭職的日期已經來到了。這時，進步黨的犬養健和自由黨的蘆田均鑑於人民大眾的革命情緒日益增長，感到必須換掉這塊“保守主義”的招牌。於是他們改變方針，提倡什麼“修正資本主義”和“中間道路政治”。一九四七年三月底，犬養健把進步黨解散，蘆田均緊跟着也退出自由黨；他們共同組織了一個“日本民主黨”。吉田茂爲了想和社会黨組織聯合內閣來延長他的內閣壽命，曾和社会黨右派進行了一連串討價還價的談判。社会黨爲了維持它的這塊假招牌，雖曾要求吉田答應——即使不實行也可以——停付戰時軍事公債的利息，作爲它參加內閣的條件；但是吉田連這一點都拒絕了。因此兩黨聯合內閣未獲成功（關於這次的政治買賣，係參照井上清著：“日本政治腐敗

史”）。

儘管自由黨和進步黨之間不斷發生狗咬狗的爭吵，但是它們在對付日本民衆問題上却是一致的。它們爲了準備麥克阿瑟所命令的選舉，在根據舊憲法召集的最後一次“帝國國會”中的最後數日間，雖然繼續演着狗咬狗的醜劇，但却把選舉法修改得更反動了。它們把大選區有限制的連記名投票制改爲中選舉區單記名投票制，還爲選舉期間使用文字圖畫宣傳及其他事項規定了無數的限制。總之，它們不外想利用這些限制使共產黨、社會黨和其他工農團體的選舉運動陷於極端不利的地位。於是，這個爲醜惡的天皇制裝璜門面的國會直到最後一剎那間仍由其本身證明了它的醜惡和反動性，並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了它的壽命。當然“老兵不死”<sup>①</sup>，它還會以新“國會”的面貌出現的。

### 三 麥克阿瑟的佔領理論

麥克阿瑟在二·一總罷工以後，也不能不回顧和重新考慮一下迄今爲止的佔領政策了。他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致美國國會的報告書中說：

現代戰爭的勝利，僅憑在戰場上打垮敵人是不能獲得的。這就是“不僅應當破壞戰爭的物質基礎，而且必須消滅驅使人們欲走向戰爭的人類本能。要想消滅這種人類本能，僅憑戰敗的一時打擊是不能使其完全屈服的。因此必須從精神上加以徹底的改造。這種改造不僅是能夠支配戰敗了的人們，而且必須是能夠將決定性的影響給予他們的後代子孫”。麥克阿瑟的意思是說，假使不能使日本人的子孫萬代都有對美國低頭的意識，就不能稱之爲真正的勝利。所以他認爲必須對已經投降的日本給

<sup>①</sup> “老兵不死”是引麥克阿瑟的話。——譯者

予更徹底的打擊。因此，“對於完全依靠外部供給食糧及其他補給品的部隊作徹底的封鎖，乃是粉碎這個部隊的有效武器（中略）。對於投降後的日本，這種封鎖不但在繼續維持並且還擴大加強了”。麥克阿瑟就是按照這種政策，有計劃地使日本人民陷於飢餓狀態。然而他又說：

“假使繼續維持這種狀態，將使無數日本人瀕於飢餓；其結果必然引起社會不安、秩序混亂和暴動等。而比這更壞的，是這種飢餓狀態會驅使民衆成為任何邪惡思想的俘虜”。這就證明日本人民為了生存的鬥爭，已經發展到使統治者感到威脅的地步；而且即將發展成為對於帝國主義來說是最“邪惡”的革命鬥爭。從為了打破糧食危機的五一勞動節到二·一總罷工，日本的形勢正是如此。所以麥克阿瑟認為不得不緩和這個封鎖政策。“因此，必須供給日本以糧食及其他緊急的救濟物資”。於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底，麥克阿瑟在北海道地區“發放”了少量的美國家畜飼料和賣剩下來的罐頭食品，從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九月之間，在日本全國“發放”了這類物資共約六十一萬七千噸，並想利用這種手段強迫日本國民感激麥克阿瑟和美國的宏恩。然而，這不能算是美國的慈善。

麥克阿瑟企圖使用將蝦釣龜的方法、即用微乎其微的釣餌迫使日本全體人民上鉤。他說：“這類物資的價款，將來可向日本請求償還，並將以美國有權優先取得日本財產為保證，所以這並不是慈善的施捨”。他在另一場合（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招待美國新聞記者時）曾洋洋得意地說：“由於美國把糧食送給日本，已使日本和美國密切地結合起來了”。日本的政府和統治階級也許如此，但民衆是否能如麥克阿瑟的願望，不是已經從工人日益對他的反抗看出來了嗎？

“軍事佔領充其量不過在一定時期內可以有效的這一事實，已由歷史所充分證明。假使超過了一定期間，不但被佔領國民

的惡化(應讀為抵抗——作者)會有迅速的發展,他們處於這種狀態被剝奪了基本的個人自由,所以越來越不好管理(因為羣衆有了組織——作者);而在另一方面,佔領軍的品質也越來越壞,他們不久會养成了支配意識,終於陷入了統治民族的幻想”。

這就說明了麥克阿瑟已經預感到日本國民的成長已經到了發動二·一總罷工,將對他們帶來怎樣的結果。於是麥克阿瑟不能不考慮早日結束對日佔領和統治日本的新方法。他說:“儘速恢復和平與平時狀態,必須是我們的明確目標。……而廢除目前所進行的軍事管理,恢復日本政府的統治,乃是我衷心所希望的”。他在佔領日本一年又六個月後,才漸漸感覺必須來談“媾和”問題了。這件事情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麥克阿瑟接見美國新聞記者時說得最清楚:“應當早日結束對日軍事佔領,締結正式的对日媾和條約,解散美軍總司令部”。那麼他所希望的,是怎樣的“媾和”呢?他接着說:

“但媾和並不是把一切指導和管理都完全取消的意思”。這就是說:媾和只是一個空名,實際上必須繼續佔領,以期達到永遠將日本完全置於美國統治之下的目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麥克阿瑟找到一個恰到好处的藉口:

“日本在憲法中規定必須放棄軍備。因此,爲了保護日本,或可准許保有少數軍事設施,或可讓日本人依靠世界的進步精神(應讀為美國帝國主義——作者)。假使由聯合國來保障日本的安全,大概會受到日本人的歡迎。由聯合國管理,不但將被日本人所接受,且將視爲這不是壓制而是保護的行爲”。

這不就是一九五一年在舊金山所締結的兩個條約(按即片面對日和約與美日安全條約——譯者)的初步輪廓嗎?此外,我們從上面的話裏,還可以極其明顯地看出來,麥克阿瑟在日本憲法中之所以規定日本必須放棄軍備的真正意圖。他現在企圖用“媾和”這個新的釣餌使日本上鉤。然而,這個空有其名的、意在



使永遠佔領日本成爲合法化的“媾和”，並不像麥克阿瑟所理想的那樣簡單就可做到。總之，戰後的日本歷史，以二·一總罷工爲標誌，已進入了新階段。這個階段是“事實上的媾和”与殖民地化向前推進的時期，是法西斯主義在新殖民地的萌芽時期；而工農大眾的鬥爭已從一直听任幹部自由擺佈的華而不實的狀態進入每個羣衆都已提高覺悟和民族鬥爭已經被提上日程的時期，而且這還是帝國主義向民主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公開宣佈“冷戰”的時期。

爲了弄清日本投降後一年半之間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鬥爭的大體輪廓，我們首先就修改憲法、土地改革、解散財閥等問題加以概括的敘述。

## 第三章 日本反動勢力的復活

### 第一節 修改憲法

#### 一 美製的日本“新憲法”

一九四五年十月，當幣原內閣成立之初，麥克阿瑟即暗示幣原應修改“大日本帝國憲法”。於是幣原內閣以國務大臣松本蒸治為中心，研究修改方案。此外，並以近衛文麿為內大臣府<sup>⊖</sup>顧問，也準備擬訂一個憲法修改方案。高踞於日本國民之上的皇室委派以近衛為中心的人物負責起草憲法“修改”方案，這不但對於民主主義是真正的嘲笑，甚至引起了一部分特權階級的反對。美軍總司令部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發表聲明，否認它曾選擇近衛參加修改憲法的事務。近衛感到他被美軍總司令部出賣了。因為他曾親自從麥克阿瑟那裏得到讓他從事修改憲法的暗示。嗣後不久，近衛由於他被列為甲級戰犯的嫌疑者而自殺，因而內大臣府的修改憲法工作停止了。此後，即專由日本政府從事起草憲法修改方案。日本政府隱瞞着日本國民，在極其秘密之中進行着這項工作。這和製訂“大日本帝國憲法”時所採取的方法完全一樣：即瞞着國民由官僚在極秘密中把憲法製訂出來，然後再以天皇的名義強加於國民身上。幣原政府的修改憲法方案，基本上是將“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原則原封不動地承襲下來：主權屬於國家而天皇總攬統治大權。所謂修改，只是

⊖ 內大臣府為掌管御璽、國號及詔書、勅書的官廳。——譯者

規定了取消軍隊統帥權的獨立以及政府應對國會負責而已。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二月之間，日本各政黨分別發表了它的憲法草案。自由黨和進步黨的方案完全與政府的方案相同。社會黨的方案規定主權屬於天皇和國民兩方面，共產黨的方案除主張建立主權屬於人民的共和國和組織一院制的國會外，還規定了應無條件地給予人民以結社、罷工、示威遊行、言論、集會、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以及給人民生活以物質保證和規定休息權利等。此外，以高野岩三郎博士為首的憲法研究會則主張建立主權在民的共和國。

麥克阿瑟命令幣原等人修改憲法，正表示了他對他們的信任。但是麥克阿瑟鑑於日本政府的憲法草案，不但顯而易見不會為國際民主勢力的對日輿論——在組織上係由遠東委員會中的民主勢力所代表——所接受，並且也過於露骨地違反了一九四六年後如前所述的日益增長的日本國民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因此麥克阿瑟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突然對日本政府提出了美軍總司令部所製訂的新憲法案（即日本現行憲法的第一次草案，它雖然仍是採取修改舊憲法的形式，但在本質上是個新憲法方案），並迫使幣原政府接受這個方案。這個方案的內容是幣原政府以前在夢中也不可能想像的，因此他們大為張皇失措。據馬克·蓋因在“日本日記”中說：美軍總司令部的惠特尼准將通知日本政府說：“如果你們無意支持這種形式的憲法草案，麥克阿瑟元帥將越過你們直接訴諸日本國民”，這才使日本政府終於接受了這個草案。就是根據“朝日新聞”在數年後（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所揭露的來看，美軍總司令部以直接訴諸日本國民來威脅日本政府是確有其事。這就說明了：幣原政府是在日本國民大眾的革命高潮壓力下，不得不接受美軍總司令部的憲法草案。儘管如此，幣原政府仍舊苦苦哀求美軍總司令部保存天皇的地位和日本軍隊，並欲使主權在民這條憲法規定喪失意義。

但是麥克阿瑟鑑於遠東委員會要求廢除日本天皇制的非正式意見非常強烈，在這種壓力之下，他不得不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拒絕了日本政府的修改要求。儘管如此，幣原政府仍舊玩弄小手段：它把憲法草案序文和第一條中的英文“Sovereign will of the People”（做爲主權者的人民的意志）這個顯而易見是主權屬於人民的語句，竟翻譯成爲什麼“國民最高意志”和“國民最高的總意”，企圖把主權屬於人民的意思蒙混過去。雖然美軍總司令部不會不留意到這種譯文上的嚴重歪曲，但是它竟故意不加追究。

憲法草案，經過詞句上的整理和使譯文去掉翻譯的痕跡後，遂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正式由天皇把它作爲“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改案提交臨時國會。主權在民的憲法，竟被作爲欽定憲法由天皇賜與國民，這就完全暴露了這次修改憲法是虛偽的民主主義。在國會裏，自由黨和進步黨站在政府與黨的立場上不得不採取大体上支持這個方案的姿態，但是它們仍然利用一切機會，努力欲確立主權事實上應屬於天皇的解釋。社會黨主張闡明主權在民。共產黨不但認爲應明確表明主權在民，並要求應根據該黨的憲法方案重新作全面的修改。應該明確表明主權在民的主張，當時曾獲得了國際輿論的支持。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遠東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有關日本憲法的問題。我們雖然不知道遠東委員會根據它的決議曾向麥克阿瑟發出何種指令，但在這次會議以後，自由黨和進步黨企圖使麥克阿瑟憲法草案向後倒退的目的並未曾實現。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衆議院修改憲法小組委員會上，自由黨和進步黨突然提議將憲法草案序文中的“於茲宣言國民的總意乃最高至上者”改成“於茲宣言主權屬於國民”；將憲法草案第一條“天皇爲日本的象徵，爲日本國民統一結合的象徵，這種地位是基於日本國民最高的總意”中的末句改爲“這種地位是基於主權屬於國民的總意”；並提議將憲法草案中承認貴族稱號僅限於其本人一代的字

句加以刪除，改為“貴族制度立即完全廢除”；此外，還提出一些其他修改，並均經修改憲法小組委員會所通過。自由黨和進步黨的突然改變態度，當然是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而美軍總司令部則是害怕遠東委員會的斥責。日本新憲法方案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由日本參眾兩院加以通過，於十一月三日公佈，並決定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起生效。

## 二 日本新憲法與天皇制以及軍國主義

日本的國家機構，由於新憲法及基於新憲法的各項法制改革，於是在制度上有了改變。主權在民曾給過去的天皇絕對專制大權以沉重打擊。像樞密院、內大臣府等既不受國會又不受政府任何約束的直屬天皇的最高官僚機構，全被廢除了。因為不准保有軍隊，所以像統帥權的獨立這類問題根本就不復存在了。從前作為“皇室的屏障”，在政治上和社會上具有各種特權的身分——貴族——也被廢除了；而規定一切國民都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保障了基本人權。過去由天皇分別任命並僅對天皇負責的內閣首相及各大臣，現在改變為首相由國會提名通過、僅由天皇加以確認；各部大臣則由首相任命；內閣全體僅對國會負責。國會是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廢除了從前不經國民選舉的貴族院，設立了作為國會第二院的、由國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參議院。從前縣級以下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僚式的中央集權制度被徹底破壞了。縣、市、鎮、村長都由居民直接選舉，地方議會也與以前的縣、市、鎮、村會根本不同，它具有了獨立的權限。特別是過去除軍隊外，凡專制主義官僚統治最大武器的內務省→縣政府→各警察署→警察分局及派出所等這一連串中央集權的警察機構也被破壞了（一九四八年，見後述）。在社會方面，廢除了具有家庭天皇制性質的父兄家長制，而規定了男女完全平等、以夫婦為中心的家族制度。總之，法制上的資產

階級民主主義制度可說是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然而，這畢竟不能說是日本的民主革命已經實現了。只有一套民主的憲法並不表示民主主義革命的實現。从民主的憲法來看，正如一九三一年西班牙在推翻王制後，雖然建立了共和國與製訂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憲法，但是西班牙並未因此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樣；日本國憲法也不是表示日本民主主義革命的實現。一九三一年的西班牙憲法畢竟還做到了推翻君主制度而建立了共和國，而日本則連共和國也未實現。何況西班牙共和國憲法，並不是由外國的佔領勢力製訂出來的；而是由獨立自主的國民所製訂的。日本新憲法的產生，則只是由外國佔領勢力為轉移民主革命的目標而強加於以天皇為首的舊統治階級和集團的，其目的也只是為了使它們可以轉移革命的目標。總之，不管新憲法中規定了什麼，日本是處於超越於憲法之上的美國佔領軍的軍事獨裁之下的。日本既沒有民族獨立，如何能有民主革命呢？問題不在於憲法上寫的是什麼，而在於誰在統治誰。从這種觀點來看，在新憲法之下，由天皇和專制主義天皇制度八十年來所發展起來的特權官僚、壟斷資本以及所謂“土地改革”後仍被保存下來的封建惡霸勢力——大地主的變相繼承者，他們一方面固然從屬於美國統治者，但另一方面却仍舊掌握着統治工農及其他勞動人民大眾的權力。

第一，新憲法一方面說是主權屬於人民，另一方面在新憲法第一條中就不是關於作為主權者的國民的規定，而是規定天皇的地位，把他作為日本國家和日本國民統一結合的象徵。關於“象徵”一詞的意義，據日本政府的解釋；或者說天皇是日本國民所仰慕的中心，或者說天皇可以體現着日本全體國民。這些解釋實際上是一面把天皇奉為國民的“道德中心”，一面似乎是說只有以天皇為中心才能有國民的統一；也就是用新的話來表現了過去的皇室中心主義。此外，新憲法接着列舉了天皇關於國

事的权限。其中包含：天皇確認國會提名的首相和確認經國會批准決定的條約等。這些权限雖說只是形式上的禮儀，但這個形式上的权限，在必要時也可以變成反動獨裁的武器。何況在天皇的权限中，還有不能僅僅視為形式的東西。例如憲法第七條，就留下了漏洞，使天皇似乎可以曲解為他具有召開、停閉、解散國會的权限。這一條也頗有被利用為舉行法西斯政變武器的可能性。

從世界各國現代歷史看，君主制度不論在什麼情形下，都是反動勢力的基礎。每當革命爆發時，反革命勢力照例是集合在君主周圍，而日本新憲法中的天皇制，當然具有同樣的作用。在日本發表了“天皇是人”的宣言後，“倫敦泰晤士報”立刻批評說：“日本反動分子認為在天皇的神性已經喪失作用的今日，縱令天皇不再能獲得極端的崇拜，如能把它作為國民的忠誠和愛國行動的刺激中心保存下來，那麼就他們的目的來說，他們以為人的天皇是和從前一樣有用的。只要日本皇室這根支柱能夠保持它的鞏固地位，那麼想把目前日本的政府機構改革成符合現實的要求，是很難辦到的”，這是非常正確的批評（見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朝日新聞”）。這項評語已由日本新憲法製訂六年後的目前情況證明它是正確的。至於麥克阿瑟等如何把天皇制度當做美國統治日本的最重要的武器的情形，我們將在下面加以說明。

第二，新憲法表面上雖不得不同時羅列一些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文，但事實上却又使這些條文無法生效。首先，所謂保障自由並沒有物質的保證。一方面雖然宣傳說言論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却對民主刊物不發給紙張——例如配給“赤旗報”的紙張就被削減了。而這種辦法從新憲法製定後就開始了。又如新憲法一面規定保障集會的自由，同時則以禁止人民在皇宮前廣場開會來限制集會。特別是按照新憲法第十二條的規定，這個憲法所保障的國民的自由和權利是“要經常為公共福祉而服務”的，並

且“不得濫用”。這一規定與德國納粹假借“公共福祉”為名的“公益應優於私益”的“集權主義”具有同樣的作用。例如國家公務員的罷工權和結社權，就是在“公共福祉”的藉口下被剝奪了（詳見後述）。因此，基本人權事實上既未能建立，半封建的經濟制度也沒有廢除。所以在實際生活中，所謂男女平等和現代家族制度根本就無從實現。只要是處在美國佔領者的民族壓迫下，只要是天皇和皇族這種特權階級還存在一天，人人平等的原則，不過是句空話而已。此外，在封建時代受差別待遇的人，即所謂“穢多”<sup>⊖</sup>，現在仍然未被解放而痛苦不堪。

第三，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仍舊原封未動。儘管新憲法規定了“地方自治”，然而自治機構的財政無法獨立，不得不依賴中央政府的補助費，因而就不得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此外，事實上地方自治機構目前所做的工作，絕大部分幾乎全是中央政府的“交辦事項”；這就說明了地方自治機構實質上不過是中央集權制官僚統治的最下級組織而已。不僅如此，這個所謂地方自治，甚至還是中央集權官僚獨裁統治的幫兇。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地方自治機構”如何製訂了“公安條例”等（見後述）蹂躪憲法的法律，以便替美日統治階級効勞的事實，就可以一目瞭然了。至於警察制度，我們也將在下面詳加說明，實際上它也是按照中央集權制的要求組織起來的。而在國會裏佔支配地位的政黨——自由黨和進步黨——中，官僚勢力仍然很有力量。事實上這些政黨，不過是官僚、壟斷資本家和大地主的聯合組織而已。

在這裏成為問題的，乃是這種官僚勢力和壟斷資本家的關係究竟如何。不用說，官僚是壟斷資本的政策執行者，但是問題

<sup>⊖</sup> 穢多是在日本歷史上長期受差別待遇的賤民的稱呼，在德川時代武士可以自由殺害穢多而不算犯罪行為，日本明治維新後，在一八七一年雖廢除了穢多的稱呼而稱其為平民，但實際上並未消滅其差別待遇。——譯者



在於日本投降後的官僚勢力是否僅止於此，或者像戰前的天皇制的官僚仍然對於壟斷資本保持着某種程度的相對獨立性。投降前日本官僚勢力的高度獨立權限，其根源是由於在制度上天皇具有無限的專制權力。現在天皇固然喪失了這種專制權力，然而却有美國佔領軍的權力代替了它。例如日本政府以前靠天皇大權的緊急敕令所能做到的事情，現在假借“根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政令”<sup>⊖</sup>的名義也都能做到，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說明了，在國內事務範圍內，專制主義官僚機構的相對獨立性，首先是由於作為美國佔領勢力的執行機關而被保存下來的。在片面對日和約生效後，雖然所謂“波茨坦政令”這種形式已經不復存在；但只要事實上的美國佔領依舊存在着，那麼日本官僚勢力這種充當美國佔領者執行機關的性質就不會有所改變。日本官僚這種依靠和美國佔領勢力相勾結而保存下來的獨立性，雖然和從前作為獨立國家而在天皇制下的官僚獨立性不無區別，但是也不應該把日本官僚看成國內壟斷資本的單純工具。第二，最近八十年以來逐漸擴大起來的龐大官僚機構，還是依靠它的歷史傳統的力量本身——這個傳統力量已被美國佔領勢力加以保存和利用——而得以繼續留存的。第三，正如我們在下節中所將說明的一樣，日本官僚勢力是利用了所謂“土地改革”的欺騙性，保存了它的權力的封建性的物質基礎。

第四，最後是關於新憲法中規定日本必須放棄戰爭和一切“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問題。在日本新憲法中加進這項條款，據說是出於麥克阿瑟本人的主意，但這決非出於他想要把日本變成一個“理想”的和平國家的熱情。假使麥克阿瑟的意圖真正在此，那麼他就不会僅僅在三年以後，藉口“形勢有了變

⊖ 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後，為實施盟軍最高統帥（事實上是美軍最高司令官）的要求事項，可以不經過法律手續，直接由日本政府以命令行之，這類命令被稱為“波茨坦政令”。——譯者

化”，假借“自衛權”這類名義教唆（實際等於非正式命令）日本重新武裝了。既然是可以隨情勢而變化的東西，這就証明了它並非根據什麼偉大的理想，而只是一種政策。放棄戰爭的規定，其目的是要首先徹底解散日本仿效帝制德國方式而組織和訓練起來的軍隊，剷除它的反美傳統，使日本完全無力反抗美國的統治，並且爲了嗣後再按照美軍方式加以組織和訓練，使它成爲與其說是日本軍隊，不如說是充當美國遠東軍有機構成部分的日本人部隊打下基礎。假使在新憲法中承認日本保有軍備，那就等於美國佔領軍承認日本投降後曾一度被解散的舊日軍立刻可以復活；這不但是公開違反波茨坦公告的規定，而且也與美國統治者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這樣作法，對於欺騙和平勢力，也是最方便的办法。當時麥克阿瑟鑑於在遠東委員會上蘇聯和澳大利亞特別強調爲永遠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而亟欲使日本成爲共和制的國家；爲了保存天皇制而在新憲法中加入將天皇作爲象徵以及放棄戰爭和軍備的條款，並欲藉此造成不必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印象（參照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朝日新聞”“憲法是這樣製定的”一文）。天皇制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象徵、代表和中心。只要保存天皇制以阻止日本民主革命的發展，那麼美國不論何時都可以使日本“重新武裝”，也就是說可以組成爲美國侵略目的服務的日本人部隊。假如使日本採取共和制，勢必大大促進民主革命，而民主化了的日本所具有的自衛軍隊，對於美國統治者來說，豈不是最壞的事情嗎？換句話說，放棄軍備的條款實際上是用來換取了保存天皇制度，即保存從屬於美國的日建軍基礎而已。

當日本國會審議新憲法草案時，共產黨議員野坂參三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衆議院全体會議討論憲法中，曾反對放棄爲自衛的戰爭。對於這一點，吉田大放厥詞說，現代侵略戰爭

經常是假自衛之名而行的，所以即使是爲了自衛的戰爭和自衛的軍備，也都应当全部放棄。他還說：“承認正當防衛權本身就有害處，所以我認爲你的意見——即野坂的有行使自衛權必要的意見——是有害無益的議論”。吉田及當時和他同樣瞎吹“理想主義”的蘆田均（修改憲法委員會會長）等，目前假“自衛”爲理由，正在鼓吹重新武裝；而共產主義者却在呼籲保衛和平憲法。六年前和現在（一九五二年），兩者地位一變，好像都變節了似的。但實際上變節的是吉田和蘆田等人。假使我們更進一步追究這種變節的底細，那麼就吉田、蘆田本身來說也可以說是始終一貫的。他們在一九四六年之所以主張放棄爲自衛的軍備，不過是爲了忠實執行美國的命令，而他們現在瘋狂地從事重新武裝，也是爲了忠實執行美國的命令。他們在藉着投靠從屬於美國以圖保存自己的地位和財產這點上，是始終一貫的，只不過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的政策有所改變罷了。至於共產主義者的原則和政策，則自始至終是絕對完全一致的。日本共產黨在一九四六年之所以主張自衛的軍備權，不僅是專爲反對憲法第二章；而是認爲在與日本獲得完全的獨立和建立爲民主共和國相連系起來的狀態下，這種獨立的民主共和國根本就不会從事侵略戰爭；因此，不僅可以而且必須具有自衛的軍備。至於目前日本共產黨之所以反對重新武裝，乃是由於目前的重新武裝並非真正爲了自衛，而是爲了充當從屬於美國的殖民地僱傭軍以便侵略蘇聯和亞洲各國。

## 第二節 “土地改革”

### 一 “土地改革”法

正如專制主義天皇制被迫不得不在憲法上規定主權屬於人民一樣，作爲專制主義天皇制和日本社會半封建性固有經濟基

礎的寄生地主制，雖然也由於遭受嚴重打擊不得不改頭換面，但是它的根基仍舊保存下來了。

寄生地主制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曾遭受過相當嚴重的打擊。因為在戰爭時期，日本政府自一九四一年起就從直接生產大米的農戶（自耕農和佃戶）的全部收穫中除留下生產大米的農戶和地主（只限在村的地主）的食米外，其餘（包括地租在內）則全部加以徵購。日本政府從徵購糧食的價款中，把相當於地租的款額付給地主。這就等於政府介於地主和佃戶之間，將原先的實物地租改成貨幣地租了。並且從一九四一年七月起，政府對地主的米價和生產者的米價之間，開始逐漸擴大了米價的差額。例如在日本投降這一年（一九四五年），對地主的米價是每石五十五日元，而對生產者的米價起初是每石一百五十日元，後來加了一倍，增至每石三百日元。因此，從土地的全部收穫中，地主所分得的份額急劇地減少了。比方說，從全部收穫中拿到一半實物（大米）地租的地主，若以日本投降時的價格計算，僅等於全部收穫價款的百分之九左右。自然也有直接向佃戶索取實物的黑市地租，但是這也只夠維持地主自用食米的程度而已。

這種政策雖然不過是國家從生產者身上直接掠奪更多的糧食，並不包含絲毫解放佃戶的意義；但是寄生地主制卻因此遭受了打擊。天皇制政府對本身基礎的地主制度施以打擊，好像是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但實際上這是迫於下列的絕對需要：即為了確保戰時糧食的需要量和維持低米價以便保持低工資的基礎。所以一方面不得不減少地主的剝削份額而由政府直接對生產者進行掠奪；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假使不在表面上對糧食生產者比對地主表示相對性的優待，那麼要想在戰時的惡劣條件下驅使農民從事不降低生產水準的劇烈勞動乃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說統治階級對農民的無形反抗，不得不表示讓步。

農民在戰時的這種消極反抗，到日本投降後已經發展成爲

積極的鬥爭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日本投降時，農民大有發生暴動不可阻遏之勢。另一方面，由於糧食危机的急遽惡化，城市的工人和一般市民，也普遍地陷於騷動不安的狀態。加上美軍總司令部恰於此時頒佈了一個“日本經濟民主化”的指令，所以日本統治階級當時的心情竟不知今後還會發生些什麼事情。日本統治階級處在這種情形下，爲了最大限度地搜刮糧食和保存“秩序”，即爲了保存半封建性地主制的舊秩序，它們所想出來的，就是一九四五年年底的第一次“土地改革法案”。

按照第一次“土地改革法”的規定，地主的土地保有面積不得超過五町步，五町步以外的土地則強制地主和佃農採取直接交易方式賣給佃農。這種方案的目的是，實際上是要保存寄生地主制的大部分勢力。根據這種方案成爲“改革”對象的，僅爲全部出租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九。特別是其中會規定地主“目前耕種的，或最近準備耕種的土地”均不得視爲“改革”對象，這等於是獎勵地主收回租地的法案。而執行這個“改革”的市、鎮、村農地委員會，又是僅由地主、自耕農和官選的委員組成，其中連一名佃戶的代表都沒有。這個改革方案，雖然僅在使耕種權比以前較有保障和將地租改爲定額的貨幣地租方面稍有積極意義，但即使在這方面還用承認有“例外”的辦法給地主準備了逃避之道。而這種改革方案，竟被美國佔領軍當局批准了。

但是這種方法，並不能欺騙住農民。日本農民的鬥爭，由於地主的拚命收回租地、政府的強制徵購糧食和通貨膨脹，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一九四六年春到夏季，這種農民鬥爭自然而然地與城市工人的革命鬥爭互相呼應起來了（見前述）。此外，國際進步勢力也都站在日本農民和人民大眾方面。盟國對日委員會中的蘇聯代表德勒維揚哥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底該委員會上，曾要求美軍總司令部提出關於日本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他並於五月二十九日向該委員會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改革方案。其

主要項目爲：

(一) 对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以前之一切出租地、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全部加以徵用。

(二) 對於超过三町步以上的自耕地，也予以徵用。

(三) 土地徵用價格，規定稻田每反不得超过四百四十日元；旱地每反不得超过二百六十日元。徵用土地在三町步以內者付給地主以全部金額、由三町步到六町步付給地主以一半金額。超过六町步以上的土地無償地徵用。

(四) 徵用的土地，应首先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佃農。

(五) 徵用土地所需價款的半數，应以國庫補助費付給地主；佃戶的購地價格应按公定價格的半數計算。

(六) 土地轉讓手續，均应由國家機關辦理；地主和佃戶之間的直接交涉，悉歸無效。

(七)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以後的土地轉讓，一律無效。

德勒維揚哥方案，才是真正的土地革命方案。美國代表艾奇遜猛烈攻擊這個方案，他除了強調無償沒收超过六町步的土地等於破壞私有財產制度外，並且反对廢除封建地主制度和解放“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不僅如此，艾奇遜还辯解說：日本政府的第一次“土地改革法案”是出於“誠意”而製訂出來的方案，所以这是日本政府“朝着正確的方向邁進了一步乃至於兩步”的行動。結果，由英聯邦代表麥克馬洪·鮑爾製訂了一個抽掉德勒維揚哥方案中的革命性，等於把日本政府製訂的第一次方案在數量上略加修改的方案。美軍總司令部以此爲基礎製訂了一個第二次“土地改革法案”，並命令日本政府接受這個法案。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內閣通過了“關於徹底改革土地制度案”；並於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據此向臨時國會提出了“創設自耕農特別措施法”案和“農地調整法”修正案。這兩個法案在國會裏經過一番多餘的——因爲反正美軍總司令部是不准許修改

的——討論，一直拖延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才被通過。但實際上日本政府的徵購土地，是從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才開始實行的。

第二次“土地改革法”規定：所有在外地主的土地、住在鄉村而不自行耕種的地主的超過一町步（北海道為四町步）的土地、自耕農自有土地和租地加起來超過三町步（北海道為十二町步）的租地部分，均由政府強制收購；原則上對於自耕土地則不加限制。出售土地時應優先售給舊佃戶中“可能努力從事農業者”。買賣土地，必須經過農地委員會；而市、鎮、村農地委員會是按照佃農五人、地主三人、自耕農二人的比例，由各階層分別選出代表組成的。“土地改革”後依然留下來的出租地的地租，一律改為現金地租而不得再有實物地租；地租的比率是稻田不得超過收穫大米總值的四分之一，旱地則以主要農產品收穫總值的百分之十五為限度。

當這個“土地改革”法案在日本國會通過時（一九四六年十月），麥克阿瑟曾經發表特別聲明說，假使這個“土地改革”能被忠實地付諸實行，“那麼不但為了建立健全和穩健的民主主義再找不出比這更可靠的根據，而且在抵制過激思想的壓力方面，也沒有比這更確實的防禦手段了”。這段話已經非常簡潔明瞭地說明了所謂“土地改革”的本質。它不過是被用來防止土地革命——“過激思想”——以期適應農村的新的歷史條件而達到維持舊秩序的目的。這種情形不論在以後的改革手續上或改革內容上，都表現得非常具體和清楚。

美軍總司令部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發出第一次土地改革指令以來，並不立刻付諸實行，却採取草擬第一次、第二次方案這種怠工辦法故意拖延時日，以便地主有充分時間收回租地，將土地分散給親屬，用在暗中出售及其他各種違反或逃避法律的辦法得以保存原來的財產和勢力。此外日本政府雖然從事收購土

地，但在出售方面却大肆拖延。直到苏联代表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及七月的盟國对日委員會上对这件事情猛烈加以譴責後，才開始進行出售；而“改革”則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才大体告一結束。在这時期中，日本政府放縱地主勢力任意反抗，其嚴重程度甚至使美軍總司令部也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指令日本政府对企圖破壞“土地改革”的“有組織的反動勢力”加以鎮壓。当然，這項指令並未曾付諸实行。有些地方，美軍總司令部的地方軍政部人員竟住在地主家裏妨礙“土地改革”的徹底实行。此外，从“土地改革”的宣佈到实施，雖然拖了這麼長的時間，但是日本政府不但不把“土地改革法”的內容对農民進行宣傳，鼓勵農民自己來推動改革工作，反而竭力使農民不知道有土地改革這回事，並竭力阻止農民組織的發展。因此，在第一次市、鎮、村農地委員會選舉中，經過投票选出的農地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佃農委員佔全体的百分之四十點九；自耕農委員佔百分之四十四點二；地主委員僅佔百分之二十三點七。而大部分市、鎮、村農地委員會，都是未經選舉而成立的。其中絕大部分是地主勢力佔了優勢；也就是在“村內和平”、“村落和平”的口號下，完全遵照地主惡霸的意旨組成的。再就最初的農地委員會主席人選看，地主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九點一；自耕農（大体都处在地主影响之下）約佔百分之三十四點五；佃農僅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其他“中立”派委員担任主席的佔百分之一點六）。

這樣一來，農地委員會變成地主的機關，雖然叫做“改革”，但在運用法律時必然儘量使其有利於地主、特別是有利於大地主。日本投降時並非從事農業的人家在土地改革後（一九四九年三月）有三十八萬戶也變成了農戶。此外，在出租地超过法定限度的農戶中，有十三萬多戶變成了自耕農。這表示地主會拚命收回出租土地，並把它分配給他們的親屬了。所以外國人批評說：“日本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成爲不流血革命，乃是由於容許



地主收回出租地的緣故”。而在“土地改革記錄委員會”的報告書“土地改革始末概要”中，對這類事實也有詳細的記載。不僅准許地主收回出租土地，並且還通過留上等田作為地主的保留地，收購儘量挑選最壞的土地以及听任地主偽裝為自耕農等各種辦法保護地主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對於因特殊情況暫時將土地出租的小“地主”的土地，却毫不留情地加以收購。

而“土地改革”法律本身，也就是在保存地主勢力的原則下擬訂出來的。

第一，所謂“土地改革法”的改革對象，僅限於已耕土地和出租牧場（其後追加了一部分未開墾的荒地），而把全部山林和大部分荒地都原封不動地留給了地主。至於國有的森林原野也絲毫未動。從前歸皇室所有的森林原野雖被改成國有，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已屬於國民所有。當任何人說日本全國土地僅有百分之十六可以利用為耕地時，也就是說把其餘百分之八十四的土地讓大地主和國家封建勢力來獨佔。這句話的含義，對於山村和山村地帶的農民自不待言，而對於包括平地農村在內的全部日本農業來說，也意味着為大地主和國家封建勢力這類森林原野的獨佔者保留了強大的統治力量。因為：第一，沒有農業用的森林和原野，農民生活和農業就無法維持；第二，能夠控制山林者就可以控制水利，從而對國家的經濟生活就具有重大的影響力量；第三，森林原野之被封建地主所獨佔，阻礙了對它的開墾和利用，而將農民束縛在目前的小塊土地上面；第四，森林原野之被地主所獨佔，還阻礙牧畜業的發展，使農業不可能具有大量牲畜；因此，就使農民永遠被束縛在封建關係之上（本來所謂日本全國土地僅有百分之十六可以利用為耕地的說法，其關鍵並非基於自然的地形，乃是由於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和“國有”情況下所造成的）。

第二，這種“改革”，絲毫未曾觸及水利和農業用道路的開

題。只要水利和農業用道路仍在地主控制之下，那麼日本農民就不能得到解放。

第三，就耕地來說，作為這個“改革”對象的耕地也僅及全部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土地改革法”准許地主保有地的面積竟達一町步。這一町步土地在農戶土地經營面積極為狹小（根據“土地改革”後一九五〇年二月的調查，經營土地面積不到三反的農戶約佔全部農戶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八，在一町步以下的農戶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八）和農民極端需要土地——即使能增加一反或五畝土地也好——的日本，便成了使地主，特別是使現在仍保有一町步土地的在村舊大地主，對村民保持往昔優越權限的根據（這類地主除此之外還在經濟上、社會上保持着各種優越地位）。所以農地委員會的書記竟發出呼聲說：“不解放地主的保有地，就沒有土地改革”；“保有地制度，就是復活地主制度的徵兆”（近藤康男：“土地改革諸問題”）。

第四，根據“土地改革法”，土地僅售與“自耕農中希望努力從事農業者”。因此，最窮困的貧農和農村無產階級被當做沒有這種希望的人而不包括在這種改革的範圍之內。假使是革命性的土地改革，那麼首先就不會把應分得土地的人除外；其次也不會將保有超過三町步土地者當做“自耕”農——例如對於不自行耕種而住在城市僅從事農業管理經營者也認為他是自耕農——並承認其土地所有權。總之，在這種地方也就暴露了：這個“改革”不是為了解放勞動農民，而只是為了改變地主制度的形式。

## 二 農民並未得到解放

由於按照上述手續和具有上述內容的土地改革的結果，農業生產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如果將改革前（一九四六年四月）和改革後（一九四九年三月）的農業生產關係相比較則為：

（一）出租土地在改革前佔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四十四，而在

改革後則減少為百分之十三點一(六十四萬七千町步)。

(二)在全部農戶中，自耕農和佃農的比率有如下表。即自耕農激增，而佃農則大為減少了。

	自耕農	自耕農 兼佃農	佃農兼 自耕農	佃農	其他
1946年4月	32.8%	19.8%	18.6%	28.8%	
1949年3月	57.1%	27.8%	7.3%	7.8%	
1950年2月	61.8%	25.8%	6.8%	5.0%	0.4%

(三)地主的數目：其本身也參加耕種的地主數目在日本內地約減少了百分之八。不參加耕種的地主數目，不論個人或公司都有若干增加（這是由於地主為了逃避保有地的限制而採取分家等辦法所致）。在北海道地區，不論參加耕種的地主，或不參加耕種的地主，在改革後均有若干增加。若將上述的數字增減相抵，就全體而言，平均計算地主的數目約減少了百分之五左右。這樣一來，地主的數目雖然幾乎沒有變化，但就每個地主出租土地的平均面積說，在日本內地已從日本投降時的一點零一町步減少到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零點三五町步；在北海道地區已從三點七七町步減少到一點一七町步了。而這類出租土地的地租，雖然也有黑市地租，但是它的規模並不太大（見近藤康男著“土地改革諸問題”）。

我們假使要把“土地改革”的結果詳加討論，未免過於瑣碎，但是根據上面的說明便顯然可見地主像以前那種佔有和出租廣大的土地，從佃農榨取幾達一半收穫量的實物地租的形態，已經大為削弱了。

但這既不是說廣義的寄生地主制已被消滅殆盡，也不是說作為舊地主階級的全體對農民的半封建性的控制業已變成毫無能力；它們仍舊是強有力的。如果就日本個別農村來看，雖然也有寄生地主幾乎絕跡的地方；此外，若就個別地主來看，在改革

後沒落的地主也還不在少數。然而如果再由日本農業的全体構造來看，那末只要想想上述的森林、原野、水利和地主保有土地的意義，地主收回的大規模出租土地，就可以明白寄生地主制的基礎仍然廣泛地被保留下來。至於糧食徵購和稅收也以對地主有利為基礎來進行的，這種情形將留在下面說明。舊地主作為日本農村的政治統治力量，依舊沒有變動。而問題尤其在於大地主的統治力量仍舊未變。

舊大地主即使喪失了土地，他們作為商業資本家，或者作為從事釀造業、運輸業和各種地方性工業的資本家依舊存在。這樣一來，雖然再不能說他們是收取地租的封建地主，但是他們在商業和工業方面對農民的榨取，一般說來封建性的因素非常濃厚。寄生地主和農村資本家本來是兩位一體的東西（地主積累地租就可兼做資本家，資本家積累金錢就可以購買土地兼作地主）；在“土地改革”以後，寄生地主和農村資本家雖在某種程度上被分割開來，但是這種分割並不徹底（凡是能成為資本家的大地主，大體都有森林原野，即使沒有森林原野，他們和從前的佃戶的關係也沒有被切斷）；就是把他們作為資本家來看，其中所含有的濃厚封建性格，也都原封未動（只要看看作為大地主的林業資本家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些傢伙，實際上就是保存下來的封建制度的核心。

地主的封建的勢力，依舊如此地具有其本身的物質基礎。他們一面最大限度地加強和利用難於徹底擺脫的——沒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徹底擺脫——封建性的習慣和思想意識，一面掌握着農村和地方的政治權力。村長、村議員和農村的農業合作社職員等，雖然不是舊大地主，却被農村中的中等地主和自耕農的上層分子所佔據的地方很多；但到了縣級單位，則舊大地主（大體都兼資本家）的勢力就很清楚地顯示出來了，他們控制並左右了站在表面上統治農村的農村惡霸。這些勢力的總和又形成了保

守反動政黨強有力的地盤的一半。這種封建勢力的體系和官僚機構、壟斷資本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則成爲美國統治日本的支柱。美國佔領者只是爲了保存這種勢力，只是爲了阻止民主革命，才實行了土地“改革”。

日本農村的封建地主勢力未被徹底肅清，由農民方面來說，就是沒有完成解放任務。如前所述，這個“改革”本來一開始就沒有把農業勞動者和最窮困的貧農作爲解放對象，所以對這些階層來說，甚至連問一下他們是否已因“土地改革”得到解放都是愚蠢的。此外，從前經營土地面積超過三反的農民則變爲自耕農，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真正已經成爲獨立自主的土地所有者。不穩定的租佃權變爲土地所有權，乍一看好像實現了農民要求保有土地的夢想；但是，第一，農民經營的土地面積依舊非常狹小。從而，希望能夠多租一反甚至一畝土地的農民，就不得不因此和地主發生聯系。此外，正如前面關於山林和水利等仍爲地主勢力的根基的說明，從農民方面來說，這種根基乃是把農民捆綁在地主身上的鎖鏈。第二，土地並非無償地分給農民，農民爲了購買土地，不得不把相當於公定地租十年份額的價款分一次或一年交清（公定地租平均稻田每反七十五日元，稻田的地價每反爲七百五十七日元六角）。如果和大米的黑市價格比較來看，這個地價固然還算便宜，但是並無出售黑市大米餘裕的小農和貧農，爲了籌措購買土地的資金就得欠下債款。第三，農民還得遭受國家徵購糧食和重稅的榨取，主要糧食的徵購價格，是以壟斷資本的利益爲前提規定出來的，也就是以壟斷資本家有可能保持充分利潤的低工資爲前提規定出來的。徵購價格，經常是遠比將農業勞動工資這一部分生產費正確地計算在內的農業生產費要低得多。唯其有農戶封建家族制度的家族勞動，才使推行低米價政策在某種程度上變爲可能。從這一點來說，壟斷資本也不得不熱心於維持農村的封建制度。並且這種

糧食徵購乃是以強制手段進行，也就是等於以超經濟的強制手段徵購糧食。政府對於小農和貧農甚至連口糧用米都不給留下，將農民的糧食全都予以徵購，然後實行了所謂“還元配給”。但在農戶領取這種“還元配給”時的米價，都要按照一般消費者的零售價格購買。因此，農民遭受了雙重剝削。即最初自己食用的大米被以不正當的低廉價格強迫徵購，然後又得付出高於徵購價格的米價購買食米。此外，徵購的數量完全由政府強制地片面規定，即根據每一村應攤多少按照每一反的土地為比例規定數量。由於規定這種徵購數量比例的官僚機構和地主、惡霸勢力勾結在一起，如果沒有農民的鬥爭，則不論對超過一反的惡霸的上等土地和貧農的一反零碎的劣等土地實際上都被徵購同量的糧食，而且這種現象是很普遍的。至於地主和惡霸所隱匿的土地，當然不論徵購和賦稅都被免掉了。

稅款自一九四七年起急遽地加重了。在一九四九年度，稅款約佔農戶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九，佔現款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果以決定米價的標準年份的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平均收入為一百，那末目前農戶收入為一九點七九四，而稅款則為四七點三七八。這也就等於現在國家以重稅和徵糧的方法榨取農民的實物和現款遠遠超過從前地主剝削農民的程度。如果以前佃農是地主的農奴，那末現在農民則是國家的農奴了。

此外，不僅徵購米價，連農產品價格一般說來也都很低，而農民所購買的壟斷資本的工業品，如肥料、農業器具和衣料等却非常高昂。由於這種所謂“剪刀差”，農民也遭受了壟斷資本的榨取。因此，“土地改革”在這種地方，即在它使壟斷資本現在可以直接榨取以前曾以地主制度為媒介榨取農民的那一部分利潤這種地方也具有其意義。

上述的糧食徵購、稅款和“剪刀差”的榨取，雖然歸根到底不外是壟斷資本對農民的榨取，但其中還包含着美帝國主義對日

本農民的榨取。最能說明這一點的，就是重稅乃是爲了支付美國佔領軍的開支。不僅如此，壟斷資本還通過這種榨取和農村的封建制度及地主勢力的殘餘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互相發生作用。日本農業和農民被美國所支配和榨取，乃是一件事關日本處在美國佔領下正在走上殖民地化的整個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將通過本書的全部敘述加以說明。

如上所述，日本農民處在美國佔領下所遭受的榨取，即使在形式上有所改變，但在實際上却比以前更加嚴重了。農民依舊處在地主制根深蒂固的殘餘勢力的壓迫之下。唯其如此，農民經營的土地比以前更零碎，農民生活的危機也越來越嚴重。這種情況，並且使地主的優越性越來越提高。此外，農民沒有得到解放，也爲資本家剝削勞動力保留封建性的基礎。工人的低工資制度之所以能夠維持，不僅由於低米價和農村過剩人口的壓力，而且更直接地是由於日本工人很多都是農村出身，對於這些工人，工頭便和農村惡霸取得聯繫不斷的加以監視，使他們的階級鬥爭發生困難，這樣也就可使整個鬥爭發生困難。土地改革主要是想藉使中農以上的農民成爲一小塊土地的所有者來達到對這些人們灌輸小私有者的意識、達到破壞工農聯盟、達到在農村內部分裂貧農和中農並使貧農孤立、達到將中農以上的階層保存下來並將它們吸引到地主勢力和國內外壟斷資本方面來的目的。然而，生活本身教育了農民大眾，由於“改革”的結果，他們不僅沒有得到實質上的解放，甚至情況比以前更壞，因此他們也逐漸挺身於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鬥爭了。從前的農民鬥爭，主要是在一村之內僅限於佃戶對與其有關的地主進行鬥爭。但是現在却變成從十幾個村鎮到數十個村鎮的所有的勞動農民開始聯合一致地爲反對徵購糧食和重稅而鬥爭，爲解放森林原野而鬥爭了。並且這種鬥爭，目前正以前所未見的高度政治意識，開始朝着反帝、反封建、反賣國壟斷資本的工農聯盟邁進了。關於

這種情形，將在本書下面各章具體地加以說明。

### 第三節 財閥的“解散”

#### 一 美軍總司令部與日本財閥

日本天皇制及“寄生地主”，畢竟由於戰後的“改革”還多少受到了一些打擊；然而日本軍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另一元兇金融壟斷資本却反而受到了保護，於是它在日本國內統治勢力中間的地位，遠比戰前還要鞏固。至於擔負“軍國主義”罪名而被解散的只是所謂“財閥”這種壟斷資本的不合時宜的外衣而已。實際上不論財閥資本或金融壟斷資本本身，都絲毫未被解散。

“財閥在日本是最大的戰爭潛在力量。由於他們才使日本過去的一切對外侵略和征服成爲可能……。就日本軍國主義說，財閥不僅應與軍國主義者本身負有同等責任，它們且靠軍國主義發了大財。甚至在日本業已戰敗的今日，財閥事實上還加強了他們的壟斷地位。財閥所有的或屬其支配的產業設備，如與無數被迫關門的小企業相比較，那麼相對的說財閥並未遭受戰爭損害。（小企業者）不僅蒙受了戰爭的損害，還對財閥欠下重債。因此，如果不解散財閥，那麼日本人幾乎不可能實現以自由人的資格來親自進行統治的希望。只要財閥繼續存在一天，日本仍將是財閥的日本”。

在日本投降後不久即至日本製訂了首次賠償計劃的美國賠償問題代表團團長鮑萊，他對日本財閥甚至也曾下過如此肯定的判決。而且，這也是日本及國際上民主力量的輿論的判斷。據說，“這種見解幾乎完全成爲美國政府的見解，並作爲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麥克阿瑟元帥的初期指令而命令解除日本經濟的高度集中”（哥亨：“戰時戰後的日本經濟”下卷）。在日本被迫投降時，美國某些人士自然會也曾考慮過把日本軍國主義的兵工廠



和推動力的財閥当作戰勝者的戰利品而加以任意擺佈的想法。唯其如此，麥克阿瑟才就解散財閥問題發出幾個喜歡賣弄的民主辭句的指令和勅告。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美軍總司令部命令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十五家財閥的總公司提出各該公司企業內容等的報告，十一月二日又指令將上述十五家財閥的股票和公司債券加以凍結。於是，堅決反對解散財閥的日本政府也無計可施，不得不在十一月四日向美軍總司令部提出了解散財閥的計劃。其中建議組織一個“股份公司整理委員會”，由它接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財閥總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債券，並負責辦理四家公司的清理及其他事項。此後，日本政府雖曾繼續發出各種政令，但是執行解散財閥工作的中心機關的股份公司整理委員會，却一直拖延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才開始成立和實際開始活動，而且它嗣後還是儘量加以怠工。當時三井和三菱的總公司雖然不能從事活動，但這兩家財閥事業中心的三井物產公司和三菱商事公司，仍被听任其在日本工商業界中發揮壟斷的威力。因此，美軍總司令部才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下令解散這兩家公司。兩家公司雖被解散，但三井銀行和三菱銀行則僅僅換一下董事，依然支配着日本金融界。金融壟斷資本不僅不會遭受任何打擊，而且由於戰爭經濟的崩潰使金融資本陷於危機，美軍總司令部及日本政府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用“經濟金融緊急措施法”這個有力支柱給它以支持。此後，所有的經濟政策，也是為加強金融資本而不惜犧牲其他一切，甚至為此而不惜對美軍總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年來的盟友的寄生地主給以相當的打擊。那末，為什麼它們會採取了這種政策呢？

“另一個主要改革——解散財閥——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禁止產業集中科的阻撓一直很難實現。雖然該科正在繼續推動解散財閥的工作，但一般人却極端諷刺地給它起個綽名叫

做‘財閥保存科’。該科反覆所說的是‘我們不能破壞我們最好的同盟者’”(見“日本日記”，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記)。美軍總司令部產業金融科科長洛克對新聞記者說：“假使要解散財閥，就必須有這種打算，即或者是讓日本陷於十年的混亂狀態，或者只好讓日本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如果剷除財閥系銀行，就意味着日本全部金融機構的毀滅。如果粉碎日本財閥，就等於消滅我們在日本的投資對象。此外還有其他害處。所以我們應當停止那種損害自己利益的行動。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日本，因為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必須和俄國對立，那時就需要有日本這樣的同盟國”(見“日本日記”，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記)。

在美軍總司令部所逮捕的第一批甲級戰犯中，雖然也逮捕了幾名像久原房之助、鮎川義介、藤原銀次郎、鄉古潔、池田成彬等財閥的最高領袖，但是他們不久即以不起訴處分全被釋放了。一九四五年十月，由於外務大臣吉田茂公開反對解散財閥，曾引起世界民主輿論的震驚；但是吉田不但沒有因此失掉他的地位，反而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竟被准許他出任首相。這時吉田在答覆外國新聞記者詢問時，仍舊毫無忌憚地公開聲言，關於解散財閥問題，他在外務大臣時期的想法現在絲毫沒有改變(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如果這種想法曾經支配了美國佔領軍當局和日本政府，那麼任何人都不能立即推斷，所謂解散財閥實際上只能是怎麼一回事了。

美軍總司令部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公佈了“禁止壟斷法”，並在同年年底頒佈了一個“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照理壟斷企業機構是應當被解散的了；但是這些“法”幾乎都沒有付諸實行。“禁止壟斷法”雖然具有禁止卡特爾和托拉斯的性質，但在事實上却只禁止了小企業同業公會性質的基爾特統制組織，而

对龐大的壟斷資本幾乎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影响。根據“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原來曾經指定三百二十五家公司應被解散，但後來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從指定名單上勾消了。特別是從一九四八年夏天中國局勢發生根本變化後，即連帝國主義者也分明預見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及其靠山美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時候，於是美帝國主義就急於要把日本工業變成美國在亞洲的兵工廠，從而“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就要從大企業中剔除其效率較低的部分並使其生產集中於效率較高的部分；於是“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是專為美國統治利益服務的法律的意義，就越來越明顯了。

## 二 日本壟斷資本的復活

現在舉出兩三個基本數字來看看作為這種所謂“解散財閥”的結果，對日本壟斷資本的影响究竟如何？首先我們根據“公正交易委員會”所編輯的“日本經濟力量集中的實況”，將“解散財閥”工作大体告一段落的一九四九年與發動侵華戰爭的一九三七年的資本集中情況作一比較。

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的公司總數是八萬五千零四十二家，資本共計為二百六十九億日元。其中最大的一百家公司僅佔公司總數的百分之零點一二，但其資本合計約為一百億日元，佔公司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四。戰後（一九四九年）公司總數計有二十萬零七千八百九十八家，資本共計為二千三百四十六億日元。其中最大的一百家公司雖只佔公司總數的零點零五，但其資本却佔公司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三十點四。換句話說，戰前在一千家公司中有一個大企業，其資本佔公司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現在兩千家公司中有一個大企業，其資本佔公司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三十。由此可見，壟斷程度比以前更高了。

下表是表示以行業為單位的前五個大企業在重要產業部門

中的生產集中程度：

行業種類	年 度	戰 前		戰 後(1949年)	
		企業數	前五個大企業公司的生產總值在全國生產中所佔的百分比	企業數	前五個大企業公司的生產總值在全國生產中所佔的百分比
煤 炭	1937年	約500	44.4	約550	43.7
製 鋼	1937年	約30	66.4	72	68.3
鋁	1937年	4	91.8*	3	100.0
造 船	1937年	24	86.8	49	56.5
汽 車	1938年	3	100.0**	4	98.8
電 動 機	1943年	7	91.1	39	77.9
合成染料	1939年	94	61.9	48	88.5
洋 灰	1937年	28	54.3	15	70.7
棉 織 品	1937年	82	42.8	34	57.2
人 造 絲	1937年	21	53.4	8	94.1
銀 行	1937年	471	39.0***	74	35.3

(原註：\* 及\*\*表示前三個大企業公司的生產集中程度，\*\*\* 表示貸款額在全國貸款總額中的比重)

从上表看來，僅由三家或五家大企業就壟斷了生產這一點上，不論在戰前或實行了“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以後，其情況幾乎是完全相同的，而在某些產業部門，集中程度甚至比以前更加强了。

那末，這類大企業究竟是那些公司呢？毫無疑問，其中大部分仍然是舊財閥系統的公司。例如壟斷煤礦業的，仍然是三井礦山、三菱礦業、北海道煤礦汽船(三井系)、井華礦業(住友系)、常盤煤礦(安田系)五家公司；而壟斷鋼鐵業的，是一向被稱為鋼鐵六大製造業的八幡(日本製鐵公司)、富士(同上)、日本鋼管(安田、淺野系)、川崎製鐵(澁澤系)、神戶製鋼(舊鈴木商店系)以及住友系的新扶桑金屬公司。至於舊日本製鐵公司乃是國家資本和三井、三菱、住友資本的聯合企業。壟斷鋁工業的是日本

輕金屬(古河系)、昭和電工(安田、森系)、日新化學(住友系)公司；壟斷造船業的是西日本重工業(三菱系)、川崎重工業(澁澤系)、日立造船(鮎川系)、三井造船(三井系)、川南工業(安田系)等公司。根據上述種種說明，就可以推測出大體的情形了。而仔細研究各行業的情況，也可以發現相同的事實。自然，這類財閥公司並不盡是直系公司，其中也包括財閥所持有的股票比例不大的公司以及其子公司和孫公司等；但是這一切對於基本情況，却並無多大影響。

雖說是財閥系統的公司，但在股票被分散於一般大眾後，那末靠原有股票來支配企業的力量豈不應當消失了嗎？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根據股份公司整理委員會的報告書“日本財閥及其解散”來看，三井家族、岩崎<sup>⊙</sup>家族等五十六個財閥家族和三井總公司、三菱總公司等八十三個財閥總公司的股份總額，共有一百零三億一千九百三十一萬日元餘，其中讓與“股份公司整理委員會”的股票總額為七十三億九千四百五十一萬日元餘，約佔其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點三(截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底止)。留下來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七，除約有十九億日元(相當於百分之十八點五)的國外公司股票外，其餘全部都原封未動地保存在舊所有者的財閥手裏。另一方面，在讓與股份公司整理委員會的約七十四億日元股票中，已轉售給一般人的約有百分之六十四；截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底，處理財閥股票所得價款已超過票面金額，計為八十八億七千七百零二萬日元餘；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均已還給舊所有者的財閥了。而且這還是在處分前作為先期付款付給財閥的。此外，在轉讓的股票中，有百分之三十六以“無法處分”為口實，將其一半發還給日本郵船等六十二家公司了。也就是說，財閥不僅將其原有股票的一部分保存下來，而且還用其

⊙ 岩崎是三菱公司的主人。——譯者

餘大部分脫手了的股票換來了數達數十億日元的價款。財閥自然不會讓這筆款子閒置不用，它們並不难將出售給一般人的舊股票重新買回來。總之，財閥本身絲毫沒有被解散，不過僅僅改變一下家族公司這種舊有的形式而已。此外，雖然財閥首腦會遭整肅，一部分財閥公司的商號也會被禁止使用；但是片面“和約”締結後，不但“整肅”被取消，連財閥公司的商號也復活了。諸如三井物產和三菱商事等曾經一度改用分散形式經營的財閥公司，現在又正在重新統一起來了。

另一方面，通過財閥銀行，日本財閥仍然是屹立未動地保存下來了。

戰後日本企業界的經營特徵，在於對外負債比本身資本還要多（一九三七年上半期日本全部企業中本身資本與對外負債的比例是六十對四十；而在戰後的一九五〇年下半期，其比例為二十七對七十三）。這種對外負債的主要債權人是銀行，所以目前的日本產業，大部分是依靠銀行的力量來維持的，而舊財閥系的銀行仍在銀行界佔着統治地位是不待言的。這類財閥銀行自然都是首先照顧與其本身屬於同一系統的財閥企業，因此，日本財閥都以其銀行為中心，正有系統地進行重新改組其企業管理體系的工作。例如千代田銀行（原三菱銀行）對中日本重工業、三菱倉庫、協和交易、三菱鑛業、三菱化學工業、日本光學等三菱系企業的貸款，就比其他銀行的貸款佔有絕對優勢的比重。而帝國銀行與原屬三井控制下的各公司、大阪銀行與原屬住友系統的各公司、富士銀行與原屬安田系統的各公司之間，情形也顯然相同。

關於日本財閥的壟斷勢力如何改頭換面依然強有力地控制着日本經濟，這從上面所述已經可以看到了。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們所控制的產業部門幾乎包括全部原來的軍事工業，而且現在正在急遽地推進着軍事生產部門。這種軍事生產部門，

和整個日本經濟逐漸從屬於美國並走上軍事化的道路是互相關聯的。自第一次吉田內閣實行“重點主義生產”以來，惟有這類軍事生產部門不斷得到了國家的最大保護。而壟斷資本和國家勢力的結合程度，通過這種過程也越來越加深了。並且在這類產業部門中，不但富有戰鬥性的工會首先被分裂，而整肅“赤色分子”的工作也進行得最為殘酷。

那末，是不是日本財閥仍與從前完全相同呢？不是的。從某些地方說來，日本財閥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因為它已經不是獨立的“大日本帝國”的財閥，而是新的從屬於美國壟斷資本的財閥了。至於其從屬的形式及途徑，既有直接“吸收”外資或與外資“合作”的方式，也有通過國家從屬於美國或依靠美國軍事訂貨的方式。總之，日本財閥壟斷資本已經變成將日本經濟當做美國軍事經濟的轉包商而重新改組的核心了。

上述各種情形，就是所謂“解散財閥”的真正面貌<sup>⊙</sup>。於是從前的“大日本帝國”在美國佔領下，在“民主化”的名義下，不過是將原有的國家組織和經濟機構加以局部修改並使其在改組後從屬於美國而已。在從屬於美國的條件下，除壟斷資本家以其優勢的地位和以前的大地主結成聯盟外，並成立了作為這兩者的執行機關而又對其保持相當程度的相對獨立性的官僚機構。而日本天皇並非僅僅是統一結合這一切反動勢力的“象徵”，實際上仍舊是它們的樞軸。它們忠實地為美國統治者服務並利用這種手段，等待着復活“大日本帝國”的時機。它們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於是和美國佔領軍共同對日本人民大眾進行新形式的鎮壓。因此，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並以工農聯盟為中心的日本全國人民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就是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歷史性的基本對立和矛盾。

⊙ 本節多承宇佐美誠次郎的指教，但文責當然由作者負責。——原註

## 第四章 新的法西斯主義的萌芽

“你們不要受欺騙。所謂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表現在政治經濟現象中的東西。你們決不要受欺騙。所謂法西斯主義不過是表現為鎮壓人民和使人民貧困的資本主義組織形態而已。”

路易·賽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親身參加反抗納粹的運動，在戰後以世界工會聯合會總書記的地位成為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領導者，一九四七年四月他在東京對日本工人階級所說的這番話，就是最容易了解而又非常意味深長地說明了法西斯主義本質的解釋之一。

法西斯主義也可以披着“民主主義”的外衣而出現。但是，當我們不是根據統治者的談話而是察看他們的行動的時候；當我們不為所謂恢復全國生產力的口號或似是而非的官方統計等所矇蔽，却直接地、具體地抓住人民大眾生活本身的時候；那麼我們就能毫無遺誤地、清清楚楚地辨認出來這裏是法西斯主義還是民主主義。

### 第一節 片山內閣

#### 一 二·一總罷工後的反動和四月選舉

麥克阿瑟在下令禁止二·一總罷工後，立即命令日本政府舉行總選舉。依照這項命令，一九四七年四月日本根據新憲法舉行了地方選舉和參議院及衆議院的選舉。



這些選舉是在怎樣的環境下舉行的呢？

第一，在杜魯門主義宣言發表後，美國佔領軍在這次選舉中所企圖的是什麼，這是毫無疑問的，而這次選舉就是在那種條件下舉行的。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美軍總司令部發表了作為它的政治部代表人對總選舉的如下聲明。——“美國正如過去不得不和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東條的日本主義鬥爭一樣，今後它在世界任何地方要與之鬥爭的，就是這種反民主的、純政治的、而且是殘酷侵略的共產主義。這件事情對於現在的日本也具有深刻的意義。這次的選舉，就是要決定這種善惡。”（見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日本各報）

這難道還不是對日本國民的絕對命令嗎？它和馬貴特少將在禁止二·一總罷工時，對日本全通信從業員工會委員長土橋（一吉）所說的話，是具有同樣影響的。馬貴特說：“我是麥克阿瑟司令部的總參謀長。你敢不服從麥克阿瑟元帥的命令嗎？如不服從立即下獄嚴處”（勞動省：一九四七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

這次選舉是在和國際方面完全被隔離的狀態下舉行的。從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日止逗留在日本的路易·賽揚等世界工會聯合會的代表，只會晤了極少數被准許見面的人物，他們甚至未能出席四月四日在人民廣場上二十萬日本人民為歡迎他們所舉行的人民大會。日本人民在佔領下的七年中，與唯一來訪的國際組織直接聯繫的機會都被剝奪了。至於報道給日本人民的國外消息，則是處於極端的新聞統制之下。關於蔣介石軍隊開始潰敗的消息等一點也不透露，但是關於杜魯門宣言以及附和它的誹謗蘇聯的報道，却不斷地、無窮無盡地強迫灌輸給日本人民。

第二，由於禁止二·一總罷工的命令而復活了的吉田內閣，曾發佈通告，把二·一總罷工後的個別罷工也看做二·一總罷工

的延長，於是制止了始終實行單獨罷工的全日本運輸工會十萬人的鬥爭，並得到美軍地方軍政部的合作，對於和二·一總罷工沒有直接關係的日本製鐵公司八幡製鐵所、京都島津製作所等的罷工也都進行了鎮壓。此外還假借妨礙業務、違反食糧管理法、違反選舉法等名義，不斷地逮捕了工農團體的幹部（見經濟學全集，安齋·海野：“戰後日本的勞工運動（中冊）”）。

於是在與憑藉政府對工農保護生活的鬥爭進行壓迫的同時，吉田內閣和國會內的保守勢力相結合，接連地頒布了非民主的法律。即既使勞動基準法未規定最低工資制而完成立法手續，又使它的實施日期延遲至九月間。關於實施“土地改革”的農地委員會的組織，則規定為讓地主、官吏可以掌握農地委員會的權力。而對當時的選舉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事情，就是在即將解散國會時，強迫國會通過（三月三十日）了如前所述的、有利於保守勢力的中選舉區單記名投票制<sup>⊖</sup>的選舉法修改案。

第三，一切反動勢力，由於受官廳的這種態度所鼓勵，或由於直接和官廳攜手合作，就開始公開活動起來。其間，報紙和廣播的向右轉，恐怖團體的猖狂行為也非常厲害。在佔領軍的嚴格檢查制度下，美軍總司令部對資產階級報紙和廣播作極周詳縝密的內容指導，使其具有濃厚的半官方色彩，表現出反共、反工人的性質，開始進行全國性的、有組織的反共宣傳。可是恐怖團體的猖狂竟達到了使外國報紙也加以報道的程度，於是官方對恐怖團體就不得不部分地進行檢舉。報紙和廣播對恐怖團體雖也曾進行過攻擊，但對恐怖團體是在什麼條件下和具有什麼背景而產生的，却一向不加追究，甚至對於恐怖團體襲擊共產黨

<sup>⊖</sup> 中選舉區是將一縣分為數區，每區可以選出數名國會議員。單記名投票制是限制選舉人的投票權，即每區不管有多少議員名額，選舉人在投票時只能在選票上寫一名被選舉人。這是日本統治階級為阻礙進步人士當選所採取的無恥手段。

或工會的事情，故意加以默認。正因為對於向山形仁丹工會、全國柴油工會等施行強暴的恐怖團體，對於向栃木縣共產黨議員候選人松本、向銚子的民主戰線議員候選人越川所施的暴行置之不理；所以東京新宿的恐怖團團長尾津喜之助才會成為自由黨的議員候選人；自由黨外圍團體的新銳大眾黨，才能藉着襲擊“產別”議長听濤的餘威，採取了預先約定使用人民廣場來妨礙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行動。

第四，一面配合着這類趨向和步調，一面藉着從內部來分裂工人階級而與日本民主化以致命影響的，就是社會黨、日本工會總同盟、日本農民協會等幹部佔其大部分的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活動。它們在二·一總罷工後，立即通過社會黨、日本工會總同盟，發表了將二·一總罷工責任歸之於共產黨的聲明，表明了反共、反“產別”的方針。這也就是美軍總司令部的方針。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勞動教育班長德微拉爾以“捲起紅旗重新出發”（“讀賣新聞”）為題發表意見說：“長年累月一直生活在法西斯主義下的日本人，有被代之以另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並公開建議從工人運動中排除共產主義者。這時，日本工會總同盟曾聲明說：“總同盟從最初起所實行的就是如同總司令部所說的一樣”。並由這類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了許多所謂“第二工會”<sup>①</sup>。在農民戰綫中，代表富農的、日本農民協會最右翼的平野派，在二月的大會上，一看出不能掌握到領導權，就在講台上大鬧一通後退出會場，另組日農刷新同盟（即以後的全國農民協會），破壞了農民戰綫的統一。

當時勞動大眾的政治意識，還很難說已經達到充分的程度，能對這類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分裂行動，立即予以徹底的批判。

① 所謂“第二工會”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組織的反動工會。——譯者

由於這類鎮壓和分裂活動，在一部分工人階級中產生了失敗主義的情緒。於是發生了不健全的支部退出全國性同業工會的現象，出現了不少工人放棄工作崗位去作黑市買賣的現象。工人的生活陷於悲慘狀態。由於二·一總罷工受挫折的結果，它使黑市米價在一月底到三月底之間立即上漲了近兩倍（東京都的推定），而包括代用食品在內的主食配給之遲發和欠發，從二月起已遍及於全國。

爲了使都市市民的不滿不要針對着統治者，於是日本政府、報紙、廣播等拚命進行農民因賣黑市而大賺其錢的宣傳，以便引起工農間的分裂。但是在嚴格的徵購制度下，所謂可以賣黑市米賺錢的農家，即除自用食米、徵購米以外可以大量賣黑市米的，也只限於地主和富農。而佔絕對多數的農民是沒有餘米可以在黑市上出賣的；即使賣一點兒黑市，也還不够購買黑市價格遠較農產物黑市價格爲高的肥料和農具。農民並沒有大賺其錢，相反地，政府却使用強權，以不够生產費的徵購價格，甚至把他們的自用食米都奪去了。

站在這種所謂強權徵購前列的就是美國軍隊。二月十九日，駐岡山的美軍軍政部長認爲縣長的作法太迂緩，要求縣長用一切手段完成徵購，並通知說，軍政部將於三月十三日直接對徵購不良的村鎮進行挨戶訪問。同樣的命令，從長崎、新潟、千葉、福島、宮城、山梨、山形、茨城、大阪、三重、秋田等地起，差不多波及於全國各府縣。在三月十二日的日本全國美軍軍政官會議上，還正式決定了对全國徵糧採取嚴厲執行的方針。日本政府受到這種鼓勵，也根據食糧緊急措施令和食糧管理法發動強權，對於不供應徵購米者以拒絕供應罪加以逮捕，甚至沒收其食米；並要求自動供應徵購米，如對徵購額舞弊者，則以煽動罪投入監獄。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本人發出督促徵購的命令。所謂“吉普徵購”就是指此。於是堪與日本戰時徵

發相比擬的、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的食糧強制採購，就全面開始了。這一年（一九四七年）對不順從徵購的農民行使強制措施的事件，甚至根據農林省的調查，也超過一萬一千件（即達每村一件的數字，而實際數字當遠較這個數字為高）。如以青森縣為例，僅在三月份一個月中，就有一千多農民曾被起訴。因此，在全國發出“種稻不夠本”的呼聲，特別是在東北、北陸這種純粹種稻的地區，竟發生不得不靠借米、借地或出賣土地、牛馬、子女以免受逮捕而維持生活的悲慘現象。不要說是靠黑市賺錢了，大部分農民生活的被破壞，這從農村經濟枯竭在三月起急遽惡化以及大多數縣、鎮、村農業會的陷於破產來看也就可以為証了（見伊藤律：“農民運動”、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農業部編：“日本農業年報”第一集）。

在這樣環境中，以美軍總司令部為前鋒，大規模地進行了獵取選舉票的運動。因此保守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勝利乃是當然之事了。

但是，在眾議院的選舉中，社會黨得到了一百四十三個議席，自由黨得到了一百三十一個議席，民主黨得到了一百二十四個議席，國民協同黨得到了三十一個議席，共產黨得到了四個議席。從各黨在選舉中所處的條件來看，共產黨並沒有出乎預料的不振，而社會黨的一躍成為第一黨却完全出乎一切人的預想之外。這不過是說明了，戰敗後為黑市和通貨膨脹所苦的勞動者，在選舉中拋棄了保守政黨，而對社會黨所揭櫫作為公約的社會主義政策有所期望而已。實際上，社會黨在選舉中所作的諾言，是具有符合於國民期望的內容的。例如（一）重要產業的國有與國營，（二）停付戰時公債的利息，（三）日本銀行概歸國營，（四）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五）以充分就業為目標縮短勞動時間，（六）斷然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七）減低勞動人民的所得稅和廢止大眾課稅，（八）實施社會保險等。

在日本，这是提倡社会主义的政党首次成为第一党。这也是以社会党为中心的民主势力联合政府，在外表上似有第一次具体实现的可能。

作为对选举结果的批评，麦克阿瑟立即讚美说：“日本国民断然排除共产主义的领导，绝对地选择了中庸之道。也就是为了保持个人的自由、提高个人的权威，选择了极右和极左之间的中间道路”（四月二十七日）。无疑地，麦克阿瑟是不会支持社会主义的，那末，为什么麦克阿瑟能够把希望放在社会党身上呢？

## 二 社会党首相内阁的成立

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的社会党大会上，社会党总书记西尾末广就曾说过：“为了联合四党和保守阵营进行斗争，应该和它们组织联合政府”。西尾所说的话，虽然就道理方面来说，除了他自己以外，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但就他的用意来说，一般人谁也懂得他不过是说要和保守政党合作而已。并且在一九四七年一月，面对着劳动攻势的吉田内阁，曾通过和田农林大臣、有泽教授、木村国务大臣，对社会党左派的铃木茂三郎、右派的西尾末广、极右派的平野力三，进行过入阁谈判。结局虽未获成功，但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政策的分歧。这从社会党的佐竹晴记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在国会上追究“联合工作因石桥问题而未能实施”时，大藏大臣石桥所暴露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石桥说：“关于这一点，森户（森户辰男是社会党当时的政务调查会长、属社会党右派）不是曾经说过，作为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社会党也有它的立场，所以只要政府假装一下要实行的样子就行了吗？我觉得对这种事情不过份加以追究，对社会党是有好处的”。

在迎接四月大选时，自称“劳动阶级代表”的社会党干部他们的选举资金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

正如後來在非法財產交易委員會中所暴露出來的一部分情形一樣，右派代表的西尾末廣，“以社會黨總書記地位的西尾個人”，或僅僅以“西尾個人”名義，曾接受大阪大土木建築資本家大林組五十萬日元和接受吳名昭著的昭和電工公司一百萬日元的鉅額獻金。雖然這在法律上不能以“賄賂”論罪，但是却不能抹煞從壟斷資本接受了“禮款”和“政治獻金”的這一事實。而且壟斷資本的代表曾明白表現其意志說：“在這次選舉時，因為正在赤旗的暴風雨中，所以希望走中間道路的政黨獲得發展”（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大林組經理在非法財產交易委員會的証言）。西尾本人曾明白作証說：這筆款子是散發給了他的部下熊本虎藏、大矢省三、原虎一、渡邊年之助、永江一夫等四十人。在這方面左派也毫不讓人，僅就已知道的說，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加藤靜枝從東亞興業公司的梅村清那裏接受了一百萬日元；此外，加藤勘十從工人們正與其進行鬥爭的保土谷化學經理那裏接受了選舉資金（見井上清：“日本政治腐敗史”）。

因此，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當選的社會黨議員一百四十三名中，就出現了以公司經理和董事佔三十七名、資本家團體職員佔二十八名、律師和公司職員佔三十四名的這種按幹部職業區別的分佈情況（見大曲直：“日本社會黨論”）。

但是，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特徵是從內部破壞工人的統一和不履行它的口頭諾言。在這一點上，大部分日本社會黨幹部也和世界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一丘之貉。

社會黨委員長片山哲在選舉的第二天曾斷然說：“要始終和保守反動陣營相抗爭，並通過議會實行革命”（見“朝日新聞”，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但在口沫未乾的數日以後，片山等所着手的工作，不是和民主勢力相聯合，而是和保守政黨組織“舉國”聯合政權。這不過是完全仿效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例子，即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口中一直反對戰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幹部

一樣，与战争爆發同時，它就推翻了一星期前的宣言而協助从事战争。

由於社会党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起正式開始和自由党、民主党、國民協同党進行联合工作的結果，根據社会党提出的協定案，在五月十二日成立了四党的政策協定。但其中絲毫沒有包含社会党任何一項的選舉公開諾言在內。雖然社会党辯解說，因為这是和其他政党的協定所以不得不如此云云，但首先在社会党所提出的原案本身中，就絲毫未曾包含任何一項選舉時的公開諾言在內。不僅如此，在這個四党協定中，明白規定着“不凍結新日元，不停止支付國債的利息”；这就証實了前大藏大臣石橋所暴露的前述社会党和自由党的秘密政策協定是实有其事。此外，社会党还承認了下列三條件：（一）反对極右和極左（即反对共產党的意思），（二）不洩露重要机密（即不將重要問題訴之於大眾的意思），（三）不从事有引起社会不安之虞的行動（即不要求議會以外的運動的支持的意思）。即使如此，还担心不能完全解除壟斷資本的不安。於是号称左派的鈴木茂三郎和加藤勤十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發表了“和共產党劃清界綫”的談話；接着又說明了他們的真心是：“过去之所以表面上和共產党有若干合作，这是因為在使工会疏遠共產党上有其必要的緣故”。因此，毀棄公開諾言以及和保守政党联合，並非單純地爲了希望取得政权；而是因為在抑制共產党和幫助壟斷資本上有其必要的緣故。

最後，自由党拒絕入閣。它所宣佈的理由是因為自由党會要求社会党開除左派分子而未被接受的緣故。但是在五個月以前，自由党内閣對於還沒有發表反共声明的左派，不是也曾作过促使其入閣的努力嗎？自由党幹事長大野等在屢次声明中曾經表示，該党既不希冀首相的位置並已滿足於政策協定；那末，当自由党所極力期望的反共的全國一致內閣計劃即將實現的時



候，自由黨的引身而退，就必然是有其他的理由了。

禁止二·一總罷工及以後的反動行爲會引起人民的極端憤怒，這從社會黨在選舉中成爲第一黨一事就顯然可以看出來了。當自由黨正進行入閣活動時，在全國曾引起強烈的反對呼聲。特別是在選舉中成爲擊潰自由黨原動力的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的入閣，表示了將以罷工進行鬥爭的態度。如果讓極右的反動政黨參加內閣，統治階級首先就沒有能夠抑壓住人民的自信。並且，在危機中的日本，如果成立了一個除共產黨外包括全部政黨的全國一致內閣，而又未能克服這個危機時，那將成爲什麼局面呢？那才真正是充分具有使共產黨勝利、使壟斷資本徹底毀滅的危險。因此自由黨的拒絕入閣，必然是由於這個道理。這種頭腦清晰的想法——事實上，當時這種預想已快要實現了——由頭腦糊塗出名的自由黨想出來是困難的。這不禁使我們回憶起，正如馬克·蓋因、約翰·根室等衆口一辭所說的那樣，深受美軍總司令部最高幹部集團所賞識的自由黨的吉田茂在這次入閣談判中曾不斷和美軍總司令部採取聯絡的事實。

於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社會黨的片山哲遂被選爲首相。第二天，麥克阿瑟發表了“這充分表示日本的國內政治在向中間道路前進”的聲明，並爲它祝福。

### 三 勒緊腰帶生活的實現

由社會黨五名、民主黨五名、國民協同黨一名擔任大臣所組成的並以片山爲首相的中間道路內閣，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誕生了；它於六月十一日發表了八項“經濟緊急對策”後，七月五日又同時公佈了這個經濟對策的基礎——“新物價體系”及其基本資料——“經濟白皮書”。

新物價體系的工資爲戰前（以一九三四—三六年爲基準）的二十七至二十八倍（規定以一千八百日元爲工資基數），米價爲

戰前的四十五倍，一般物價為戰前的六十五倍。但對生產價格已定得很高的主要商品還額外給予價格差額津貼。例如煤炭價格為戰前的一百二十倍，硫酸銨為戰前的一百三十九倍，銑鐵為戰前的二百一十倍，鋼材為戰前的二百二十倍；打算從給壟斷企業的商品以遠較戰前為高的消費者價格着手，藉以圖謀所謂經濟的復興。一看這些倍數就會明白，這是利用低工資、低米價、高物價來犧牲人民，以便重新復活陷於危機中的壟斷資本。第一，這裏所決定的工資水準，即所謂一千八百日元基準，是首先以鋼鐵業能盡量賺錢來決定煤炭價格，又以煤炭業能盡量賺錢來決定煤炭工人的工資，然後以此項數字作為全體工人的工資水準。所以從最初起，這就是為了確保高額利潤所製定的低廉工資體系。而為了維持這種低廉工資，就必須保持低米價。至於所謂平衡價格計算法<sup>⊖</sup>，表面上雖然很像對戰前的生產價格已有所補償似的，但實際上是利用把農民勞動、黑市肥料等所有生產價格都不包括在內的計算法，將米價規定在遠較生產價格為低的水平上。此外，對壟斷企業，藉所謂“重點主義生產”的名義，不僅給它們以價格差額津貼，還利用復興金庫的貸款、優先分配物資等方式，把人民的稅款和物資都集中地給它們了。而據經濟白皮書說，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夠提高生產和擴大貿易（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機中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結構”）。

這種辦法連片山內閣也不能稱它為“社會主義”，於是創造了所謂“高度民主主義”的名詞。但是，這種“高度民主主義”，毫無疑問，正因為它在維持和扶植壟斷資本上是高度的，所以壟斷資本的代表人、經濟團體聯合會的石川一郎才稱讚它“實在是很

⊖ 平衡價格計算法是選定某一時期作為某項農產品的價格標準，並計算出該項農產品價格與一般物價的比例；如一般物價上漲，即按照此項比例提高該項農產品的價格。這是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手法；日本政府即用此法計算米價。——譯者

好的对策”(見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日本經濟新聞”),自由黨也才“对政府的態度表示敬意”(見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朝日新聞”)。

片山本人在組閣後第一次談話中就大嚷要犧牲人民的生活。在以“向國民呼籲”爲題的廣播中,這個社會黨員的首相說:“爲了克服通貨膨脹、復興生產,甚至還要要求繼續過比目前爲甚的勒緊腰帶生活”(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於是“勒緊腰帶生活”這句話成了流行語。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博雄曾極力廣播說:計劃在十一月間要使勞動者的家庭經濟有盈餘(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但是,這所謂盈餘是在預定的超過勒緊腰帶生活上的盈餘,即四點二人一戶的人家,每年有木炭三簍,五年有毛巾一條,五天每人有手紙一張,五月可以理髮一次。

而且在資本主義中,計劃經濟至少從所謂改善人民生活之類的、資本主義的“由上決定的計劃”,是從來未曾有過一次成功的事情。就在發表了“盈餘說”的那個月中,甚至根據總理府統計局的調查,生活費業已較政府的預定上漲了兩倍(日本全國二十八個都市中,五口之家的平均生活費爲五千四百五十七日元,其中飲食費爲三千七百三十日元,佔消費款額的百分之六十八)。其所以如此,固不僅僅是由於資本主義決不能夠對物價作本質地統制的這一鐵則,還由於片山內閣雖然口稱“健全預算”並確曾在一般會計中減少了赤字,但是在特別會計中卻又編入了龐大的赤字;再加上前任內閣時代的復興金庫貸款及其他對壟斷資本救濟費的發放,因此從一開始就親自製造了引起通貨膨脹、破壞物價體系的因素。於是,黑市價格平均每月以接近百分之二十的比率上漲,片山內閣也就隨之不斷地提高了公定價格。但是資本主義的工資統制,只要是沒有工人的反抗,就會日趨嚴重的。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已完全釘死在一千八百日元的基準之上。雖然拿這點工資已不可能過活,而主

要食糧的延遲配給竟在全國日趨嚴重（延遲配給的情形至七月二十日止，全國平均延遲了二十日，北海道延遲了九十日）。這種延遲的配給，竟以飼鳥的玉蜀黍、吃了以後誰也會壞肚子的大豆粉等作為主食的。

工人階級首先對這種生活的破壞進行了反擊。在二·一總罷工後採取守勢現在又活躍起來了的工人階級，從一九四七年七月底起，以機械、化學、印刷出版業為首，在私營企業中發動了要求打破飢餓工資，要求彌補虧空的津貼的鬥爭，並獲得了統制數額以上的工資。於是重新復活壟斷資本為目的的低工資體系，立即依靠工人的實力，開始被打破了。

一見這種情形，立即趕來救援片山內閣的便是美軍總司令部。本來所謂片山內閣的緊急經濟對策，不過是把作為“促進經濟統制”的、麥克阿瑟三月二十二日致前任首相吉田信件中的內容，再加上所謂“保證勞動者生活”這一項適合於中間道路內閣的話而已。所以，美軍總司令部一看見從“保證勞動者生活”這一項開始的整個經濟體系行將崩潰時，就首先拋出了大量的糧食（當然，正如前述麥克阿瑟報告中所說的一樣：“這並不是為了慈善”）。美軍總司令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拋出了二十二萬噸糧食，特別是八月九日在九大都市中拋出了一萬一千噸糧食，八月二十日又預先付給日本政府以九、十月份的六十六萬噸糧食。接着，八月十四日，美軍總司令部發表了設立一億二千七百萬美元的輸出入周轉基金的決定，並公佈自第二天（八月十五日）起准許重新開放壟斷資本所期望的私人對外貿易。這種貿易，完全處於美軍總司令部的管理之下，因為它的目的是在於藉低廉工資為基礎實行飢餓輸出，藉加重人民負擔來輸入高價的商品，所以其意義是讓外國來剝削日本人民的血汗。但是從以壟斷資本為本位的復興經濟政策轉為依靠吸收外資和重新開放對外貿易的片山內閣說來，却把它當做“久旱的甘霖”（一九四七年八月十

五日片山談話)來加以歡迎了。

美軍總司令部的勞工政策是以二·一總罷工為分水嶺而大有改變。這種改變從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詹姆斯·基倫四月二十四日就任日本勞工顧問時起就很顯明了。在基倫帶至日本並由他發表的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格林的公開信中，希望日本工人不要依靠鬥爭，而要“依據集體合同及勞資的書面協定”來改善生活。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用經濟科學局勞動部的名義，發表了所謂工會民主化，即排斥和攻擊共產黨的小組活動的小冊子（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朝日新聞”）。四月二十九日，基倫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勞動者為了改善生活，所需要的只是增加生產和堅固的集體合同”（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讀賣新聞”）。代表這種說法的三項政策是——（一）以工會“民主化”的名義，用排斥共產黨小組的方式，奪去共產黨對勞工運動的指導力量；（二）把勞工運動限定於集體談判、集體合同的範圍內，奪去工人的戰鬥性；（三）以增加生產的名義企圖協調勞資關係；這就是美軍總司令部勞工政策的基本論調。這種基本論調，以後由基倫和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人員屢屢作為談話加以發表；並且利用電影、小冊子、教育講座等手段來大肆宣傳。此外，不管是在中央或地方，美軍總司令部發出許多的“勸告”或“忠告”，對日本的工人運動進行了強烈的干涉。

在九月初開始設立的勞動省，就是沿着這條路綫進行活動的。最近，加藤勘十以“設立勞動省的內幕”為題發表文章說：“勞動省完全是服務機關而不是權力機關。首任勞動大臣米窪曾極力說明這一點，而繼米窪後任的我，也強調這一點。在全官廳工會協議會的爭議中，我就是這樣來實行的”（“改造”月刊，一九五二年增刊號）。加藤是怎樣“實行”的，姑留待以後再說；而米窪所極力說明的則是“保證生活就會製造惰民”（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所說）和“為了復興生產應迅速解決

爭議”(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所發表的勞動對策)。所以勞動省不是為日本工人服務的機關，而是為美軍總司令部和日本壟斷資本服務的有力機關，這已由他們自己屢次予以証明了。

當然，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曾經拚命為“勒緊腰帶生活”作宣傳和辯護。日本工會總同盟，在與片山內閣成立同時，就發表聲明全面地支持這些宣傳。號稱為勞動統一戰綫的、在二·一總罷工後從“全國工會聯合鬥爭委員會”發展而成的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簡稱“全勞聯”)，它雖然鬆懈，却是日本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唯一的全統一組織(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成立)。日本工會總同盟對於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不是使它加強而是要它“和社會黨合作”，並利用“盡量避免罷工而應重視談判鬥爭”的原則去抽掉它的骨骼。除此以外，還提議另外組織一個新的全國協議會(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甚至被稱為日本工會總同盟左派幹部的高野實，在出席大阪“產別”的演說會中也說：“對於罷工的地方不借錢，解僱工人也是不得已的”(龜田東伍：“工人的政治生活”)。在農民戰綫方面，同屬左派的野溝、稻村、岡田等日本農民協會議員團，與鈴木、加藤的反共聲明相呼應，提倡排斥共產黨，而與主張政治自由的黑田壽男等社會黨統一左派(純正左派)相對立。他們從七月起組成日本農民協會主體派，開始進行分裂日本農民協會的活動。所謂社會黨左派雖未參加內閣，但在國會中加藤擔任勞動委員長，鈴木擔任預算委員長(在社會黨內擔任政務調查會長)；他們與右派分工合作，在國會中起了協助片山內閣的作用。而他們看到人民的不滿日益高漲時，八月底，以鈴木為中心擬訂了補充政府經濟政策的緊急對策草案，並為宣傳此項草案曾在全國掀起遊說運動。這草案雖認為“政府的對策不夠完全”，但它也不過是在政府方案上稍稍增加一些左傾的詞句而已，基本上它和政府的對策是完全相同的。例如，在作為草案中心的工資物價對策中，就認為“維持一千八

百日元基準而重新開放對外貿易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並應宣傳解釋，在明年下半年以前，勒緊腰帶生活是使日本經濟恢復到戰前的一半和穩定國民生活的基礎”。又說：不能“贊同如共產黨所煽動的、每人每月三千六百日元之類的不合法的提高工資要求”，而認為“工人階級有堅持勒緊腰帶生活，燃燒起建設精神”的必要；並應“努力使工會運動的主要方向轉移為重建經濟和復興工業的運動”。所以大部分社會黨右派和左派的幹部，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自由黨和壟斷資本都積極支持片山內閣的經濟緊急對策，特別是對於凍結工資政策，不惜全面加以協助。尤其它們極力鼓勵和督促能壓制工人的片山內閣利用行政整理和整頓企業去實現產業合理化，而這種企圖是過去被十月鬥爭和二·一總罷工所打垮了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前首相吉田在國會中作代表質問時說：“第一，如果不重新開放對外貿易，就不可能防止通貨膨脹和安定國民生活。……第二，首相應使人民大眾透徹了解目前的經濟實際情況，關於產業合理化和裁減冗員，希望採取斷然的措施”。片山內閣為適應這種要求，於是在七月中改訂了“貸款規則”，並逐漸限制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但是，壟斷資本對此仍感不足。日本銀行總裁一萬田曾發表談話說：“對虧空者給與貸款是不會實行的。對於不解僱工人的企業也不給予貸款。並希望政府斷然實行行政整理和產業合理化”（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是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答覆說：“如果不實行國有企業的合理化，私營企業就很難實行調整”，表示將着手行政整理（十月二十九日）。首相片山對此表示同意，並在國會中答辯說：“政府認為緊縮行政人員不必等待草定具體方案，今後將局部地順次實行”（十二月五日）。

於是，片山內閣，在整個統治勢力的支援下，實現了“勒緊腰帶生活”。

黑市價格每日上漲，即使根據東京都的調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比頭一年上漲了約三倍，平均約達公定價格的十倍。不僅是黑市價格，即使被統制的物品的公定價格，八月是魚類，九月是交通費，十月是香煙等，低的上漲了百分之六十，高的上漲了兩倍至三倍。

主要食糧的延遲配給，在十月間，平均起來，東京為二十日，北海道為六十日；最後到十月底時，竟採取了把全國二百零五萬七千石延遲配給的糧食一筆勾消的殘酷措施。這項够二百五十萬人吃一年的配給糧，竟用一紙行政命令完全勾消了。

而且，只有工資的公定價格、低米價與重稅絕沒有改變，所以家庭經濟當然不會有盈餘。即使根據勞動省的工人每戶家庭經濟調查，在應該出現盈餘的十一月時，勞動收入僅及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五，就是把借款和賣衣服的钱計算到收入之內，每月支出的百分之五·七仍然是赤字。

這樣當然無法生活下去。而事實上有一位遵照政府命令拿一千八百日元基準薪水專靠配給生活的法官就餓死了。這事件曾在報紙上哄動一時。這因為他有法官的地位，報紙才會採錄為新聞，至於報紙所不採錄的“無聲的人民”，或者在上野的山上，或者在大雜院的破屋中，則在不斷的死去。

#### 四 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的產生、 片山內閣的瓦解

在資本主義下面，人民如果不進行鬥爭，那就惟有受苦到死。

親身體驗了這種痛苦的工人，先要求發給突破危機費和生活虧空補助費，到九月左右進而提出了提高工資基準的長期要求。雖然未能達到所要求的數額，但是由於打破了統制工資，便獲得了個別擊破按行業來劃分的工資制度的結果。



工資被固定為一千八百日元基準的國營企業工人，也从七月起，以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為首，開始要求發給臨時費；九月，以全官廳工會協議會（簡稱“全官”）的名義，向政府提出了打破一千八百日元基準和保證可以產生二千四百卡路里的最低工資制的要求。當政府正式拒絕此項要求時，被禁止從事罷工的官公廳勞動者，在分別向中央勞動委員會、地方勞動委員會提出控訴同時，並以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國營鐵道工會、全國財務工會為中心，展開了激烈的地區鬥爭和工作崗位鬥爭。他們開始突破了听任幹部操縱鬥爭的範圍。

這種自下興起的工人秋季攻勢，使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反共和分裂工作在羣眾中失去了依據。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日本工會總同盟大會上通過了支持社會黨、堅持一千八百日元基準的決議案，這件事情使日本工會總同盟的幹部陷於孤立。十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受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唆使，發出要把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集體請假戰術作為“野貓罷工”<sup>⊖</sup>加以處分的警告時，結果在工人團體中只有日本工會總同盟支持政府的這種警告。

但是分裂主義者是不會就此默然退却的。他們是愈受反對就愈想用陰謀進行巧妙的分裂。特別是在美軍總司令部壓力甚強的新聞通信廣播工會中，就以讀賣新聞工會（在美軍總司令部直接干涉下，在罷工中新組成的御用工會）和廣播第二工會（完全接受資本家的要求，把從工會中驅逐出共產主義者及其同情者訂入規章中的御用工會）等為中心，大規模地進行了分裂和退出工會的活動。

在這類分裂活動中，首次給與日本工人運動以最大打擊的

<sup>⊖</sup> 所謂野貓罷工（Wild Cat Strike）是指個別工會組織不根據工會總部的命令，而自行進行集體請假之類的鬥爭。——譯者

就是破壞了煤礦工人的統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成立的煤礦工会全國協議会是强有力的煤礦工人攻勢的後援者，這個協議会是由“產別”的全國煤炭產業工会（簡稱“全炭”）、中立的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簡稱“炭联”）、日本工会總同盟的日本礦山工会（簡稱“日礦”）這三個工会合組而成的。它是日本工人統一戰綫最有力的堡壘之一。但是從一九四七年夏天起，就遭遇了資本家团体（日本煤炭礦業联盟）露骨地策動分裂的陰謀，並由許多社会民主主義者開始從事分裂它的活動。這在十月的煤礦工会全國協議会大会上終於爆發出來了。

掌握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領導权的武藤武雄，在这次大会上是分裂主義者的中心。當他在批准職員問題上和組織問題上屬於少數派的立場時，他就主張推翻原議從新討論，並且主張取消多數表決制而採取協議制。當這類主張又被否決時，他就率領着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及許多日本礦山工会的代表退出會場，另外組成了所謂“不容獨裁陰謀分子有參加餘地”的日本煤礦工会同盟（簡稱“炭勞”）（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於是，剩下來的全國煤炭產業工会（簡稱“全炭”）和中立工会就組成了全國煤炭工会（簡稱“全石炭”）這一同業工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毫無疑問，在瓦解這個煤礦工会全國協議会中，分裂主義者的策動及其推動者的資本家团体的陰謀，以及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日本礦山工会等主要是由中小煤礦工会組成的這種情況是起了作用的。但是，除此以外，作為使這些分裂工作容易進行的社会條件，則是殘留在煤礦中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煤礦勞動，雖然是最現代化的勞動，但在日本，工人幾乎全部是出身於農村；於是，一方面盡量省去机械的使用而使他們從事手工勞動；同時又被著名的禁閉室和工头制度等封建的勞動組織所圍

繞着。这种从工作場所和社会全体有聯繫的濃厚的封建結構，正是社会民主主義者有机可乘的絕好條件。例如屬於武藤武雄的地盤的常盤、北海道、北九州煤礦，在煤礦勞動中，也是封建色彩最濃厚的地方。

日本煤礦工人所从事的既是現代化的勞動，但是勞動組織同時又是封建性的；這裏面就存在着日本煤礦工人之所以既能進行勇敢的鬥爭，同時又經常為分裂活動所利用的基礎。

在農村中被封建土地所有制強烈支配着的日本，封建制度不僅从根本上束縛着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並且給社会民主主義者提供了与特权階級相勾結而从事活躍的絕好條件。因此，封建制度對於團結一致進行鬥爭這類現代工人的唯一武器，也就起了腐蝕的作用。

國營鐵道工人和煤礦工人一樣，一面从事着最現代化的勞動，一面由於大部分是出身於農村或与農村有深刻聯繫，加之，还受着封建身份制度的強烈束縛；所以他們的情形也就和煤礦工人大体相似，即最具戰鬥性的鬥爭和被分裂活動所利用的情形，由於時間、地區和工作崗位的不同，彼此交錯地消長着。

利用美軍總司令部建議的“工会民主化”名義从事分裂活動，是从國營鐵道工会開始的。

从十月十六日起，在东京舉行的國營鐵道工会臨時大会中，当反映工会會員的意志把右派所提出的職位等級制工資方案和压迫地區鬥爭的鬥爭方針分別以三十票和七十票之差加以否決時，右派就採用妨碍會議進行和退出會場的戰術使大会陷於混亂，而担任大会主席的右派分子齋藤鉄郎就趁此机会，片面宣佈大会散會。於是，齋藤等人二十日在大宮聚會，協議在國營鐵道工会內製造反共組織。此外，他們又得到了日本勞工運動最大叛徒和強有力的戰爭協力者的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等的指導；十一月七日，以星加要、長谷川英雄、齋藤鉄郎等為中心的國營

鐵道工会最右翼幹部聚集在上野車站，組織了國營鐵道工会反共聯盟（一九四八年三月，改稱為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而成爲所謂“民主化同盟”的前驅。

民主化同盟的特徵，就是要奪去工人的戰鬥力量。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所製定的基本方針，絲毫沒有規定如何進行鬥爭，而只是強調“排斥共產黨，防止共產黨員充當工会職員”。並且，在它的宣言中說：“這一英明的決斷（使大會流產）很好地防止了國家的危機，完全地粉碎了共產黨的陰謀。但是，和他們的戰鬥並未結束，而只是剛才開始”。於是，反共聯盟發表了所謂二·一總罷工時共產黨的秘密指令，把它當做“共產黨陰謀”的證據。但是，所謂秘密指令既沒有發令者的署名，而內容又是說“革命委員應於二月一日午前零時採取特殊行動”，對根本不存在的“革命委員”令其採取莫名其妙的“特殊行動”。這不待共產黨正式否認，就可以看出是漏洞百出的偽造指令（勞動省一九四八年版“資料勞工運動史”）。

儘管成立了社會黨內閣，又有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分裂活動，但是由於工人攻勢的高漲，終於使日本政界發生了動搖。自由黨拋棄了壓制不住工人的片山內閣，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發表在野黨宣言，開始進行以建立反共、反社會黨的保守政黨聯合內閣爲目標的活動。因此，這也就引起了社會黨右派內部矛盾的增漲。主張開除社會黨左派以便和自由黨、民主黨聯合的農林大臣平野，因爲和主張一面利用左派以壓抑勞工運動一面繼續維持與民主黨、國民協同黨聯合的國務大臣西尾發生衝突，在十月間被罷免職務。於是，平野以全國農民協會的國會議員爲中心，在社會黨內組成了與自由黨相接近的最右派。與此相反，以日本農民協會統一派爲中心的社會黨最左派（純正左派），反映了人民對政府的尖銳攻擊，開始批判和保守政黨的聯合，而強烈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加藤、鈴木等所謂左派，也

被捲入其中，在農林大臣等問題上開始和右派趨於對立。關於內閣政策問題，民主黨過去是听任社會黨右派及與右派合作的、以和田博雄（現在的社會黨左派）為中心的經濟安定本部的官僚去掌管。現在民主黨看見社會黨的這種分裂情況，於是在十月二十一日，藉着將預算編製權從經濟安定本部奪到大藏大臣栗栖（栗栖屬於民主黨。——譯者）的手中，遂掌握了內閣的主導權，並且強調應利用整理企業、吸收外資來打開經濟危機。

但是，生活被迫得走頭無路的工人，卻從秋季攻勢接着轉入了冬季攻勢。

全通信從業員工會將計就計，利用“野貓罷工”的警告，交替使用慰勞休假、舉行工作場所大會、要求特別配給等的複雜戰術，擴大了地區鬥爭、工作崗位上的鬥爭；並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起，在全國同時舉行了三天的反政府的波浪式的鬥爭。國營鐵道工會的下層工會，也排除了反共幹部的壓迫，開始進行地區鬥爭和工作崗位上的鬥爭。被公務員法剝奪了罷工權的各官廳職員工會，也運用定時下班、一齊請假等戰術逼迫政府。這終於使政府屈服了。十二月十五日，政府接受了中央勞動委員會所提出的支付二月至八月份生活補助費的妥協方案。但是全官公廳各工會當知道這是將稅款包括在內時，除領導權被右派掌握的國營鐵道工會以外，都對決定新工資的薪給審議會加以抵制，並將鬥爭集中於要求最低工資制的運動。

私營企業工人的鬥爭，當接近年底時也日益尖銳起來，特別是依靠下層的共同鬥爭使工人的統一戰綫從下層鞏固起來了。他們排除了分裂主義者的策動，在十月底，全國金屬產業工會（簡稱“全金屬”），十一月、日本自治團體工會總聯合會（簡稱“自治勞聯”）及全日本化學工會（簡稱“全日化”）之類的全國性企業組織，或者是新組織起來，或者是大大擴大了。反映這種趨勢，於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產別”大會中，批判了片山

內閣的全部政策，決定由工人親手發動獨立的復興生產鬥爭。

此外，片山內閣的“經濟復興”對策，還破壞了中小企業家和農民的生活。在選舉時公開約許要挽救中小企業的社会黨內閣，把產業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幾乎完全集中地給與壟斷資本了。據該公庫一九四七年度第一季度的報告，中小企業僅佔貸款總額的百分之五點四；若就對虧空者的貸款而言，實際上所佔不及百分之一。再就全部應進行配給的資材方面說，其大半也是集中於壟斷資本。一九四七年七月，東京中小工廠所分得的配給資材僅及批准配給的全部必需資材的百分之三十六而已（據東京市政調查會調查）。因此，壟斷資本的懷裏雖然是充滿了資金和資材，但中小企業却為獲得資金和資材所苦。

在片山內閣下，對農民除強迫徵購麥子外，並和戰時一樣還強迫攤派稻米的數量。社会黨本應實行它所許諾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但它在組成內閣後，却在議會中表明：“不考慮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農林次官井上）。不僅未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它對地主的收回土地也不加制止，於是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這四個半月內，僅據農林省的調查，地主收回土地的件數已達一萬三千五百七十起（見“日本農業年報”第二集）。

於是，片山內閣利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追加預算，一方面大規模地提高對大眾的徵稅，一方面以臨時所得稅和非戰災者特別稅等新稅大大加在農民和中小工商業者身上。

“社會主義”假面具最後由於煤炭國家管理案而完全被揭穿了。雖然這是片山內閣時期社会黨所採取的唯一的“社會主義”政策，但實際上從它的原案內容看來，這是違反社会黨的選舉諾言的。而它和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的命令一樣，不過是為了出產三千萬噸煤，又要“避免根本改變過去的私營企業的經營方式”來實行國家統制而已。所以，把煤礦工人統一起

來了的煤礦工会全國協議會，攻擊該案是“輕視目前推進生產的中心力量的煤礦工人和工会的存在，一步也未超出和資本家相妥協的”“官僚本位的法案”。法案製訂者的社會黨商工大臣水谷，是明知如此而將法案向議會提出的。他說：“打開天窗說亮話，這個法案不過是把以前所一直在實行的現實辦法作法律上的確認而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衆議院礦工業委員會發言）。

而且連這個法案也受到了資本家的攻擊。在自由黨總裁吉田的女婿麻生多賀吉的指揮下，以北九州為中心的煤礦資本家，以東京神田的龍明館這家旅館為大本營，公開說要用一切手段來阻止這個法案。正如以後在議會中所暴露的一樣，他們公然散發了估計約一億至二億日元的現款來收買議員和閣員。雖然未能達到否決法案的目的，但是在逐漸抽去法案的主要精神這一點上却大獲成功。即使如此，幣原之流的保守的資本家代表仍認為民主黨所提倡的“修正資本主義”頗有冒犯神聖私有財產制度的危險，他不但反對這個煤炭國家管理案，並為尋求從事剝削的自由而退出了民主黨，另外組成了同志俱樂部。之後，它又與自由黨合併而組成了民主自由黨。

社會黨每當被迫履行公開諾言或遭受國民批評的時候，以西尾為首的幹部就衆口一詞辯解說：“這由於社會黨不是一黨內閣的緣故”。這就表明，對於片山內閣，早已不可能希望它會有證明其為“進步”政黨的任何政策了。相反地，商工大臣水谷早在入閣時所說的：“保守陣營的人不能對勞動階級講的話由社會黨來講，這就是我們的使命”（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日本經濟新聞”），却完全成了事實。於是日本國民對社會黨是所謂“勞動階級代表”的期待，就徹底被叛賣了。

十二月十八日，當全國工会聯絡協議會在人民廣場召開確保最低生活權人民大會時，雖然日本工会總同盟的幹部事先得

知這個大會具有攻襲片山內閣的色彩，並下令所屬工會不得參加，但是屬於它的東京交通工會和關東金屬工會却不顧這個命令，根據工會會員的決議參加了大會。由於中小企業家和貧困的農民表現出日益增長的不滿，由於工人在二·一總罷工後採取和農民、市民合作的政策，並通過日本電氣產業工會的電力罷工、全國財務工會的反對對大衆課稅運動等，代表了開始部分實現的工農同盟和自主的復興生產鬥爭；所以，除日本農民協會外，連從來未曾出席過這種大會的中小企業家的團體，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以二十餘萬羣衆的名義，宣誓“由工農和市民等勞動人民之手來開始復興生產和重建祖國的鬥爭”，並全體一致通過了對片山內閣“我們已經不能再有任何期待”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一月社會黨當作廢除四黨協定的理由曾說：“現在社會黨在大衆中的威信已掃地無餘了。我們聽出道上行人或電車上的談話，往往有些話實在想掩耳不聞”。看見了國民的憤怒情形，即使在社會黨內部，下層黨員和日本農民協會統一派等左傾幹部（純正左派）也尖銳地發出了反對和保守政黨聯合的呼聲。在這種壓力下，鈴木、加藤等所謂社會黨中的左派，組織了五月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聲明，把罪過完全歸咎於和保守政黨相妥協的四黨協定問題上（實際上，一如前述，社會黨在它所提出的協定原案中已無選舉諾言的痕跡，並且左派所製訂的緊急對策草案，在本質上也是和四黨協定相同的）。其中並稱，在廢除四黨協定以前，他們在社會黨內將保持在野黨的立場。於是他們和右派就對立起來了。同時，由於整肅平野力三的緣故，與西尾對立的最右翼的平野派（全國農民協會派）退出了社會黨；他們並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組織了幾乎和保守黨沒有兩樣的社會革新黨。當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召開社會黨大會時，下層黨員的不滿就爆發了。於是，和右派幹部的意志相反，大會通過了以廢除四黨協定為首的、停止支付戰時公債利



息、要求實施徵收第二次財產稅、要求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等決議。

但是，民主黨已看透了社會黨幹部的底細。社會黨右派的片山在新年致詞中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戰士”（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日本各報）。社會黨左派的加藤也說：“片山內閣已離開了社會黨的本來面目，代表社會黨本來面目的只有我加藤了。我在二十八日曾應邀和某有力者（大概是美軍總部的幹部。——作者）會面，那個人說，他對於社會黨在一月的大會中重新恢復了本來面目一事從心底裏感覺欣慰，只有依靠這種辦法，才能使日本從共產黨的政策中獲救。我當時也大為興奮，並誓為此而盡全力。各位雖對片山內閣失望，但希望不要因此對社會黨失望”（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加藤在長野的談話）。他們看穿了，只有提倡反共才能夠和保守政黨聯合。民主黨總裁蘆田，為了對抗當時以自由黨為中心積極進行的自（由黨）民（主黨）合併活動，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底，提倡組織中央政治協會。根據民主黨幹事長竹田的說明，這是包括社會黨在內的反共勢力大聯合。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的社會黨大會上，仍保持了許多黨內職位的社会黨右派分子會響應此舉。於是首相片山宣佈着手企業整頓和行政整理（一月二十二日），勞動大臣米窪發表了着手修改（改得更壞）勞動法規（一月二十七日）。最後，片山政府藉口對全官公廳人員支付零·八月的生活補助費，向議會提出了再度將鐵道運費和郵費約提高三倍的追加預算（一月三十日）。

日本國民看見這種情形，於是轉取突擊了。

從一九四八年二月起，日本電氣產業工會、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全官廳工會協議會、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會議會相繼決議，舉行反對解僱、反對修改勞動法規的鬥爭。資本家所最懼怕的電氣產業工會的罷工，在不顧幹部的妥協下，由各支部開始了地

區鬥爭。迫於這種情勢，電氣產業工會中央鬥爭委員會也下令從二月五日的事務罷工起舉行全國性的第一次攻勢。同時，由於年底開始的強制徵稅的所謂“稅款旋風”，遭受了嚴重剝奪的中小企業家和農民，也開始了真正的反徵稅鬥爭。並且，因為公佈要提高學費，於是以全國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為中心，大學和高等專科學校學生為反對提高學費，開始了戰後最初的全國性學生運動（二月七日全國大會）。廣大的國民，不僅批判了片山內閣，似乎對於議會政治也開始不信任了。

站在國民各階層鬥爭前面的，就是二·一總罷工後一直在從事着日常鬥爭的共產黨。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發表了鬥爭宣言。其中說：“片山內閣強迫實行以壟斷資本為中心的亡國政策，公然開始了對人民的進攻。因此，現內閣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正在成為大眾的憤恨之的。……讓這種反人民的內閣繼續多存在一日，不過是使亡國之時提前十日而已。我黨除與人民大眾一齊要求片山內閣立即辭職外，並相信已到了應竭盡全力來打倒它的時候。只有站在工人、農民、中小企業者、市民、正直的產業家——即大多數國民利益的立場，並組成代表這一切民主勢力的民主戰綫，才能克服這種危機，才能保證民主主義和民族獨立”。這是第一次提倡組成民主民族戰綫。

在這種國民攻擊的壓力下，二月五日，社會黨左派以國會預算委員會委員長鈴木為首，同意了撤回政府提出的追加預算的決議。於是，政府陷入了危機。結果，片山政府撤回了預算案，鈴木宣佈辭去預算委員長的職務，社會黨內部左右兩派遂暫時獲得妥協。但是，由於輿論的激烈反對，如果內閣繼續戀棧，將使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思想——議會第一主義本身，有被國民全面否定的危險。所以，片山內閣以應負黨內對立的責任為藉口，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宣佈總辭職。

一般人批評片山內閣在執政八個月中是以“無為無策”而始

終。但是片山內閣決不是“無爲無策”的。第一，它用新物價體系，藉着極端地降低實際工資，使工人陷於貧困。第二，它藉着統制種稻數量、強制徵糧、低米價，使農民陷於貧困。第三，它藉着不分配資金、資材，使中小企業陷於沒落。再加上重稅和糧食不足，除壟斷資本家和地主外，名副其實地實現了對全體國民的“勒緊腰帶生活”。所以，片山內閣的最大“功績”是從事分裂站在日本民主化前鋒的工人階級，是藉着向工人階級傳播經濟主義、勞資協調、避免鬥爭之類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去挽救陷入危機中的壟斷資本。實際上，在片山內閣之下，曾把半官半民的“統制會”或“營團”<sup>⊖</sup>組織成爲官營的“公團”；又藉着發給價格調整費、提高貸款標準、開始斡旋日本銀行貸款，和大量發放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使壟斷資本逐漸與國家權力密切結合起來，得以鞏固其重振旗鼓的基礎。唯其如此，所以民主黨總裁蘆田在一九四七年年尾才讚美道：“總之，使勞動攻勢僅限於這種程度爲止，這是片山內閣的功績”（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赤旗報”）。並且，由於這些措施，才使美軍總司令部經濟科學局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底能夠宣佈：“重建日本金融機關的準備業已完成”（“朝日經濟年誌”，一九四七年）。

因此，不能不說，片山內閣是符合了麥克阿瑟的期望的。

## 第二節 第二〇一號政令

### 一 事實上的媾和——“遠東兵工廠”政策

從一九四八年初起，美國的对日政策就進入了新階段。

首先，這時候，日本軍事基地化的第一階段工作已大体完成

<sup>⊖</sup> 統制會或營團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戰時的半官方經濟統制組織，例如“纖維統制會”或“食糧營團”之類；片山內閣時把它們改稱爲“纖維貿易公團”和“食糧配給公團”。——譯者

了。這種情形，僅僅從財政方面也可以看出來。日本自投降以後，按照佔領軍的命令，一直負擔了以戰爭結束處理費為名義的、佔日本預算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四六年度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一九四七年度為百分之三十一點七）的佔領費。在純佔領費中，工事費的比例雖然在一九四六年度佔百分之四十五，在一九四七年度中佔百分之三十七點三；但是在一九四八年度減少為百分之十九點六，在一九四九年度減少為百分之七點四。並且，佔領軍所使用的物資數量是非常龐大的，其中水泥一項，佔領軍所使用的在一九四六年度佔日本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五，在一九四七年度也佔百分之四十五點二，但在一九四八年度減少為百分之七點三，一九四九年度減少為百分之五。與此相同，銑鐵管的比例，在一九四六年度實際上佔日本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一，一九四七年度也佔百分之七十七；但一九四八年度減少為十四點一，一九四九年度減少為百分之五點九。與此相反，人事費、勞務費、物品維持費的比例，從一九四八年度起却急劇地增加起來（經濟學全集，風早八十二：“戰後國家財政的實體分析”）。僅僅看看這類情形，就可以認為日本軍事基地化的第一階段，在兩年半中已大體完成了。

並且，一九四七年底，美國的对日“媾和”談判失敗了。

為了製訂如前所述的“並非意味着完全緩和指導和管理”的“和約”，為了製訂以保障美軍（聯合國軍）為條件的对日“和約”，美國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正式發表聲明，建議召開对日和約預備會議。但是，美國政府為了使條約內容符合於它的要求，顯然拋棄了為戰時各種協定以及最後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協定中所明白規定的、應根據四大國（中、蘇、美、英）的一致（包括否決權）原則和取得所有交戰國同意來製訂全面和約的方式。也就是否認了四大國的否決權以及採取由遠東委員會十一國起草和約草案方式的建議。

苏联和美國政府交涉和討論後，探明了這種方式的意義，於是主張應按照莫斯科協定，根據四大國一致原則，由遠東委員會起草和約。美國政府認為保留否決權就不能使和約早日實現而加以反對。苏联於是反問，不正是因為根據大國一致原則，才使對意大利、芬蘭、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的五國和約得以早日實現，並在頭年簽字，且已批准了嗎？而英國、法國也並未表示強烈支持美國起草方式的態度。

但是美國始終不同意改變起草方式，不僅不承認大國一致原則，反而採取了放棄從速對日“媾和”的政策。美國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最後中止了這種交涉，並從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外長會議議程中將日本問題除外了。

雖然最早提倡對日“媾和”的“名譽”也許可以歸之於美國，但歸之於它的，只是最初就提倡用否定全面媾和方式的起草條約辦法來造成蹂躪波茨坦公告內容的“媾和”的“名譽”罷了。

於是，美國政府在它所企圖的對日“媾和”交涉失敗後，迨至朝鮮戰爭爆發前大約兩年之間，關於對日媾和從未再有所建議。不僅未曾有所建議，並且對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莫洛托夫聲明，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間維辛斯基所提倡的、即苏联經常提議的促進對日媾和的呼籲，既不交涉也不商談就一概加以拒絕了。

美國所採取的政策是使日本處於所謂“事實上的媾和”狀態，而繼續把它置於美軍的佔領之下。

此外，自一九四七年年中起，由於馬歇爾計劃，美國把“援助”的重心放在歐洲了。而且美國對於迅速發展起來的亞洲民族運動也感覺有加以壓制的必要。再加上對日“媾和”的停頓和“事實上的媾和”的主張，於是美國放棄了摧毀日本軍需生產的方針，貸款給日本，欲使日本藉着美國的“援助”而儘早得以“自立”。所以，把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政治經濟基地的政策，也就逐步實現了。例如，我們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初看見了美國衆議

院外交委員會的報告和以緩和賠償爲目的的斯揣克調查團的訪日(八月)等；而在一九四八年初就由陸軍部長羅雅爾的談話正式表明了以日本作爲“遠東兵工廠”的政策；接着在一月二十一日，由麥考埃少將在遠東委員會中提出日本復興計劃的建議；三月九日，斯揣克委員會發表了緩和賠償的聲明；三月十三日，國務院和陸軍部發表了緩和禁止經濟力集中的聲明；此外還有國務院政策設計處主任喬治·凱南(對蘇“遏止政策”的設計人)和陸軍部次長特萊伯等的訪日。

關於美國新政策的意義，從最初用美國政府名義正式發言的陸軍部長羅雅爾的話中，就得到了很好的說明。他說：“在欲將日本大規模地非軍事化的初期政策和欲將日本建設爲自立國家的新政策之間，曾發生過矛盾。”因此，新的“對日佔領政策的方向，在於培植強有力的日本政府。其目的不僅是使日本本身能夠自立，並使日本在今後對遠東可能產生的新集權主義(指共產主義——作者)的威脅發揮防波堤作用上，成爲非常強有力的、安定的民主主義”(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羅雅爾在舊金山聯邦俱樂部的演說)。

於是，日本在被佔領的狀態下，以武力強制它成爲美國在亞洲軍事和經濟據點的所謂“事實上的媾和”政策、“遠東兵工廠”政策，就有意識地從此開始了。

## 二 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民主化同盟的產生、 蘆田內閣的成立

成爲打倒片山內閣中心原動力的工人攻勢，在片山內閣辭職後也沒有弛緩下來，却進而成爲戰後最大勞工運動的“三月鬥爭”了。

全官公廳的各工會，除國營鐵道工會以外，全遞信從業員工會以各支部爲單位採取了揭發鬥爭、反徵稅鬥爭，並以要求地區

津貼等形式進行鬥爭；全國財務工会採取了揭發大戶偷稅漏稅、反對大眾課稅運動等鬥爭形態進行鬥爭；同時以它們為中心，連教職員和大藏省官吏都包括在內的非業務的官公吏也被動員起來，參加了以要求生活補助費和維持最低工資為目的的大規模鬥爭。在私營企業方面，以電氣產業工会、全日本運輸工会、東京芝浦電氣工会、日本煤礦工会同盟、全國煤炭工会等為首，展開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爭議。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甚至屬於日本工会總同盟中被稱為最落後工会的全國纖維產業工会同盟（簡稱“全纖維”），也發表了鬥爭宣言。其間，反對修改勞工法規的鬥爭也高漲起來了。作為這個戰綫的統一組織，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產生了由全日本產業別工会會議、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簡稱“全官公”）及中立系統的二十個工会所組成的反對修改勞工法規共同鬥爭委員會。像印刷出版業工会等，曾經通過對修改勞工法規用總罷工進行鬥爭的決議。

隨着鬥爭的高漲，分裂主義者進行破壞的餘地被縮小了。甚至被民主化同盟掌握了領導部的國營鐵道工会，由於受下層廣泛展開的地區和工作崗位鬥爭的壓力，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也被迫不得不發表了鬥爭宣言。於是鐵道當局在二十四日答應將三月份的工資提前於二月中發給。當時，雖然國營鐵道工会的幹部立即下令中止罷工，但基層組織為表示不滿，以札幌、香川等地的支部為首，却進入了實際上的罷工。就拿武藤武雄所領導的、在十月間破壞了全國煤礦工人的統一、退出了煤礦工会全國協議會的日本煤礦工会同盟來說，雖然煤礦業聯盟（資本家團體——譯者）一面對“產別”系統的全國煤炭工会以停止地區鬥爭作為進行談判的條件，一面對日本煤礦工会同盟答應無條件進行談判並提出改訂工資方案；但日本煤礦工会同盟對於資本家所顯示的特別友好態度，却由於基層大眾不滿的壓力，而不得不加以拒絕。並且它對於各現場所開始的、全國煤礦工人

的事實上的共同鬥爭，也不能不加以默認。

對於這種工人運動的高漲，如果由日本工會總同盟、“國鐵”、日本煤礦工會同盟等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所進行的分裂工人階級的活動歸於失敗時，美軍總部似乎認為那就只有對於站在私營企業工會前鋒的“產別”、及站在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前鋒的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分別從其內部進行破壞了。美軍總司令部勞動教育班長德微拉爾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曾發表談話說：我們希望與其由各企業的組織不如由各行業的組織來組成全國性的同業工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朝日新聞”）。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科長凱倫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宣佈，美國行業工會、並且是分裂世界工聯中心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在一九四七年的大會上曾經決議：為使日本工人運動“確立為民主的（反共的）工會，誓予以全面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每日新聞”）。美國勞工聯合會根據這次大會的決議，曾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花費兩個月的時間和一百萬美元，使法國的石烏派從法國總工會中分裂出來。從這件事看來，當然可以認為他們對日本也從十月起立即開始了同樣的活動。何況在日本，不要說是一百萬美元，就是一萬美元，當時的黑市價格已達五百萬日元以上，因此，在收買費低廉的日本，這筆款子可以說是非常充裕了。

組織產別民主化同盟的工作，是以“產別”事務局長細谷松太為中心來進行的。細谷以事務局長這一書記的身份，竟違反“產別”大會關於二·一總罷工的決定，和日本工會總同盟一樣對此加以抨擊，並在“產別”中散佈不應舉行二·一鬥爭的意見。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產別”臨時大會中，當他的這種意見受到批判時，他便立即辭掉事務局長的職位；於是，他一面與在全日本運輸工會中成立的“日通會”、與在電氣產業工會中成立的“綠會”等反共組織採取聯絡，一面積極進行美軍總司令部所希望的



分裂“產別”的活動。從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左右起，分裂“產別”的工作特別活躍起來；甚至在“產別”最強有力的工會全遞信從業員工會中，也組成了民主化聯盟籌備會。但是，他們認為沒有充分時間組成下層組織，需要在“產別”內立即發動一個全面分裂的活動。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在片山內閣總辭職的那天），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有澤廣己、高野實、細谷松太五人曾舉行會議，決定大綱，十三日即匆促組成了產別民主化同盟，並於十四日發表了聲明書。但聲明書並非當着下層工會面前發表的，而只是當着從旁援助分裂“產別”的讀賣、廣播第二工會等中立和御用工會，以及日本工會總同盟，國營鐵道工會反共聯盟等幹部面前發表的。

正如從這種組成經過所看見的一樣，產別民主化同盟是以非工會會員細谷為首的六名事務局局員作為領導部而組成的。它和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不同，差不多沒有可供指揮的下層工會。產別民主化同盟在口頭上主張工人階級的統一，並曾聲明它“不是反共的”。但是，正如它的聲明書中所說的一樣，它的目的是“排除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企圖使產業別工會民主化”。而且它假藉“產別”大會的決定是出於共產黨組織的活動為理由，想利用不服從大會決定是“民主主義”來分裂工人運動。所以，這就表示出來，它的行動也是和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及其他“民主化”同盟完全一樣。毋寧說，它和過去的民主化同盟的不同之處，只是假藉統一的名義，以自己為中心，要求其他組織加入它，而在經常以分裂工作為它的唯一信條上更前進了一步。這一點從下述的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來。“產別”在看見聲明書後曾召開“產別”幹事會，當會上要求民主化同盟在下屆執行委員會開會前暫緩從事活動時，他們因為無話可說只得表示同意，但立即又以不能遵守此言為理由提出辭職。於是他們瘋狂地向分裂工作前進，甚至連攻擊“產別”的藉口都拋棄了。

這種產別民主化同盟的產生會使統治階級高興到什麼程度呢？這只要看一下所有的御用報紙立即把它當做大新聞，還把自稱為“仍是共產主義者”的細谷松太（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已被共產黨開除，後來他加入了社會黨）的談話，連日在第一版上大事刊載就可以明白了。並且，美軍總司令部的勞動科科員胡佛承認：“據民主化同盟迄今所說的話看來，它是健全而有效的組織”（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勞動科科長凱倫讚美說：“我們最感覺欣慰的是，最近日本各工會一面抵抗着錯誤的政治組織的支配，一面自動地致力於民主工會的活動”（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從這些話來看，也就可以明白統治階級是怎樣高興了（樋口泰一：“美軍總司令部的勞動指導方針”）。

“產別”以外的反共分裂主義者也一齊從外部來援助產別民主化同盟。日本煤礦工會同盟的武藤，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的齋藤，日本工會總同盟的原虎一，讀賣新聞職工工會的渡辺文太郎等著名的反共分裂主義者，對於“產別”幹事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即請產別民主化同盟暫緩活動——譯者）曾聯名提出抗議。產別民主化同盟最有力的協助者是社會黨左派的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和日本工會總同盟左派的高野實。就個人方面說，舊日本工會總同盟時代是加藤的部下、和高野實同事的細谷；擔任加藤靜枝（加藤勘十之妻——譯者）的選舉事務局長的喜田；曾做過鈴木的政治經濟研究所所員的落合；他們作為產別民主化同盟的三巨頭，也分別和加藤、鈴木、高野保持密切的聯繫。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工會總同盟的幹部曾指令下層工會對產別民主化同盟表示歡迎。這些反共工會的幹部曾集合起來，舉行了工會民主化運動懇談會，把它當做分裂勞工運動工作的中央聯絡機關。

但是這類分裂工作也未能壓制住在三月鬥爭中高漲起來的勞工運動。例如在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內的民主化同盟工作上，

雖然把担任“產別”副議長的光村拉進來，並在二月二十三日組成了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民主化聯盟，但立即受到鬥爭中的工會會員的批判，而陷於癱瘓狀態。就是專為頌揚戰後日本工人運動中“民主化”(反共)運動意義而寫的、由勞動省在一九五二年所編輯的“資料勞工運動史”中，甚至也承認當時的民主化同盟會陷於苦戰之中。

激烈的勞動攻勢阻礙了民主化同盟的產生和發展，與此同時，中小工商業者 and 農民的反對苛稅運動，教員學生的復興教育鬥爭等也高漲起來了。這就使統治階級的政治危機日益加深，於是發生了在片山內閣總辭職一月後還不能成立繼任內閣的政治危機。

建立民主日本的人民鬥爭愈向前發展，統治階級就愈努力把保守反動勢力團結起來。於是，自由黨企圖和幣原等的同志俱樂部聯合起來，組織自(由黨)民(主黨)兩黨合作的保守統一政黨，組成不包括社會黨左派在內的政權，以便對人民的勢力進行壓迫。在民主黨中雖然有一部分(太陽會)人響應這種活動，但作為該黨主力的蘆田派，却企圖在民主黨的領導下，把國民協同黨、社會黨，可能時並將一部分的自由黨也包括在內，把未被視為右翼政黨的保守勢力團結起來，來阻止共產黨的抬頭。正如後來在“非法財產處理委員會”中所暴露的一樣，為了這種目的，自由黨會利用甚至目的在使戰犯兒玉譽志夫上台的辻嘉六的獻金，利用民主黨總務原侑負有責任的非法出賣印花布的款子，利用幹事長大野伴睦主持的、對昭和電工及土木建築業者給與貸款和便利等而得來的款子，利用吉田的女婿麻生從北九州工人身上榨取的款子等，來收買民主黨的議員。民主黨也毫不後人——毋寧說，由於民主黨取得了政權，所以弄錢更為方便——正如在“非法財產處理委員會”中所暴露的一樣，它藉着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藉着對土木建築業者的預付款項及其他

办法；首相蘆田不用說，從大藏大臣栗栖、大藏省次官以下一直到國會議員止，都把國民的稅款大量裝進腰包。民主黨爲了和自由黨的分裂活動相對抗，並努力從事拉攏社會黨的活動。特別是後來使蘆田不得不進小菅看守所的那筆款子，可以說是直接地阻止了民主黨的瓦解。社會黨右派一面壓制提倡不參加聯合政權的最左傾分子，一面與希望參加政權的左派幹部相結合，把社會黨引導向贊成蘆田出任首相的方向。最後，由於保守勢力的意見不能一致，舉行了決戰投票，遂使蘆田當選爲首相。於是，由民主黨佔七名、社會黨佔八名、國民協同黨佔二名大臣所構成的蘆田內閣，作爲中間路線政治的延長，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成立了。社會黨左派的加藤（勞動省大臣）和野溝（國務大臣）之所以會入閣其目的是爲了平抑國民的不滿，這是頗值得注意的。爲了與此相對抗，同志俱樂部和自由黨合併組成了民主自由黨。於是，促使保守勢力結合起來的人民鬥爭，相反地又阻礙了保守勢力的一致。

### 三 三月鬥爭

蘆田內閣一上台就聲明要吸收外國資本，努力穩定經濟。以前曾要求廢除四黨協定的社會黨左派幹部，這次對於和友黨締結三黨協定却異常熱心。他們通過鈴木所提出來的三黨協定草案的內容竟和蘆田一樣，也就是說：“依靠外資的積極援助，以求根本處理通貨膨脹及將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是一切施策所應集中之點”。無論是民主黨或社會黨，都是迎合美國的对日新政策的。但爲了吸收外資，又需要些什麼條件呢？據栗栖在就任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後對新聞記者團說：“作爲吸收外資的前提，必須完成企業整頓和使勞資協調”（見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各報）。爲了穩定經濟和停止通貨膨脹，雖然蘆田內閣以一九四八年初以後減少了通貨的流通量而自傲，但實際上這是依靠一九

四七年年底開始急劇實行大量徵稅，即靠每月強制徵稅三百億日元（如果把它與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六個月中徵稅四百億日元相比較，就會真正懂得爲什麼這是和絞刑一樣厲害了）來無理地實行了通貨緊縮政策。也就是依靠這種沉重的賦稅和人民生活的貧困來降低了國民的購買力。換句話說，蘆田內閣是預定了以苛捐重稅、整頓企業、勞資協調、國民的貧困，來爲吸收外資製造基礎。於是，蘆田內閣由於名副其實地實行以上的政策，而得到了“梆梆內閣”<sup>①</sup>的綽號。

但是，蘆田內閣一成立，就要來挽救它的危機了。因爲三月鬥爭已全面開始了。

蘆田內閣在成立後，立即將薪給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案通知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想藉此來中止罷工。這個建議案，是根據統計局遠爲低估了的私營企業的平均工資爲標準，再把公營企業工人的勞動時間按六·六小時計算，而決定出來的所謂二千九百二十日元基準的低工資水平。此外，這個建議案還爲工資體系帶來了職務等級制。這種職務等級制的工資體系是一種厚上薄下的薪給制度（最高和最低的比例，從相差六倍半變成了相差十五倍）。不僅如此，它的目的是藉着把職務等級制這種身份等級的新勞動體系帶到工廠車間，使車間中，使車間和車間之間，發生等級的對立；特別是使下層工會會員，一面在各車間陷於孤立，一面在各車間中，通過上級而層層受壓迫。並且，根據這種職務等級制的工資體系，其辦法是，雖然提高了基準，但受惠的是上層的工人貴族，下層的一般工人的工資却增加得有限，還企圖藉此來分化工人。

雖然國營鐵道工會因爲民主化同盟幹部佔多數，表決時以

<sup>①</sup> 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以美國兵爲對象的妓女，被稱爲“梆梆女郎”，此處的“梆梆”兩字本此。——譯者

微小差額决定了接受這個建議案；但全官公廳的其他工会却拒絕接受。它們在答覆政府時，曾提出妥協方案，即如果根據從前的工資體系，把新基準作為臨時薪給時它們可以接受。但政府拒絕了這個妥協方案。於是問題業已從工資基準轉移為職務等級制上了。

政府蔑視集體談判權，為使新工資體系完成立法手續，將“關於政府職員薪給等的法案”和追加預算一併提交議會，經議會匆忙通過後，立即開始按此項辦法單獨對國營鐵道的職工支付薪給。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雖然提出了根據從前的工資體系按照二千五百日元的計算標準支付薪給，其餘問題移歸集體談判的最後妥協方案；但勞動大臣加藤經與美軍總司令部商談後，仍拒絕了這個方案。

全官公廳各工会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擴大委員會，認為政府缺乏誠意，宣言以實力進行鬥爭。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在二十五日舉行了二十小時的罷工。全遞信從業員工会从二十六日起舉行了各地方單位的罷工。非現業的職員工会，也一齊採取了請假戰術。像主管收稅的全國財務工会，把美軍總司令部的屢次“勸告”和“忠告”認為並非正式命令而置之不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会會員都一齊採取了請假戰術。黔驢技窮的日本政府，於是通過勞動大臣加藤，請求社會黨進行斡旋。社會黨接受此請，並通知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進行斡旋。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雖然答覆願以撤銷職務等級制為接受斡旋的條件，但因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產別”民主化同盟、全遞信從業員工会民主化同盟等的走狗幹部，通知社會黨，要求斡旋得到較國營鐵道更為優厚的待遇，於是使社會黨幹部進退兩難無法措手了。

其間，電氣、煤炭、機器、纖維、土木建築及其他私營企業中的鬥爭也高漲起來了。“產別”曾要求政府作妥善的處理。“產

別”下面的全日本機器工會，爲了援助官公廳勞動者的聯合鬥爭，通過了舉行二十四小時罷工的決議。當時，共產黨在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發表聲明，正式號召國民“爲和平、民主主義和民族的完全獨立”，“組成民主民族戰綫”。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在三月二十六日舉行擴大委員會，決定自三月二十九日起把鬥爭擴大及於全國。於是，遵照此項決定，全官廳工會協議會決定從三月三十日起在十三省（即十三部——譯者）舉行四十八小時的請假罷工；日本自治團體工會總聯合會指令從三月二十九日起開始行動；像東京交通工會之類，則業已從三月二十七日起就進入了無限期罷工。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成爲三月鬥爭中心的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動向。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把地區鬥爭滙合起來，在中央的指令之下，爲給政府以最後打擊，曾指令從三月二十九日起把全國劃分爲東西兩部，分別舉行罷工；從三月三十一日起則進入全國總罷工。於是，三月二十九日，日本東部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十五萬工人舉行了罷工，使三月鬥爭達到了最高潮。

這個三月鬥爭的規模究竟有多大，並且，它對統治階級的打擊究竟有多重，這只要和以前被稱爲日本歷史上最大工人鬥爭的一九四六年的十月鬥爭比較一下，就很顯然了。這次參加罷工的人員達八十一萬八千四百一十八人（一九四六年十月爲十八萬八千九百五十八人），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數達二百一十二萬九千五百六十八日（一九四六年十月爲一百六十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日）（根據勞動省公佈的數字）。

日本政府和社会民主主義者幹部已無法來收拾這種事態了。於是就在這時候發表了馬貴特備忘錄。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美軍總司令部經濟科學局局長馬貴特少將以備忘錄通知日本政府，認爲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罷工應該適用二·一總罷工的禁止令；同時並對全國財務工會

發出了禁止罷工的直接命令。日本政府得到了这种助力，於是公佈禁止非業務官廳的爭議行爲，三月三十日，搬出“官吏懲戒令”这种違反勞工法的舊法律，對全國財務工會幹部給以處分。但是日本的工人已較二·一總罷工當時更前進一步了。以至遞信從業員工會、全國財務工會爲首的現場和非現場業務的全官公廳勞動者，改行採取地區的和工作崗位的分散鬥爭，並繼續實行了請假戰術。三月三十日，馬貴特又發表聲明，凡公營事業，不管是採取地區罷工或其他形式，只要是和某種企業有關的類似罷工的行爲，都視爲是總罷工。這也就是完全禁止公營事業罷工的命令。

這一絕對命令，遂挽救了剛剛誕生就要喪命的蘆田內閣。

#### 四 吸收外資政策

日本壟斷資本，對於以日本爲“遠東兵工廠”的美國新對日政策，採取了無條件加以歡迎的態度。支持民主黨的、有勢力的壟斷資本家團體的經濟同友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發表聲明，“希望無限制地吸收外資”。

當決定對日經濟政策的美國陸軍部次長特萊伯等人訪問日本時，蘆田首相曾請求借款十億美元，在美方對於這個請求的答覆中則顯示了它的明確條件。“陸軍部次長和盟軍最高統帥所極力主張的一樣，他強調日本維持預算上的收支平衡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他說：關於美國今後將給（日本）以何種程度的援助將由欲自力更生的日本人在重要物資的增產、國外貿易的復興、平衡預算的實現等進步程度上所表現的努力、創造和勤勉的記錄和證據而決定”（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美軍總司令部特別公佈）。

爲了滿足這種吸收外資的三項條件，蘆田內閣曾傾注全力於“修正資本主義”。



第一，爲了“重要物資的增產”，它把片山內閣以來的“重點主義生產”方式，加上民主黨綱領中的“超重點主義的經濟重建方策”而叫做“集中生產”，採取了培養壟斷資本的經濟政策。例如，在一九四八年度，鋼鐵業以價格調整費的名義把國家預算中的百分之五以上裝進了私囊；此外，還讓他們以較一般產業的公定價格遠爲低廉的公定價格，得到了輸入原料和煤炭的配給。據說鋼鐵業從國家手中所獲得的利益，其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集中在五大製造商之手（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機中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結構”）。

第二，關於“國外貿易的復興”，日本政府和美軍總司令部合作，爲購買高價的外國商品採取了下列政策，即從日本國民的稅款中付出龐大的輸入價格差額補助費，並將輸出因工資低而價格廉的日本商品所得到的款項劃入貿易基金。也就是說爲購買佔日本總輸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價格高昂的美國商品，採取了把幾佔輸出中百分之七十的商品向亞洲市場傾銷的、壟斷資本主義本位的振興國外貿易政策。大藏大臣北村解釋說，這種低工資正是振興貿易的基礎；他說：“日本過去之所以能够如此者，還不是由於成本低廉嗎？總之，這是由於人工費便宜的緣故”（“東洋經濟新報”週刊，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號）。於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所發表的經濟安定本部復興計劃中，就認爲必須將這種饑餓輸出比頭一年增加九倍了。

關於第三項條件的“平衡預算”，蘆田內閣在幾近三個月中都未能編製成預算，經用暫定預算度過這個期間後，一九四八年六月初才向議會提出正式預算，而自稱是“爲吸收外資的平衡預算”。的確，賬面上的收支是相等了。但是，爲此却將賦稅比頭年（一九四七年）提高了近兩倍，這也是把重點放在間接稅上（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率從一九四七年的四十九對五十一變成了四十四對五十六）。新設立了營業稅這種對大眾的徵稅，並將鐵路

運費提高了三倍半，將郵費提高了四倍。此外，僅僅爲了一億五千萬日元的歲入，把不實行半工半讀就不能上學的學生的學費，一舉而提高了三倍半。這顯然是採取了盡量向大眾徵稅的方針。另一方面，政府說是爲了吸收外資和積累資本，大大降低了向壟斷資本徵收的公司稅。而且，陷於危機中的壟斷資本，它唯一的財政經濟對策就是通貨膨脹政策，於是以佔領費、價格調整費、復興金融公庫及其他政府出資、交付公債等形式，業已將通貨膨脹包含在預算本身中。並且在政府本身的歲出項目中已列入價格補助等特別補充費的項目，這就表示它們顯然預見到了通貨膨脹的繼續發展。一言以蔽之，一方面藉通貨膨脹來掠奪國民，一方面又藉徵稅和政府對中小企業的延期付款來阻止通貨膨脹，這種雙重的掠奪政策就是“平衡預算”的實質。

所以，廣田內閣是忠實無比地服務於“遠東兵工廠”政策的。憑藉這種政策，日本的壟斷資本才能够使它的重建工作着着前進。在機構方面，壟斷資本的代表，利用直接參加“公團”、配給審議會和官廳中，而使國家權力從屬於它們。就壟斷資本的團體說，因爲只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作爲地區和各行業的資本家團體的聯絡機關而成立的經營者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還嫌其領導力量太薄弱；於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成立了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簡稱“日經聯”）這一壟斷資本的中央指導機關。並由它專門從事領導資產階級對付工人運動的政策。這一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成立後，立即開始向日本政府及美軍總司令部提出了它的意見書，這可以看做是日本壟斷資本恢復了自信的證據。

但是，這類從屬於美國的、壟斷資本本位的經濟政策，只有在犧牲國民生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日本工人由於一九四七年的秋季攻勢的鬥爭，雖然使勞動條件有了若干改善，但是好容易增加的工資，却不能趕上由於通

貨膨脹的物價上漲。即使根據官方的統計，家庭生活費中，在一九四八年四月為止已有百分之七一八的虧空，而飲食費在家庭生活費中佔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日本勞動年鑑”第二十三集）。但是，這類的數字還遠不能表示出實際生活的貧困程度。爲了抑制工人的不滿，在都市中的配給遲發現象雖幾乎沒有了，但這種足額配給是大量地以大豆渣、乾杏子、甚至以砂糖當做主食來配給的。哪一個國家會命令人類把像螞蟻一樣的東西當做主食呢？那末，既然是人，就不得不到黑市去買了。但這種黑市，政府又用警察力量來加以禁止。於是黑市價格，特別是主食的黑市價格就上漲起來。家庭生活費中，飲食費所佔的比例幾達戰前的兩倍。但所謂戰前，乃是以“比印度工資還要低”而著名世界的、日本工人階級所處的狀態。不僅如此，即使根據經濟安定本部的推算，當時已有四百萬名的失業者（一九四八年五月、經濟復興計劃第一次試案）。但實際生活水準是應該將這種失業期間也計算在內的。因此，如果以這種失業期間平均計算，那就顯然可見，日本工人真正是被迫處於動物以下的生活狀態。

它們對於抵抗程度比工人爲低的農民，曾給以較工人更爲嚴重的打擊。徵購是以所謂“徹底徵糧”，按照攤派額強制收購農民所有的大米。遲發配給從都市移至農村，造成了山梨縣遲發配給五十日，秋田縣遲發配給六十日的最高紀錄的現象。加在農民身上的賦稅負擔，相當於一九四七年的兩倍。地主的攻勢日益增劇，收回土地的事件在各地都大量發生。“土地改革”也按照地主本位的辦法進行。例如首相蘆田就被當做在村地主（假借暫時離村的名義），決定了他可以不交出土地。在生產得愈多就被掠奪得愈多的佔領制度下，勤勞的日本農民也不得不採取放棄耕種的最後手段了。即令根據農林省的調查，一九四八年夏季，三萬戶以上的農民，放棄耕種的田地達二萬五千町步以上（據“日本農業年報”第二集、第三集）。

對於抵抗程度比工、農更微弱的中小企業家，則壓迫也就更爲厲害。於是集中生產、平衡預算、貿易第一主義，就變成了減縮資金和資材的配額，增加賦稅負擔和延遲政府付款，而給中小企業以威脅。此外，由於吸收外資加強了壟斷資本的支配，遂使中小企業陷入危機。例如，作爲第一次的對日借款，在四月底發表，在六月初付諸實行的六千萬美元的棉花週轉基金，其條件是以所購棉花的六成作輸出之用。因此棉花的配給就完全集中於壟斷資本，致使濱松、丰橋等地的中小企業陷於崩潰狀態。雖然外國的私人投資還甚少希望，但是第一筆私人投資——對日新化學工業公司的外國資本，僅僅是以提供專利權和技術作爲代價，就取得了該公司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一（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日本經濟新聞”）。即令是在日本的傀儡政府汪精衛政權之下，也限制外國資本不得超過全部股額的百分之四十九。居然逾越這種比例，要求企業的完全控制權的是美國資本；而爲了希望獲得利潤不惜出賣民族產業的，則是日本的壟斷資本家。

於是當蘆田內閣的全部政策顯然是意味着對國民生活和對民族產業的破壞的時候，首先是工人階級站起來和它進行了正面鬥爭。

馬貴特的聲明，並未能使日本的勞工攻勢發生如二·一總罷工後一樣的退潮。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工人，在這個聲明以後，仍然勇敢地進行了先後有二十個支部，人數達四千五百名的罷工。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雖然由於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凱倫的禁止命令，中止了這一罷工，但是這種不屈不撓的鬥爭，却激勵了全官公廳的各工會。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雖一齊接受了在新薪給委員會成立前作爲暫定措施的政府方案，但是另一方面，却成功地使政府接受了它所一直強硬拒絕的三項條件：（一）不許解僱工人，（二）付給罷工時的工資，（三）不得修改勞工法規。從四月起，私營企業的勞動

攻勢日益激烈起來。在四、五、六月間風起雲湧的罷工波濤，雖不及三月鬥爭之大，但除三月鬥爭外，規模之大也是日本勞工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

特別充分表現出這時期的鬥爭特徵的，就是“東寶”電影製片廠的勞動爭議。“東寶”的經營者為對具有強有力的工會並取得了模範集體合同的“東寶”職工進行挑戰，特聘請自由黨的落選議員候選人渡邊鏡藏為經理，並以和勞工方面有關的官吏馬淵、北岡等為董事。他們在高唱企業合理化、整頓虧損、片面宣佈集體合同無效後，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發出通告，解僱職工二百七十名（包括大部分工會的幹部）。對於這種挑戰，工會方面要求製定具體的製片廠復興計劃，並撤銷解僱；但經營者却加以拒絕，明白表示了一如經理渡邊所說的：“即使製片廠長滿野草”也要鬥爭到底的態度。這種強硬態度的背景是：第一，正如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立即支持這種資方攻勢所表現的態度那樣，日本壟斷資本採取了全面支持“東寶”經營者的態度把這當做對勞動攻勢作全國性反擊的第一步；第二，由於資方認為根據利潤本位的經營計劃，應取消攝影廠，改為租賃電影攝製場，上演美國影片，實行“企業合理化”和“整頓虧損”；並自信藉此還可以獲得美國資本的援助。但是，按照這種政策，則攝製了“戰爭與和平”、“再來一次”、“光輝的星期日”、“泥醉的天使”、“兒童會議”等傑作，簡直可以說是攝製了日本投降後一切優秀影片的“砧攝影所”，就要被摧毀，它的攝製幹部就要被解僱，而代替它來充斥日本各地的將全是色情、荒誕和美國西部片。“東寶”的職工，一面對侵犯勞動權作猛烈的反擊，同時還組成“保衛日本電影會”，組織工農和市民，對破壞民族文化的政策進行反擊。於是，開始了五七個月之久的東寶罷工鬥爭。

## 五 警察制度的復活

對於這類勞資的正面衝突，在馬貴特聲明以後，整個政府機關把勞工運動視為敵人，開始了殘酷的鎮壓。

為此，對警察機構進行了整頓。

根據波茨坦宣言，佔領軍當局對於作為警察國家、在世界上臭名遠揚的、日本戰前的警察機構，負有破壞的義務。但是美軍總司令部在兩年多中並未實行這項義務。如前所述，美軍總司令部一面在形式上廢除了特高警察，一面則把它当做美軍總司令部諜報部的輔佐而加以保存。此外，還藉口日本軍隊已被解散，反而容許日本政府將警察的數目從戰前的五萬六千人擴充為九萬三千人。

此外，應該與軍隊同時立即解散的內務省也被保存下來。負責設計警察民主化的警察制度審議委員會的委員長，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同意，竟由內務省出身的官僚政治家、戰時強制疏散東京都市民、使人民陷入戰禍中的大久保留次郎擔任。這當然使警察的民主化不能實現了。甚至為改善都市警察機構而訪日的美國華倫丁代表團，也認為如果不立即使行政事務脫離警察事務，如果不將每八百戶一名警察的數額至少減為每二千戶一名，那麼就不能解除人民的壓迫感覺，從而，也就不能使警察成為人民的公僕（見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日本各報）。

使消防隊脫離警察而獨立是一九四七年一月的事；製定裁判法使司法權僅在形式上獲得獨立是同年五月的事；將內務省的警察事務移交給總理大臣直轄的公安廳是同年六月的事；而指令警察民主化的麥克阿瑟信件，則是日本投降兩年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才發出的。於是，好容易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才頒佈警察法，解散內務省（一九四七年最後一天），實施新警察制度（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但為時已在羅雅爾業已表明美國的

對日政策是停止“非軍事化”方針，“培養強有力的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後了。所以使日本警察“民主化”的目的就和停止日本的“非軍事化”是爲了重新武裝日本、使日本政府“強有力化”是爲了促進日本法西斯化完全一樣。

新警察制度使所謂“民主”警察，在它的工作中不包含統制經濟和衛生等非純屬警察事務的行政事務，在形式上取消了警察機構的中央集權制，凡人口五千以上的各地方自治單位均應成立自治警察以作爲警察制度的中心。這種自治單位的警察應服從地方議會所同意任命的警察委員的命令，而國家警察的數額限制爲三萬名，應服從國會所同意任命的公安委員的命令。

但是，這類事情本身，毫未減少警察的力量，相反地是意味着大大加強了警察的權力。首先，警察事務雖然限定爲純警察事務，但這只是意味着更加強了作爲新警察的首要目的、即圖謀“維持公共秩序”的力量。於是，和華倫丁的勸告相反，雖然事務方面簡化了，但警察的人數反由九萬三千名增加爲十二萬五千名了。所謂地方自治單位警察，其目的不過是爲了將警察財政負擔從中央轉嫁給地方自治單位。並且，美軍總司令部當時的佔領地警察事務，主要是交給美軍地方軍政部掌管，這就使得日本警察從屬於這種維持治安的機構了。

所以，警察的中央集權制也並未取消。而且規定地方警察負有必須經常不斷把全部情報供給國家警察的義務。特別是在“國家緊急狀態”的場合，根據國家公安委員的“建議”，總理大臣具有統率全部國家警察和自治警察並對它們下命令的權限。這種對中央和地方，即對全國頒發戒嚴令的權限，即使是戰前的日本政府在法律上也是未曾有過的。不僅如此，國家警察所劃分的六個警察管區和日本在戰爭末期所劃定的六個軍管區是完全相同的。國家警察是憑藉地方自治單位警察的援助和合作來擔任維持治安工作的。毫無疑問，日本人民是處於和戰時受憲

兵、警察嚴厲統制時完全原封不動的體制下，但由於警察人數比當時多兩倍，所以受到比戰時更加厲害的壓迫。於是，國家警察本部長齋藤，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國會中明白說，已計劃在各警察管區各設一萬名特別武裝警察隊。並且警察的武裝也顯然加強了。他們被發給了美國製的手槍以代替短劍。他們是怎樣使用這些手槍的，留待以後詳談，現在只先提出一件事說一下。在戰前，例如在原（敬）內閣時代，因為警察拔出了沒有開口的短劍而受到攻擊，使政府苦於答辯，不得不說是僅僅揮動了一下劍鞘。但現在則與此相反，例如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在全國縣長會議上，首相吉田竟明目張膽地發表駭人聽聞的言論：“警察如認為應盡量不使用武器以保護人民，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此外，為協助警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還建立了鐵路警察制度。雖然消防隊和警察制度分開了，但在人事、設備和其他方面仍和過去一樣與警察保持着聯繫。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國家公安委員和消防團長的聯絡會議上，曾正式決定消防隊和警察在緊急時應取得聯繫，在“緊急狀態”下，二十萬的消防隊員應對警察進行援助。

此外，在海上，從最初起就建立了純粹的海軍。一九四八年四月製定海上保安廳法，將運輸省的掃海管船部和該省外局的水路部、燈塔局合併成為海上保安廳，下設海上保安隊從事取締偷航和走私的工作。這在名義上雖稱為“海上警察”，但第一，它的武裝絲毫不受限制；第二，它的預算內容無須得到國會的同意；第三，立即將作為賠償之用的日本海防艦二十八艘交給了海上保安隊。駐盟國對日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基斯連科曾攻擊說，這種海上保安廳法未經盟國對日委員會的審議，具有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味，是直接地違反了波茨坦公告。英國代表也認為海上保安廳法未經盟國對日委員會審議是不應當的，這是他第一



次在這種會議上採取了和美國代表對立的態度。這就表示在國際上也認為海上保安隊是日本重新武裝的正式開始了。

於是，所謂警察機構的“民主化”，和美軍總司令部所實行的一切“民主化”一樣，是在國際國內民主主義勢力的壓力下，一方面在語言和形式上推行着日本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則實際是美國政府與竭力欲保存維持治安機構的日本舊統治勢力和反動政治家相勾結，使日本成為比戰前更徹底的警察國家，並更為加強了日本警察所具有的軍事性質。和戰前的唯一不同之點，只是全部警察機構及其所孕育的重建日本軍隊的萌芽，完全是處於美國壟斷資本的支配之下而已。

## 六 麥克阿瑟的信件

為了“培養強有力的日本政府”，首先必須壓迫共產黨和勞工運動。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把揭發大阪久保田鐵工所出賣黑市煤炭的四十六名工人交付軍事審判，這是勞工運動被付諸軍事審判的第一遭。這次的裁判後來曾以美軍地方軍政部的名義予以緩刑。但是，在三月鬥爭中，以割斷佔領軍電綫名義而被捕的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東京搬運工事局支部、國際電氣通信施設部福岡收報所、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北海道札幌地區等的負責人及當事人，除均分別被處以五萬日元至七萬日元的罰款外，還被處以一年至五年的徒刑。其中，像東京搬運工事局的鬥爭委員長山內，因為在公審庭上提出証據，証明口供是用刑逼出來的，於是認為這是反對調查官的証言，當場加處偽証罪（苦役二年、罰款六萬七千五百日元），遭受了世界司法史上前所未聞的判決（遞信省勞務局編：“遞信勞工運動史”）。

由於這種鼓勵，日本的司法機關和警察機關也開始進行暴力的鎮壓。特別是集中地攻擊資本家所最討厭的工人管理生產

的鬥爭。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實行生產管理的東京愛光堂的印刷工人，就以非法侵入罪而被捕。從四月二十一日起，對於同樣實行生產管理的日本製造打字機各工廠，在戰後第一次出動武裝警察，對工人佈置的糾察線使用暴力。特別是在佔據三田工廠時，警察隊把身上刺字、高喊：“我們是正人君子，討厭赤色份子，趕快停止罷工”的流氓當作前鋒，先行侵入，在他們被工人趕出來後，立即求助武裝警察隊，重行進攻。於是揮舞六尺棒和棍子，使許多工人受傷，並拘捕了二百幾十名工人。

但在日本，決定性的鎮壓，往往是利用排外主義以對付朝鮮人來開始的。一九四八年一月，因為文部省命令朝鮮人學校應按文部省規定的學校課程進行（強制使用日語和日本教科書進行教育，否認自主教育）教學，所以朝鮮人於三月底在山口縣，四月中旬在岡山縣，分別和縣當局進行集體交涉。在神戶，縣長、市長和檢察官合作，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強迫查封全部朝鮮人學校並對抗議此舉的許多朝鮮人，由警察隊揮舞警棍使數十人負重傷及輕傷；十七日又對抗議此項暴行、擁至縣府的朝鮮人及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日本人，也揮舞棍棒亂打一通，使十五人負重傷，六十五人被捕。朝鮮人以及對這問題寄與深切同情的日本共產黨員、工會會員等，立即開始進行了前後共達二十萬人的大眾抗議。在這種壓力下，四月二十四日，縣知事答應並簽字承認撤銷封閉學校的命令和立即釋放被拘禁者。但第二天黎明，忽然用神戶美軍憲兵司令部的名義，對神戶地區一帶宣佈初次的緊急狀態。並立即以神戶市為中心，逮捕了京都、大阪、神戶一帶的朝鮮人千餘名（據旅日朝鮮人聯盟發表為一千五百七十二名，據佔領軍發表朝鮮人日本人合計為一千一百七十六名）。次日即二十六日未明，又逮捕了以市會議員堀川為首的共產黨員、各工會幹部一百三十三名。麥克阿瑟的心腹、第八軍司令官艾契柏克中將曾特意飛至神戶，親自指揮處理這一事件，這就充分

表現了未將這次事件作為地方事件來處理。並且艾契柏克四月二十六日在招待新聞記者時，沒有舉出任何證據竟武斷地說：“這次在神戶大阪地區的暴動，顯然是由日本共產黨煽動的”。

為對這次神戶事件及對四月二十三日同樣在大阪府廳前發生的拘禁一百五十名朝鮮人和日本人的事件表示抗議，四月二十六日，立即在大阪的大手前公園舉行了抗議大會。當大會在嚴厲限制下開完後，三萬到會者的三分之二已平靜地離開會場，這時南朝鮮系的建國促進會會員突然用消防水龍向散會中的羣衆噴射自來水。同時，警察揮舞棍棒，解下手槍衝入羣衆中，除殺死了十五歲的少年金太一以外，還使數十人負重傷。殺死少年金太一的手槍是從圍牆中瞄準後開槍的。這顯然是警察的有計劃的暴行。而且更驚人的是，警察局長鈴木對調查這次事件的各民主團體代表明白斷言說：“這是有意的。跪着也會開槍，站着也會開槍。在這種情形下，警察是準備殺到一人不留為止的”。這位警察局長鈴木曾得到連縣知事也沒有的外國出品的高等汽車，並且第二年還坐了美國飛機出席在瑞士的重振世界道德（反共的世界主義團體）大會等。他之所以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特殊優待，也許是當然的了（“產別”編：“官方暴行”）。

艾契柏克曾在四月二十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打算將全部在日本的朝鮮人用伊麗莎白皇后號輪船遣送回去，並要完全撲滅共產黨。這是利用神戶、大阪事件的機會，想一舉而將日本投入法西斯主義。

但是，阻止了這種企圖的，第一是立即在日本全國舉行抗議的朝鮮人；第二是強有力地援助此舉的日本共產黨員、工會會員；第三是和他們共同鬥爭並廣泛進行反政府運動的日本國民。各地的朝鮮人除立即舉行抗議集會和示威運動外，同時要求有使用朝鮮語教學的自由，並在日本全國接連進行了韌性而不屈不撓的鬥爭。這一鬥爭所動員的人數，估計前後共達數百萬人。

援助了此舉的日本人，而對着法西斯主義和民族的壓迫，也以日朝兩國國民間前所未有的熱情進行了合作。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大阪地方協會會長村上弘（共產黨員），僅以關於朝鮮人學校問題曾協助朝鮮人並發表鼓勵演說這一理由而被美軍軍政部所逮捕。但他代表日本工人階級對軍政部的訊問毅然對答如下（“遞信勞工運動史”）：

“地方協會決定了要參加（四月二十三日對縣政府的抗議）嗎？”

“是的。”

“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打算做非法行為嗎？”

“並沒有那樣的意圖。”

“難道朝鮮人可以侵犯日本的法律嗎？”

“誰使他們侵犯的，你想想它的原因看。”

“關於純屬朝鮮人的問題也要干與嗎？”

“日本勞動人民大眾和他們合作是當然的。”

“這不是叛逆嗎？”

“這是民族的自主權。”

雖然村上弘被處以四年苦役，但是這並不能夠摧毀在工人階級間所充滿的國際主義精神。所以，要求釋放被捕朝鮮人的簽名者達二百五十萬人，捐助的救濟基金達五十八萬日元。而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東京舉行的反對非法鎮壓人民大會上，五月一日在全國的國際勞動節集會上，日本工人階級一方面堅強反對官方的非法鎮壓，同時要求給“旅日朝鮮人以自主教育的自由”，這顯然是認識了“民族的危機”和“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是出於同一根源的。

隨着壓迫的廣泛擴大到國民各階層，鬥爭也就廣泛地擴大到國民各階層了。

在農村，以貧農為中心在各地展開了食米鬥爭。貧農領導

權很強的日本農民協會各支部，以對“隱瞞田地的鬥爭”來暴露地主、富農沒有申報的田地，而和控制鄉村的惡霸勢力進行了鬥爭。不僅是貧農，全國農民反政府情緒的高漲，從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東京舉行的全國農民大會上也可以看出來。因為出席大會的儘管主要是富農和中農的代表，但他們竟把社會黨左派的國務大臣野溝噓下演講台去了。

進行反對提高學費運動鬥爭的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發動了反對以大學委員會法案為中心的殖民地教育及要求復興教育的鬥爭。從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聯合罷課的學校在日本全國達一百一十三所，人數達二十萬人。為反對重稅，以中小工商業者為中心，在各地組成了賦稅民主化同盟。為反對破壞民族文化，“保衛日本電影會”發展成了“保衛日本文化會”（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成立）。在地區方面，在反對非法鎮壓的鬥爭中，也開始出現了如像大阪的擁護民主主義同盟準備會之類的反法西斯統一組織。於是，以這類的團結為中心，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除日本工會總同盟以外的各工會，日本農民協會及其他民主團體，就和共產黨、社會黨及一部分無黨派的議員合作，組成了工農聯絡會，使議會外的鬥爭和議會內的鬥爭結合起來了。

這一日本全國國民的反抗高潮，粉碎了欲一舉將日本導入法西斯主義的企圖。而艾契柏克的大話也終於未能實現。

但是與正面的鎮壓同時並行的，還有從背後開始的進攻。例如，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官員保爾·詹森就發出命令說：“各縣知事對於被選舉為勞動委員會的人具有拒絕指名的權限。而排除和取消屬於單方面的人物則是縣知事的責任。對此，司令部將全面予以援助”（勞動省：一九四七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因此，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宮城、三月在山形、四月在長野和青森等地發生了排斥民主選出的地方

勞動委員而由縣知事隨意任命委員的所謂委托職权的暴舉。甚至對於勞動關係調整法這種資本家本位的法律，資本家還意猶未足，又自己利用行政權來開始破壞他們所親手製訂的法律。

即使如此，仍然未能抑壓住國民的抵抗，尤其是站在它的前陣的勞動攻勢。於是，這就進行了欲修改勞工法規的冥頑努力。自加藤勳十就任勞動大臣後，雖然常常表明“不修改勞工法規”，但首相蘆田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上却斷然說：“像塔夫脫—哈特萊法之類的東西，政府正在考慮之中”。而勞動大臣加藤並未否定過這句話。

民主黨明確地認清了社會黨左派的作用。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的民主黨大會上，該黨政務調查會會長稻垣說：“企業自由和確保利潤對於吸收外資是最重要的條件。和社會黨進行合作在消除勞動方面的不安上比什麼都有效。雖然有人主張應將左派清除，但是如果左派實行容共和組織民主戰綫，那就非常糟糕，所以拉攏左派就是為了防止這類事情”。首相蘆田也在演說中說過：“雖然各位都害怕左派，稱之為野獸，這因為是外行的緣故；至於我們，因為會驅使猛獸，所以能充分駕馭他們”。實際上，社會黨左派首領鈴木，藉口維護三黨協定，重行就任國會預算委員會委員長，並自行解散了號稱為“黨內在野黨”的五月會。同時，日本工會總同盟退出了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產別民主化同盟召開了全國大會（都在六月間），而這些事都是在社會黨左派幹部的指導和援助下實行的。甚至可以說，社會黨中對蘆田內閣應負政治責任的，與其說是右派，不如說是左派。

勞工法規之所以未被破壞，並非由於左派幹部的參加內閣，却完全由於儘管有左派幹部的入閣而仍有澎湃高漲的勞動攻勢（據勞動省發表，參加罷工的人數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達二十萬，五月達十九萬，六月達二十九萬）。

未能修改勞工法規的蘆田內閣，於是開始從不為大家注意

的方面提出了束縛基本人权的法案。

其中的第一件法律是五月一日公佈的輕犯罪法。這是代替過去的違警處罰令來處罰違反公共道德行為者的法令。除共產黨以外，所有政黨均曾對之表示贊成。共產黨認為凡對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稍有妨礙的法律都是無用而有害的，並列舉過去怎樣利用違警處罰令壓迫國民的實例來加以反對。因為這種意見受到國民的支持，於是社會黨提出如下修正後，該案才在國會通過。即：“當適用此項法律時，應注意不致因此而非法侵犯國民的權利，不得越出公共目的的範圍而為其他目的濫用此項法律”。但是，自法國革命的人权宣言經過討論並闡明其意義以後，凡可能濫用來侵害國民權利的法律，在維護基本人权上從未作過一次必要的嘗試。並且凡禁止加以濫用的法律而未被濫用的例子，在歷史上也從未出現過。所謂禁止濫用的規定，往往只是掩飾鎮壓法規的遮羞布而已。像社會黨右派的松岡駒吉之類，就完全公開說：“正如在過去的時代需要治安維持法一樣，對於過火的大眾運動，這是必要的”。實際上，輕犯罪法是立即就開始用於鎮壓民主主義運動的，其後更被日益濫用，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這項法律竟被擴大應用到這種地步，警察把東京新宿高等學校的學生作為貼標語的“現行犯”，甚至用手槍從後面射擊，使他負了瀕死的重傷。雖然松岡駒吉也許對此感覺滿意，但作為主權擁有者的人民却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暴力。

第二項法律是政治資金規正法。眾議院的“關於隱匿物資特別委員會”，曾把日本投降後資本家、地主、軍人、官僚們瓜分了龐大國家財產的事情揭發出來；一九四七年底它改組為“非法財產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後，並對政府和政黨的收買受賄也進行了調查。這個委員會，曾暴露了從辻嘉六事件到自由黨本部和鳩山一郎的建築私宅事件以及民主自由黨方面的非法行為。嗣後，當開始揭露龜井貫一郎、土木建築獻金事件等以及蘆

田、栗栖、西尾等的民主党、社会党的腐敗情形時，遂製訂了政治資金規正法。而爲了防止這類政党的貪污腐敗，於是規定了政治团体的呈報制和政治团体的收支申報制（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通過、七月二十九日公佈）。但是，因爲這類現存政党是以政治腐敗爲基本條件而成立的，它当然不能自行消滅政治腐敗。政治資金規正法是反面利用政治腐敗的現象，假借使政界純潔化的名義，來束縛爲憲法所保障的國民的政治自由權利。其目的不僅是對於政党，特別是爲了嚴格限制政党以外的羣衆团体的政治活動。因爲這樣一來，以工会爲首的一切民主团体，如果不作麻煩的呈報，就不能够从事政治運動了。

第三項是開始在各地製訂公然蹂躪基本人权的公安條例。首先製訂这种公安條例的是福井市和福井縣。一九四八年六月底，在福井地方發生了大震災，出現了數十万的災民。因爲官方沒有立即採取救濟办法，於是日本共產党、工会及其他民主团体馬上組織救濟隊，進行了有效的救濟活動。官方所擔憂的不是國民生活的被破壞，而是害怕國民將希望寄託在民主团体方面。首先在七月四日，對於全遞信从业員工会會員爲便利災民在街上售賣郵票和明信片，以“違反郵政法”的名義加以逮捕。六日，對張貼颱風預報傳單事先警告災民的國營鐵道工会會員，以“違反輕犯罪法”加以逮捕。於是七日用福井市長的名義，八日用福井縣知事的名義，假借禁止“从事一切煽動言論行動”的曖昧條文，公佈了只准政党及其他各种团体或個人在官方許可範圍內行使言論、出版、集会、示威遊行權利等的公安條例。爲憲法所保障的、對於國民來說是比什麼都更重要的基本人权，竟被區區的行政官吏所蹂躪了。雖然這會由縣議會和市議會所通過，但無論是國會或其他機構都無权製訂超越憲法範圍的法律。所以当各地仿效福井的例子公佈公安條例時，甚至一部分地方法院也不能不對此判決其爲違反憲法，這就是顯著的証明。



在福井地方，曾利用公安條例，大大限制了民主團體的活動。七月十日，竟命令由東京所派遣的、以共產黨議員為首的全國的民主救援代表離開縣境。

福井地方的日本官方，顯然得到了美方軍政部強有力的支持。福井的美軍軍政部長官公開說：“凡是共產主義者，不論他是什麼人，都要把他擊潰”；他還親口吹牛說：“我簡直要親自去把他們抓起來”（奧那·托勒西：“日本的悲劇、美國的悲劇”，載“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二年增刊號）。這類由美軍地方軍政部對日本內政的直接干涉，不僅在福井，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是露骨的。例如在埼玉縣，該地的美方軍政部就認為教師不是勞動者，屢屢向日本地方當局提出此項“勸告”，後來知道按照日本的法律不可能否認教師是勞動者，於是在七月十三日（一九四八年）由軍政部直接下令禁止一切教職員工會的活動。

但是，儘管有這類壓迫，隨着生活的日益被破壞，日本國民的反政府傾向却迅速高漲起來。其間，在各政黨中，唯有不斷打退鎮壓，從事保衛國民生活的日常鬥爭的共產黨力量在急劇增長起來。

一九四八年七月間，蘆田內閣瀕臨崩潰的危機。七月二日發生了下列事件：即包括把鐵路運費提高四倍、郵費提高三倍半在內的掠奪國民預算案，竟被號稱為社會黨“純正左派”的最左翼所反對，且為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所否決（其後該案以微小的多數在眾議院全體大會上被通過）。七月五日成立了作為全國學生組織的全國學生聯盟，當議會審議大學法案時，全國學生聯盟決議舉行無限期罷課。七月六日，副首相西尾末廣因被追究其受賄責任而辭職。七月七日，社會黨把純正左派開除出黨。但純正左派聯合未被開除的人組成社會黨正統派議員團，開始了整黨運動。七月八日，雖然社會黨發表了以所謂在十月間舉行暴力革命為內容的共產黨秘密指令，但被共產黨揭露出來，這是

連號碼都錯了的(共產黨的正式指令还不到三百號,它却填為第四百零一號)、粗製濫造的假文件。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在西方的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曾受狙擊;與此相呼應,七月十九日,在東方的日本,發生了民主自由黨系反共團體分子在佐賀對德田球一投擲炸彈的事件。但是,德田球一在負傷後立即指出:“剛才在這裏所發生的是什麼事情呢?不正是稱共產黨為暴力革命的人們在對共產黨施用暴力嗎?不僅是對於共產黨,並且是對於工會和一切民主運動施用暴力。……這就表示目前正是全國國民和我黨必須共同斷然粉碎這種新的法西斯萌芽的時候”。對於這一暴行,以印刷出版工會的二十四小時罷工為首,在日本全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法西斯的壓迫,反而加強了國民的反對。

突出地站在这類國民攻勢前列的,仍然是官公廳的勞動者。對於蘆田內閣所規定的三千七百日元基準這種活不下去的工資水準,全官公廳各工會組成聯絡協議會,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轉入了要求五千二百日元基準的正式鬥爭。這次的鬥爭在以下三點上比三月鬥爭給政府以更大的壓力。

第一,通過三月鬥爭,親自體驗過民主化同盟幹部叛賣行為的國營鐵道工會會員,在五月底的奈良大會上從民主化同盟幹部手上奪回了領導權。過去作為中間派而成立的革新同志會(簡稱為“革同”),現在作為統一派而開始與共產黨相接近。國營鐵道工會在奈良大會上,擊敗了民主化同盟的提案,同意進行地區鬥爭,並通過了重行參加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的決議。甚至在民主化同盟中綽號叫做“堅持二千九百二十日元基準佛爺”的、擔任薪給對策部長的蓮見太一,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也落選了。但因日本政府立即把蓮見任命為人事院俸給科長,這就充分證明了民主化同盟和政府間的密切關係。於是在三月鬥爭中,由於民主化同盟幹部的領導而未與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

議會採取一致步調的、擁有六十萬會員的國營鐵道工會，重新和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合作，大大地加強了鬥爭的力量。

第二，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所提出的要求中，附有六項條件：不改定物價，取消大眾徵稅，不設立處理紛爭的機關，不實行解僱員工的行政整理，不製定最高工資制。這些條件是具有動搖日本國內國外壟斷資本基本政策的政治意義的。一開始就使經濟鬥爭同時具有了政治鬥爭的意義，這表示全官公廳勞動者已比三月鬥爭時大大成長了。

第三，外部的援助，比三月鬥爭的時候，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都有飛躍的發展。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除日本工會總同盟以外，國營鐵道工會、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全官廳職員工會協議會、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會議、日本工會會議、全國煤炭產業工會、日本煤礦工會同盟等大部分工會，組成了反對提高物價的聯合鬥爭委員會，強有力地支持了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的鬥爭。而農民、學生、中小工商業者鬥爭的高漲，以及工農聯絡會的成立，也大大幫助了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的鬥爭。

政府頑固堅持三千七百日元的基準，致使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的談判趨於決裂；於是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根據七月一日才施行的國家公務員法，於七日向中央勞動委員會申請調停，從八月八日起獲得了爭議權。政府藉口這項要求是政治要求，破壞了片山內閣時自行製定的公務員法，不接受此項提訴。於是這就引起了包括社會黨正統派在內的工農議員團對政府的激烈攻擊。因此，使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已完全沒有活動的餘地了。在三月鬥爭時是政府中主角的西尾末廣，因政治獻金問題已被迫辭職了。勞動大臣加藤勘十由於民主化同盟勢力的衰退，已無計可施。政府終於屈服下來，從八月四日起出席了調停委員會。而且政府一步步地受着工人方面的壓力，不得不

在八月十七日表明，根據集體談判的結論，勞動條件應由國會決定。這就意味着，用低工資基準束縛全體勞動者的美日壟斷資本的最大基本政策，已陷入不得不由日本政府親自推翻的危險境地了。

這時候，就由麥克阿瑟發出了在日本法西斯主義歷史上，標誌着一個新時期的文件。這就是他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首相蘆田的信件。這封信的主旨是應立即整個修改三週前才施行的國家公務員法。其理由是，爲了“使公共(全體)利益高於一切”起見，認爲賦與國家公務員以集體談判權、爭議權是不適當的。蘆田內閣便活躍起來，採取“麥克阿瑟信件是高於一切法律”的解釋，立即否認了中央勞動委員會的調停。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用日本政府名義公佈了第二〇一號政令，並即日付諸實施。而這個政令是根據一九四五年勅令第五四二號這種在新憲法實施後業已無效的“天皇命令”，來剝奪公務員的集體談判權和爭議權。

如果不賦與爭議權，則憲法所保障的團結權就失去了它的意義。況且，既沒有爭議權，又沒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那就不過是一個請願機關而已。全官公廳所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總數達二百六十萬人，佔日本有組織勞動者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所以它在戰後日本勞工運動上，曾起過最重要的作用。現在却從官公廳勞動者的身上，一舉而剝奪了他們爲憲法第二十八條所保障的勞動者的權利。這是第一次公開地否定了憲法的條文。並且，剝奪一部分勞動者的應有權利，就是削弱其餘勞動者的力量，也就意味着是從全體勞動者身上剝奪了一部分權利。而剝奪勞動者的權利，就是削弱國民的力量，也就意味着是損害了全體國民的基本人權。所以，日本是向法西斯化的道路大大邁進了一步。

這即使在美軍總司令部的政策上，也是一個急遽的轉折點。並且這由下述事實可以充分來證明它。即在二·一總罷工後掌

管美軍總司令部勞工政策的勞動科長凱倫，雖然主張為培養民主化同盟至少應保留集體談判權，但這一主張未被接受，他竟不得不因此去職。關於這時期的情形，直接受過美軍總司令部勞工政策訓練的勞動省勞政科長飼手，曾談稱如下。

“在二·一總罷工後凱倫擔任勞動科長的時期，是等待自主的（民主化同盟系）工會發展的時期。這種政策，以麥克阿瑟的信件為轉機而不得不有所改變。也就是說美軍總司令部放棄了它所耐心等待的發展。至於它的原因，可以舉出來的，第一是極左分子的活動，第二是國際情勢。有鑑於現在和將來的狀況，美國也不得不採取強硬的政策了。”（勞政研究所：“現代勞工運動的動態”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這就雄辯地證明了：在七月攻勢中高漲起來的日本國民的政治覺醒，在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為中心的美國遠東政策的破產，在必然要引起柏林（封鎖）問題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國壟斷資本的削弱；遂使美國命令佔領下的日本急遽地轉向法西斯化了。

### 第三節 走向殖民地化的日本

#### 一 文化、教育的殖民地化

日本的法西斯化，由於公佈第二〇一號政令而結束了它的準備時期。

在公佈第二〇一號政令以後，就露骨地開始了殖民地式的鎮壓。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假借誹謗佔領軍的名義，美軍地方軍政部逮捕了包括共產黨候補中央委員佐藤佐藤次在內的新潟縣日本農民協會統一派的幹部。八月十一日發表了福井的軍政部代表控告共產黨員野坂參三違反佔領政策的事件。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拒絕地方勞動委員會的仲裁、在日本官方援助下

想強迫接收砧製片廠的“东宝”經營者方面，看出了無法擊破在各工会支援下的日本電影戲劇工会的防綫；於是請求美國第八軍直接加以干涉。美國第八軍於是出動了戰車八輛和一個中隊的兵力，还用飛機在空中進行恐嚇；同時並指揮備有裝甲汽車的一千八百名武裝警察，執行了对“东宝”電影製片廠的臨時处分（勞動省，一九四八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这种压迫的殘暴，據女演員赤木蘭子說：“只剩下軍艦沒有派來”；東京民報報道这种暴力鎮压的情形甚至說：“而且对手既非暴徒也非無賴，却是夾有女演員在內的電影工作者。以这种人爲对手还如此嚴重，那末，如果礦山等發生罷工時，恐怕只有使用原子彈了”（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不僅是对“东宝”爭議，对其他重要產業的爭議，美軍總司令部也都直接加以干涉。例如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命令電氣工人中止罷工，九月十日对全遞信从业員工会，九月十三日对電氣產業工会爭議發出強硬的停止爭議的“劝告”等，就是它的例証。此後，在“產別”所屬工会的罷工中，沒有受美國佔領軍干涉的倒反而屬於例外了。

在意識形態方面，也爲殖民地法西斯主義開闢了道路。在日本投降後，立即開始了的、在文化和思想方面基於美國主義的愚民政策，在這個時期中達到了它的頂點。与此同時，一面藉着普及世界主義思想來消除日本民族的自覺，一面藉着動員以天皇制爲首的一切反動勢力開始努力鼓吹民族主義，來爲殖民地法西斯主義的意識製造温床。

在電影方面，剛一投降時曾輸入日本的若干反法西斯影片已不見踪跡，而到处都是宣揚色情、怪異、荒誕故事的影片，特別是表現資本主義末期症狀的強盜片和恐怖片。

在廣播方面，“山崗鐘聲”的作者菊田一夫發表文章說。——“日本廣播協會的廣播節目从投降後一直到現在爲止，日本人幾乎是毫無自由的，用我們的習慣語來說，这是美國佬的節目”。節

目中像專談常識的“談話資料”、利用社會佳話宣傳轉變風氣的“左鄰右舍”、專門宣傳完糧納稅義務的“農民之夕”、專門以民主化同盟工會為對象的“工會時間”等，都是由美軍總司令部廣播科所計劃，而用日本廣播協會計劃的名義來廣播的。至於不遵從指示的人，則不斷被降職或被開除。以流浪兒問題為廣播題材的“山崗鐘聲”，曾獲得社會上的好評。後來美國佔領軍強迫菊田一夫繼續寫作，並以命令的口吻詢問菊田：“你知道波茨坦公告嗎？”對於一九四八年秋天起美國佔領軍的擁護封建制家族制度的方針，菊田說：“我（菊田自稱）切身感覺，終於成為從事民主主義教育的孤兒了。失去熱情的作者所寫的‘山崗鐘聲’，從這時候起就變成僅僅以娛樂節目為方針了”（“山崗鐘聲的前後”，“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二年臨時增刊號）。

美軍總司令部特別把重點放在教育方面。自一九四六年一月發表“關於教育的根本改革備忘錄”以後，美軍總司令部雖然經常說，用教育改變日本國民的思想正是佔領政策的重要目標，但是這裏所謂“民主主義”教育是什麼性質的東西呢？

據菊田一夫說：“從當時到佔領軍統治結束時為止的七年間，比什麼都嚴格的似乎是對教育廣播節目的方針。當時美方所使用的作為對學校廣播稿的資料，因為它和一九二〇年時對美國黑人兒童的教程幾乎完全相同，所以連我們這種不懂教育的人也覺得其中有些地方頗為可笑。不知是不是為了此事，總之日本廣播協會教育科的三位科長，都是因為違反民間情報教育局的方針而被免職的。”（見“山崗鐘聲的前後”一文）

從一九四七年起在教育方面就開始強制施行美國式的六三三四制<sup>⊖</sup>。於是放棄基本課程的學習，把重點放在名叫社會科，但內容並非研究社會的基礎而是藉着家族組織即係國家組織縮影

⊖ 即小學六年，初高中各三年，大學四年的教育制度。——譯者

的这种非科学原则，其目的在於从課程方面模糊階級認識。並且还强制使用从未听說过的“核心課程指導制”方法，强制实行地區教育和興趣本位的实用主義等等，來徹底進行殖民地的愚民教育。因此國民激烈地批評說：“六三制只能練好棒球”。事實上，根據一九四八年全部學生程度調查結果看，小學生的國語和算術程度，至少要比戰前差兩三年（參攷刀江書院出版、矢川德光：“对新教育的批判”）。

不僅如此，民族教育也被破壞了。在國語讀本中，刪去了具有民族特徵的古典民主文學的教育；在高等學校以下，不教授日本的歷史和地理。天皇的家庭親自示範，從一九四七年四月起，讓美國婦女瓦伊寧夫人擔任了皇太子的帝王教育。於是與普及從屬於美國的世界主義教育同時，促使作為法西斯主義基礎的民族主義復活起來了。一九四六年八月發行的日本歷史國定教科書，在敘述“國家的發展”中，把日俄戰爭和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分別寫成爲“由於意見的不一致”和“因鐵路突被炸毀，於是爆發了事變”，藉圖隱蔽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同時還承認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實有其人，仍然把以天皇和統治階級爲中心的、反民主的、排外主義的歷史來教給國民（井上清：“國家發展的批判”）。

至於標榜爲“民主主義”的、新學制高等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則是在一九四八年夏開始編輯而在十一月發行的。把這種教科書當作新學制高等學校、教師、國民，特別是當作返國日人的思想教育讀本使用後，認爲比美國出版的還要好些，於是遂把它翻譯成英文，並分發給美國佔領軍的全部士兵（估計印數當在二百万到五百万册）。這種教科書的內容是矛盾已極的“理論”。舉其顯然可見的說：第一，它從民主主義中抽去了民主主義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民族獨立這一決定性的因素；第二，它抹殺了爲歷史上、理論上所充分證明了的關於民主主義的最重要的結



論——爲實現民族獨立和民主主義，不能僅僅依靠改革，必須實行革命；第三，它認爲“爲了公共福利”，必須剝奪個人的權利，特別是工人的罷工權。這就明顯表示，這裏所謂“民主主義”，是與法西斯主義一脈相承的；第四，它認爲在“人口過剩”的日本，除依靠低廉工資進行傾銷輸出外別無生存途徑，藉以復活日本帝國主義過去的“理論”；第五，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所證明的一樣，站在最前綫和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是共產主義，但它卻把共產主義稱作“極權主義”；並不顧共產主義是民主主義的最高發展形式這一在理論上和歷史上所充分證明了的事實，而主張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是對立的东西；第六，正像世界上一切法西斯主義者所說過的一樣，它把無產階級專政是壓制少數剝削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現實的民主主義方法，故意加以隱蔽；並把階級專政說成是個人獨裁（井上清：“對文部省著的‘民主主義’的解說和批判”、“歷史教育論”）。

這一套所謂“民主主義”的原理，在一九四八年十月舉行教育委員選舉時，曾對日本國民廣泛進行宣傳並名副其實地加以實行。在教育委員的選舉中，雖然教員工會代表全國教師的意志，爲使教育民主化，曾在各府縣提出工會的競選人，但美軍總司令部通過地方軍政部，認爲教員工會的競選人違反“教育民主化”原則，強硬“勸告和鼓勵”他們退出競選。據東京的競選人金子靈岳作証說，如果不退出競選就必須甘願斷絕收入的來源，還要受一切可以想像的壓迫，這“真是懇切而懇勸的勸告”。因此，教員工會推出的競選人，除兩名外都不得不退出競選。而對始終未曾退出競選的金子靈岳和埼玉縣的阿部綱義兩人，以及對於共產黨和民主主義統一戰綫所推出的競選人，就由美軍各地方軍政部中與教育有關的官員，更發動了“頗爲懇切懇勸的”使他們落選的運動。各地方軍政部中與教育有關的官員命令各校校長召開“家長教師聯誼會”大會，對到會家長和一般市民（曾特

別命令一般市民參加這種大會)進行了反蘇反共的“民主主義”宣傳。當有人質問“這可以認為是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嗎?”則有時回答說“這是強有力的勸告”,有時也就乾脆答覆“這是命令”(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金子靈岳在共立講堂的演說)。此外,對於儘管在這種壓迫下而仍然當選了的東京的堀江邑一(共產黨)、埼玉的阿部綱義,則正如預定的那樣,在他們當選後仍加以各種壓迫。當他們反抗這種壓迫時,終於採取最後手段,把這兩位國民的代表加以整肅。這就徹底証實了美國的“民主主義”是什麼東西了。

日本政府受美軍總司令部這種政策的鼓勵,開始迅速轉向法西斯的道路。以下事例都是其具體表現,例如把麥克阿瑟的信件當做命令;聲明第二〇一號政令不違反憲法(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內閣官房長官聲明);指令立即檢舉違反第二〇一號政令者(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檢察總長的指令);發出通告,剝奪官公廳各工會的爭議權和集體談判權,否認集體合同和專門從事工會工作人員的地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內閣閣議決定);擴大解釋第二〇一號政令,把私營企業對公教人員的同情罷工,適用刑法第六十五條的共犯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次席檢察官會議的聲明);蘆田首相發表談話,說是正在考慮整肅共產黨員擔任公職(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招待外國記者時的談話);搜查共產黨的地區事務所,以便當做違反二〇一號政令的旁証(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以後在各地進行搜查);發出通告,說是工會排斥共產黨職員並不違反勞工法規(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勞政局長賀來的通告)等等。

## 二 民族獨立青年行動隊

但是,從第二〇一號政令就開始了的、這種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新階段,也促使日本國民的民族自覺和保衛民主主義的鬥爭

進入了新階段。

一九四八年七月底，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國營鐵道工會發表緊急事態宣言，立即表明了和第二〇一號政令進行鬥爭的態度。國營鐵道工會松山機務段分會的乘務員，為反對強制實行用一名乘務員的、這種等於是殺人的新調配車輛辦法，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通過了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決議，八月四日開始停止火車的行駛。八月五日，該分會為反對鐵路當局罷免該分會會長、副會長等四名的命令，立即舉行無限期罷工。而在日本政府援用違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名義拘捕了十名領導分子後，仍使四國西部的鐵路運輸停頓達一星期之久。在這次鬥爭中，大阪、廣島等機務段雖然接到業務命令要他們破壞罷工，但他們却拒絕服從這種命令。並且松山的日本農民協會支部，也以大批糧食贈送給罷工團體表示同情；這就表示儘管這一鬥爭比其他工會早走了一步，但它已不是孤立的鬥爭了。所以，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當北海道的兼松煤礦工會要求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反對公務員法，斷然實行二十四小時罷工時，這一問題已經不僅是全官公廳勞動者的問題，而成為日本全國人民，特別是全體勞動者的問題了。這些情形就証明了日本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已經成長起來了。

日本在佔領下第一次的民族反抗，也是這時候開始的。這種民族的榮譽，在地區方面應歸之於北海道，在階級方面應歸之於工人階級，在年齡方面應歸之於二十歲年代的青年。

貫穿北海道狩勝峯的狩勝隧道是一個斜度千分之二十五的陡坡，加以通風設備不良，所以通過這個隧道時列車乘務員不斷發生窒息、火傷的事故。國營鐵道工會旭川支部新得機車區分會，自成立以後，雖然用集體談判辦法要求改善通風設備，減少貨運列車等，但卻未被接受。於是該分會根據違反勞動基準法為理由向當局申訴，同時從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起實行減少貨

遲列車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儘管勞動基準局調查團和鐵道省調查團在調查中親身遭受了窒息和火傷的危險，但仍不接受分會的要求，反認為分會的鬥爭是“非法的爭議行為”而施以壓迫。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分會鬥爭委員長柚原秀夫“為促使殘虐當局的反省”，在隧道入口的鐵路線上投身自殺。分會會員為紀念這一殺身的抗議，把狩勝隧道改名為柚原隧道，並繼續進行減少貨運列車百分之三十的鬥爭。而工會本部也正式承認了分會的爭議權。

第二〇一號政令就是這時公佈的。公佈當日（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即命令新得分會停止減少列車百分之三十的行動。新得分會遵照命令在第二天，即八月一日開出的、未減少車次的第一班列車，當進入隧道時，立即有兩名機車助手發生了窒息。上邊命令他們去死，但是他們又無法進行為了生存的鬥爭，因為現在他們被剝奪了唯一的武器——爭議權。八月五日，參加乘務員會的分會會員，通過了用實力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以保衛民族獨立的決議。並由分會中的五十九名青年組成“民族獨立柚原青年行動隊”，他們在柚原墓前宣誓要鬥爭到底後，就分赴各地活動。於是，他們在國營鐵道分會中、在工廠中、在農村中，為呼籲民族危機而開始從事大規模的宣傳活動。這項運動立即以旭川支部為中心，擴大及於北海道一帶的國營鐵道工會。到八月二十日為止，脫離職務者達一千三百六十一名，因此不能行駛的車輛達一千輛左右，不能搭車的乘客達六萬名左右，使北海道的鐵路運輸陷於停頓狀態。

官方一面把這些青年行動隊當做違反第二〇一號政令者給以免職或其他處分，同時還蹂躪憲法發出沒有填寫姓名的空白拘票來逮捕這些行動隊員。但是，這些行動隊員，在日本國民的援助下逃避了官方的追究。從八月下旬起，他們渡津輕海峽南下，勇敢地向全國呼號民族的危機。這種放棄工作崗位的鬥爭

方法，作為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鬥爭方法，雖不免受了做得過火的批評，但這並不能掩蔽它把民族危機在國民面前尖銳地暴露出來的偉大功績。

與此相呼應，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青年工人中，也出現了放棄工作崗位的人。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本部更把這種戰術發展起來，實行了“霧雨戰術”（這是一種似斷似續的鬥爭方法，即個別實行放棄工作崗位、進行工作場所鬥爭和部分罷工等）。私營企業的全日本機器工會、全日本鋼鐵產業工會、日本電氣產業工會等，也進行了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鬥爭。工農聯盟也前進一步，甚至出現了下面的例子。即電氣產業工會的豬苗代發電廠的工人，以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去親自着手解決農民問題中心環節的土地問題。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日立支部舉行了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二十四小時罷工。因為官方對於這個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支部和支援它的工會、共產黨加以鎮壓，於是八月二十四日舉行了市民大會表示抗議。在市民大會開會時，武裝警察事先未作警告，忽然從羣眾背後進行襲擊，揮舞警棍、六尺棒，使包括老太婆、主婦、兒童在內的一百多市民受輕傷和重傷。“當時附近一家魚店的老大爺，氣得變了臉色跑到我們面前。只見他脇下夾着五、六把菜刀，並把菜刀遞給我們說：‘喂，你們橫遭這種毒手，我豈能坐視不管。我借給你們這些傢伙，和他們拚吧。’大概數百名的目擊者都和這個老大爺有同樣的義憤。但是我們以感謝的心情婉拒了這位老大爺的援助。老大爺帶着不解的神情退回去了”（引自全日本機器工會日立分會的菅原和夫的筆記：“官方的暴行”）。這如果在一九五二年會如何呢？我想大概會使老大爺滿意而退的。一九四八年，工人和市民在挨打下退却了。但是，即便在一九四八年，工人階級還是立即進行了反擊，把真相訴諸於全體市民，並舉行了代表日立全市

的二万五千人羣衆的大抗議集會，致使从茨城縣一帶調來的數千名警察隊駐守在日本市不能離開。

繼續壓“东宝”電影製片廠之後的這種对日立的鎮壓，引起了國民各階層的反法西斯運動。於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組成了幾乎包括所有民主團體在內的擁護民主主義同盟準備會。九月，東京葛飾區的五千名家庭主婦蜂擁至區公所進行鬥爭，高呼“如果有錢養警察，就拿米來”。此外，主張“研究的自由”和“反对復活法西斯殖民地教育”，並為此進行鬥爭的學生們，組成了名為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簡稱“全學聯”）的全國性組織（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作為他們的核心鬥爭機關。

由於國民的這種抵抗，使福井縣放棄了控告野坂參三的企圖，使大阪撤回了公安條例。並且這使蘆田內閣修改勞工法規和整肅共產黨員任公職的企圖也未能實現。由於日本國民的抵抗；日、美壟斷資本想急速把日本導入法西斯主義的野心，遂暫時被粉碎了。

### 三 政治腐敗、第二次吉田內閣、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

但是，在日本國民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前，統治階級已自行暴露了它的醜態。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間，蘆田內閣崩潰了。

成為蘆田內閣崩潰原因的昭和電工事件，是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統治本身所產生的政治腐敗的典型例子。

只要是脫離了人民權力的統治，諸如專制統治和殖民地統治，當然是政治腐敗的最好的溫床。美軍總司令部的官員，不論是高級的或低級的，都熱烈地要求和歡迎現款、利權以及日本畫、古董、珍珠等日本珍品，特別是日本婦女的肉體。由於日本統治階級的戰犯、政治家、官吏、資本家們，從親身的體驗中競相

提供這類賄賂，於是也就加深了這種腐敗。舉例來說，一九四八年珍珠的價格之所以不僅是急劇暴漲，而且從市場中消失了踪跡，就是由於在一萬田總裁下的日本銀行進行收買的緣故。至於這些東西送到哪兒去了，大概是不問自明的（“廣場”雜誌，一九四九年第一號）。

昭和電工事件的主角日野原節三，在“有了女人和金錢就可以統治天下”的信念下，正如起訴書中所說，他“經司令部當局的推薦”，一九四七年三月就任昭和電工（壟斷日本肥料生產額百分之八十的公司）的經理，他所使用的行賄、應酬費，僅已查明者已達七千萬日元，而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為止，他所獲得的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則達三十億零八百萬日元。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是國家和壟斷資本直接結合的典型表現。這種貸款是以復興產業的名義，用國家貸款的形式，實際上就是壟斷資本家不負歸還義務把國民稅款飽其私囊的制度。如果這種地方不產生腐敗現象，那等於說是污泥溝中不會生蛆了。實際上，從復興金融公庫所獲得的貸款，其中百分之四十到八十必須用作收買費，這已成為當時資本家的常識了。因此，在昭和電工事件上所判明的二千餘名有關人物中，上自興業銀行總裁、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副首相西尾、首相蘆田；下至警視廳監視被拘留者的警察、大學出身的官吏，都包括在內。政黨方面，除共產黨以外，民主自由黨的大野伴睦、小澤專七郎；民主黨的蘆田、栗栖，社會黨的西尾末廣，幾乎一切政黨都與這一事件有關係。甚至從調查這個事件的司法官起到日本官方禁止從事調查的絕對權力最高層止，也就是說整個控制日本國家的機構，都已腐敗透頂，都接受了日野原和他的姨太太秀駒的錢財等物（實際上是國民的稅款）。

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幾乎全被像昭和電工所代表的那類壟斷資本分掉了。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為止，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中，分給全國五萬家中小企業的貸款額不過是二十億日元（佔

總額的百分之二·三)；与此相反，三井礦山公司得到了三十億一千五百万日元，三菱礦業公司得到了十九億五千万日元，这种貸款是集中地給与壟斷資本了。由於以德田球一為重要委員的“非法財產处理委員會”的追究，与昭和電工事件有關的腐敗現象的暴露，產生了使第二個、第三個以至一切壟斷資本和一切國家機構的醜惡交易都在光天化日下被暴露的危險。於是，作為与昭和電工事件的有關者，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傳訊了經濟安定本部長官栗栖，十月五日逮捕了副首相西尾，並且顯然要波及到首相蘆田，甚至牽涉到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次長凱德斯的名字。於是經濟科學局局長馬貴特用電話詢問：“為什麼不釋放日野原”，以此為首，美軍總司令部遂開始進行強硬干涉。結果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遂使蘆田內閣被迫辭職了(井上清：“日本政治腐敗史”及參照“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二年臨時增刊号的“烏尾夫人的生活和意見”、“秀駒這個女人”兩文)。

但因為中間道路政治不是直接由於人民的压力，而是由於它的內部腐敗崩潰的，所以这使保守政党仍有組成後任內閣的可能。

於是以後任內閣問題為中心，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兩派勢力的对立。一派是企圖組織以山崎猛為首揆的民主自由党、民主党、國民協同党、社会党右派的全國聯合內閣的運動；一派是企圖組織以吉田為首揆的民自党中心的單獨內閣的運動。這兩派的对立是分別以民政局的凱德斯和諜報部的韋洛比所代表的美軍總司令部兩種勢力為背景的。但是，它們在压制以共產党為中心的民主勢力的抬頭和企圖維持正在崩潰中的國內國外壟斷資本的統治這一點上，是站在相同的立場的。只是為了維持它們的統治，究應減輕右翼的色彩以緩和國內國外的反对，还是用露骨的右翼“強硬政治”來突破危机這點上，它們对应选取那种手段还有着矛盾而已。



結果，後者獲得了勝利，於是成立了第二次的吉田民主自由黨的單獨內閣。

吉田之所以獲得勝利，其原因如下。第一，由於從柏林問題進入到北大西洋同盟談判後美國壟斷資本的危機，特別是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所造成的美國遠東政策的破產，加上中間道路政治的失敗，遂使美國政府日益感覺有在佔領下的日本組成“強有力”的政府的必要。實際上，後邊要說明的“經濟安定九原則”<sup>⊖</sup>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發表了；又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命令凱德斯返回美國去了。第二，由於“遠東兵工廠”的政策，積極地促成了日本反動勢力、特別是壟斷資本的復活。一九四八年三月被指定為經濟力過度集中的企業（壟斷企業）的三百二十五家公司（佔日本全國股票的三分之二以上），從五月到十一月，除一百家以外，全都解除了它們的指定。並且對於餘下的一百家公司，也保證它們不必擔憂會被完全解散。結果，只有二十八家公司在形式上加以分散或被吸收入新公司中。這一面提高了壟斷資本的自信，一面起了加深它的買辦性的作用。代表這種壟斷資本意見的一萬田日本銀行總裁，當蘆田內閣垮台時，曾熱烈希望“加強國內的政治力量”（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招待新聞記者的談話）。第三，民主自由黨在三月組成該黨時，把舊自由黨時代的純自由經濟政策曾加上若干統制經濟的色彩。五月以該黨名義首次發表了勞動對策（包括修改、停止勞工法規及禁止公共和重要產業的罷工）；五月和七月又主張實行行政整理（先行裁員百分之二十五）等，開始積極主張這類迎合已發動攻勢的壟斷資本的心意的政策。而吉田所主張的保守聯合、強有力的單獨內閣，是完全符合日、美壟斷資本的期望的。

⊖ 所謂“經濟安定九原則”是由麥克阿瑟的經濟顧問、美國底特律的銀行家道奇，為日本製訂的如何使日本經濟進一步殖民地化與軍事化的方案，所以也稱為“道奇方案”或“道奇路線”。——譯者

第二次吉田內閣組閣時，因為保守政黨意見不能一致，於是除從民主自由黨本身外，只從參議院的綠風會中遴選出數名閣員後就粉墨登場了。正因為吉田是以頑固出名的，所以會傳說他比片山、蘆田的“諾諾連聲”之輩也許敢於和美國佔領軍相抗爭；但他的所謂頑固祇是對下的官僚性頑固；至於對上，即對於美國的權力，則必然是徹底的卑屈和服從。並且吉田根據最反動最具買辦性的二次世界大戰後附屬國的原則發表談話說：“共產黨人雖然說日本是殖民地，但美國以前不也是英國的殖民地嗎？”（吉田招待外國記者的談話，載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英文“日本時報”）這種話對於熱愛民族獨立的日本國民說來，是永不能忘的、徹底的、賣國賊的言論。

第二次吉田內閣，在美軍總司令部的支持之下，打算把第二〇一號政令完成立法手續後再舉行大選，於是連施政演說也未發表就向議會提出修改國家公務員法的方案。這法案得到保守政黨的贊同，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經國會通過了。因此，剝奪國家公務員的爭議權和集體談判權的第二〇一號政令就完成了立法手續。這時候，社會黨幹部看到工人階級的激烈反對，於是放棄了它在與黨時代所親自製訂的原案，提出了僅僅保留集體談判權的修正案，仍想藉此維持它的工人政黨的招牌。但是沒有爭議權的集體談判權，就和沒有填入火藥的砲彈殼是一樣無意義的。於是在十二月，社會黨正統派議員放棄了社會黨整黨運動的念頭，並和國有鐵道工會的革新同盟，日本農民協會的正統派同志會等共同組成了名為勞動者農民黨（簡稱“勞農黨”）的這一在社會黨和共產黨之間的中間政黨。但是那些代表着國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深切不滿、以及意識到如果在國際和國內不以共產黨為中心就不能挽救民族命運的社會黨最左派和一時加入了勞農黨的人們，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起，當做所謂社（會黨）共（產黨）合作陸續參加了共產黨。於是右翼社會民主主

義的勢力一落千丈，而共產黨的勢力顯著增大了。

在這時期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甲級戰犯的審判結束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宣佈了判決。東條、廣田、土肥原、板垣、松井、武藤、木村七名被處以絞刑；木戶、平沼、荒木、小磯、島田、畑、白鳥、梅津等十六名被處以無期徒刑；東鄉茂德和重光葵分別被處以二十年和七年的徒刑。

連審判長韋勃也認為是在戰爭中曾起決定性作用的天皇、以及和天皇、軍部、政治家們同樣負有重要戰爭責任的壟斷資本家，竟無一人被起訴，因而也未受任何處分。其所以如此，正如美國的首席檢察官季楠的証言一樣，乃是出於美國的決定。雖然在這一點上使戰犯審判的反法西斯性質為之大大減色，但即使如此，這在當時仍不失為是對於企圖發動戰爭從事法西斯統治者的一大實際教育。

但是，這種實際教育却被統治階級完全相反地來利用了。在執行絞刑的翌日，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天皇大概是為了表示謝意，特別會晤了檢察官季楠。這時，天皇通過季楠，當面交給他一封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信中說：“我願為使美日關係達到最親密的程度而竭盡全力”（據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美聯社電）。這就是日本統治階級的“象徵”（指天皇——譯者），親自表明了他的買辦性質。並且就在同一天，美國政府以美軍總司令部司法局長的名義，發表甲級戰犯的处理業已結束，其餘被告一律釋放，表明了和日本舊統治階級攜手合作的態度。之後，戰犯不僅是接連地被釋放，且不久就到了戰犯被重用的時代。於是日本就不斷地向着殖民地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前進。而日本國民為了表示不滿，甚至作打油詩諷刺說：“所以東條說，我真是倒霉啊”。

## 第五章 走向战争的道路

### 第一節 道奇路線

#### 一 一月選舉与第三次吉田內閣的成立

在美軍總司令部所提出的憲法草案中，甚至还附有選舉法在內。日本保守勢力主張不把選舉法包含在憲法內，由於這一主張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同意，於是它們在法律上掌握了隨時可以修改選舉法的權限。日本保守勢力一方面宣傳議會政治即等於“民主主義”，另一方面則利用這種權限，每逢選舉時，就在選舉的前夕修改選舉法使其對自己有利。正如一九四七年四月選舉時曾修改選舉法一樣，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保守政黨在選舉前夕，以“端正選舉”為口號，在解散議會之前製訂了“選舉法特別條例”。其實這不過是假藉所謂“公營選舉”的名義來限制舉行競選演講會，並對於文字、圖畫加以禁止性的限制。“選舉法特別條例”，為了壓迫進步勢力，嚴格限制候選人發表競選演說的次數，幾乎使他們不能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和使用宣傳畫進行宣傳；另一方面，則把選舉前的拉攏、挨戶訪問以及黨棍活動等當做選舉運動的主要內容，也就是以所謂“地盤、招牌、皮包”這種勢力、情面和收買為主要武器來保證保守政黨的勝利。日本的報紙和廣播等根據這種情況，都預料選舉結果必然使保守政黨獲得壓倒的勝利，乃是當然的事情。

然而，打開投票箱一看，其結果却是出乎意料之外。原來僅有四位議員的共產黨獲得了投票總數的百分之十。當選了三十

五人，一躍而為四大政黨之一。共產黨不僅在大城市中都有當選者（許多是第一位），而且在中小城市和農村中也有許多人當選。這說明了共產黨不僅得到了工人階級的絕對擁護，而且也得到以中小工商業為首的城市居民和農村的中、小、貧農的擁護。也是共產黨本質上不同於其他政黨，共產黨始終不渝地進行日常鬥爭的結果，而它與政治上的腐敗毫無關係這一點同樣是起作用的。同時，中國人民解放北平、天津兩地的勝利，也大大地增加了日本人民必須而且能夠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與之相勾結的賣國勢力的信心，這也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標榜中間道路政治的民主黨、社會黨和國民協同黨是慘敗了。尤其是社會黨、從黨的領袖片山哲開始起，連同西尾末廣、加藤勘十、野溝勝、永江一夫、富吉榮二、島上善五郎等許多幹部都落選了。國民對於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幹部的叛變，不管它是社會黨的右派或是左派，均曾予以尖銳的批判。

一九四九年一月選舉結果（括弧內係一九四七年四月選舉的結果）如下：

	當選者數	得票比率
民主自由黨	264(131)	43.8(26.9)
民主黨	69(124)	15.8(25.0)
社會黨	48(143)	13.5(26.3)
共產黨	35( 4)	9.6 (3.7)
國民協同黨	14( 31)	3.4 (7.0)

中間道路政治所失去的選票，除為共產黨所得外，其餘都集中到了民主自由黨的手裏，民主自由黨成了絕對多數的第一大黨。其所以成為第一大黨有下述種種原因，即民主自由黨在被它的與黨稱為“五當三落”（花費五百萬日元的即可當選，花費三百萬日元的便落選）的這次選舉中，花費了巨額的資金；得到了法西斯的壟斷資本的積極支持；許多官僚因預見到美軍總部

的政策而大批地參加了該黨(如以後充任大臣的岡崎勝男、池田勇人、大橋武夫、吉武惠市和佐藤榮作等人都是在這時入的黨)；由於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許多農村都普遍地存在着“自耕農主義”；以及民主自由黨强有力的支柱——地主和富農在農村中確立了統治權。

儘管民主自由黨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是保守勢力却因為看到中間道路政治受到了人民的不信任以及看到共產黨的發展而動搖起來。雖然民主自由黨成了絕對多數的政黨，但還沒有建立單獨政權的信心，於是通過吉田茂來努力從事組織“强有力的保守聯合內閣”。民主黨內部的右派(代替蘆田而任總裁的犬養健一派)也展開了與此相呼应的活動。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吉田、犬養兩個總裁在進行會談中間，曾往訪麥克阿瑟。事後發表聲明稱：“鑒於國內外的形勢，準備以兩黨聯合來求得政治的安定”。這個聲明符合了美軍總司令部所執行的美國政策的要求。但是民主黨內部的反犬養派，在國內外對選舉後所產生的極端右傾內閣的反对輿論以及民族資本家雖然微弱但已開始表示反抗的壓力下，他們主張仍舊在野，因此民主黨終於分裂成為兩派。結果第三次吉田內閣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組成，除了自由黨的閣員外，民主黨犬養派(擁有議員三十四人)也有二人參加了內閣。

麥克阿瑟對民主自由黨的勝利甚為欣慰，他說：“自由世界的人們在亞洲歷史的重要關頭，對保守政治哲學給予明確而又具有決定性的信任，這個熱烈而又秩序井然的日本選舉是可以滿意的”，美國心目中所期望的日本“强有力的政府”，就是這個民主自由黨的政府。

## 二 九原則、道奇預算、索普建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國國務院和陸軍部發表公告，

將決定了日本國民經濟命運的經濟安定計劃付諸施行；次日，日本政府將麥克阿瑟致吉田首相的信件，和這個公告一併加以公佈。這個公告就是命令日本政府實行所謂“經濟安定九原則”，其目的是爲了規定單一匯率（見經濟安定九原則前言），它的方法是：（一）平衡預算；（二）加強稅收；（三）嚴格限制貸放資金；（四）“穩定”工資；（五）統制物價；（六）加強對外貿易和外匯管理；（七）改善物資分配制度以便增加出口；（八）增加重要國產原料和製成品的生產；（九）改善徵糧。

正如美軍總司令部所發表的特別文告中所指出那樣，這個計劃和五個月以前麥克阿瑟對蘆田內閣所提出的經濟安定十原則是“本質上相同的計劃”。但是，也有下列不同的地方：根據麥克阿瑟的信件，附有決不容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反對“九原則”的絕對條件；同時還特別警告日本，美國對日本的經濟援助將視日本執行“九原則”的程度如何而定。此外，美軍總司令部一開始就要求日本國民忍受窮困和不自由。麥克阿瑟的信件中說：“九原則要求日本人民在生活各方面更要勒緊腰帶，暫時放棄在自由社會中所賦予的特權和一部分自由”。

抽象地看，穩定經濟應該是人人所願望的，九原則也好像是很有道理，但問題却在於是誰和爲誰來穩定經濟。美軍總司令部早在事先即已交代清楚，它要求“更加勒緊腰帶”和“放棄特權和一部分自由”。也就是說，九原則的具體內容是在世界經濟範圍內，使日本經濟成爲美元的附庸（見經濟安定九原則的前言）。於是要：（一）從人民手中榨取重稅（第二項）；（二）維持低廉工資（第四項）；（三）對農民加強徵購糧食（第九項）；（四）加強榨取全國人民的勞動（第八項）；（五）設法保證外債和外國資本的安全（第一項）；（六）用上述方法所獲得的資金只能借給美軍總司令部所同意的巨大壟斷資本（第三項）；（七）壓低米價，統制物價，以保證美、日壟斷資本製品獲取最高利潤（第五項）；（八）通過日

本政府來加強美軍總司令部對貿易的管理(第六項);(九)集中資材,以增加美軍總司令部所同意的輸出(第七項)。

美軍總司令部不只是頒發了指令,而且还親自加以執行。

爲了鎮壓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急劇高漲起來的勞動攻勢,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在“九原則”公佈的前夕發表了所謂工資三原則,即:(一)禁止提高工資,以免影響物價;(二)不准貸款給爲支付工資而負債的企業;(三)爲上述目的亦不准支付政府補助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個以保持低工資爲目的的三原則是美軍總司令部一致認爲所有企業部門都應遵守的原則。與發表九原則的同時,黑伯萊對當時正在進行罷工的日本電氣產業工會、日本煤礦工會同盟、全國煤礦工會、全國海員工會、私營鐵道工會總聯合會、全國金屬產業工會、全國纖維產業工會同盟等重要工會,發出了立即停止罷工的強硬命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接着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美軍總司令部命令日本政府公布外匯管理法以及其他有關管理貿易和外匯的各種法律。儘管它們解釋說這些法律是爲了擴大私營“貿易的自由”,但實際上其目的是爲了外國銀行和外國貿易商人好“自由地”控制日本的貿易,並且也是爲了擴大與它們相勾結的日本大貿易資本家(屬於前日本三井物產系統和前三菱商事系統之類的公司)的“自由”活動的範圍。事實證明,儘管說是“自由”貿易,但是貿易商却受到了和戰時同樣的統制,貿易商在輸出和輸入各項物資時,必須在規定的範圍內領取政府批准的外匯。尤其是取得輸入用的外匯時,須繳納百分之五十的押金。這個條件只是有利於壟斷資本的。同時,除美日貿易外,和其他各國之間的貿易則採取“協定貿易”的方式。所謂“協定”正如後來所簽訂的日英貿易協定那樣,代表日本的不是日本政府,而是由美軍總司令部“代表”日本和對方國家代表簽訂的。日本政府沒有任何發言



權，只有忠實履行業已簽定了的“協定”的義務，這是把日本完全視爲殖民地的貿易協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通商產業省政務次官官幡在衆議院通商產業委員會上的答辯）。

但是，九原則中不僅包含着經濟上的附庸性，甚至還具有更加重要的軍事意義，這一點，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華北和華東的同時不得不迅速表現出來。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美國陸軍部長羅雅爾率領代理陸軍參謀長兼計劃作戰處長魏德邁和任命爲公使銜麥克阿瑟最高財政顧問的底特律銀行總經理道奇（前美國銀行協會會長）等人赴日，他們與美軍總司令部首要分子就對日政策進行了重要的討論，並於視察了日本和南朝鮮的軍備情況後才歸去。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國經濟危機的徵象更加緊迫了，因而極度加強了九原則所具有的掠奪性。

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道奇公使發表的聲明稱：爲了日本經濟的“自立和穩定”，必須撤除曾經作爲日本經濟支柱的美援與日本政府的各種補助金，日本必須用自己的兩隻腳來走路。

正如我們在下面將要詳細談到的那樣，所謂“自立”就是意味着：一面既要盡量削減美援，另一方面又要使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美國；所謂“穩定”則是以這種“自立”爲先決條件，藉使美國資本及其附庸的日本壟斷資本能獲得“穩定”的高額利潤。

麥克阿瑟早已宣佈過，美國的“援助”並不是“慈善”，而是確保“美國取得日本資產的優先權”。道奇自己也對日本國民說過：“和日本國民一樣，美國公民是不願意爲援助日本而繳稅的”（見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聲明）。但是他在一九五〇年對美國下院提出証言時却說：對日援助的主要項目是糧食和棉花，這些“都是剩餘物資”；“因此，對日援助計劃的實際費用主要是這類剩餘物資。在一九五一年度對日經濟援助的總額中，有百分之八十七是用於購買美國剩餘物資的”；“尤其明顯而又重要的是，

本年度（指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度——譯者）撥付給日本的援助比日本支付給佔領軍的費用（這個預算是道奇公使編製的——作者）還要少。本年度美國要求從佔領地區救濟資金內撥給的對日援助額為二億七千一百萬美元，與之相比，日本政府支付給佔領軍的款額將為二億九千七百萬美元。日本政府支付給美國佔領軍的這筆錢，如果按照國防省的軍事預算則需要三億四千五百萬美元”，對日援助“比其他地區是更為有利可圖的”，“沒有任何國家用如此少量的援助而能換得如此多的東西”（道奇向衆議院歲出委員會提出的聲明及井上、宇佐美：“危機中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結構”）。

所謂“穩定”並不意味着日本國民生活的穩定。在答覆新聞記者提出“由於撤除美援和日本政府的各種補助金將會使失業和破產達到怎樣的程度”的質問時，道奇說：“九原則是一個合理的計劃，必要時將予以隨機應變的調整。至於失業問題，有了失業者時再解決”，這表示他沒有考慮到失業和破產的問題（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朝日新聞”）。正如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道奇第二次聲明中所說明的，“穩定”的目的僅在於“為了有效地使用美國政府撥充用以復興日本經濟的資金來確立健全的基礎”。

日本政府雖也懂得了美國政府所要求的並不是日本那種遲遲不前的“復興”，而是迅速的“自立和穩定”；但是日本政府還不能領會到文字以外所包含的具體內容。所以第三次吉田內閣自以為按照了九原則和道奇第一次聲明而數次草擬的一九四九年度預算案全部被美軍總司令部徹底否定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道奇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美軍總司令部編製的內定預算案。這個預算案以係根據絕對命令的九原則所編製為理由，就原封不動地當做日本政府的預算案，且不准國會修改而予以通過了。

這個美國製的一九四九年度預算的第一個特徵是，它公開

地加強和確立了美國資本對日本財政經濟的控制。在“均衡預算”的名義下，爲了“確立有效地運用美國資本的健全基礎”，竟把支出作了慘無人道的削減。例如在歲出方面的一般會計項下裁員百分之三十，特別會計項下裁員百分之二十；失業對策費削減爲前一年的百分之一；至於爲實施六三學制而編製的建築校舍的預算，則乾脆完全勾銷了。在歲入方面，儘管通貨膨脹引起了物價的高漲，但稅率並未降低，歲入的百分之六十三即取自稅收。爲了強制實行事實上的大規模的增稅，大量增加徵稅費和司法警察費，嚴厲地進行徵稅。這是早就佈置好了一種掠奪國民的預算。

新設立的“對日援助對等資金特別會計”就是這個特徵的典型的表現。正如道奇所說明的，這與馬歇爾計劃在歐洲各國所設立的對等資金賬目具有同樣的性質。日本政府有義務將變賣對日援助物資的款項作爲“對等資金特別會計”賬目加以儲存，如售價低於進口價格時，即以日本稅收補充其差額。該款的用途“置於最高司令官的管理之下”，主要用於償還國債和“直接而迅速有利於復興經濟的資本的投資”。但是一九四九年度道奇預算，爲了設置一千七百五十億日元的對等資金特別會計，竟從一般會計項下撥出了一千零八十三億日元的結餘金和輸入補助費（亦即國民的稅金）列入貿易特別會計。“換句話說，所謂一千七百五十億日元的特別會計並非別的，它不是外國的贈與，而大部份是以國民稅金設置的”（風早八十二：“戰後國家財政的實況分析”）。與設置這個對等資金特別會計同時，廢止了復興金融公庫。因此，在戰後喪失了金融能力的日本資本主義，只得被迫以對等資金爲其唯一的基本貸款來源。結果，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以剩餘物資爲誘餌，強力地無代價地掠奪了日本國民的稅金，並以這筆主要來自稅金的資本用作償還外債以及對美國認爲重要的工業進行投資，從而確保其利潤並建立了控制整個日本經濟

力量的財政制度。這與業已規定的貿易管理制度相配合，就基本上完成了使日本資本主義徹底隸屬於美國的機構。

道奇路綫的第二個特徵是在於它是被隱蔽了的軍事預算。首先，撤消政府補助金的原則並不適用於輸入補助金和價格調整費等項目，例如價格調整費達二千零三十二億日元（佔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八·七，一九四八年度為百分之一三·二），為一九四八年度的三倍以上。這是為了要發展價格調整費所集中扶植的鋼鐵、煤炭、肥料（火藥）、非鐵金屬、蘇打等潛在軍事工業的緣故。而且沒有舉出什麼理由，一下子把價格調整費和戰爭結束處理費編製了十三個月分的預算，這就只能把它看作是軍事預備費了。特別是對等資金不同於一般信用貸款和其他貸款，因為它只能對美國政府所希望的工業即軍事產業集中投資，這並不是“援助”一般的“遠東工廠”和一般的日本壟斷資本，只是給予“遠東兵工廠”和補充美國軍事產業的日本壟斷資本的“援助”。實際上，從對各產業的貸款先後次序來看，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次序是煤炭、電力、化學、機械、纖維；而對等資金一年間的貸款次序則是電力、造船、煤炭、鋼鐵、化學；對纖維產業等部門則完全沒有投資。此外，對等資金也向公營企業的國營鐵路和通信設施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如果仔細地按月份來看，值得注意的是，對等資金貸款的重點隨着朝鮮戰爭的逼近已放在電力、造船、通信、交通等直接軍事生產的部門。這顯示了附庸地位的軍事產業的特徵，即貸款的次序是隨時變動的，因而也是不固定的。

據美方公布，九原則以及具體執行九原則的所謂道奇路綫，都以制定美日單一匯率為其重要的目的。即必須使日元在國際經濟市場上附屬於美元。由於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被削弱，使得截至一九四九年為止，各種商品的進出口外匯率並不一致，其間的差別大約從一美元折合一百五十日元到一美元折合六百日

元左右。如果不這樣，工業就勢必要發生混亂，特別是經營出口工業的中小廠商不能避免虧蝕；因此，對道奇預算感到驚慌的資本家，還樂觀地以為不會在剛剛開始實施九原則時，就強迫日本實行單一匯率。然而，美國經濟恐慌的發展使美國政府急於強迫實行單一匯率。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美軍總司令部公布了一美元折合三百六十日元的單一匯率，並於第三天開始實施。從進口方面來看，這個牌價比當時進口貨的平均匯率（一美元折合三百三十日元）約略貶低了百分之十，這樣就使得進口貨也隨着上漲了百分之十。我們不要忘記日本是一個入超很大的國家，道奇預算明顯地為日本國民規定了這項負擔，預先在歲出中編製了一千億日元以上的輸入補助金。總之，美國的經濟恐慌負擔是如願以償地轉嫁給日本國民了。再從出口方面來看，中小廠商的大部分產品，如果不按一美元折合四百日元以上的匯率出口就要蝕本，因此，這個匯率就勢必要使中小企業破產，使中小企業的工人失業。但是，這個匯率僅僅有利於紡織業等巨大資本的出口。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經濟在犧牲勞動人民和中小企業（不包括壟斷資本）的基礎上，被強制地引入世界經濟內變為美元所指揮的小卒。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美國政府片面通知遠東委員會會員國，決定停止拆遷作為臨時賠償的工廠設備（佔原計劃賠償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從而愈益加強了道奇路綫的軍事性。因此，八百四十五所軍需工廠（計有：前陸海軍兵工廠九十六所，飛機工廠三百零一所，私營軍需工廠一百七十八所）沒有被拆運至國外，其後不久，這些工廠便被陸續地取消了“指充賠償工廠”的名稱，而開始進行軍需生產了（一九四九年“朝日經濟年史”）。

索普<sup>①</sup>的稅制改革進一步加強了道奇路綫的掠奪性。一九四九年五月，索普博士為了製訂道奇所沒有完成的稅制改革而來到日本，於九月十五日發表了稅制改革的建議案。

第一，這個建議案以“積累資金”為理由，公開地廢除了公司的过分利得稅，准許資產的重新估價（按照通貨膨脹上漲的程度對資產進行估價），僅徵收其中的百分之六作為估價利益金，並進而廢除了對高額收入的累進課稅。對三十萬日元（在戰前這是免稅點）以上所得金額的課稅率一律規定為百分之五十五。這樣一來，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高額收入者的納稅是很輕的，因而又決定對富人徵收所謂富裕稅的新稅，藉以掩飾這種不公平的措施，但是這種稅也只不過是無足輕重的名義上的賦稅，稅率低得驚人，僅百分之零點三到百分之三。估計可能收到的稅額也不過是二十億日元而已。減少對富人的課稅，又要維持原來的歲收，這就必然要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勞動所得的基本的免稅額降低了，除娛樂稅以外的一切大眾課稅都增加了。索普建議所吹噓的“稅收負擔的公正”，只是有利壟斷資本的“公正”，即給了勞動者以基本的免稅額，也必須給公司和股東以基本的免稅額。

第二，為了“加強地方財政”，索普建議案把居民稅增加了兩倍，取消了以資產為基準的課稅法，並開始採取了按人口和收入為比例的課稅，此外又設立了各種地方稅，並增加了各種地方稅的稅額。特別是設立了包括原來的地租、房屋稅在內的固定資產稅，把稅收一下子增加了五倍。它認為這將能減少地方的許多捐款，從而能夠增加四百億日元的稅收，這就是增加上述各項課稅的根據。它又吹噓說，全部計算起來，可減稅二百億日元。因此，如果捐款不一下子減少到原來的三分之一，租稅就絲毫也談不上有了什麼減輕。然而，捐款究竟有沒有絲毫的減少

---

⊖ 索普 (Carl S. Shoup) 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率領“稅制代表團”赴日，他所發表的建議案，是旨在戒斷日本人民強迫吉田政府執行其搜括日本人民的一道法令。吉田政府根據這一法令在第七次國會修改了日本稅法，在第八次國會修改了地方稅。——譯者

呢？如果沒有什麼減少，那就是大量的增稅。而且“加強地方財政”毫無鞏固地方自治的意圖。用平衡津貼制度來代替從前的地方附加稅，反而是加強了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單位的控制。稅制本身既然不能規定稅收的用途，但是索普建議案却是輕而易舉地實現了和殖民地時代的印度財政制度極為相似的財政體系。該建議案把原來應由中央政府國費負擔的直接有關國民生活的支出，如實施六三學制以及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事業的費用，轉由地方財政負擔，而將中央財政集中於軍事、警察的開支。

第三，索普建議案以“稅制近代化”“改善徵稅事務”為藉口，增加了易於徵收的大眾賦稅，並把對勞動人民的徵稅方法改為源泉賦稅（對工人從工資中，對農民從徵購糧食價款中直接扣除源泉賦稅，而相反對股東的紅利則不徵收源泉賦稅），加強會計師制度，增加稅務人員的名額，用以鼓勵大資本家的公開漏稅。另一方面則“建議”成立能夠簡便而又嚴格的向工人、農民以及中小工商業徵稅的機構。

上述九原則的具體化和道奇路線的發展是受到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的美國經濟恐慌的影響的，它使日本經濟陷於極為深刻的恐慌狀態，導致國民生活的破產。九原則預先向人民要求的“把腰帶勒得更緊”和“放棄自由”名副其實地實現了。從而產生了物價跌落、購買力減少、貿易下降、滯貨激增、中小企業破產、不付工資、失業者增多以及農村經濟的破產等現象。

### 三 第三次吉田內閣與反動勢力

資產階級政黨不僅最後不會遵守在選舉時對國民的諾言的政策，而且一開始就根本沒有想到要遵守它，這就是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但像日本民主自由黨那樣徹頭徹尾地毀壞選舉諾言

的政党則是絕無僅有的。

民主自由党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後，就完全撕毀了它在選舉當時曾向國民各階層所提出的各種政策——廢除統制，緩和銀根，取消交易額稅，振興中小企業，自由銷售徵購後的餘糧，救濟災害，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資，提高婦女文化水平以及改善家庭日用品的配給制度等等。民主自由党甚至連親手編製預算的重要工作也放棄了。它還以“沒有想到九原則是那樣的苛刻”或“沒有領會到道奇路綫的真正意圖”來進行辯解。如果是那樣的話，就應該乾脆地對國民承認自己的估計錯誤，那才不愧是公正的政党。然而自提出道奇預算以來，在三月至四月之間，不僅在野党中間，就是在民主自由党的一部分人中間，也對完全不實行選舉諾言日益感覺不滿。因而引起了所謂不履行諾言的問題。

以吉田茂為首的民主自由党幹部，從一開始就把選舉諾言看作是騙取國民選票的一種宣傳。在公布民主自由党獲得了絕對多數的消息的同時，代表最反動的壟斷資本的日本銀行總裁一萬田發表談話說：“民主自由党沒有必要拘泥於原來的政策（即選舉諾言），應當堅決實行九原則”，以鼓吹放棄諾言。事實上，由於吉田內閣在無限忠誠地執行了美國命令的同時，並推行了日本壟斷資本本身所要求於日本國民的“勒緊腰帶”和“放棄自由”的政策，因而更形加強了九原則和道奇路綫所加諸日本國民的“進一步的勒緊腰帶”和“放棄自由”，使日本國民陷於窮困和毫無權利的深淵中。

取得絕對多數的民主自由党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撤銷了“非法財產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成立了“特別考查委員會”。後者除了繼承前者的任務外，並企圖調查“妨礙重建日本的行爲”，將旨在檢舉腐化政治的委員會，一變而為進攻民主主義運動和共產黨的委員會，而改變了



它的性質。民主自由党用这种方法防止了統治階級腐朽情况的被揭露，同時也取得了鎮壓民主主義者的一种工具。

第三次吉田內閣於一九四九年三月末提出了臨時預算，開始施政。爲了必須根據道奇的授意重新編製預算，便向國會提出了半個月的臨時預算。正如共產黨議員志賀義雄所指出的那樣，這個臨時預算在手續上是極其違反憲法的，因爲它是根據當時尚在國會進行審查討論中的財政法（因而還不是法律）而編製的。吉田內閣不是遵守憲法依靠國民的絕大多數，而只是依靠“皮包、招牌、地盤”這類收買和情面關係取得國會中的絕對多數，強行通過了這個臨時預算。

接着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吉田內閣未經提交正在開會中的國會加以討論，便擅自公布了“團體等規正令”這一所謂波茨坦政令（等於戰前的敕令）。這是將規定取締右派團體和軍國主義分子的一九四六年的第一〇一號敕令加以修改的，用以處罰“助長主張暴力主義方法的傾向或使之合法化”的團體和個人。從法務廳特別審查局（簡稱特審）的機構的調整，並新設立了專事調查左派團體的第四科這一事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法令是以共產黨爲中心的左派爲其對象的。這個法令賦予法務總裁這一行政官吏以判定是否爲“暴力主義”的權利。因此，政府不僅對共產黨，而且對它想要彈壓的任何個人或團體，隨時都可以隨心所欲地予以處分。一個行政官的意志可以一舉剝奪言論、出版、集會、思想的自由等各項基本人權。正因爲這個法令是法西斯主義獨一無二的好武器，所以吉田內閣懼怕人民的反對，不敢提交國會而倚仗美軍總司令部的權勢，公佈了這個法令。一九五二年因爲這個法令將隨對日“和約”的生效而失效，所以吉田內閣在一九五二年製造史無前例的、野蠻的五一事件，使“防止破壞活動法”獲得通過，以便使此項法令合法化。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與美國政府簽訂的所謂處理阿波丸請

求賠償的協定，赤裸裸地暴露了吉田內閣的法西斯買辦性。阿波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載運俘虜的日本船隻，根據國際協定是不能作為進攻對象的，該船在業已通知美國政府的航線中航行時，為美軍所擊沉。很明顯的，美軍是不對的，因此，美國政府在戰爭結束後也不得不承認日本要求賠償損失的權利。但是，第三次吉田內閣却突然簽訂了這個無條件地放棄請求賠償損失的協定。而它的理由則是日本在戰爭結束後接受美國政府的“直接和間接的援助過多”了。我們曾經再三分析了這種“援助”的性質。吉田政府明確地承認“援助”是債務，並且恭順地在該協定附帶的“了解事項”中，承認“佔領費以及自日本投降以來美國政府貸與日本的貸款以及信用貸款，是日本對美國的有效債務。這些債務只有經過美國政府的同意方得減少”。不用說，這個協定是背着國民而締結的，也沒有提交國會審議。首先，在佔領下的日本是沒有權利與外國簽訂外交協定的，首相吉田茂不惜蹂躪日本憲法和國際法，把日本的權利出賣給外國，因此他認為外交必須是秘密的，並親自兼任了外交部長。

所有這些政治措施，與其說是出乎民主自由黨或吉田內閣的意見，還不如說大部分是順從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而製訂的。它們雖然也互通聲氣，但是，相反地，民主自由黨或吉田內閣所特有的反動性，有許多地方甚至是超過了美軍總司令部的。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整肅”松本治一郎的問題上，正如根據不容置疑的證據業已證明的那樣，是吉田茂討厭松本治一郎的存在，所以直接懇求麥克阿瑟，無理地硬把整肅令套在他的身上。松本治一郎是一個長期站在解放部落<sup>⊖</sup>運動最前列的社會黨中最左翼的一分子，他在擔任參議院副議長時曾拒絕向天皇鞠躬（“中央公論”雜誌，一九五二年四月號正木昊所著文章）。

⊖ 部落是受差別待遇的日本“國民”。——譯者

可以這樣說，特別是在擁護壟斷資本和壓迫工人運動上，吉田政府甚至比美軍總司令部更為露骨。

當公布九原則的時候，日本銀行總裁一萬田立即發表談話說：“根據這個（即九原則）我們必須首先考慮穩定工資的對策，而目前已到了必須直接管制的階段了”。他希望進一步執行美軍司令總部以三原則為中心的對工資的間接管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日本經濟新聞”）。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在第三次吉田內閣成立的那天，發表了對新內閣的意見書，要求吉田內閣為了“穩定經濟”，“經濟政策應廣泛地積極地反映經濟界的意見”；“特別是勞工政策應以高度熱情”實行（一）直接管制工資，（二）企業合理化和行政整理徹底實施（“失業的發生是必然的”）及（三）勞資協調（工會的“民主化”，強制裁決等）。

民主自由黨無限忠誠地順從了壟斷資本的這些要求。吉田內閣利用美軍總司令部的政策，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恢復了證券市場，五月連只在形式上妨礙壟斷的禁止壟斷法也加以修改，使其完全失去作用；六月頒佈了日本銀行法，加強日本銀行和私營銀行以及私營工業間的聯繫，“積極地反映了經濟界的意見”。

在勞工政策方面，首先向美軍總司令部提出了強硬的直接統制工資的政策，要求規定最高工資。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認為九原則已使物價開始下降，最高工資制度反將導致高額工資制度，沒有同意吉田內閣的意見。最後，三月間決定繼續維持間接統制政策。此外，民主自由黨在一九四九年初即開始進行了修改勞工法規的交涉，要求對美軍總司令部提出的第一次草案和第二次草案大加補充；如爭議的強制調停制，罷工預告制，“禁止喧囂的集體談判”，禁止一切政治罷工和同情罷工等等。日本資本家的這些異常露骨的要求，甚至使得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都感到躊躇。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在工人階級一致反對修改勞

工法規運動的面前，不敢完全同意民主自由黨的要求。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美軍總司令部終於提出了它的最後方案，它被作為日本政府的方案提交國會，而於五月二十二日獲得國會的通過（勞動行政研究所編：“現代勞工運動的實況”）。這個“工會法”和“勞動關係調整法”的修改，雖未落到最壞的結果，但是已經嚴重地蹂躪了工人的基本人權。在“確立民主性和自主性”的藉口下，工會需要取得政府的批准，這是與民主性、自主性恰巧相反的。同時，政府加強了以資本家為本位的調停委員會的權利；擁有任意指定“公共事業”範圍的權利，來當做鎮壓工人運動最有力量的手段。於是這就建立了对一切產業部門的工人運動可以在“維護公共福利”的藉口下進行管制的體系。

吉田內閣在製訂這些法西斯法案的同時，又以全力來進行解僱工人。事實上，民主自由黨所履行的公約，除了“修改勞工法規”（改得更壞）外，還有“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解僱工人）、“撤銷交易稅額”（但是却增添了超過撤銷額以上的新稅，並實行了增稅）。強制實行九原則和道奇路綫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政策有助於解雇的執行，而解雇是作為確立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手段來強制推行的。所以這就與站在反法西斯最前列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發生了正面的衝突。

## 第二節 三鷹、松川事件

### 一 企業整頓、行政整理

如同片山哲任首相時所說的“政府正在考慮堅決進行行政機構的改革，作為促進一般企業健全化的榜樣”（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衆議院全體會議上的發言），所以片山和蘆田的中間道路內閣藉口“產業合理化”和“企業整頓”，大力進行了私營企業工人的解雇，或者藉口“行政整理”解僱國營企業的工人為

私營產業樹立模範。但是這些措施遭到了工人階級的強烈反擊，“行政整理”遭到完全失敗了，“企業整頓”也幾乎無法實現。

然而，由於生產集中的進展和重稅的壓迫，使中小企業陷入危機，從一九四八年夏季起，發生了工資的遲發和欠發等現象；從同年秋季起，就以營業不佳為理由開始解雇工人。根據經濟安定本部的調查，一九四八年六大都市倒閉的企業數達一百五十八家，被解雇的工人達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一人。

一九四九年吉田內閣所進行的“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也都是出於日美壟斷資本的要求，但是由於實行九原則以及資本家利用這個機會所採取的毫不掩飾的進攻，其規模、方法及其結果，和中間道路內閣時代的情況相比，是表現得更為殘酷了。

由於以九原則為基礎所產生的政府貸放資金的縮小、政府有計劃地延期付款，以及銀行資本的資金收縮，首先使中小企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因而，工資的遲發、欠薪等現象波及到所有的產業部門，不發工資的現象，從一九四九年三月起有了激劇的增加，連勞動基準局的調查也顯示了如下的龐大的數字：自一九四九年二月起至十二月止，不發工資的事件有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一件，金額達八十五億七千萬日元。勞動基準局本身也承認這個數字只是實際數字的一部分，實際數字當比這高出數倍或數十倍，事實上不發生遲發或欠發現象的經營部門是幾乎沒有的。不僅如此，從一九四九年三月開始被迫倒閉、停工或減產的企業急劇地增加了，此後，一個月的數字就超過了一九四八年一年的數字。據勞動職業安全局的顯然縮小了的估計，自一九四九年二月起，至十二月止，由於企業的倒閉、緊縮而被犧牲的人數達四十三萬五千人，因此，估計至少當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被拋棄於街頭（一九五一年“日本勞動年鑑”）。

這種大規模的企業整頓，如同一九四八年的情形一樣，大半是集中於中小企業的。一九四九年度企業整頓的特徵是：壟斷

資本利用企業整頓的浪頭，在大企業部門也進行了大規模的人員整頓。大同製鋼廠從八千人中解雇了三千人，日本電氣公司從一萬人中解雇了三千五百人，沖電氣公司從六千七百人中解雇了二千八百人，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從二萬二千人中解雇了四千五百人。解雇人數之多，除了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時代以外，在日本是史無前例的。值得注意的是，實行人員整頓的範圍是以電氣通信、鋼鐵、車輛、化學等為中心的部門而進行的。因為這些舊軍事產業部門如果原封不動，是不能發揮作為附屬於美國資本的軍事產業的作用的。解雇是以“企業的虧耗”為藉口的。實際上，如果剷除了由於戰時和戰後的通貨膨脹所引致的所謂“虛構資本”<sup>⊖</sup>不僅不該是“虧耗”，就是把工資提高二倍或三倍也還是賺錢的。但是，日本壟斷資本一面保持原來的戰爭利潤（戰後把戰爭時期所受到的損害轉移到一般國民身上），一面又計劃重新調整自己，以期依靠美國的備戰政策，追逐新的戰爭利潤。

這個大規模的企業整頓是在美軍總司令部、吉田內閣、保守政黨以及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積極援助下進行的。美軍總司令部和吉田內閣所策劃的勞工法規的修改和行政整理的計劃是與企業整頓一併進行的。美軍總司令部對於重要產業的罷工會嚴令加以禁止（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月禁止煤業的罷工和三月禁止海員的罷工等）。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對於以“產別”系工會為中心而進行的反對修改勞工法規的運動曾發出強硬的禁止命令（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通告管“產別”議長）。接着福井、大阪、靜岡、新潟、滋賀、石川等各府、縣實施了公安條例，另有數十個市、町、村也相繼發出了同樣目的的法令

<sup>⊖</sup> 這是指股票持有者對公司的投資，一方面轉化為產業資本，另一方面股票即帶有貨幣資本的性質，成為買賣的對象。因此股票買賣時的上漲價格就是所謂“虛構資本”。——譯者

(約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初至五月底之間)。

爲了幫助大選時受到了國民徹底批判的社會黨，一切反共勢力都向社會黨伸出了援助之手，諸如上自吉田首相在總選舉後發表了希望社會黨重整旗鼓的談話，下至民主化同盟幹部星加、菊川、細谷等人的加入社會黨(二月)，以及日本勞工運動中最惡劣的叛徒佐野、鍋山、三田村等的聯合。社會黨幹部好像爲了符合這些期望似地，發表了對企業整頓的“鬥爭”方針，認爲基於九原則的企業整頓是必要的，只是反對吉田內閣的做法，即反對必須“採取重點生產方式的經濟恢復政策”。此外，高野、武藤、加藤、細谷等日本工會總同盟和民主化同盟的幹部則與以水野成夫、工藤昭四郎等爲中心的“進步的”(以分裂勞工運動爲得計)資本家團體“經濟同友會”合作，成立了以推進勞資協調爲基礎的“合理的經濟施策”的“經濟再建中央會議”(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主持的“勞資協議會”上，主持人、經濟科學局長馬貴特曾說：“現在是勞資攜手並進的時候了。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企業整頓所引起的打擊是勢所難免的”。這難道不就是忠實地按照了這些話而行動的嗎？於是在這些權力及一切反共勢力，特別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援助下，對工人階級強制實行了日本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有意識的企業整頓。

這種企業整頓的殘酷程度，由於道奇預算而愈益加重了。連吉田內閣也估計到包括行政整理在內將出現一百八十八萬人的失業者，認爲其中一百五十三萬人需要救濟，至少需要失業對策費一千億日元。可是道奇預算却盡量削了又削，減到八億零八百萬日元(不及預算的百分之一)。這就是道奇曾經說過的“失業問題，有了失業者時再解決”的具體答覆。這就等於說儘管你被解雇，生命我可不能保證。吉田內閣因違背了它的“周全的失業對策”、“實現大規模的公共事業”等在大選時的補充諾

言，生存了道奇預算，實行了使數百萬日本人（包括家屬在內）走頭無路的政策，從而赤裸裸地暴露了吉田內閣的毀滅民族的本質。

## 二 保衛民族產業的鬥爭

一九四九年年初，日本工人階級面臨到戰後最嚴重的危機。工資因遲發、欠發和不發而大大降低了。年底鬥爭以來禁止罷工的命令鎮壓着他們的對抗。要想突破這個命令繼續進行鬥爭，資本家則又開始了它的企業整頓、行政整理以及修改勞工法規等的全面攻勢。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工人，如果僅在本企業單位內進行鬥爭，則只有與經營者一道成爲壟斷資本的犧牲品。在政治上和階級意識上日益前進的工人階級，遇到了如此急劇不利的情況，也只好暫時退守了。

面對着這個危機，傾全力來制止日本全面法西斯化的是共產黨。在選舉中獲得了十分之一的國民的支持的共產黨，選舉後向社會黨和勞農黨提出了統一行動的綱領，這個綱領包括反對行政整理、企業整頓、反對修改勞工法規，救濟中小企業和及早締結和約等十三項目（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這個綱領被拒絕之後，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五、六日召開了中央委員會，決定通過反對修改勞工法規，反對行政整理、企業整頓等運動，把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結合起來，並製定了對地方自治單位的共同綱領，傾全黨的努力爭取成立由下而上的民主民族統一戰綫。共產黨鑒於九原則和企業整頓的被強制實行，各民族產業迅速地受到了破壞，即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發表宣言，號召以工人階級爲核心，團結農民、中小企業和包括民族資本在內的各階級，爲保衛民族產業而共同鬥爭。

由於這些指導形勢開始有了改變。以“產別”系統的工會爲中心，日本工會總同盟，日本工會會議等的下層工會也都捲入了



反对修改勞工法規的鬥爭。這些鬥爭雖然受到了美軍總司令部的禁止，但是，努力於把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統一起來的全國金屬產業工會、全日本電線工業工會等各工會，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參加者達三十萬人的、事實上即是反对修改勞工法規的罷工。擁護受害者（指被解雇的人——譯者）的鬥爭和反对企業整頓的鬥爭與職業安定所工人的鬥爭相結合，發展成爲戰後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失業的鬥爭。並且，保衛民族產業的呼聲，受到了因九原則而被陷入危機的各階級的歡迎，各企業單位則以工會爲中心，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召開了保衛通信（指通訊企業——譯者）會議，五月召開了煤炭產業會議等。從地區來看，即在地方財政因道奇路綫而瀕於危機的情況下（認爲財政危機不可挽救而辭職的市、町、村長，截至五月底止數達二千一百七十九人，佔全國市、町、村長的百分之二十），大垣市議会对日本電氣工廠的倒閉、富山市議会对保土谷化學廠的緊縮，都發表了反对的決議，保衛（東）京、（橫）濱的會議也成立了，這樣，就開始踏進了全國性的保衛民族產業的鬥爭的方向，一時低落的工人運動進入四月、五月後逐漸地高漲起來了，參加五月罷工的人數計達五十三萬人，勞動日的損失達二百三十萬日，爲戰後第二位。

壟斷資本強制實行企業整頓的企圖，受到了工人的反擊而開始被粉碎了。特別是東京芝浦電氣公司的企業整頓，一九四八年十月解雇了一萬人，開了大企業的企業整頓的先例。它是“產別”系工會中最富有戰鬥性的工會爲對象的，所以壟斷資本竭力動員了美軍總司令部、警察、民主化同盟、復興金融公庫、帝國銀行以及股份公司整理委員會等一切反对工人的組織；儘管如此，但由於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工會联合会進行了合理的（一個人也不解雇而公司仍有盈餘）恢復計劃和井然不紊的生產管理鬥爭，給壟斷資本以反擊。雖然警察隊曾用暴力接收了該公

司的加茂、川岸兩個工廠（大部分是女工），但也受到了包括農民、市民在內的保衛地方產業鬥爭的反抗。東京芝浦電氣公司經理以及經營人員們雖曾自豪地說過：“截至四月底止要裁減四千人”，但是事實上却連一個人也未能解雇而終於在四月底退却了，一直到七月為止，負有經營責任的財界代表們連企業整頓的方案也未能提出。

日本國內外的壟斷資本爲了替私營企業的整頓鋪平道路，必須迅速強制實行行政整理，裁減公營企業的職員和工人。這種行政整理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殘酷計劃，它按照道奇路線計劃在一般會計項下一次就裁減人員百分之三十，在特別會計項下裁減人員百分之二十，共計裁減四十二萬人。這顯然是要引起反對的。因爲職員被無故免職時還保有要求重新審查的權利，官營企業工人還保有集體談判權和請求調整處理爭執的權利。

爲了對付上述情況，日本政府與美軍總司令部進行協議之後，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向國會提出了名爲定員法的法案。它規定“爲了順利地實行這一次的行政整理”（爲了壓抑反對運動），暫時停止官吏和公營企業工人所享受的上述權利。同時“因爲必須實行平衡預算（在道奇預算的範圍內）”，不能按照正規數額支付退職津貼，因此將根據不經過國會議決的政令（美軍總部的命令）而實行。就這樣依仗美國佔領軍的勢力，不僅蹂躪了承認國民生存權和集體談判權的憲法，甚至連被修改得更壞的國家公務員法和惡劣的公共企業勞動關係法也給違背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國會通過了定員法，並規定自六月一日施行。於是日本政府的裁員工作遂告完成。

但是，這個道奇路線的中心立法並爲行政整理最好武器的定員法，吉田內閣却未能立即付諸實行。因爲站在吉田內閣面前的是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陣營，還有支持工人階級並開始進

行反抗道奇路綫所導致的民族危机的各階層人民，更有在民族的不滿情緒中迅速擴大了領導力量的共產黨勢力阻擋着它的進路。

道奇路綫導致國民生活的破壞，產生了國民廣大階層与壟斷資本的对立。鎮压的加强反而使國民鬥爭帶上了民族抵抗的色彩。一九四九年三月的禁止反徵稅鬥爭的命令受到了鬥爭中的中小工商業家的反擊，他們以爭取公正課稅鬥爭的形式，展開了反对一切强行徵稅的权力的活動。禁止对中國貿易的限制，促使壟斷資本中面臨毀滅的民族資本積極準備成立中日貿易促進會議（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成立）。大学和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爲了反对製定殖民地化“大学法案”的陰謀，團結在全國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簡稱“全學聯”）的周圍，發動了保衛教育的鬥爭。儘管美軍總司令部的方針是“不問任何理由不準學生罷課”，但是“全學聯”却提出了增加教育費和立即停止法西斯鎮压的要求，並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起至二十四日之間，掀起了全國一百多個學校共約有十萬學生參加的罷課。文部省和學校當局對學生進行了強力的壓迫，但以東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爲首的各校學生所進行的反对處分學生的鬥爭，則一直繼續到六月中旬。

由於道奇路綫所導致的農產品價格的暴跌、並遭受“吉普徵糧”、“旋風徵稅”的農村生活是非常悲慘的，自殺、賣身、放棄耕作等現象遍及全國。例如岡山縣的貧農，包圍縣政府進行了不給飯吃絕不回去的強硬鬥爭。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由各農村團體共同主持召開的全國農民代表會議，曾不顧屬於民主自由黨和日本農民協會主体派（日本農民協會內分爲主体派及統一派——譯者）主持人的反对，對吉田內閣進行了批判。在接着召開的日本農民協會大會上，主体派与統一派分裂了，擁有多數議員的統一派正式開除了野濤等主体派的幹部。於是，日本

農民協會內部業已認識了社会民主主義真相的社会黨員和勞農黨黨員等，例如在茨城縣，就率領了他們的組織集体加入了共產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在東京三田職業安定所開始的臨時僱工的鬥爭，隨着失業者的增大而迅速高漲起來。這個鬥爭獲得了如下的成果，即迫使政府在五月下旬答应了超过預算以上的就業，六月中旬又迫使政府答应了增加實際工資，也就是說用實力打破了國家預算的限制。日本工会總同盟、民主化同盟和社会黨等的幹部，當五月間勞動攻勢達到最高潮時，因為他們不為實際加在工人身上的貧困和剝奪工人的權利而鬥爭，反而說：實行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是不得已的，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橫行是因為共產主義者使用暴力的緣故，所以脫離下層羣衆中開始被孤立起來。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舉行的琴平大會中，民主化同盟不得不把它唯一尚握有指導權的國營鐵道工会的指導權也轉移給共產黨和革新聞盟的統一派了。於是勞工法規的修改和定員法的通過反而加強了工人為了自衛的團結，而道奇路綫的進行和法西斯的逼人，也開始造成了以工人為中心的國民的一致反抗。

而且鬥爭的高潮已達到對法西斯主義採取先發制人的進攻階段。當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東京都會議與美軍軍政部相勾結正企圖提出公安條例的時候，以東京交通工会、全日本電線工業工会和全日本化學工会等為中心的工人階級，連日與失業者、家庭婦女和學生携手並肩湧到了東京都政府。五月三十日晚，警察隊揮着警棍向集中於都政府的三萬人的遊行隊伍亂打，拘捕了包括婦女在內的六十五人，甚至發生了把女學生的裙子都撕掉了的暴行。當遊行隊伍不因負傷而屈服，正對警察的暴行進行抗議時，警察隊在黑暗之中把東京都電車公司的售票員橋本金二從會議廳的三樓推下去，並拳打腳踢地把他害死了。

憤激的遊行隊伍與聲援隊伍一起立即湧到了警察廳進行了抗議遊行。這個遊行隊伍用實力衝破了禁止舉行遊行的美軍總司令部前面的地區。這也可以說明，羣衆已自覺地認識到究竟誰是公安條例中所隱藏的日本法西斯的幕後指揮者。

次日（五月三十一日）橋本金二所屬的東京交通工會柳島支部抗議對橋本的殺害，決定立即進行罷工。掌握着東京交通工會指導權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說：公務員的罷工是違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拚命制止這個罷工。但是，柳島支部副書記大塚庄司躺在鐵軌上說，如果要開動電車就把我軋死吧。終於，柳島支部和目黒、廣尾支部都相繼進入了罷工。與柳島相近的火車公司、日本無綫電公司、東京芝浦足立工廠、三菱製鋼和日立龜有等私營企業的工會也轉入了同情的抗議罷工，進行聲援。於是因自己的夥伴被殺而引起憤怒的工人終於粉碎了警察、憲兵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壓迫。

這次的五·三〇事件以及包括公務員在內的對此立即進行抗議的公開政治罷工，對於面臨着即將根據定員法而進行行政整理的一切官公廳工會，給予了莫大的有力支援。特別是對於因行政整理而必要解雇十二萬人的國營鐵道工會的影響更為重大。國營鐵道工會對行政整理問題，具體地指出了：有鑑於國營鐵道尚未從戰爭的損害中恢復過來的現狀，特別是有鑑於鐵軌、隧道和六三型電車等的危險事故，為了防止這些危險，反而有增加人員的必要。國營鐵道工會發動了反對裁員保衛國營鐵道的鬥爭，並與政府正面對立起來。當日本政府為了試行定員法，命令自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起在東京鐵路管轄下的二十五個路段實施以加強勞動和裁員為目的的新值班制時（五月二十五日），這些路段一致表示反對。其中，東神奈川、蒲田、千葉和中野等路段拒絕了按照新值班制而工作。橋本金二的殺害事件以及因此而發動的抗議罷工，大大地刺激了這些分會的鬥爭，使

它們通过舊值班制進行了實際上的業務管理，並召開車間大會進行了車間鬥爭，進入了事實上的罷工。一九四九年九月，鐵道當局解雇了反對新值班制的東神奈川和千葉地區的領導人，並且以妨礙業務的罪名採取了向檢察廳對他們起訴的手段。這就使得東京鐵路管區的各路段和電車區同時舉行了罷工。中野、蒲田和三鷹等地區從九月十日開始，八王子和下十條等地區從九月十一日開始，相繼進入了罷工。因此，中央、京濱、東北以及鶴見等電車綫的行車完全停止了，橫濱和總武綫的行車也幾乎陷入了完全停止的狀態。這是自有國營鐵道以來第一次發生的嚴重狀態。而且在這個期間，工人的鬥爭與一般市民的聲援結合起來了。如在東神奈川電車區，發生了所謂人民電車事件，即工會接受支援罷工的乘客的要求自動地開動了電車（官方曾以“共謀行駛電車危險罪”對工會會員起訴，結果法院宣判工會會員全部無罪）。

自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起政府與國營鐵道工會之間前後進行了三次談判，但事態仍然未能夠獲得解決。於是美軍總司令部出面干涉了。九月十一日美軍總司令部發表的特別聲明中說：“前經通過勞動科代科長艾彌斯告知國營鐵道工會，電車罷工是非法的、違反佔領目的的行為，並曾命令國營鐵道當局，在工會停止罷工前不得與之進行交涉。”對國營鐵道工會發出的命令是：“立刻命令停止爭議”（離開這個房間後立刻停止爭議）、“爭議行為如不停止則禁止進行集體談判”。國營鐵道工會各分會、各支部要求繼續罷工的呼聲仍然很高，但為了保存力量準備對付定員法的實施，便發出了停止罷工的命令。因此，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立即乘機利用這個禁止命令宣稱：“這次國營電車罷工也是由於共產黨採取了過左的戰術——暴力革命而引起的”。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這種宣傳受到了國營鐵道工人的反對，在熱海舉行的國營鐵道工會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以多數通

過了“在行政整理問題上，如遇到最壞情況時，可採取包括罷工在內的實力鬥爭”的方針，決定與政府鬥爭到底。

形勢是倒轉過來了。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反法西斯勢力掌握了主導權。從這個時候起，大家都已知道單憑政府或分裂主義者的力量是不能實行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的。

### 三 下山、三鷹、松川事件

戰後，日本流行着一句美國話，即所謂“大量散播”，它的意思是通過無線電、報紙、雜誌、電影以及其他宣傳機構，向大眾大規模地灌輸某種意見，在美國，它是捏造輿論，特別是捏造反蘇反共思想的有力武器。

在通過美軍總司令部的直接領導、檢查制度、以及“新聞規則”<sup>①</sup>等制度而被驅向指定方向的日本新聞“報道”中，從一九四九年六月初開始，特別報道得更多的是：第一，所謂妨礙列車行駛的消息；第二，所謂共產黨人八月暴力革命說；第三，所謂留在蘇聯的日本人的悲慘生活和他們希望回國的消息。

關於妨礙列車行駛的報道，幾乎充斥了每天的報紙和廣播，經國營鐵道工會仔細調查後，結果發現這些都是在每年春夏間許多孩子們所搞的頑皮把戲。但是官方絲毫也不追究它的原因，反而利用它在報紙和廣播中報道成爲不可理解的事件，暗示這些似乎都是國營鐵道工會會員所作的。國營鐵道工會會員雖然也向一般國民揭露了這是有目的的宣傳，但是還沒有覺察到偏偏在這年（以前也沒有，以後也沒有）進行這種宣傳，是意味着具體的危險已在逼近了。

所謂共產黨八月暴力革命說，是民主自由黨的半機關報“讀

---

<sup>①</sup> 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美軍總司令部發表的關於限制新聞報道和編輯的規則。——譯者

賣新聞”早就報道過的，特別是自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民主自由黨廣川廣彥（幹事長）發表了“共產黨企圖在八、九月間發動暴力革命”的談話之後，這個談話就被各方面加以強調了，其中，站在这个反共運動的前列的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社會黨、日本工會總同盟和“產別”民主化同盟派幹部為協助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而召開的恢復國營鐵道共同鬥爭的會議上，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細谷松太和島上善五郎等右翼社會民主主義的代表們，故意肯定說共產黨計劃在八月舉行暴力革命，通過了要求召集臨時國會以制止共產黨的暴力的決議（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這些八月暴力革命說的唯一而具體的根據是德田總書記在六月舉行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中曾說到“日本的經濟危機比法國和意大利還要嚴重，比普通所說的恐慌還要慘得多，這表示了革命正在加速來臨”。事實就是如此，從這裏是找不出什麼八月革命說來的。

關於促進留在蘇聯的日本人的回國的問題，自从三月麥克阿瑟致函盟國對日委員會以來，就動員了所有的宣傳機關進行宣傳攻勢。但是蘇聯宣佈，在一九四九年中將送還除戰犯以外的全部日本人，並且當日本迎接遣返者的船隻抵達蘇聯時就立即開始了遣送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第一批回國者在舞鶴港登陸時，他們都不是當局所期望的那種骨瘦如柴的人，而是載歌載舞、身強力壯、體格強健的人。登陸後，他們為了擁護和平，堅決拒絕美軍總司令部關於蘇聯軍事設施的調查，向國民介紹了蘇聯的輝煌成就和蘇聯擁護和平的熱忱。大多數回國者更進一步地集體加入了共產黨。於是一直高唱歡迎回國者的官方人員，驚惶失措地竭力阻撓回國者與國民相接觸，不僅用棍棒驅散歡迎者，而且在京都事件中，連回國者自己也受到了挨棍棒的“歡迎”。散佈關於留在蘇聯的日本人或蘇聯的謠言的人抓住了“鬥爭”這個字眼，硬把民主的人民批判，捏造得好像是暴力裁



判，或一再製造在苏联尙有三十七万人的神話（參照上杉正一郎：“馬克思主義与統計”，青木文庫版）。除此以外，就再也弄不出別的什麼花樣來了。

这种玩弄的手法雖然失敗了，但是所謂“大量散播”的目的，則在於把同樣的一套捏造的东西反覆地塞到國民的耳中去，哪怕只有一部份人相信，他們就可以乘机採用其它手段來製造鎮壓人民的藉口。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美軍軍政部就企業整頓問題開始了对工人運動的彈壓。廣島日鋼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六月十日日本製鋼廣島製作所突然公佈了在二千多工人中解僱六百多人的整頓計劃，並藉口該廠被指定為賠償工廠，用美軍軍政部的名義对反抗這個整頓計劃而不肯離開工廠的工会會員下令撤退。工会要求出示軍政部的證明書。六月十三日以達加上尉的名義發出禁止進入工廠的命令。公司動員警察隊開始封鎖了工廠。六月十五日早晨聚集在工廠对此進行抗議的工会會員及其家屬以及声援隊達一万四千人。當時，美國軍隊跟隨着二千多名武裝警察，闖入羣衆隊伍中逞兇，演出了使十個人重傷，三百多人輕傷的暴行（一九四九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但是，這個事件反而使廣島各处的全部工人團結起來声援了日鋼罷工。不久，市民和農民也參加了声援。不僅如此，這個事件更成爲反法西斯的問題而獲得了全國各地的声援。

根據美軍總司令部的这种方針，吉田內閣自六月十三日以來，屢次召開了內閣治安懇談會。六月十七日動員了五百名武裝警察接收東京芝浦電氣公司的加茂工廠。檢舉了一百四十二名工会會員，其中女工佔了大半。六月三十日在福島縣的平市又發生了一個小事件。警察毫無理由地突然拆掉了掛在車站前面爲市民所支持的共產黨的公報板，以煤礦工人家屬爲主的平市市民向警察署提出了抗議，他們面對着警察，靜候代表与警察

署長交涉的結果。這時恰巧下了一陣驟雨，市民便跑到警察署內去避雨。平日只是給人民做壞事的警察慌忙地跳了出來，但看到市民秩序井然，立即又跑回署內去了。因為只是這麼一回事，平市警察署還沒有小題大做。但是，福島地方檢察廳接獲這個報告時，便與最高檢察廳取得聯繫，並不調查一下實地的情況，立即在福島市發表共產黨襲擊並佔據平市警察署，動員了一千多名福島縣的武裝警察，以騷擾罪名，一個一個的逮捕了常盤煤礦最具有戰鬥性的工人。同時，通過所有資產階級的報紙和無線電向全國各處散播這是“共產黨暴力革命演習”的宣傳。

歷經這些過程，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麥克阿瑟第一次發表了明顯地暗示出將使共產黨非法化的重要聲明：

“共產主義者爲了自己的成功不得不進行破壞，於是以自由的盾牌爲掩護，正繼續向着他們違反信義的目標前進，這是這個時代的矛盾之一。現在在我們面前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今後對於這種運動是否應給予法律上的同意承認和保護。”

在這個聲明中，連麥克阿瑟所特有的美麗詞句——遮羞布——也見不到了。

與這個聲明發表的同一天，終於實施了定員法，即作爲行政整理的第一步，由國營鐵道當局發表了解僱三萬名以上的國營鐵道的首次裁員計劃。正當國營鐵道工會調整陣容待機進行決定性鬥爭的時候，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國營鐵道總裁下山突然失蹤了。在連屍體也還沒有被發現的時候，主管警察的樞員國務大臣就聲稱下山是被人謀殺的，報紙和廣播充滿了令人將信將疑的消息，給人一種印象，好像下山是被共產黨員或富有戰鬥性的國營鐵道工會會員暗殺了的。七月六日發現了屍體之後的宣傳也是如此。

爲什麼要進行這種報道呢？現在是很明白的了。關於這一點，“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二年增刊號“從美國得到的東西和喪

失的東西”中以“社會消息七年史”為題的新聞記者座談會的記錄是值得引用的。

在這個記錄中，今井（“每日新聞”記者）說：“在下山屍體被發現的前一天（七月四日），下山在國營鐵道裁員的問題上，受到了美軍運輸司令部某少校的嚴厲斥責，因為他沒有把鈴木市藏（共產黨員、國營鐵道工會副委員長）列入解僱名單中。在這以前，他還受到了當時自由黨幹事長增田（即增田甲子七，當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嚴厲斥責。後來某少校跑到下山的家裏去，從午前一點鐘一直呆到三點鐘，甚至還對他說過：像你這樣的混蛋給我死去吧。這些情況在當時的報紙上是不能發表的。但是，下山在鈴木市藏為什麼沒有被解僱的問題上是受到了非常嚴厲的責難的。因為這件事情觸怒了當時的政府和美國佔領軍。據下山的妻子說：某少校回去之後，下山抱頭喊痛，幾乎要哭出來了。因此，我最初訪問下山的家的時候，他的妻子突然問道：是自殺的嗎？以後她再也沒有說過是自殺的了。”

山崎（共同通訊社記者）說：“搜查當局首先派去驗屍的鑑定員和第一科的人都斷定他是自殺的。但是，地方檢察廳（東京地方檢察廳）却通知說他是被人謀殺了的，要大大幹一場。”

今井說：“那時候，當時主管國家警察的樋貝國務大臣還沒有接到報告就發表了下山是被人謀殺的談話。不用說，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國營鐵道的罷工。我見到了樋貝先生，也見到了當時的其它政府人員，他們說如果下山不是被人謀殺，事情就難办了。當時的氣氛是如此的。使我直到現在還不能理解的是……他（解剖下山屍體的東京大學醫學院教授）所說的話，他說下山是自殺的，這是一種違反國民立場的說法。他還說學問究竟是應該為國家服務的。……這就可以了解東京大學是怎樣受到政治的支配了”。

在這裏應該追究的，並不是下山總裁的死究竟是自殺或是

被殺的問題(从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也有被殺的可能,而且很有可能是被最高當局方面下手殺害的)。

作為一個歷史問題來看,其所以嚴重,是利用下山總裁的死來對付共產黨和戰鬥的工會會員,阻止了國營鐵道工會的“使用包括罷工在內的實力行動”,並強制實行解僱。事實上,由於發生了這種日本勞工運動史上史無前例的奇怪事件以及反動勢力利用這個事件進行了總攻擊,以致動搖了國營鐵道工會的反攻計劃,失去了進行決定性鬥爭的機會。

統治階級進行了追擊。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向來以討厭新聞記者聞名的吉田首相,破例召集了特別在下山事件的宣傳上充分與政府合作的六大資產階級新聞社的社長,給予慰勞;同時還發表談話,表示決心說:“在國營鐵道問題上,政府計劃給共產黨以徹底的打擊”,要求他們給予協助。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也一概被動員了。七月七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把當時國營鐵道的民主化同盟的代表星加要叫到總司令部作了很長時間的談話。七月九日,社會黨發表聲明說:“應該先排除共產黨員,然後再進行集體談判”。增田官房長官看到這個聲明便對新聞記者聲稱:“由於下山事件的發生以及民主化同盟派的積極活動,加強了國營鐵道工會協助行政整理的傾向”。翌日(七月十二日),星加要會見了民主自由黨幹事長廣川,達成了某些協議(一九四九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及鈴木市藏:“永不滅的信号”)。

就這樣,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國營鐵道當局發表了第二次解僱計劃,被解僱者達六萬三千人。這與第一次解僱有所不同,很明顯的,它是一種政治性的解僱,解僱的對象是包括着共產黨員和具有戰鬥性的工會會員。

然而,國營鐵道工會已經擺脫了由於下山事件所造成的暫時的混亂現象。中央鬥爭委員會立即發出了拒絕解僱的指令,

並配合着進行下層工会退回解僱書的鬥爭；七月十五日，向國營鐵道當局提出了“情況正在進入最險惡階段”的最後警告書，表明了將採取包括罷工在內的實力行動爲反對解僱而鬥爭的態度。國營鐵道工会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是與有力的支援組織的成立有關係的，即：反對法西主義的全國各民主團體於七月二日組成了擁護民主主義同盟（擁有一千一百十三萬盟員）；爲了糾正下山事件中所表現的資產階級的報道，傳播站在工人立場的民主報道，從七月六日起舉行了民主團體新聞的共同編輯會議，以期通過民主團體的機關報的編輯工作建立統一戰線；全遞信從業員工會以及其他全官公廳的各工會建立了反對行政整理的反攻體系，並明白表示予國營鐵道工会的鬥爭以積極援助的方針等。很明顯的，國鐵第二次解僱與第一次解僱的情況是大不相同的，它遭到了強大的反擊。

這時候再一次發生了奇怪的事件。在國營鐵道工会中央鬥爭委員會發出了最後通告的七月十五日夜晚，三鷹車站一輛無人駕駛的電車突然衝出了車庫，使六人死亡和十三人負傷。在事件發生後的三十分鐘，當局就大肆宣傳說這是共產黨有計劃的暴動。同時，警察和民主化同盟派工會會員不知何故竟以收拾肇事地點爲藉口，完全毀壞了一切可做證據的重要東西。於是，第二天早晨毫無任何證據就立即接連逮捕了共產黨員和左傾工會會員。檢察當局並且公佈：“這是有共同陰謀的可怕的共產黨的暴力行爲”。報紙、雜誌和廣播則利用一般國民容易相信被捕者就是犯人的心理，千方百計地進行了離間國民與共產黨及國營鐵道工会關係的大力宣傳。例如“讀賣新聞”在報社內僞造了司機台上帶着繩子的照片，把它作爲確鑿的證據用很大的篇幅來刊登。政府方面，這一次也故意地由吉田首相親自發表了“正在警戒共產黨”的聲明（七月十七日）。

三鷹事件與共產黨毫不相干，現在只要看看控訴審判中判

決無罪的理由也就明白了。甚至目前仍被視為犯人的非黨員被告竹內，除了他的“自供”之外，也沒有任何物証。這個“自供”是在酷暑中連續進行了十數小時的訊問，並給了一切暗示後所造成的“自供”，正因為如此，被告竹內屢次推翻了他的“自供”。儘管自由法曹團（日本的進步律師團體——譯者）提出了証據發出了公開信，但是對於在該事件發生前後行動極為可疑的民主化同盟派工會會員，連一次調查也未進行過。

毫無疑問，三鷹事件與下山事件同樣，是與一九四九年六月初起所進行的“妨礙列車行駛”、“共產黨的暴力”之類的宣傳有着密切聯系的，是利用它來防止公佈解僱通告後的罷工的。兩者所不同的是：三鷹事件是官方所掀起的規模更大的事件，並立即逮捕了共產黨員和工會會員，所以必須進行更加淆亂聽聞的宣傳。這就証明了，官方業已預料到：共產黨和國營鐵道工會是如此強大，而實行第二次解僱是更加困難的。

儘管發生了三鷹事件，共產黨和國營鐵道工會的戰鬥力幾乎是毫未削弱；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統治階級希望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採取露骨的反對工人階級的態度。

與三鷹事件的發生同時，發動了較下山事件時規模遠為巨大的有組織的反共、反工人的宣傳。於是共產黨立即根據德田總書記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猛烈的反宣傳活動。為了把那些為資產階級報紙或廣播所隱蔽了的三鷹事件的真相向一般國民進行宣傳，動員了全黨的組織。共產黨員連日日以繼夜地搖鈴四處發賣三鷹事件的號外。各民主團體機關報的共同編輯會議也大力協助了這個反宣傳運動。各工會邀請從蘇聯回來的人參加座談會以及在各地舉行的蘇聯真相報告會，用具體事實的說明粉碎了與反共宣傳相配合的反蘇宣傳。國營鐵道工會決議在這些反擊的基礎上，發動每一工作場所都進行退回解僱書的鬥爭，用實力來粉碎行政整理。即將實行解僱的全體信從業

員工會以及其它全官公廳的各工會，一面加強反攻體系，一面發出了支持國營鐵道鬥爭的聲明。以東京芝浦電氣工會聯合會為中心的私營產業中反對企業整頓、反對解僱的鬥爭也日益高漲起來了。

統治階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民主化同盟上面。由美軍總司令部的介紹出席了國際勞工組織會議（ILO、在資本家的領導下謀取勞資合作的國際會議）和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籌備會的民主化同盟派國營鐵道工會委員長加藤閱男，在風潮期間於七月十七日回到了日本。他還未到工會總部就立即與民主化同盟幹部和社會黨左派幹部舉行了所謂麻布會談，會後又立即與預先邀請他談話的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進行了長時間的面談。次日，以違反公共企業勞動關係法的罪名，公佈解僱國營鐵道中央鬥爭委員會的十七名委員。十七名中包括共產黨系統的全部委員十二名，革新同志會派半數以上的委員五名，而民主化同盟派則一個人也沒有被解僱。這個行動的目的是將國營鐵道中央鬥爭委員會的領導權完全移轉到十五名民主化同盟派的手裏。國營鐵道中央鬥爭委員會認為這個解僱通告無效把它退回去了。七月十九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黑伯萊發表聲明說這個解僱通告是有效的。民主化同盟派在七月二十一日舉行的中央鬥爭委員會會議上說，被解僱者沒有資格任中央鬥爭委員會委員，要求革新同志會的統一派退席。統一派在答覆中指出：作為一個工會會員就有充分的資格並有責任實行大會的決議，以盡對全體工會會員的義務。於是民主化同盟派退席了。同日，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長惠特尼把社會黨總書記鈴木茂三郎叫去了。結果，鈴木曾發表感想說：“我得到的印象是，社會黨已處在超出預料的嚴重情況中”（七月二十二日“朝日新聞”）。七月二十二日，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完全支持民主化同盟的聲明。同日，加藤閱男召開了只有民主化同盟派

出席的中央鬥爭委員會，並向全國發出了僅召集沒有接到解僱命令者參加的中央委員會的指令。下列事實證明，他是無視發出指令的手續和資格的，這個指令竟未能編號，成爲一個所謂零號指令。加藤委員長自己說：“如果可以說這是民主化同盟的‘政變’，我將甘心接受非難”（一九四九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矢加部勝美：“勞工戰綫的異狀”）。

統一派曾對民主化同盟提議召開大會，但被拒絕了。共產黨發表聲明說：“惡劣的民主化同盟幹部是民主自由黨的別動隊”，革新同志會派也發表聲明說：“中央鬥爭委員會的民主化同盟幹部假藉合法和反共的名義協同民主自由黨，與社會黨一樣始終一貫地採取了叛變行爲”。於是民主化同盟想籠絡一部分革新同志會派的戰術失敗了。然而，由於民主化同盟的這種強烈的“政變”，使國營鐵道工會分裂成爲兩個，因而對第二次的解僱未能適當地進行鬥爭。民主化同盟派召集的排除解僱者並以次多票候補人遞升爲委員的中央委員會，一直到八月十五日好容易才開成了。這個中央委員會按照民主化同盟的提案，承認了當局的解僱措施，並決定與政府進行交涉時排除共產黨員和戰鬥的工會會員的參加。民主化同盟派說：“這是民主工會的劃時代的勝利”；可是，誰在爲這個“劃時代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呢？

然而，國營鐵道工會中的共產黨和革新同志會兩派却保持統一，深入下層進行宣傳活動，與退職者、退回解僱書者同盟的活動相配合，以便防止第三次解僱。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於七月二十七日發表了鬥爭宣言；東京芝浦電氣工會聯合會和北海道煤礦等以舉行波浪式罷工打擊了企業整頓。與國營鐵路的情況完全一樣，當局於八月十二日通告全遞信從業員工會解僱一萬一千人，“全遞”內部的再同（民主化同盟）派乘三十六名中央鬥爭委員會中有二十九個人接到解僱書的機會，採取了與國



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派同樣的行動。富有戰鬥性的全遞信从业員工会指令下層工会團結一致進行鬥爭，並於八月十六日相反地從中央委員會中清除了再同派。於是從八月十五日在中央官廳剛剛開始實行的裁員，也遭到了以全農林工会和全商工工会為首的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的激烈反擊。勞動人民由於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叛變而引起的憤怒反映到社會黨內部，具體表現在對幹部的批判上面。左派的是立梅市、師岡榮一和和田敏明等人批判了鈴木、加藤和野溝等所謂左派幹部，從七月底開始要求社會黨反省，醞釀成立再建派。因此，行政整理和企業整頓就難以強制實行。從七月下旬起，國營鐵道工会、全遞信从业員工会的工人，和農民、山林工人攜手並進，在木曾谷發動了山林解放運動。這說明統治階級所最懼怕的工農聯盟的發展方向，已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於是第三次造謠誣蔑事件發生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上午三時，一列火車在東北本綫松川車站附近翻車，死亡了三個人。報紙和廣播在報道這個事件的同時，還發出了似乎在當場逮捕了國營鐵道工会會員又是共產黨員的嫌疑犯的消息，並加上了事件發生的前夕在肇事地點附近的東京芝浦電氣公司松川工廠召開了工会大會這一段消息，這個報道露骨地放出了該事件與共產黨、國營鐵道工会和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工会有關的空氣。同時，事件發生的次日，日本政府立即由增田官房長官斷定說：“在次官會議上曾听取了福島（松川）事件的報告，這次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兇惡罪行。從三鷹事件以來，它與歷次發生的事件同樣，是出於同一思想根源的。”

的確，在與增田長官所說的相反的意義上，這個松川（東北綫）事件是日本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兇惡罪行”，也是與三鷹事件同樣“出於同一思想根源的”。正如在以後的公審中搞得清清楚楚無可懷疑的那樣，第一，當天晚上發生了盜竊事件，警察隊為

逮捕盜賊正在松川車站附近一帶佈置了特別戒嚴，松川事件是恰好在這時發生的。第二，這一次罪行是利用列車偏偏在那天夜間停止行駛的時間進行的，而知道列車停止行駛的，只有國營鐵道的少數上層負責人以及從他們那裏得知消息的美軍總司令部有關者。第三，作為唯一證據的單口螺絲鉗和螺旋鉗，是警察隊很容易地從泥水田中拾到的，但這兩件東西都不是國營鐵道的用具，如單口螺絲鉗係外國製品。僅憑這些事實而論，就可以知道這是工人或共產黨員不能做到的罪行。顯然，這是官方或與官方有着密切聯繫的人們所進行的極其惡劣的有計劃的罪行（松川事件被告救濟會：“松川事件裁判記錄”）。

自從著名的幸德秋水事件（無政府主義者圖謀刺殺明治天皇的事件——譯者）發生以來，在日本社會運動史上，有許多利用“捏造”的例子，但像松川事件這樣兇惡的已遂事件，在日本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在外國，特別是在美國却是司空見慣的，例如當工人運動或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為了打垮它的力量，便多次地計劃或實行了諸如第一次五一節時所發生的海馬克事件以及有名的摩利·馬凱雅事件，湯姆·牟尼事件，撒苛、樊齊蒂事件等。正因為如此，Frame UP.（捏造）這句美國話已成為世界性的用語了。

與下山、三鷹事件同樣，所有的宣傳機關都按照政府所述說的那樣，把松川事件與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連繫起來，對一般國民進行了反共、反工人的大規模宣傳。在這過程中，檢察當局採取了與對待三鷹事件不同的形式，即不立刻拘捕共產黨和工人（但曾搜查辦公室），而先對流氓、暴力團體等各方面進行調查，之後得出了好像除共產黨和工人外別無犯人的結論。於是根據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因其他事件的嫌疑而被捕的國營鐵道工會福島支部赤間勝見的“自供”，從九月十二日起，逮捕了以國營鐵道工會的鈴木信（他擔任共產黨東北地方委員會候補委員的重要職

務)、同工会支部的阿部信次和本田昇、东京芝浦電氣公司松川工会联合会的杉浦三郎以及該區鶴見工廠工会的佐藤一(爲了領導爭議鬥爭,以东京芝浦電氣工会联合会代表身分於松川事件發生的頭兩天來到松川)等爲首的二十人。政府很巧妙地、有計劃地把領導保衛民族產業鬥爭的共產黨、領導反对行政整理鬥爭的國營鐵道工会和領導反对私營企業整頓鬥爭的东京芝浦電氣工会联合会湊在一起了。

並且,爲了使檢察官所編造的“因共謀而構成兇惡犯罪”能够成立,捏造了無一合理之处而又駭人聽聞的案証。諸如騙取被告赤間的目不識丁的母親在完全相反的“陳述書”上蓋章,又根據這個“陳述書”和符合於檢察官談話的被告赤間的“自供”(赤間在公審時否認了這個“自供”說它完全是虛構的),不容許全体被告与律師見面,日以繼夜地用尽一切手段逼迫被告“自供”,此外还把氣象台報告的“罕見的晴空之夜”顛倒爲“漆黑之夜”;硬說脚不好的被告用三點半鐘跑了五里道路;硬說騙小孩的活動螺絲鉗可以取掉被一百數十噸重量拴着的螺釘帽;把限於時間不可能知道的事情硬說會有事前联系;當場明明破壞了二根螺釘帽,但一定要說只破壞了一根等等。這并不純粹是福島地方檢察局的創作。這個案証是最高檢察廳動員全國各地“有手段”的檢察官所編造的(共產黨出版局編:“真理必勝”)。

与捏造事件同時,官方对共產黨開始了瘋狂的鎮壓。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五百名警察隊包圍了日本共產黨總部,以“赤旗報”用紙有來源不明的嫌疑爲藉口,搜查了“赤旗報”營業所和“曉”印刷所。因爲完全沒有可資捏造的材料,警察隊無可奈何地撤退了;但官方却抓住這個事件在全國各地大肆宣傳,造成共產黨是可以鎮壓的這種印象。

然而,依靠造謠誣蔑和暴力鎮壓,是絕不能使日本工人階級退縮的;決定性的打擊却是來自工人階級內部。

以松川事件為轉折點，全官公廳各工會內部的民主化同盟、再建同盟、刷新同盟以及冠有其他名稱的分裂主義者，與國營鐵路的民主化同盟派一樣，由於犧牲了被解僱者（共產黨員和戰鬥的工會會員佔多數）而把持了工會的實權，或是另組工會，與官方密切勾結，從內部來瓦解工人的統一。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中接受了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領導的各工會，都無條件地接受了行政整理的方案，決議退出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這些分裂派成立了全官公刷新同盟。官方甚至給它們以法律上的協助，特別是人事院於八月十七日公開解釋不承認因行政整理而被解僱者為工會會員，這就替分裂主義者的活動提供了最好的法律根據。

如此強制施行的行政整理，加強了壟斷資本緊縮私營企業的決心。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代表日本的壟斷資本於九月七日向各資本家散發了如下勞動對策：“為了更進一步地加強對國際經濟的聯繫……採取合理化即裁員的想法也是出於不得已的。”“首先應該排除經營內部的共產黨員。迄今為止在排除共產黨員時，一般地是否應以不合作者的名義實行解僱，在這一點上會牽涉到法律問題，但是，這次國營鐵道的裁員已給予明確的解答。……這些分子是可以而且必須排除的。”“旨在勞資合作以期加強企業而組成第二工會時，即使這個工會屬於少數，公司施策的重點也應放在該工會上。”“經營者必須徹底進行反共教育。”“足以與工人的團結對抗的就是經營者的團結。”“現在經營者應該開始發動經營者的攻勢。同時，為了取得輿論的支持，當然要和美軍總司令部民事部、監督官廳、警察、法院以及檢察廳等經常聯繫，並不斷積極努力與企業所在地的各機關，特別是報社、通訊社以及廣播電台等輿論機關經常保持密切聯繫”（“為對付目前勞動情勢經營者所應採取的態度”）。

壟斷資本為了實行企業整頓採取了上述的一切手段特別

是私營企業工會內部的民主化同盟派，首先利用共產黨員和戰鬥的工會會員的解雇，在公司、官方、社會黨、“總同盟”和“新產別”等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協助下，有的另行組織工會，有的奪取工會的領導權，破壞了工人階級的統一。甚至站在反對企業整頓最前列的東京芝浦電氣工會聯合會的鬥爭，也因為屬於“產別”民主化同盟派的堀川工廠工會支持公司方案，退出了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工會聯合會，加以資方又用大量資金使各工廠各自分裂，於是這一鬥爭到十月間終於遭受了挫折。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所進行的私營企業的企業整頓，主要是在交通（鐵道和海運）、機械、汽車修理、金屬以及電氣器材等軍事產業部門，所以這也可以說是特別爲了以後發動朝鮮戰爭作準備工作。

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中央、地方和公團（公私合營的糧食、煤炭等重要物資的配給機構——譯者）實現了被解僱者達六十二萬人的行政整理；即使根據官方顯然縮小了的統計數字，私營產業也實現了被解僱者達四十三萬人的企業整頓。道奇路綫於是突破了第一關。

這對日本國民來說意味着什麼呢？其結果是失業、購買力降低、農業破產以及從中小企業擴大到大企業的恐慌的尖銳化——一句話，就是日本民族產業的全部破產。它的具体表現就是災害的大量增加。儘管一九四九年夏秋之間的颶風都是中級颶風，但是，由於森林的濫伐、河川工事的停頓以及各種設備的腐朽等種種原因，即使根據政府的估計，所遭受的損失也已達八百二十三億日元。如果加上過去遭受災害而尚未恢復起來的那些損失則共達一千五百二十二億日元。但是，按照道奇預算，却將災害對策費名副其實地減少到幾等於零，公共事業費也從一九四八年度佔歲出百分之一〇點五減少到一九四九年度佔歲出的百分之七點四。因此，使日本民族遭受破壞，這是道奇路綫

開始時就預定了的。而且這在驅使日本走向意味着最嚴重的民族破壞的單獨“媾和”和走向戰爭的道路上，也是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的。

## 第六章 朝鮮战争的準備与日本

### 第一節 朝鮮战争的迫近与日本的基地化

#### 一 解散旅日朝鮮人联盟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日本政府在三鷹事件和松川事件之後，突然藉違反“团体等規正令”第二條——主張以反抗或以暴力主義对待佔領軍的团体——的罪名，以暴力解散了“旅日朝鮮人联盟”（簡稱“朝联”）和“旅日朝鮮民主青年同盟”，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並褫奪了全体幹部的公職。但是，日本政府並沒有指出这些团体行使暴力或反抗佔領軍的任何確鑿的証據。这件事本身有兩種劃時期的意義。首先，这是第一次適用“团体等規正令”，它意味着日本進一步的法西斯化。日本統治集团煽動日本落後羣衆的民族偏見，利用这个弱點使他們相信“朝联”是行使暴力主義的团体，並企圖以对“朝联”使用“团体等規正令”來使人民習慣於今後法西斯暴力的鎮压。法西斯主義已从对個人的迫害和对個別行動的鎮压發展到解散組織和禁止其恢復的階段。

第二，这次事件暗示了美國及从屬於它的日本統治者在亞洲政策上的新發展——進行準備在九個月後所爆發的“熱战”。

#### 二 单独“媾和”与日本加緊軍事基地化

与解散“朝联”同時，美國正迅速地進行着对日单独“媾和”、重新武裝日本和變日本為美軍軍事基地的政策。一九四九年九

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在華盛頓舉行會談，九月十七日美英兩國發表關於強制實行單獨對日媾和的方針，聲稱兩國關於迅速召開對日和會問題已取得一致意見，即使沒有蘇聯的參加也是要加以進行的。同年十一月四日美聯社馬尼拉電訊：據駐日美軍總司令部高級官員的意見，美國擬對蘇聯僅做形式上的邀請，將於一九五〇年初在東京由麥克阿瑟主持召開對日和會，並可能在這時締結美日軍事“防禦”協定。翌日，來自華盛頓的消息稱：美國已大体上擬就了對日和約草案，草案中規定美日之間締結軍事協定，媾和後美軍仍駐在日本，保有基地，負責“保障”日本的“安全”，會議也邀請蘇聯參加，但沒有否決權。根據這些消息，我們可以判斷舊金山“和會”的作法以及兩個條約<sup>⊙</sup>的基本內容在此時即已確定了。

早在一九四七年春，對日媾和問題即已在聯合國會員國之間被着重提出來了，蘇聯主張忠實遵守波茨坦公告，根據中、蘇、美、英四大國一致的原則，應由四大國外長會議起草條約草案。美國則一開始就企圖單獨媾和，藉“媾和”之名繼續變相地佔領日本，並置波茨坦公告於不顧，主張由遠東委員會用多數表決的方法來起草和約。由於蘇、美兩國意見不同，至同年秋天，對日媾和問題暫時擱淺，自此以後，美國就一直推行着“事實上的單獨媾和”政策。

一九四八年秋，蔣介石政權在中國的徹底失敗愈益明顯，美國就開始更加注目日本了。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漢森·鮑德溫論稱：“如果對美國在東方的戰略地位加以重新檢討的話，那末遲早要歸結到利用日本人力資源的問題。因此必須修改放棄武裝與戰爭的日本憲法”。同日，英國“每日郵報”駐紐約特派記者報道稱：“爲了對抗中共軍的勝利，美國的

⊙ 指舊金山對日單獨“和約”及美日安全條約。——譯者



戰略家和軍事部門正在研究日本的重新武裝和利用日本人力資源的問題”(“朝日新聞”)。翌日,美國駐日本佔領軍主力部隊第八軍前任司令艾契柏克中將發表主張說,在日本建立一支以小型武器武裝起來的、以十五萬人為限的“警察部隊”是当前的急務,而“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和“國防部消息靈通方面”也提出了同樣的主張(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讀賣新聞”、十二月二日“朝日新聞”)。這些雖然是含糊的新聞報道,但正是一年半之後出現的“警察後備隊”計劃的最初表現。

但是,當時美國的軍方、政府和一些戰略家之間,關於日本的利用價值和利用的方法,從世界戰略的觀點來看,有某些分歧意見。麥克阿瑟一派主張,因為失掉了中國大陸,所以必須在日本和沖繩建立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以此為進攻大陸的基地;而國務院方面則從歐洲第一主義出發,覺得日本的戰略價值不大(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生活”雜誌)。因為有這種分歧,一九四九年二月,美陸軍部長羅雅爾到了日本,對日本和南朝鮮進行視察,並明確地拒絕了麥克阿瑟增強駐日兵力的要求。不僅如此,他還曾對新聞記者說:“(一)一旦發生戰事,日本不但不能有利於美國,反而會成為美國的負擔;(二)亞洲的戰略價值次於歐洲;(三)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必要的時候,有權利從日本撤兵”(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這使得一心依靠美國的日本統治階級非常狼狽。但這件事情從另一面來說,則是美國在可以利用日本的時候將盡量予以利用。

關於如何利用日本這一點,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認為結束佔領形式早日“媾和”更為有利,而美國國防部却堅決主張繼續佔領。一九四九年六月,蘇聯提議為根據波茨坦公告進行全面對日媾和,應迅速召開中、蘇、美、英四國代表會議。美國害怕蘇聯取得了對日媾和的主動權,同時又因中國形勢的發展對美國絕對不利以及它已經把發動朝鮮戰爭的準備提到了日程表上,

所以在九月間召開了上述的艾奇遜、貝文會談，決定採取排斥蘇聯的对日“媾和”和美軍在日本保有基地的方針。但國防部仍主張繼續佔領，以便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美陸軍參謀總長柯林斯到日本，在東京發表聲明稱：“佔領軍已成為安定遠東的力量，因此要根據需要而繼續駐軍”。接着在年底，美陸軍部次長伍立茲與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偕同來日，與麥克阿瑟進行了某些協商，並曾與吉田首相會晤。伍立茲曾發表談話說，在他與麥克阿瑟的協議中“也包括為美國陸空軍建立設施而利用日本及沖繩勞動力的可能性的問題，得到的結論是：新工程的百分之七十五可依靠日本的勞動力來解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朝日新聞”）。

在進入一九五〇年以後，日本走向美國軍事基地化的速度日益加緊了。麥克阿瑟在新年文告中威嚇日本人說，人民中國的成立給日本帶來了威脅，他還滑稽地強調日本憲法中的關於放棄軍備的規定，絲毫也不否定日本有“防禦”外來攻擊的自衛權利。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長惠特尼對上述文告進行解釋說，麥克阿瑟的文告並不意味着日本有重新武裝的權利，但是它意味着日本有與“外國”——實際上是美國——締結“防衛”同盟或進行交涉、接受“聯合國的保護”的權利，日本如果沒有這種“同盟”或“保護”就不能對抗外來的攻擊；這事實上是後來締結“美日安全條約”和日本“協助聯合國”計劃的暗示。

與上述論調相呼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吉田首相在日本議會上強調了不放棄自衛的權利。法西斯主義者確實是善於饒舌而健忘的。僅在三年半以前，吉田尚以首相身份在國會上饒舌稱：“很顯然的，近年來的戰爭大都是以行使國家防衛權之名而進行的，因此承認防衛權，往往成為引起戰爭的原因”，“我認為承認因行使國家的正當防衛權而進行的戰爭為合理乃是有害的事”。

在美國的心目中，對日媾和問題，首先只是美國在遠東的戰略問題，只是利用日本的國土、資源與人力為美國的戰爭目的提供便利的問題，它從未從日本的獨立或履行國際正義的問題上加以考慮過，這一點已至為清楚地說明了單獨“媾和”的本質。儘管國務院反對軍部的意見，主張結束佔領形式，但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上院却聲言：“日本為亞洲的防共鐵壁，必須在整個遠東地區重新確立它的影響力量”，兩天之後，他又強調美國要在日本、阿留申羣島和琉球保持堅固的軍事基地，對促進日本的完全獨立或保障日本的安全等却一字未提。同月十五日合衆社的電報盛讚橫須賀已成為美國的永久軍事基地，同月十八日美聯社東京分局局長羅素·布蘭斯稱：“現在美國的主要基地，計有橫須賀海軍基地及分佈在全國戰略地點的至少八個航空基地”，並稱：“從北海道到九州建設有許多飛機場，這些機場的跑道可供最大型的轟炸機降落之用”（一月十八日“日本時報”）。

同一時期，美陸軍參謀總長柯林斯曾在美國國會上作証說：“駐在日本和歐洲的美國陸軍，在數月以內要進行一旦遭到敵人攻擊時能很好的完成其任務的準備”，並稱：“陸軍提出了四十億二千萬美元的預算，這是維持十個師團所需的費用，其中有四個師團將派駐日本”（二月十五日公佈）。美國將現役陸軍的百分之四十派駐在日本，並且要在“數月以內”，即到六月間要完成戰鬥準備，凡是有良知的人看到這個報道都忧心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果然，朝鮮戰爭於六月爆發了，駐日美軍立刻就出動到前線去了。一九五〇年一月底柯林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海軍作戰部長薛爾曼、空軍參謀總長范登堡等偕同來東京，他們逗留到二月六日，與麥克阿瑟進行會談並視察各地。我們雖無法知道他們商議和研究了些甚麼，但是我們可以相信這與前述柯林斯在國會的証言、美國與李承晚的軍事協定以及日

本基地的擴充和修建等都是互相有關聯的。

在這期間，日本國民反對日本軍事基地化和反對單獨媾和的鬥爭日益高漲，特別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批判了日本共產黨的野坂理論以後，激起了全日本國民深刻的民族自覺，使民族鬥爭有了迅速的發展（後面還要詳細談到）。此外，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締結，給了日本國民以很大的感動。這些情況促使美國的統治階級大多趨向於下列見解，即他們認為對日本採取“媾和”的形式，反而有利於對日本的實際佔領與統治，佔領形式的繼續，只有刺激民族鬥爭而沒有好處。結果，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反對“媾和”的急先鋒陸軍部次長伍立茲不得不辭職，繼而陸軍部長格雷也辭職了。四月六日共和黨領袖杜勒斯——摩根財閥的律師、有名的最頑固的反蘇反共分子——就任為民主黨杜魯門總統的國務院顧問。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地取得海南島渡海作戰的勝利之後，使美國的統治者深為憂慮；加之在朝鮮要求和平統一南北朝鮮的人民力量的發展，情況“已不符合於美國的時間表”了。因此杜勒斯發表了“積極促進對日媾和”的聲明（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繼而他被任命為主要負責進行對日“媾和”的工作（同年五月十八日）。

在此十日以前，吉田首相曾說過：“與美國等國家的單獨媾和，事實上已經完成了”。又說：“日本是佔領基地，但不是軍事基地”。反過來說，也就是吉田親自承認了“與美國等的媾和，就是事實上的長期佔領；日本向美國提供的軍事基地也就是美軍佔領日本的基地”。當時美國政府的喉舌“紐約時報”曾論稱：“美國可以締結一個包括在日本保持一連串軍事基地條款的和約，但這並不是僅保持個別空軍基地，而必須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將日本全國變為美國的基地。”該文說：因此，即使在形式上結束軍事佔領，也要考慮辦法，使日本全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實際是

處於美國統治之下，“杜勒斯的困難就在這裏”。這樣的對日“媾和”當然“必須排除蘇聯和共產黨中國來進行”，“朝鮮的形勢使處在危險地位的日本受到威脅，日本人從丰臣秀吉時代<sup>⊖</sup>起就把朝鮮稱做是指向日本的短劍。在蘇聯控制北朝鮮時，如果美軍突然撤退，自由的韓國就將崩潰，這柄短劍則將再度（！）握於蘇聯的手中”。於是這柄短劍就勢必指向非武裝的日本，所以美國必須“保衛”日本，“必須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將日本全國變為基地”。

無論是丰臣秀吉時代或它以前及以後的時代，朝鮮從未成為指向日本的短劍。朝鮮在古時是日本文化的老師。歷史說明，早自古代日本天皇制成立之時開始，當日本的專制統治者們，自認為有力量的時候，就企圖侵略朝鮮，而且自丰臣秀吉時代起以迄於最近，朝鮮經常成為日本的專制統治者侵略大陸的跳板。這些事實，無論美國新聞記者如何無知也是應該知道的。無論如何，他們這樣地偽造歷史，把美國的对日單獨“媾和”——露骨地要求變日本為美國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基地——與虛構北朝鮮有侵略南朝鮮的危險連結在一起，這與一個月以後發生的情況結合起來看，實在是意味深長的。

## 第二節 財政經濟上的備戰

### 一 財政和工業

朝鮮並不是共產主義指向日本的短劍，相反地，為了使日本成為帝國主義指向朝鮮、全亞洲以及蘇聯的短劍——如“紐約時報”公開講過的，成為美國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基地——日本的國

<sup>⊖</sup> 丰臣秀吉（一五三六——一五九八年）一五九一年曾經統一全日本，主張侵略朝鮮，一五九二年及一五九七年兩度向朝鮮出兵，結果敗退。——譯者

家財政也被賦予了這種主要的任務。為此，一九四九年底，道奇又與美國陸海空三軍最高首腦先後來到日本。道奇編製了日本一九四九年度的補充預算和一九五〇年度的預算案，並強迫日本政府和國會加以接受。我們在前面（第五章）已經敘述過道奇預算的基本性質——使日本財政、金融和經濟為壟斷資本利益服務並使之從屬於美國的軍事性和殖民地性——而一九五〇年度預算案把這個基本性質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在預算總額中，一般會計項下較上年度減少了百分之十強，在特別會計項下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六強。它們聲稱“這是昭和以來第一次的劃時期的走向緊縮財政的轉折點”，並高唱“通貨收縮”的效果。但是在這個緊縮的預算中，“對日援助對等資金”卻從一九四九年度的一千五百零八億日元增加到一千五百八十一億日元。這項金額相當於同年度產業設備資金的百分之八十八，也就是說日本不能自主運用的“對等資金”控制了主要的日本產業和金融。並且將這項資金的投資，預定投入以國營電氣通信事業、國營鐵道和國營林業為主的公營企業四百億日元，以電力、船舶為主的企業以及其他金融機關、煤炭和鋼鐵等巨大壟斷資本的私營企業約四百億日元，償還債務五百億日元。如前所述，日本軍事基地化是美國對日的基本政策，不用說所有這些投資都是有它的軍事目的的。

一九五〇年度歲出預算緊縮的主要因素，是該年預算中的價格補助金減至九百億日元，幾乎比上年度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削減價格補助金的目的是在於通過外匯預算使日本對外貿易服從於美國的利益，同時使日本物價“接近”國際價格，從價格方面使日本產業從屬於美國壟斷資本。這並不意味着削弱了對日本壟斷資本的權力的保護，而是意味着壟斷資本對工人和中小資本家剝削的酷烈。回想起麥克阿瑟指令實行九原則的時候，他曾經說九原則要求日本人更須勒緊腰帶，“要求暫時放棄給予自由

社会的一部分特权和自由”。在这个政策下，陸續出現了以紡織、人造絲工業爲首的中小企業的倒閉，有的人因繳不了税金或还不了債而自殺了。但是大藏大臣池田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會見記者時却傲慢地說：“在大的政策面前，多多少少的犧牲是難免的，即使有五、六個人的自殺也是算不了什麼，大家用不着吵吵嚷嚷”。恰巧就在同一天，在盟國對日委員會上英聯邦代表也指出了“日本產業、經濟和金融的百分之八十已爲舊財閥系統的八大銀行所控制”。

在一九五〇年度預算的歲出裏，直接與以後的朝鮮戰爭有關而特別具有深刻意義的，是在一般會計項下編列了七百二十三億日元的國債償還費。這項金額等於一九四九年度的二倍，一九五一年度的三倍以上。一般的說，國債償還問題是道奇預算的基本方針之一。它的目的在於：首先是有利於國內債權者即國內壟斷資本家，其次是以償還外債的方式爲導入外資鋪平道路。然而偏偏在一九五〇年度預算編列如此空前的巨額——本年已到期應償還的國債僅爲八億三千万日元——這是意味着什麼呢？道奇離日本半年之後，朝鮮戰爭一爆發，麥克阿瑟就命令日本政府建立警察後備隊，並指定從國債償還費裏支出二百億日元作爲它的創辦費。無疑地，在這個異常龐大的國債償還費中事實上早已隱藏着直接的軍事費了。

美國不僅通過道奇預算或貿易管理使日本產業軍事化並從屬於美國，而且在一九四九年秋至一九五〇年這一期間美國採取了更直接的形式來加速推行這種政策。日本石油、帝國石油和東亞燃料以及其他幾家日本公司壟斷了最重要的軍需品的石油等——採掘原油和輸入原油的精煉——而這些公司由於“導入外資”，已爲德士古、美孚和其他美國石油資本所控制。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共產黨議員川上貫一在國會指出最近期間不斷大量輸入和儲藏與日本民需毫無相關的石油的事實，並質問

爲什麼要輸入和儲藏石油，輸入石油的所有權究竟屬於日本人還是外國人，而政府對此未能提出任何答覆。

重工業、化學工業的大企業相繼生產美軍軍用品並成爲美軍直接管理的PD工廠（特需工廠），有的雖還未成爲美軍直接管理的工廠，但也已開始了各種的軍需生產或是準備走向這個方向。東日本重工業（舊三菱重工業）的下丸子工廠、富士汽車工廠（舊日軍直轄工廠）和小松製作所相模原工廠（舊日本陸軍兵工廠）等早已爲美軍生產吉普車、卡車等以及修理和裝配各種汽車、戰車和壓路機等。過去屬於日本陸軍兵工廠的赤羽兵工廠改名爲日本製鋼赤羽工廠，廠內劃分爲三個地區，第一地區修理和改造步槍或小型武器零件，第二地區製造戰車零件，第三地區修理七五公厘及一〇五公厘大砲等重兵器和製造高射砲用的卡車零件。日本特殊鋼、五十鈴、日產、豐田和池貝等大汽車製造工廠也全部或局部變爲美軍直接管理的工廠。有些民需產業工廠已由生產卡車轉爲製造登陸艇了，日本製鋼武藏野製作所由生產農業機械轉爲生產登陸艇了，石川島造船工廠的第二工廠也開始登陸艇的製造。日本最大規模的染料工廠三池染料大牟田工廠由減少或停止原來的醫藥品、染料的生產，改爲生產猛烈炸藥TNT原料的硝基甲苯及航空用燃料的汽油等，而且還生產苛性鉀等染料的半製品，這隨時都可以改爲生產可怕的毒瓦斯。保土谷化學王子工廠開始生產可以轉換爲生產炸藥的硝基氯苯和硝基苯，獅子油脂公司的平井工廠、三井化學名古屋工廠、大日本賽璐珞堺工廠、日本觸媒化學公司、日本水泥公司以及其他化學工業的大企業也都開始轉入軍需生產（“產業勞動調查月報”，一九五〇年七月號）。

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工業部門也開始製造軍需品了。例如日本紙業公司龜有工廠把紙製品的百分之四十轉爲火藥箱的生產了（同上）。一九五〇年三月我曾經到長野縣伊那去旅行過，所



說那裏的小規模的製木工廠，只有製造彈藥箱、製造包裝砲身的木筒或其他材料的工廠才因加班、加夜班而出現着景氣，一般民需生產則蕭條得很。

## 二 農業和農民的生活

日本農業對美國的從屬性被加深了。儘管美國佔領軍當局和日本政府採取了反農民的政策，但由於農民的努力，一九四九年日本農業生產大體已恢復了原狀。然而，日本政府不是進一步地設法增加國內糧食的生產，而是盲目服從美國佔領政策的要求，從外國輸入了超過需要量的大批糧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至十二月之間，日本輸入了二百九十萬噸糧食，比日本政府向佔領軍請求輸入的數量還多出六十一萬噸，這與其說是輸入糧食不如說是輸入美國的農業恐慌。一九五〇年的輸入數量是更加增大了，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止共達一百六十萬噸，這些進口糧食的價格，大米每日石為九千六百七十一日元至一萬零七百二十日元，而日本政府向農民強制徵購大米的價格每日石為四千二百五十日元，尚不足輸入大米價格的二分之一！如果將這筆被外國農業資本家和商人賺去的錢，用於本國的農民和農業，對於農民和全國人民將會有什麼樣的幫助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吉田政府一方面百依百順地執行佔領軍的這種政策，一方面向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召開的第六屆臨時國會提出了部分修改“確保糧食臨時措施法”的法案——即強迫追加徵購糧食法、簡稱為“食確法”——遭到了全國農民的猛烈的反對。該法案在衆議院因自由黨佔絕對多數獲得了通過，在參議院的情況則不是那樣的。美國佔領軍對參議院施用了壓力，吉田首相並提出了參議院如果不通過這個法案就是違反佔領政策。結果參議院還是以未審核完畢為名壓下了這個法案。臨時國會於一九四九年

十二月三日結束，次日召開了第七屆國會。儘管在國會開會期間，日本政府還是按照美國佔領軍的指示，在十二月七日以“波茨坦政令”強制施行了“確保糧食臨時措施法”。所謂國會只能按照美軍和日本政府的意志行事，如果違背了它們的意志，那末國會就要遭到上面所說那樣的壓力。並且當時的糧食情況，並沒有緊迫到足以構成藉口來這樣公然地蹂躪民主、必須製訂強迫向農民追加徵糧法案的程度。但儘管如此，它們之所以還要強制施行這項法案的原因，大概是出於這種陰謀，即它們企圖在糧食情況比較好的時期做好法律上的準備，以便一旦發生戰爭等情況對糧食有所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由美國任意榨取日本農民。

在這種殖民地化的農業政策之下，日本農村呻吟於日益加深的恐慌中。由於實行了道奇政策，使得都市人民更加貧困，降低了对農產品的購買力，青菜、水果等非統制物資領先，農產品的價格暴跌了，大米的黑市價格跌到前一年的二分之一以下。一九五〇年四月東京每日升大米的價格由前一年的二百四十日元跌到一百零七日元。大米出產地的黑市價格比公定價格還要低。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接到了美軍總司令部天然資源局的“授意”——等於命令——於三月七日決定：（一）本年度大米在徵購後允許自由販賣；（二）早收米的獎勵金及超額徵購的特別價格，由現行的生產者價格的兩倍減為一點五倍；（三）自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全面取消對主食品的管制制度。

這個政策看起來似乎與僅在四個月前才施行的極端反民主的“食確法”相反，但表面上儘管相反，本質上却是相同的。因為：第一，它使支持自由黨的農村惡霸——地主、富農、農村商業資本家（二者往往合而為一）可以在秋收時殺價收購貧農的大米，自己囤積起來，待大米漲價時賣出謀利，同時也增大了他們以高利貸榨取不得不出賣自用糧的貧農的可能性；第二，它為美

國擴大控制日本農業的道路，因為在帝國主義、反動政府和農村惡霸統治下的農業生產關係是不能滿足糧食的絕對需要量的，是或多或少地需要輸入的。在這種條件下，允許國內自由販賣主食品，可以通過美日兩國政府的關係，便於美國統治者操縱進口糧食，掌握日本糧食的命脈，並可使農村惡霸從中牟利。這對苦於糧食徵購制和糧食統制的農民以及消費者雙方來說，只是以准許“自由”買賣的美名，把萬事推給經濟法則。正如大藏大臣池田恬不知恥地狡辯的那樣：“富人可以吃米，窮人（當然包括農民在內）只好吃麥”，這真是帝國主義的最惡劣的反人民的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後，使它們必須估計到戰時糧食的自給問題，因此這個做法已行不通。但儘管如此，美軍總司令部和日本政府為了必須供應朝鮮，還是採取了與徵購相同的辦法，“追加”了一九五〇年產麥徵購的比例。總之，不管是緩和徵購或是加強徵購，在這些內外統治者的心目中是沒有日本農民和日本人民大眾的）。

日本政府曾不斷企圖推翻“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四月以來製訂了提高佃租的法案，它不顧遠東委員會（五月八日）指令美軍總司令部必須繼續遵守土地改革的原則的指示，同年十二月又製訂了將佃租和土地價格提高七倍的法案。在遠東委員會指令的面前及由於日本農民的反對，一九四九年實行這個法案時，不得不將該年度佃租的提高率比預定的多少予以降低了。但在一九五〇年八月終於實施了將佃租提高了七倍的原來的方案。佃租與土地價格的暴漲是違背“土地改革”的精神的。然而，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又進一步地製訂了包括以下各項內容的法案：即停止強制收買土地；廢除用以保障耕作權的恢復佃耕權的規定；凡被政府收買的土地或未開墾的土地，如認為適合於建築住宅或作非農業用途時，可以把它歸還原地主等。

這類法案不僅停止了“土地改革”，而且替地主打開了收回

土地的道路，使農民的耕作權極度不穩，因此是露骨的反動法案。連麥克阿瑟也認為當時強制實行這種法案反而不利，因而沒有加以支持。日本政府雖暫時擱置了這類法案，但仍繼續製訂了代替的方案，如（一）對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以後新成為離村地主的佃出土地和佃出牧畜地，不再強制收買其超過法定限制面積的部分；（二）對十二月二日以後新發生的不適合耕作業務者超過法定面積的自耕地不指定收買等。總之，這些都是使農村惡霸今後能自由變為離村地主或地主的法律。這些法案得到麥克阿瑟的支持而提到日本第七屆國會，由於農民團體的猛烈反對未獲通過，在第八屆國會上也是以未審查完畢被擱置起來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頒布了“波茨坦政令”，其中規定：（一）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日以前應由政府收買的土地和牧畜地仍按原價收買；（二）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後新成為離村地主者所有之出租土地或出租牧畜地，以及超過法定限制面積的在村地主的出租土地或出租牧畜地，應強制轉讓出售；（三）土地價格最低為現行價格的七倍左右，佃租亦提高七倍。強制轉讓的手續是：（一）公佈應轉讓的土地；（二）土地所有者選定和呈報願承受者的姓名；（三）市町村農地委員會製訂轉讓計劃；（四）縣長批准；（五）發給轉讓證書。如果土地所有者未呈報願承受者，可由政府接受轉讓。這個政令與以前的法案相比較，對地主雖多少有所不便，但它實際上是使他們可以自由決定土地價格，只對土地的轉移加以管制。況且這個政令是由地主惡霸控制的地方政府機關來執行的，既然沒有農民的監視與鬥爭，“強制轉讓”的強制力量即等於零，反而給有錢人開闢了可以大搖大擺集中土地的道路。事實上在農村中已經發生了“曲解”（？），認為這個政令是使地主可以自由收回土地（見後）。

這些反動法案是否會廣泛地使寄生地主復活和成長，關鍵在於農民的經濟情況和鬥爭力量。但是這種千方百計企圖強制實行反動法案事情的本身，已經與土地價格和佃租的上漲以及地主執行徵購制度等相配合，鼓勵地主和農村惡霸奪取土地，給它們以重溫舊夢的希望，增加了他們在農村的政治和社會勢力。這是企圖使耕作權不穩定，從而加深農民對地主和農村惡霸的隸屬地位。<sup>56</sup> 吉田內閣及其主子就是這樣竭力企圖在日本農村中鞏固和培養作為它們的支柱和爪牙的階層。

都市產業部門的加緊解僱和中小企業的破產，使農村的失業和半失業者大量增加了。連日本政府的“勞動力調查”也承認一九五〇年二月在從事農林業勞動者中，每週僅工作三、四小時以下的達七百五十五萬人，較頭年同時期增加了一百九十四萬人，佔從事農林業勞動者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即使在農忙期的六月，一九五〇年也較頭年同時期增加了一百萬人。這對農民的解放和生活的提高給予了怎樣程度的壓迫是不可估計的。民法即使有所修改，但事實上根深蒂固地殘留着的封建家族制度，却掩蔽了這種龐大的農村失業者 and 半失業者，而這種狀態又反過來維持着封建的家族制度。同時它又給工人的低工資提供了條件，那是更不用說的了。

關於低米價的強制徵購和稅金的重担，沒有一一列舉數字的必要。例如迄至一九四九年為止所徵收的地租，從一九五〇年起改為徵收“固定資產稅”，一舉而增為從前的三倍半。這就勢必使居民稅和其他地方稅也提高一倍。<sup>57</sup> 由於佃租和土地價格的上漲，使得農民僅有的一點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也被剝奪了。

所有這些情況，都使整個日本農業日益走向破壞的道路，各地都發生了農民放棄耕地的事件。根據一九五〇年二月的農業調查，與頭年三月比較，農家總戶數約從六百二十五萬戶減為六百一十七萬戶。也就是說戰後有增加趨勢的農家戶數反而變為

減少了。並且這些農戶的百分之五十是兼業農戶（與一九四七年八月的調查比較，在比例上增加百分之五點四，實際數字增加四十六萬戶）。兼業農戶中以農業為副業的第二種兼業農戶的增加尤為顯著，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二十二，共一百三十四萬七千戶（比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五點九，實際數字增加三十八萬戶）。並且這第二種兼業農戶的百分之八十是經營不滿五反土地的農戶，也就是說，這些農戶是將要从農業中被全面地驅逐出來的半無產階級；實際上，他們中不少人已被剝奪了農業經營者的地位。一九五〇年度經營不滿三反土地的農戶比一九四九年度的調查數字在比例上和實際數字上都減少了（附表見第二一九頁）。

從日本政府的統計上可以看出來，戰後日本農業分化的新趨勢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時，最下層的農戶終於被迫全部地或部分地離開了農業，而中農階層則有所增加。這並不表示中農經營的穩固，只不過說明了整個日本農業在殖民地重壓之下，逐漸走向破產，中農吸收了貧農放棄的土地，拚命地設法以圖生存。實際上，根據農林省農戶經濟調查——以中農階層為對象——一九四九年包括農業以外的收支在內的現款總收付中，就有三千五百日元的虧空。一九五〇年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後所產生的“繁榮”，上述農林省的調查宣傳說這項數字有了一萬七千日元的盈餘。即使如此，這也是由於：第一、農業以外的收入，特別是出賣勞動力的增加；第二、農民的經營費的縮減，特別是家庭生活費縮減的緣故。因此，這反而表示農業經營本身虧耗的增大和農業正在走向破產的道路。中農尚且如此，中農以下的農民則不是所謂盈虧的問題，而只是能否活下去的問題了。

這就是在日本走向殖民地化、軍事基地化的過程中，國內外壟斷資本以及與它相勾結，受它所培養、鼓勵和鞏固的地主、惡

需对農民的統治和榨取在“土地改革”後帶給農民的結果。

按經營面積分類的農戶構成變動表(1947—1950年)

	農戶總數	3 未	反 滿	3—5 反	5反—11— 町 1.5	1.5— 2町	2町— 3町	3町 以上	不耕作 農戶	
	千戶	%	%	%	%	%	%	%	%	
全 國	1947年 8月1日	5,909 (100%)	23.9	17.5	31.0	15.7	6.2	3.6	2.1	0.0
	1949年 3月1日	6,247 (100%)	25.8	17.2	31.1	20.8		3.2	1.9	0.0
	1950年 2月1日	6,176 (100%)	23.8	17.0	32.0	15.6	6.1	3.4	1.9	0.1
	實 數	千戶 (1,472)	1,051	1,973	961	379	208	131	8	
全 國 (北 海 道 除 外)	1947年 8月1日	5,702	24.5	17.9	31.8	16.0	6.1	3.2	0.5	0.0
	1949年 3月1日	6,013	26.7	17.0	32.0	15.2	5.8	2.8	0.45	0.05
	1950年 2月1日	5,931	24.1	17.4	32.9	15.9	6.1	3.0	0.5	0.1

每町約等於九九·一八公畝(約等於我國 14.88 市畝)

### 第三節 反对軍事基地和爭取全面 媾和的鬥爭

#### 一 勞工組織的分裂

逐漸使朝鮮的天空慘淡無光的備戰活動，不僅加速了日本變為美軍的軍事基地和日本產業軍事化的过程，把日本工人置於美軍的槍砲威脅下，而且使得对人民的法西斯鎮壓和分裂羣衆組織的工作，自一九四九年夏、秋以來也更加緊了。前面所述的解散“朝联”便是它的第一砲，對於具有戰鬥性的工会會員則變不講理地实行解僱。另一方面，在資本家、政府和美軍總司令

部的積極的保護和鼓勵下，照例以所謂“工会民主化”、“保衛工会免受共產党的控制”的藉口，使工会在战後遭到最嚴重的分裂。一九四六年以來成爲日本工人運動主力軍的全國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会受到了很多次接連不斷的鎮壓和分裂的毒手。左右兩派對立得非常尖銳的國營鐵道工会，自从一九四九年夏天遭到“蔭肅赤色分子”以來，一時處於右翼社会民主主義和法西斯分子的控制之下。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会組織中最強有力的統一組織“全遞信工会”也出現了分裂派，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們組織了全遞信從業員工会，从而使光榮的全遞信工会遭到了分裂。全國自治团体工会協議会（簡稱“自治勞協”）亦於十一月自日本自治团体工会總联合会中分裂出來。這些分裂出來的新工会，与日本教職員工会（九月脫離“全官公”及“全勞聯”）一起，於年底組織了日本官公廳工会協議会（簡稱“官公勞”）而与“全官公”對立了起來。私營企業方面，作爲各企業工会聯合体的，顯示過鬥爭力量的全日本產業別工会會議以及屬於它的各產業工会也早已有“民主化同盟”的組織，這些組織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組成了全國產業別工会联合会（簡稱“新產別”）。在私營單一工会中規模最大又是強有力的工会之一的日“電產”自十一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以後也爲民主化同盟派所控制終於脫離了“全勞聯”。這樣，過去在全國產業範圍內組織了數百萬工人的全日本產業別工会會議現在縮小成爲以全國金屬產業工会爲中心的少數工会的联合体，失去了往年的面貌。

這些日本官公廳工会協議会、全國產業別工会联合会和日本電氣產業工会等工会与全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全國煤礦工会的統一組織，爲民主化同盟派所控制）、全日本金屬鑛山工会联合会（一九四九年七月脫離“全勞聯”）、私營鐵道工会總联合会、海員工会等獨立的大工会以及從來就和產業別工会會議相



對抗的聯合組織日本工會總同盟，在美軍總司令部公開與不公開的援助下，以“民主的勞工統一戰綫”為標榜，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就開始籌劃組織“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簡稱“總評”），一九五〇年三月召開了籌備大會。毫無問題，“總評”原來就是要與“全勞聯”相對抗的組織。從國際方面來說，“全勞聯”是參加了世界工會聯合會的，而“總評”則與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彼此均力圖取得密切聯繫。國營鐵道民主化同盟的負責人加藤閱男得到了美軍總司令部的積極援助，參加了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籌備會和成立大會。美軍總司令部一方面慫恿日本工會參加了這類會議，但當蘇聯金屬工會邀請日本金屬產業工會赴蘇時，卻堅決禁止其前往。它是不讓人民知道蘇聯的真實情況的！一九五〇年三月召開“總評”籌備大會時，該會接到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英國職工大會以及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主席及秘書長的賀電。關於“總評是美軍總司令部的工具”的輿論，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布拉蒂居然作這種解釋：“我是不相信這種愚蠢的說法的，但是，假定這是事實，我們以為這是無上光榮。”（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勞工教育研究會上的演講，見“日本勞動年鑑”第二十四集）

在這些分裂工作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全日本海員工會、全日本造船工會和全日本港灣工會的代表自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起至十一日止在千葉縣的鴨川與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威廉進行了三天的會談。會談結束後，一月十二日全日本造船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從“全勞聯”和“大金屬”組織中退出，接着港灣工會的幹部也相繼悄悄地決定自產業別工會會議退出。朝鮮戰爭爆發後，美軍立即雇用了包括海員在內的約三十萬噸的日本船舶，報紙報道過有關日本人船長參加了美軍浦項登陸作戰（七月十八日）活動的消息（“讀賣新聞”），這些與上述事實不是沒有關聯的。

分裂勞工戰綫的活動，從各個工會起遍及於全世界的範圍。不管分裂的藉口是“工會民主化”還是其他什麼鬼話，工人組織的分裂是大大地削弱了工人的力量，並使佔領當局、資本家和日本政府從心底大為高興。麥克阿瑟在一九五〇年的元旦致詞特別為慶賀分裂的成功讚譽民主化同盟說：“工人也以他的努力和愛國心，對日本的復興作了很好的貢獻。現在他們已脫離了過去的那種不負責任的領導而把舵轉向了正確的方向，正朝着客觀而健全的將來前進”。又說：“工人們一般都是要求穩健的中間道路的”。不幸的是，這些分裂活動和鎮壓不僅削弱了左翼勢力，而且實際上是削弱了整個日本工人階級的力量，從而也使全國人民的力量暫時大為削弱，並使他們不得不後退了一步。

然而，麥克阿瑟大概有些錯覺。這位元帥並不十分了解工會分裂主義幹部與工會會員工人大眾之間的區別。不管幹部怎樣蛻變，羣衆對於為道奇路綫所強制造成的飢餓和失業，不得不挺身起來進行鬥爭，保衛業已被壓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工會雖然分裂為兩個，但工人階級的利害是一致的。工人雖然苦於工會的分裂和幹部的對立，但為現實的生活而進行鬥爭這一點是共同的。自從一九四九年進行年終鬥爭以來，“勞動爭議”的浪潮逐漸高漲了。在這個浪潮的推動下，甚至連國營鐵道的星加要這個衆所週知的社會法西斯幹部也不得不參加了絕食罷工。這個罷工與歷年的年終鬥爭有所不同，在年終過去以後，罷工的浪潮依然沒有低落。一九五〇年三月，參加勞動爭議的人數達一百十二萬人，損失了三百八十四萬個勞動日，就勞動日的損失來說，它比過去最高記錄的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二百四十一萬個勞動日超過了百分之六十。而且，這個鬥爭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反對降低工資反對解僱的防禦性鬥爭，部分地開始轉為要求提高工資的攻勢鬥爭了。此外，這個打破記錄的勞動爭議的主力軍並不是從前的“國鐵”以及其它的日本官公廳工會協議會，而是

全日本机器工会、全國金屬產業工会、全日本金屬礦山工会联合会、全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和電氣產業工会等私營基礎產業的工人。工会幹部中即使是与威廉進行了鴨川会談的港灣工会幹部，也反对遲發工資和解僱，並提出了爲保證他們地位的統一的“集体合同”要求。一九五〇年二月底港灣工会中的神戶港“塔里曼分会”所進行的罷工是第一砲，接着(大)阪、神(戶)和北海道港灣的工人也同時舉行了罷工。這是他們在日本戰後首次進行的罷工。工会幹部說港灣事業是屬於佔領軍的“公益”事業不得舉行罷工，但工人打破了這種幹部的合法主義而前進了。港灣工人對於職業安定所強迫他們服從帝國主義的港灣行政且爲軍事目的服務的措施開始進行反抗了。

儘管羣衆的意志如此高漲，但因爲工会幹部是受麥克阿瑟讚揚之類的人，對於三月攻勢只發表了準備總罷工的聲明而未付諸實行，因而也就未能貫徹所提出的要求，至於它的最大收穫則是羣衆已開始對工会幹部的合法主義進行批判。一九五〇年三月七日，日本政府對於當時的“電產爭議”採取了高壓的態度，內閣官房長官增田聲稱：“即使是一個工会的罷工，如果它的影响及於全國，如果它是重要的產業部門，應視爲違反禁止總罷工的麥帥命令而加以禁止”。但是，第二天与第三天全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全國會員有百分之九十三進入了波浪式的罷工，一脚踢開了美軍總司令部布拉蒂和艾米斯的干涉，舉行了三次罷工。羣衆的這種鬥爭力量，使得以金屬工業工人爲中心的“全勞聯”系統的工会所領導的大企業部門，走向了長期的大規模的爭議。一九五〇年四月日立製作所工会總联合会二萬一千人提出了提高工資的要求，資本家反而以大批解僱（包括“整肅赤色分分”在內）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作爲回答。資本家的這個挑戰，引起了歷時四個月之久的大規模的爭議。從此工人鬥爭的浪潮擴大到大化學產業工会、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全日本電綫工業

工会、全日本通運工会、私營鉄道工会總联合会、全日本港灣工会以及其他部門的各個工会，並發展成爲以全日本金屬產業工会協議会和全日本汽車產業工会爲中心的六月三日“保衛產業總奮起大会”（“日本勞動年鑑”第二十四集）。

這些爭議是工人爭取年終津貼、要求提高工資和反對解僱的經濟鬥爭。但工人或多或少已開始認識到他們的生活之所以遭受破壞，是因爲國際帝國主義和它的附庸吉田內閣執行了產業軍事化、殖民地化政策所致。因此，工人們在鬥爭中廣泛地進行了要求民族獨立、反對產業軍事化和保衛和平的宣傳。在全國金屬產業工会所領導的“日鉄”和“日立”的大規模的爭議中，這一點表現得特別明顯。其中例如等於是美軍直接管理工廠的池貝汽車廠所進行的爭議，就是爲了反對廠方執行美軍總司令部馬南中校解僱共產黨員和工会活動分子的命令。他們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起，進行了五天的英勇的羣衆性的鬥爭，終於迫使廠方撤銷了這個命令。又如日本鋼鐵武藏野工廠，自一九五〇年一月中旬成了美軍直接管理工廠——勝利汽車工廠的加工工廠，從生產農具改爲生產登陸艇。於是工人們對於廠方成爲在美軍直接管理工廠的監視下提出了抗議，並進行了怠工；同時還散發傳單說：“我們知道是誰在變日本爲殖民地，是誰在遲發我們的工資”，“別叫我們先製造軍火，讓我們先製造和平的農具吧！”。

於是，儘管在美軍總司令部積極進行分裂活動和民主化同盟幹部也與之相呼应的情況下，但第二十一屆五一勞動節仍和往年一樣，在東京爭取實現五一節的統一行動——其他地方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干涉，有些未能取得統一行動——有五十萬人高舉和平、獨立的標語牌參加遊行。這一天，日本全國有數百萬人被動員了，這是戰後最大規模的五一勞動節。保證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排除殖民地的頹廢的文化教育，反對報紙、廣播

進行挑撥戰爭的宣傳，停止軍需生產發展和平工業，反對戰爭，反對變日本為軍事基地，堅決反對製造並使用原子彈和氫彈，履行基於波茨坦公告的全面媾和等口號響徹了日本全國。

## 二 農民的活動

在農民戰綫方面，日本農民協會自分裂後不僅迄未統一，而且分裂的程度是更加嚴重了。農民組織中的左右兩派都變得十分無力。因此，如與上述農民的窮困和農業危機的深刻化相比較，一般來講，農民的鬥爭自然是相對地低落了。只是在有好的領導的地方，則從一九五〇年開始才屢次與“勞動攻勢”相配合，或與同一地區的勞動攻勢共同合作，展開了值得注目的農民鬥爭。

從個別的來看，農民鬥爭的規模是比較小的，根據地方的情況，所提出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從整個看來，一九五〇年四月日本共產黨的農民鬥爭的領導者曾對它作了如下的論述。“自一九五〇年以來，農民運動的面貌已經有了變化。在一九四九年秋天至年底的這段時間內，一向為鄉村惡霸勢力所操縱的請願運動，已在反對徵購、米價、農業合作社問題和停止執行土地政策等問題上有了廣泛的開展。特別是進入一九五〇年以後，農民鬥爭擺脫了惡霸勢力的操縱，一開始就展開了以爭取糧食為中心的保證貧農生活的鬥爭。三月至四月之間，曾有二、三千名羣衆進行了包括這些要求在內的反對徵稅鬥爭，並立刻將鬥爭擴大到了全國範圍。電氣產業工會、金屬產業工會以及鄉鎮工廠的工人也參加了這個鬥爭，農民、市民和中小商業者舉行了郡、市民大會和縣民大會，並向稅務署、地方事務所、市政府等處進行了遊行示威。有的地方遊行示威的隊伍還和警察發生過衝突。參加這些鬥爭的工人階級起了很大作用。現在農民鬥爭的特徵是它不僅提出了過去的關於經營方面的要求，而且將鬥爭

轉變為‘保證吃得飽飯’的鬥爭。因此，參加鬥爭的範圍也是廣泛而又多樣的，參加的階層有失業者，木工，泥工，貧農以至中、富農層，鄉村小商人，碾米所工人等。於是鄉村各階層根據各自的要求而進行鬥爭的農民鬥爭，由反徵稅鬥爭而統一起來，並與附近鄉鎮或都市的運動相結合，表現了向地域鬥爭方向發展的趨勢”。（松本三益：“農民運動的新形勢與發展的因素”，載“前衛”雜誌第四十九號）

### 三 市民鬥爭的展開

為了要求和平與民族獨立，不僅有組織的工人，而且連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和市民也都曾反對美國統治集團及吉田內閣所策劃的單獨“媾和”和給美國提供軍事基地。一九五〇年一月，“和平問題談話會”（一九四九年秋成立）中的著名學者們（其中包括第一屆吉田內閣文部大臣安倍能成在內），公開發表了實現全面媾和、反對給任何國家提供軍事基地以及不容侵犯中立的要求；此後，許多學術團體和學者組織也發表了擁護和平的聲明。一九五〇年四月底，連日本學術界的官方最高機關所組織的日本學術會議第六屆總會，也由於民主會員的奮鬥而表明態度說：“我們決心今後絕不從事以戰爭為目的的科學研究”。於是，與世界和平運動相聯系的、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爭取和平運動就從這時展開了。這便是響應“斯德哥爾摩宣言”的簽名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工會為核心而進行的，截至一九五〇年底止，已徵集了六百萬以上的簽名。該宣言把重點集中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要求上，使得任何人都很容易理解，所以它首先在動員千百萬羣眾參加和平運動的第一步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和平與獨立也是學生的強烈要求。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美軍總司令部教育顧問意爾斯在東北大學正預備作講演時，學生知道了他的講演內容是宣傳反蘇、反共並以此為藉口欲使日

本教育殖民地化和壓迫學術研究的自由，於是齊聲反對，終於迫使意爾斯中止了講演。從此以後，以全國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平”和“學術自由”的鬥爭，以空前的速度在全國學生間擴展起來了。

此外，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所舉行的國際學聯反對殖民制度鬥爭日日本中央大會，通過了團結一切青年爭取和平、獨立、自由，實現全面媾和，反對軍事基地化，反對給青年以低工資以及為打倒吉田內閣而組成“青年祖國戰綫”的決議，積極地開始了活動。截至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止，所徵集的新德哥爾摩宣言簽名者約達七十五萬人。

日本婦女的和平運動也有了廣泛的發展。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節，日本民主婦女協議會、婦女民主俱樂部、新日本婦女同盟以及其他婦女團體的代表，還有工會婦女部、共產黨婦女部、社會黨婦女部等的代表共一萬名，聚集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大會，以“反對戰爭和貧困”的口號為中心，通過了“遵守波茨坦公告、實現全面媾和”、“不要製造軍火”等決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國對日“媾和”特使杜勒斯親自接到了甘特烈特恒子、神代田野、平塚雷鳥、野上彌生子和植村環五位日本婦女運動前輩所發起的“日本婦女關於和平的希望事項”，這表明了日本全國婦女不顧思想、信仰和政黨等立場的不同，一致在要求和平。希望事項中強烈地主張擁護和平憲法、要求絕對中立、全面媾和、反對提供軍事基地以及“拒絕把丈夫和兒子送到戰場”等。

對於日本各界的這些決議和聲明，一般報紙和無線電幾乎沒有作過報道。它僅通過各民主團體的機關報、雜誌、傳單或小冊子告訴了國民，只靠這些決議和聲明是不能夠迅速地組織數百萬羣眾採取行動的，這便是它的弱點。然而它的意義是絕不能忽視的。它將來會以某種形式為羣眾開闢採取行動的道路。

日本各階層國民以上述各種方式來表明爭取和平的意志，這是日本歷史上未曾有過的。

#### 四 政黨的重新改組

一方面是殖民地化和軍事基地化的推進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恐慌的尖銳化，另一方面則是人民大眾對它所進行的反抗，為保障生活，要求全面媾和以及爭取和平、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這些情況必然在國會或各個政黨中也引起了各色各樣的反映。一九五〇年初期的特徵就在於日本所有政黨都進行了重新改組。

社會黨在一九五〇年一月第五次大會上終於宣告分裂了。竭力打着階級政黨招牌的左派——但它們也經常強調反共——與主張以“國民政黨”即公開地主張以資產階級政黨出面的右派終於因爭奪黨內領導權而宣告分裂。各報紙視社會黨的分裂為社會黨幹部私人的權利之爭，自然，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社會黨的分裂是因為：左派執心如果社會黨再不稍為表現一點“社會主義的”“階級的”立場，就無法吸引羣衆；右派則亟欲早日與資產階級各政黨聯合以便參與政權。然而左右兩派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又合併了。這是因為以分裂狀態來參加參議院選舉，對於左右兩派的黨魁以及它們的主子是不利的。一九四九年九月曾因積極響應勞農黨提出的共同鬥爭而被開除的足立梅市與和田敏明等人，對這樣的社會黨極感不滿，於是他們與其所領導的縣級幹部以及其他同志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成立了社會黨重建籌備會。他們決定以“保衛民族的完全獨立和自由，反對戰爭，維護和平”，“與勞農黨、共產黨合作，以此為中心來進行組織民族民主統一戰綫”為方針，並向社會黨內部有良心的人們發出呼籲。

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在反動勢力所控制的國會中也有若干反映。如前所述，第六屆臨時國會未通過“食確法”；一九五〇年



三月，第七屆國會強烈地反對了道奇所編製的預算案。衆議院因執政黨民主自由黨佔絕對多數，勉強通過了該預算案，但在參議院就遭遇了重重困難。恰好這年五月是參議院半數議員的改選時期，因此，在野黨自可不必說，就是民主自由黨議員也爲了使自己在選舉中處於有利地位，不得不稍爲僞裝一下採納人民大眾要求的姿態。因此，一九五一年度預算案在進入新年度的四月一日仍未被通過；一九五〇年四月二日，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以二十三票對十二票否決了道奇預算案。本來一般認爲該預算案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中也是難於通過的，但因美軍總司令部與日本政府施以壓力，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才以一〇四票對九十五票勉強通過了。這就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三天間的“財政空白”時期。參議院繼而否決了地方稅法案——這是把全部地方稅約增加到三倍，盡量使地方多負擔文化和社会經費，以便盡量用國家財政來充裕軍事警察費的法案——使它不能成立而告結束。這個法案也是美軍總司令部亟欲通過的，民政局長惠特尼曾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對參衆兩院議長發出強硬通告說：“不同意對該案作任何修改”，然而參議院地方行政委員會却否決了該案，參議院全體會議亦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懼於當天五一節示威遊行的五十萬工人要求和平、獨立和自由的呼聲的壓迫，終以一百零二票對七十三票的多數否決了該案，這是日本國會居然拒絕了佔領當局要求的最初例子。

在國會進行這些活動的過程中，一九四九年秋天又出現了“保守政黨大聯合”的活動。吉田和民主自由黨幹事長廣川表面上說：這是爲了準備“和會”以期政局的長期穩定；其實，這是爲了更徹底地強制實行以國內外壟斷資本爲本位的政策，壓制國民的力量，將民主黨和國民協同黨也合併起來置於吉田的獨裁之下，以期實現資產階級地主官僚的統一戰綫。然而，這個方針首先在民主自由黨內部遭到大野伴睦一派的反對——大野是被

整肅的鳩山的黨羽，他不希望吉田的勢力由於保守政黨的聯合而增強——同時，被號召“聯合”起來的民主黨和國民協同黨的骨幹也反對“聯合”。因為它們對民主自由黨獨裁的前途沒有信心，又因為它們的後台的中小企業或與美國壟斷資本主義並無勾結的一些大資本家，受到吉田買辦政策的摧殘，所以增長了反吉田、反民主自由黨的情緒。於是，吉田等所指望的“保守政黨大聯合”，最後只是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從民主黨的“聯立派”<sup>①</sup>拉出二十三名眾議院議員和五名參議院議員入民主自由黨，並從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起將民主自由黨改名為自由黨。

另一方面，沒有響應保守政黨大聯合的民主黨在野黨派，拉攏國民協同黨，於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召開黨大會並聲稱其目的在於“力求統一進步的國民勢力”，於是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以民主黨、國民協同黨兩黨為核心，並吸收小黨派的數名議員參加，成立了“國民民主黨”。這個玩弄所謂溶合了中庸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優點的煽動性空話的國民民主黨，只是一個不滿意吉田自由黨的大中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的黨，其中成分複雜，包括着多少具有民族資本家色彩的、法西斯分子的以及其他各色各樣的成分在內。

## 五 共產黨情報局對日本共產黨的批判

雖然與資產階級各政黨以及社會黨的分裂或聯合有本質上的不同，但在民族危機再度加深的漩渦中，共產黨也不得不起一大變化。日本共產黨儘管還有不夠的地方，然而它曾把日本的民族危機及時地告訴人民，一九四八年四月它提倡組織民族民主統一戰綫，從此，民族鬥爭的意義才逐漸地廣泛而深刻地取得

<sup>①</sup> 民主黨內當時分為“聯立派”和“在野黨派”，聯立派一直是贊成與吉田合作的。——譯者

了國民的理解。一九四九年九月共產黨首先預計到形勢的發展，號召為反對單獨“媾和”與軍事基地、立刻締結全面和約以及媾和後撤退一切佔領軍隊而進行鬥爭，於是上述的爭取獨立與和平的羣衆運動才有了發展。然而，共產黨當時却未曾對國民大衆明確指出佔領軍的性質，黨的最高領導人之一野坂參三甚至發表了即使處於佔領制度下亦可經由和平方式建立人民政府之類的演說和文章。縱令這是矇混敵人眼界的一種偽裝，但當時的客觀形勢已使這種理論有了發展，它只能給國民以錯誤思想，不僅絕不可能引導國民擺脫民族危機和保衛世界和平，而且會帶來極大害處。因此，必須迅速糾正這種“理論”，指出爭取獨立與和平的正確道路。一九五〇年一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對此作了嚴厲的批評。該刊稱：

“在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和朝鮮的掠奪計劃失敗之後，美國國務院和美國軍國主義者就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於日本，作為反對蘇聯和反對亞洲各國民主運動的軍事冒險的主要基地。首先，他們企圖用種種無稽的藉口來拖延對日和約的簽訂，並且用這種辦法來使美軍對日長期佔領合法化。”“美國侵略者支配着日本政治經濟。”日本在美國帝國主義的“統一支配之下”，日本產業在美國控制下趨於軍事化，日本全國也美國軍事基地化了。麥克阿瑟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對倫敦新聞特派記者公然宣稱：“我已經在沖繩島修築二十五個飛機場，這些飛機場保證我們超級重型轟炸機每天進行三千五百次飛行……太平洋現在是盎格魯·薩克遜湖。”“日本資本家並沒有落後”，國家財政預算就是純為照顧它們的利益而編制的。

“恢復軍國主義日本以及鎮壓民主運動早就是日本反動派與美國帝國主義者集團的共同目標和基礎。除了這種共同目標之外，這個集團的每個參與者還在試圖實現各自的計劃。日本

反動派是在利用在日本有利害關係的美國資本家作為同盟者，靠他們來支持日本反動派在日本的政治影響；而美國帝國主義則利用日本反動派作為一種工具，有了這種工具，就更易於摧殘日本的民主團體與建立對日本的完全的政治與經濟的統治，就更易於使日本變成軍事冒險的基地以及使日本人民成為砲灰（中略）。

“共產黨組織、工會和日本一切民主力量應該將勞動人民團結起來，天天不斷地揭露外國帝國主義者在日本的殖民地化計劃以及日本反動派的賣國和反人民作用。它們應該為日本的獨立，為建立一個民主愛好和平的日本，為立即締結公平的对日和約，為從速撤退駐日美國軍隊，為保證各國人民間持久和平而進行堅決的鬥爭（中略）。但是，事實說明，日本共產黨某些領袖的言論並不在於成功地執行這些重要的任務（中略）。例如，日本共產黨領導人物之一野坂在分析日本國外國內政治形勢時曾力圖證明：戰後的日本具備着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條件，即使處在佔領制度的條件之下；他還進而硬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日本國土上的本地化。’”<sup>①</sup>

如此，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觀察家徹底地批判了野坂對於佔領軍的錯誤認識以及人民可經由國會獲取政權的錯誤理論。

接着上述批評，中國共產黨也發表了批評。日本共產黨自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開始繼續三天舉行了第十八次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全體一致接受“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批評的積極意義”，並按照這個路線決定了新政策。野坂自己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亦發表了自我批評。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批評不僅引起了日本共產黨深刻的自我批評，而且給廣泛的人民大

①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譯者

衆——甚至包括熱心的反共主義者在內——指明了民族的敵人並喚起了民族意識。麥克阿瑟早已看出了這種情況，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他在日本新憲法實施三週年時暗示將使共產黨非法化。他說：“過去有人以爲日本共產主義在國內運動上，較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可能保持較爲溫和的路綫，但是，現在日本共產黨公開屈服於國外的干涉……，它已成爲違反日本利益的黨，並採取了不利於日本國民的運動方針，根據這個事實，顯然上述認識是完全錯誤的”，因此，可以考慮把它置於法律的保護之外。這說明麥克阿瑟是如何地害怕清算了野坂“理論”後的日本共產黨的影響力量。

## 六 戰爭前夕的鎮壓

儘管如此，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爲了紀念在一年前的這一天因參加反對公安條例遊行而被殺害了的東京都電車公司工人橋本金二，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人民廣場”召開了爭取全面媾和的人民總奮起大會，約二萬工人參加了這個大會。

十二點半鐘的時候，大西兼治等五、六個工人走近正在會場記錄到會者的演說的丸之內警察署的巡警須藤，對他說：警察的這種特務行爲是違反遠東委員會關於日本工會運動的十六項原則的，要求須藤停止記錄並由須藤交出記錄紙。正在這個時候，美軍“反間諜情報機關”柯恩中士跑來向大西說：爲什麼“奪取”記錄紙（引號內的字是檢察官所說的），當他追問理由和姓名地址的時候，“八個”工人把柯恩中士“摔倒了”，接着把前來援助的美籍日人山下下士和山本中士“推倒在地上毆打”。會後遊行隊伍正走到日比谷公園，美軍士兵爲拘捕上述“暴行”事件犯人，衝入工人隊伍拘押嫌疑分子，並帶走了當時進行反抗的日本人；當天傍晚，又在丸之內警察署附近拘捕了兩個人。橫遭拘捕的這八個工人被付諸美軍軍事審判，罪名是“以共同意志採取共同行

動，故意且非法抗拒佔領軍的公務命令”，“以共同意志採取共同行動，故意且非法對佔領軍人施以暴行”。這個審判僅花費四十小時就宣告結束了，判決結果，大西被處以苦役十年，其他六人被處以苦役七年，一人被處以重役五年。

這次事件的第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大西是否“奪取”了須藤巡警的記錄紙，須藤巡警說是大西奪過去的，而大西說是須藤交給他的。記錄紙並沒有撕破，據巡警作証說：它沒有撕破是因為“大家圍上來脅迫他交出去的”。當大西跟須藤要記錄紙時，須藤也許感到被“脅迫”而不得不交出來，即使這是事實，這也絕不能算是行使暴力，而只是口頭交涉。當時因為美軍“反間諜情報機關”的軍人走上來，所以許多日本工人也跑來問“是什麼事情”，於是說是發生了“暴行”，但是，所謂遭受“暴行”的軍人却連一點傷處也沒有。即使說曾遭受“暴行”，但也毫無証據可以證明加害者就是被告們。檢察官當做証據的照片，雖然模樣有點像被告，但從這個像片中却顯示出來他並未從事“暴行”，相反地，這是與“暴行”毫無關係的。辯護律師們曾經明快地指出：不僅毫無証據可以證明八名被告曾有“出於共同行為的暴行”和“出於共同意志的暴行”，而且既不可能有這種事實，也並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實。然而審判長却完全置之不顧。關於這次裁判的詳細速記，載於“報告”雜誌第五十二號中。

這次審判是匆匆忙忙地在六月三日宣佈了上述的判決，這一天正是參議院選舉投票的前夕，也就是預定舉行“突破產業危機人民大會”的那一天。於是日本全國的報紙和廣播都大肆宣傳“對佔領軍施以暴行者”被處刑的消息，並極力譏諷具有戰鬥性的工會和共產黨。政府、自由黨和進步黨自不必說，連社會黨以及自命並被公認為所謂“有識之士”和“進步人士”者，居然也責難共產黨終於對佔領軍行使暴力。即使日本的報紙和廣播沒有力量要求公平的裁判，但為什麼不根據在法庭所提出的事實

作公正而客觀的報道呢？是沒有這種自由呢，還是有其他特殊原因呢？不久的將來，歷史將判決誰是暴行者，誰是和平捍衛者。

五月三十日事件成爲進一步大規模地鎮壓的藉口和預兆。以全國金屬產業工會和全日本汽車產業工會爲中心，預定六月三日在全國舉行“突破產業危機人民大會”，而全日本金屬產業工會（十三萬人）、全日本汽車產業工會（四萬五千人）、大化學產業工會（三萬五千人）和日立總聯合會（三萬三千人）各工會亦已正式指令所屬工會舉行罷工並參加此次大會。全日本造船工會所屬的長崎造船所一萬工人按照預定計劃自六月二日至五日舉行了罷工。預計京都、橫濱和北九州等重工業地區將要展開罷工的浪潮。瘋狂的日本政府於六月二日下午八時，突然宣佈自三日至五日之間禁止在東京舉行一切集會和遊行，並於六月三日動員東京都內七十三處警察署和全部消防隊準備採取行動。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既沒有憲法又沒有任何法律的。日本各地爲反抗這種橫暴的壓迫都舉行了罷工。

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的參議院選舉等於是在首都戒嚴中進行投票的。值得記住的是，這種選舉就是美國式的民主主義和“自由國家”的選舉。選舉結果，當選者爲自由黨五十二名，社會黨三十六名，民主黨九名，共產黨及其所推薦者七名，綠風會九名，其他十九名。自由黨在這次選舉中力圖使六十至八十人當選，曾供給每個候選人以一千萬日元至二千萬日元的選舉費，採取了收買以及其他一切不法手段，然而，儘管如此也只有五十二名當選，得票數也比上屆衆議院選舉時減少了一百萬票。民主黨也同樣地減少了一百萬票，這些票流入了社會黨、綠風會以及其他無黨派人士之手。共產黨及其所推薦的候選人的得票總數爲二百八十八萬餘票，較上屆衆議院選舉得票數約減少了十萬票。這次選舉是在事實上的戒嚴中舉行的，而共產黨所得票數

之所以能与上屆選舉中一舉当选三十六名議員時沒有多大差別，就表明渴望和平与独立的羣衆並沒有屈服於官方的鎮压，同時也表明共產党的潛在力量。

麥克阿瑟曾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發表聲明說：“共產党已被‘粉碎’，只有極少的殘餘分子还在蠢動而已”。但是，大概他看到他的聲明以及五月三十日事件和六月三日事件的鎮压，都對於選舉未曾起什麼作用，所以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指令吉田政府解散日共中央委員會以及“整肅”日共全体中央委員。次日，日本共產党機關報“赤旗報”的編輯幹部等十七名也被整肅了。原來是整肅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法令——“褫奪公職令”，現已成為維持法西斯統治的武器。於是在日本全國各地，以有組織的工人為主舉行了反对暴力鎮压的抗議罷工和集會。这使得日本政府不禁惴惴自危。於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政府要求法院對三鷹事件被告判刑（三名判处死刑），藉以恫嚇人民，从六月十六日開始，更無限期地禁止了全國一切集會和遊行。这种橫暴的壓迫毫無任何法律和政令條例的根據。只是由國家警察本部長官命令全國的各警察隊長，由東京“警視總監”以地方自治單位警察联合会會長的身分与全國地方自治警察採取“联系”後加以執行的。中央集权的警察由於“警察民主化”的結果，按理說已應該不存在了，然而事實上確是如此。對於这种情况，報紙和廣播不僅不曾提出任何抗議，甚至也未曾作过正確的分析。歷史証明，對共產党的鎮压意味着立刻就將剝奪全國人民的自由，同時也意味着战争即將到來。這個歷史的公式是很符合於事实的。



## 第七章 日本重新武裝与法西斯化

### 第一節 加强軍事、警察力量与 動員一切反動勢力

#### 一 警察後備隊的創設

不論是個人或國家，在行動中遲早總會暴露出它隱藏在內心深处的真相和秘密的。戰爭是國家行動中最冒險的行動。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充當了“聯合國軍”也就是美國軍事基地的重要角色，於是過去以抽象的花言巧語欺騙人民的事實，也就全部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一九五〇年一月為麥克阿瑟所強調，又曾為吉田政府和自由黨以及其它方面所宣傳的日本“自衛權”的意義，現在已極具體地顯示出來這是作為日本重新武裝的第一個步驟。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僅隔兩個星期，即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日，指令吉田政府建立七萬五千人的“國家警察後備隊”，並將海上保安廳的名額增加八千人。為了使日本政府在國會中不致因違法挪用預算而遭受反對，為了使日本政府不必為籌劃經費而感到困難，麥克阿瑟不惜為此作具體的規劃，指令挪用債務償還費作為此項措施的臨時經費。這與佔領初期所發生的抽象的“民主化”指令，適成一個顯明的對照。

日本政府一接到這個指令，立刻就非常迅速地採取了行動。首先，為了避免受國會中民主勢力的任何阻撓起見，不採取法律形式而利用了“波茨坦政令”的形式。一九五〇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立即公布了“警察後備隊令”，並為招募志願者等等而大肆

宣傳，八月二十三日在全國業已有七千名第一批後備隊隊員，穿戴上了仿照美國兵裝束的隊服和隊帽。

日本政府過去接到關於“民主”政策的指令時，對於它的實行總是盡量加以拖延，相反地，這次在設立警察後備隊和加強海上保安廳的大事業上，為什麼又進行得如此巧妙呢？法令和規則的制定也許幾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僅以一個半月的時間就全部完成了隊員的徵募，特別是全部準備好了隊員的制服和武器，並把它輸送到指定的地方，却不是通常所能辦到的事。這暗示着設立警察後備隊的準備工作很早以前就在秘密地進行了。此外，麥克阿瑟總司令部戰史編纂室的舊日軍參謀們和韋洛比少將等所草擬的重新武裝計劃，一九四八年秋以來美國關於建立日軍和“利用人力資源”的研究，日本一九五〇年度預算案中國債費的激增，所有這些都是警察後備隊早已有充分準備的證明。一九五〇年初，服部卓四郎、鎌田詮三、有末精三、田中隆吉、河邊虎四郎、野村吉三郎等舊陸海軍將領、高級參謀、右翼團體及民主自由黨幹部等曾不斷接觸，商討重新武裝計劃，這在當時就已有具體的揭露了（見“續日本地下組織”，載於一九五〇年二月“真相”雜誌特輯）。當時不大相信這個消息的人，如果看到這些舊軍人們今天也正是武裝計劃的中心人物的這一事實，大概再不會懷疑所揭露的基本事實的真實性了。

這樣迅速編成的警察後備隊，在一九五〇年底配備了美國所“借與”的卡賓槍和機關槍，成為純粹是美國式的輕武器裝備的四個步兵師。“借與”的武器有損壞時需要賠償，至於武器的管理，直到最下層機構都是由美軍掌管的。於是在武器管理的名義下，也就“管理”了部隊本身。代替師團司令部的“管區本部”，第一處設於東京，第二處設於札幌，第三處設於舞鶴，第四處設於福岡。在全國以大隊或聯隊為單位設立了三十七個兵營，這是按照美軍用語叫做兵營的。他們的訓練是由美軍將校

和下級軍官用英語夾雜着一兩句日本話來指導進行的。

海上保安隊也根據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波茨坦政令”，將名額由一萬人增加為一萬八千人——不包括事務職員在內——將它所保有的船舶（艦艇）由二十五艘大量增加至二百艘，排水量由五萬噸增加至八萬噸，並新設立了海上保安大學及海上保安訓練所，也就是海軍士官學校。

警察後備隊是非常殘酷的處所。根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管轄後備隊的大橋國務大臣在國會的發言，當時有一千名隊員因肺部患病而被“解僱”。三個月以前還是身壯力強的青年，現在則面黃肌瘦地回到鄉村去了。過去天皇的軍隊雖然封建冷酷，但至少還負責把害病的隊員送往軍用醫院治療，而警察後備隊連這一點也不做。它是按照美國現代化的“理論”來解僱和開除他們的，即“病人不能使用，對不能使用的人就不發給薪水並叫他滾出去”。最初因貪圖五千日元的月薪以及服務二年後退伍時還能拿到六萬日元退職金，所以許多人都狂熱地應募。但因大家逐漸知道了上述實際情況，並日益擔心被送往朝鮮代替美國兵充當炮灰，於是，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前這一年之間，竟出現了一萬人以上（佔全部人員的百分之十四）的退隊者。而為了補充這一萬名缺額，曾徵募志願者，但這一次全國只有三萬人報名。

政府一直說警察後備隊不是軍隊，完全是維持國內治安的“警察”。即使在理論上，警察與軍隊之間也並沒有明確的界限，不過這裏姑且不論，但僅就上述的師團配置、美軍對它的指揮和訓練、以及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季編成後備隊以來的歷史來看，顯而易見，警察後備隊就是第一批的殖民地軍隊。它首先是為了鎮壓日本國民爭取和平與獨立的鬥爭的軍隊，其次是為了補充美國帝國主義的軍隊。麥克阿瑟本人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在美國國會說：日本的警察後備隊是做照美國軍隊編制的，“與其

說它是單純的警察力量，不如說它是警備軍”；並且當議員詢問這種察警後備隊“能否轉變為強大的保障國際安全的軍隊”時，麥克阿瑟“很有把握地表示同意”，並回答說：“那是很容易的事”。不僅如此，他還曾考慮過如何把警察後備隊派遣到朝鮮作戰的方法。

問題不在於後備隊是否是軍隊或警察，重要的是在於它究竟是什麼性質的軍隊。首先，如上所述，就其成立的歷史來看，其次就其編制、指揮命令系統以及裝備來看，無疑地後備隊就是供美國統治者使用的殖民地僱傭軍。警察後備隊的一切裝備全部依賴美國，這不只是經濟上的問題，而且是政治上的問題，這意味着日本沒有指揮這個軍隊的權利。不僅後備隊的訓練是美國式的，而且各兵營的隊長即使是日本人，他也沒有實權，而在警察後備隊編制之內的、充當“顧問”的美國將校或下級軍官才是真正的隊長。警察後備隊隊本部的長官和次官雖然是日本人，但長官室的隔壁就是外國人的辦公室，一切事情全在那裏決定。美國議員和麥克阿瑟所說的“強有力的國際軍隊”的後備隊，它的實質就是如此。

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季以來就主張為美國而重新武裝日本的漢森·鮑德溫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曾說：“美國不得不期望西德和日本供給為应付世界各地局部戰爭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因此，美國必須及早締結對日單獨和約，使日本擔負其‘防衛’的責任和提供軍事基地，並應以‘聯合國’的名義來組織日本和其它國家的軍隊”（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朝日新聞”）。與漢森·鮑德溫同樣很早就熱烈主張日本重新武裝的艾契柏克中將在一九五〇年年底毫不掩飾地說：“美國軍隊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軍隊，而日本人則是最廉價的陸軍。”、“只要天皇陛下下一道命令，立刻就可建立二、三百萬的精銳軍隊”（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國“新聞週刊”雜誌）。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前來日

本的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羅森堡說：“我对日本警察後備隊的關心，是出發於人力資源的觀點。我們信賴後備隊，將來也是這樣”（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朝日新聞”）。總之，自始至終，就是為美國提供人力而已。這就是警察後備隊、同時也就是重建日本軍隊的最主要的基本特徵。

警察後備隊和日本的重新武裝第一是為美國充當殖民地僱傭軍，第二是為日本壟斷資本、天皇制官僚，地主惡霸以及其它反動勢力充當對內鎮壓人民、對外企圖復活帝國主義野心的一種工具，這一點也是必須加以重視的。這些反動勢力早就渴望准許它們重新建立軍隊。資本家把重新武裝和戰爭當做他們獲取利潤的最佳辦法，日本國會議員在投降後不久就肆無忌憚地對美國人說：“西伯利亞將滿足新民主日本的一切需要”（馬克·蓋因：“日本日記”，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記）。本來日本軍部和政府都認為：即使要投降，也只是對美、英投降，並不曾打算對蘇聯和中國投降。現在它們認為期待已久的機會終於到來了，於是開始大肆宣傳重新武裝。日本參議院議長佐藤於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說：如果“聯合國軍”招募志願軍時，日本人可以應徵（報紙曾大肆刊載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美國參議員馬格納遜在參議院提出准許招募日本人為美軍志願兵的法案）。如果突如其來地說要重新武裝，勢必遭到國民的反对，因此，先宣傳任何國家都有“自衛”權利，或必須“獨立自主”“保衛國土”，就成為自由黨和民主黨（以及麥克阿瑟）所採取的推進重新武裝的戰術（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星期每日”週刊）。過去說“還不到談論重新武裝的時候”或“不從事重新武裝”的吉田首相，現在他也說“正在考慮自衛的方法”了（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這裏所謂方法不外乎承認美軍長期佔領日本，提供軍事基地；總而言之，就是後來成為“美日安全條約”的具體內容以及日本本身的重新武裝。

在这种情况下，前首相蘆田均便非常率直地提出了重新武裝的主張。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他就重新武裝日本的办法向美軍總司令部提出了意見書，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他在他的故鄉發表演說曾力陳重新武裝的必要。他說：“爲了重新武裝，本來最好是修改憲法，但要修改憲法就得經過國民投票。顯而易見，親身體驗到戰爭悲劇的許多婦女对此勢必加以反对，投票的結果大概不能免於失敗。估計到这些情况，憲法的修改必須再等待一個時期。代替修改憲法的妥善办法就是各政党採取一致步調，接受單獨‘媾和’條約，在‘聯合國’的支持下進行武裝。”據新聞記者報道，蘆田關於重新武裝的論調：“並不是忽然心血來潮，而是在相當長的時間与各方面联系和徵求意見之後，才認爲最大公約數是建立十五個師，共二十万人”（同上“星期每日”週刊）。如此看來，所謂“自衛”“自衛”云云，只不过是日本方面來响应上面所引用的漢森·鮑德溫的言論而已。他們所能做的事情也不可能超出這個範圍。因爲，爲了日本的“自衛”，首先就必須撤退一切駐在日本的外國軍隊。既然他們不主張這樣，那麼不管名義如何，讓外國軍隊駐在日本，並在它的指揮下（所謂在“聯合國”指揮下實際上就是在美國指揮下）建立日本人部隊，不言而喻，这只是把日本人当做“人力資源”而已。

日本舊職業軍人和各種右翼集團認爲蘆田和吉田的重新武裝計劃过分依賴美國，於是稱他們爲“親美派”，因而這些軍人和集團拿起重新武裝計劃夢想再走復活“大日本帝國皇軍”的道路，但這種計劃在目前也不过是夢想而已。

## 二 警察力量的增強

与建立後備隊同時，警察本身也大爲增強了。例如允許稅關官員攜帶武器（根據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改後的稅關法），賦予鐵路公安人員在鐵路設施內与司法警察有同樣的权

限，並准許他們攜帶手槍（同年八月一日）。九月三十日設立了“出入國管理廳”作為外務省的外局；藉口所謂“鑑於朝鮮事件以後非法入境者激增”，並設置了出入境審查官和警備官，還准許他們攜帶和使用武器，以便強迫為日本政府所討厭的朝鮮人撤離日本並執行如同司法警察的取締“非法”入境者的職務。這不外是以新的規模大力復活了過去的“特高警察”的“外事科”和“朝鮮科”而已。

於是這就陸續新設和加強了不屬警察法範圍的警察，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法務府特別審查局的大規模擴張。作為法務廳特別審查室而成立（一九四八年二月）的特別審查局是過去特高警察變相的東西，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特別審查局的編制起初不到一百五十人，以後年年按幾何級數的速度急劇增加，朝鮮戰爭爆發前夕增至五百三十七人，戰爭爆發後八個月增至一千二百人，一九五一年度補充預算時增加到三千人，在一九五二年度預算中又增加到五千五百人。特別審查局在法律上並不是警察，特審事務官完全沒有警察官所具有的權限，然而，他們擅自使用如下的文件，從事警察也無權進行的家宅搜查和查封沒收。

“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譯者）×月×日

法務總裁 大橋武夫

××××先生

禁止日本共產黨宣傳教育部發行的黨的活動方針的出版

根據昭和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暨同年七月十八日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致函內閣總理大臣的兩項指令，命令無限期停止所有日本共產黨機關報及其代替報紙或同類報紙的發行，本人奉內閣總理大臣之命執行上述措施，特此傳達執行。”

在這個文件的任何字句中也並未賦予特別審查局人員

以搜查人民住宅並隨意拿走東西的权限。然而，特別審查局人員就憑着這張紙條來襲擊人民住宅，從床下到天棚到處搜查，任意搶奪，甚至連公開出售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或單人像片也都沒收了。當人民抗拒這種非法行為時，特別審查局人員便傲慢地說：“你該知道我的手就是麥克阿瑟的手，這是麥克阿瑟的命令，它勝過日本的憲法”。如果再繼續抗拒非法搜查，就將成為妨礙執行公務的現行犯。這就是美國式的吉田“民主主義”的實質。這不是比過去特高警察更惡劣的警察專制是什麼？

一般來說，警察的品質是日趨惡劣，他們威脅着基本人權。甚至根據法務府的調查，自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九月止，法務府受理的侵犯人權案件達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件，其中五百三十八件實際上係由警察等特別公務員所犯的案件，這裏面包括“暴力侮辱”案一百三十八件，致傷致死案八件。連法務府也承認，警察侵犯人權“表現了極顯著的增加趨勢”。不容忽視的是，此外還有幾十倍，不，幾百倍如啞吧吃黃連無處伸冤的案件。而警察的變成獨斷行事者則是他們的主子法西斯化的具體表現。

隨着特別審查人員即特高的加強，中央集權的警察也加強了。一九四八年麥克阿瑟以得意的花言巧語形容中央集權的警察說：“如同過去它在日本封建時代所表現的那樣，今天它也是近代集權主義獨裁制度的顯著特徵”。於是麥克阿瑟指令改變舊的警察制度，將它分為國家警察和地方單位警察，要警察必須作“國民的公僕”。但事實上日本警察從沒有一次當過國民的公僕，也沒有作過這樣的努力。警官學校教務長弘津恭輔在他所寫的“致新警察書——國家與警察”這本警察教科書中（一九四八年出版），就正面否認了公僕精神。他說：“據稱新憲法下的警察精神，是由‘天皇陛下的警官’轉為‘公僕的警官’。我不能理解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於是他主張警察仍然“要服從天皇



陛下的聖心”，並應遵循“作為天皇陛下的警官的理想”。麥克阿瑟對這樣的警官學校一句話也沒有譴責過。此外，照理說中央集權的警察應已不存在了，但事實上，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禁止全國集會和示威遊行時，却運用了中央集權的力量動員了國家警察和地方警察。

等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則在法制上也明確規定了警察的中央集權化。首先規定了市區以外的自治警察可以由居民投票加以廢除。因為地方自治單位財政苦於警察費的開支，於是，自由黨、民主黨以及其它地方惡霸在該法律公佈後，立即進行富於煽動性的宣傳說：如果撤銷警察就可以減輕賦稅的負擔。截至一九五一年九月底止，日本全國一千三百十四個鎮、村的自治警察中，決定撤銷的達一千二百十四處。然而鎮、村的財政負擔並沒有因此而稍有減輕。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削減了相當於警察費的平衡財政津貼所致。只有徹底廢除國家警察和地方警察而採用民警制度，才是改善地方財政和維持鎮、村居民治安的方法。顯而易見，即使做不到這樣的地步，至少要廢除國家警察和警察後備隊，把這筆費用分配給地方政府，並以民主方式選舉公安委員。實際上，一九五一年一月的全國市長會議也曾通過了要求撤銷國家警察的決議。但政府不顧這些民主要求，卻把國家警察的名額增加了五千名，原則上是把被撤銷的地方自治警察吸收到國家警察中去。不僅如此，還規定如經縣長要求，國家警察即可在地方自治警察管區內行使職權。於是中央集權的警察這樣一來就變得穩如泰山了。

首相吉田和自由黨之所以對“行政整理”特別熱心，它的真正意圖就是在從事上述的重新武裝和加強警察力量。他們藉“行政整理”之名，一方面把社會福利和文化教育等和平民主事業費用縮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則把預算和人力集中在軍事、警察以及徵稅問題上。這些軍事、警察和徵稅機關是受外國控

制的，而一般殖民地國家機構的形態也或多或少就是如此。關於這種官僚機構的軍事化和附庸化，從預算中的官吏編制名額來看，一方面是一般職務的行政官吏或通訊、鐵路、專賣等國營事業的員工年年減少，另一方面是只有特別職務的國家警察、後備隊和稅務官員等則在顯著地增加。

一般會計的編制名額（單位：千人）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一般職務	225	217	177	155	151	149
特別職務	149	205	280	269	356	354

特別會計的編制名額

郵 電	487	436	443	405	406	412
國 鐵	607	604	627	500	498	469
專 賣	33	36	41	38	41	40
共 計	1,619	1,599	1,677	1,458	1,539	1,519

上表係根據平野義太郎：“日本和平經濟的考察”。

### 三 反動勢力的總動員

在加強軍事和警察力量的同時，各種反動勢力都開始總動員了。當共產主義者、工會活動家、進步的知識分子和愛好和平的人士被奪去職業，被奪去言論機關，遭受各種迫害的時候，五年前作為戰爭負責人、極端國家主義者等等“不歡迎的人物”而被整肅的人們却陸續重新出現了。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對曾經請願要求解除整肅的人，大批解除了其中一萬零九十名的整肅。同年十一月八日，以甲級戰犯被判處了七年苦役的重光葵，以刑期已逾四分之三，且服役

態度良好爲理由，被釋放出獄。同年同月三十日又有三千二百九十七名正規軍人被解除了整肅。預定計劃是派他們來充當警察後備隊的幹部。一九五一年五月，駐日美軍總司令李奇微准許日本政府對於根據佔領軍命令所發出的政令重新加以考慮。因此，日本政府立即進行大規模的解除整肅。六月解除了七萬人，八月又解除了包括四千多名舊軍人在內的一萬三千人的整肅。這樣一來，與禁止和平集會同時還使戰犯重新出現了。於是，除與軍事方面有關者外，一般被整肅者幾乎都被解除了整肅，剩下的僅有一千人左右，而這些人也逐漸地被解除了整肅。因總司令部特別命令而被整肅的鳩山一郎也恢復自由了。此外，與解除整肅的同時，還放寬了對被整肅者各種活動的限制，放寬了對教員和工會人員的整肅，撤銷了和財閥有關係的職員的就業限制，還大大放寬了對舊特高警察以及保護觀察所職員等的就業限制。

曾經暫時不敢露面的戰前右翼團體也陸續出現了。主要的右翼團體有“日本革命菊旗同志會”（戰後較早成立的右翼團體）、“大和黨”（一九四九年三月成立，以曾經在駐華特務機關工作的人員爲核心）、“新生日本國民同盟”（一九五一年五月成立，以舊紫山塾頭子本間憲一郎爲核心的舊右翼團體，主体有前大將真崎甚三郎、前中將根本博以及其他舊軍人，並連結了“勤皇忠誠會”、“大日本生產黨”、“愛國社”以及由蘇聯歸國的軍國主義者組成的“太陽梯團”等團體）、“協和黨”（一九五一年八月成立，以故石原莞爾領導的東亞聯盟等爲核心）以及前東亞聯盟系統的“民族新生運動”等；至於其他以前右翼團體法西斯分子的個別活動以及其他小團體則是不勝枚舉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東京新聞”報道，將近二千個右翼團體在特別審查局進行了登記。

如同戰前那樣，這些右翼團體都是以反蘇反共擁護天皇制

爲最高綱領的。唯一的不同是，戰前它們以反英美主義爲其重要的招牌，但現在則与此相反，已變成了美軍權力的忠實奴僕。其中某些團體的活動，例如民族新生運動等，標榜着民族主義，似乎也主張擺脫美國的統治而完全獨立，但它們並不採取要佔領軍即“駐日軍”立即撤退和廢除美日“安全條約”及“行政協定”等爲實現民族獨立的具体行動。本來它們只不过是依靠着承擔帝國主義暴力統治的一部分任務而存在的，因此，它們甚至不可能主張純粹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從前，它們是日本軍部的外圍團體，現在它們已得不到如同從前軍部所給予它們的援助了。然而國內外的壟斷資本家們却給它們以援助和鼓舞。資本家似乎也了解利用舊右翼團體來破壞現代的羣衆運動是沒有多大效果的，但仍然讓舊右翼團體扮演這樣的角色，如亂打罷工工人，或以恐怖手段對待羣衆革命鬥爭的領導人物等等。只靠這些來破壞現代的羣衆運動委實是太不濟事了。所以國內外的統治者們要求從羣衆組織內部進行破壞。以市井流氓分子爲核心的舊式右翼團體已不能勝任這個任務了。於是必須在各項工作崗位、工會和農民協會中培養執行這項任務的人。“愛國工人運動”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被培養的。

民主主義者應該特別警惕的現代日本法西斯羣衆組織，就是這種“愛國工人運動”。這是由國營鐵道工會的法西斯分子頭目星加要等所組織的團體。起初，它們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勾結，在工會、農民協會“民主化”的口號下，進行分裂工作，驅逐了真正有戰鬥性的工會幹部。可是後來，即使在“民主化同盟”所控制的工會中，不管工會幹部的意圖如何，在工會會員羣衆鬥爭力量高漲的壓力下，它們也不得不與政府和資本家進行某種程度的鬥爭。於是，星加要等人在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等職業反共分子和西尾末廣、淺沼稻次郎以及其他社會黨右派幹部的秘

密領導下，並取得“國策紙漿”公司經理水野成夫等大資本家的援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組成了“青年獨立同盟”。國營鐵道民主化同盟極右派、日本工會總同盟書記局、社會黨書記局、農民黨青年部、石川島造船廠、日立製作所龜有工廠等的一部分青年是該同盟的最初的核心。它們是以暴力破壞工會及進行各種挑撥行為為任務的純粹法西斯行動隊。甚至連社會黨正式機關報“社會新聞”，也抨擊它是“隱藏着極其危險的極右傾向的政治團體”（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當一九五〇年初發生電氣產業爭議時，“青年獨立同盟”喧嚷要“保衛”豬苗代電源免遭共產主義者的破壞，其實它們是想如同松川事件似地進行誣蔑捏造，預備在自己破壞以後再把它們的罪行轉嫁於共產黨和自由工會，企圖藉此對共產黨和自由工會進行徹底破壞。

朝鮮戰爭爆發後，“青年獨立同盟”及其夥伴，在政府和資本家的庇護下，結合着職務等級制，加強了以人民為唯一對象的半秘密結社式的活動。然而即使在它們活動中心的國營鐵道工會中，由於工人羣衆的反对日益高漲，一九五一年六月星加要等雖然在新潟舉行的國營鐵道工會大會上，主張從運動方針中刪除和平四原則（即全面媾和、反对軍事基地、反对永久中立和反对重新武裝），但却以一百十三票對二百九十二票的比率遭到一敗塗地。不僅如此，民主化同盟組織亦因此而解散了。星加要說：“出於愛國精神的工人運動是會受鎮壓的”，於是他鼓吹所謂“愛國工人運動”，並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在濱松舉行了“保衛組織同盟”的成立大會。據稱：該同盟的成立是為了挽救解散民主化同盟而產生的“工會危機”和“日本的危機”。該同盟綱領的第一條，否定馬克思主義；第二條，為實現以人的革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第三條，排斥“階級至上主義”；第四條，資本主義由於其內在矛盾而必然崩潰的論調是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我們相信國家的機能可以統制和調整資本，應以世界

各國合作爲目標，逐漸變成幸福的國家”；第五條，反對“偏倚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第六條，實現“日本民族獨立”；第七條，“中立主義”成了蘇聯的爪牙，“我們要根據積極的和平主義與‘聯合國’合作”；第八條，“祖國日本的資本，將來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要參加經營，積極活動，以確保工人階級的利益”；第九條，反對工會進行政治鬥爭；第十條，統一工會；第十一條，使工會成爲工會會員的工會。

上述綱領的條文是既無理論又無用處的亂七八糟的文字。總而言之，它的意圖是絕對支持帝國主義國家（第四條），向美國一邊倒（所謂“民族獨立”也要不妨礙與“聯合國”即美帝國主義的“合作”，實際上則是屈從。第五、六、七條），爲了擁護資本主義（第八條）而推進反蘇反共的政治鬥爭（第九條）。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二日兩天在大宮國營鐵道工業機械部舉行了“國營鐵道工會新生民主化同盟全國代表會議”，決定了幹事長齋藤鉄郎以下的幹部。同在九月一日“青年獨立同盟”改稱爲“青年懇談會”；九月七日上午上述“國營鐵道新生民主化同盟”、日本工會總同盟、全國纖維產業工會同盟（簡稱“全纖同”）等十幾個工會的極右派領導人組織了“民主工人運動研究會”（簡稱“民勞研”），而成爲“愛國工人運動”的總司令部；專事分裂“總評”和擾亂、挑撥工會內部。有人說“愛國工人運動”是工會的“產業報國會”化運動，它們企圖使工會成爲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工具，就此點而言，的確可以說是“產業報國會化”了。但是必須着重指出，它正在被培養成爲比“產業報國會化”更危險的買辦性法西斯政變的基本部隊和破壞工會的法西斯突擊隊。

正同賣國的破壞工會運動經常假“愛國”之名而出現一樣，隨着右派和法西斯組織的復活和新生，也公開復活了右派法西斯的意識形態，並從事“愛國”心的煽動。一九五〇年八月，吉田首相和天野文部大臣與文教審議會委員馬場恒吾、高橋誠一郎、

安倍能成、小泉信三、和辻哲郎等人舉行座談，認為当前的急務是養成具有“真正愛國心和有志做國家棟樑的健全思想的人”。十月二日吉田又在新聞協會說：“文教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復興純正而堅強的愛國心”，藉以“防止過激的思想和行動”。所謂“純正的愛國心”是与“愛國工人運動”以及赤尾敏領導的“大日本愛國黨”等的“愛國”是一樣的。顯而易見地，這種所謂“純正的愛國心”是以變日本為美國的軍事、經濟殖民地，使日本人代替美國兵充當炮灰為光榮的心；同時，它的精神就是对反对殖民地化和代替美國兵充當炮灰的國民施以恐怖行為的暴力團體精神。

一九五一年一月，美國最大壟斷資本家洛克菲勒為調查“慈善事業”和“交流美日文化”与杜勒斯媾和使節團同時來日。他究竟在日本調查了什麼？據說“由於他的任務的性質是什麼也不能發表的”（特克斯脫：“在日本的失敗”）。但毫無問題，在這種極秘密的“慈善”和“文化交流”中，他一定有向日本鼓吹國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工作。他还研究了如何振興“茶道”和“插花”的方法。對美國來說，日本半封建的“國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它的頂點就是天皇崇拜——不僅不可怕，反而是美國利用日本所不可或缺的東西。

由於文部省的半強迫命令和家長教師聯誼會首腦的強迫要求，於是自一九五〇年九月新學期開始以後，中小學校掛“太陽旗”和唱“君之代”<sup>⊖</sup>逐漸盛行了。與此同時，“神道”也復活了。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的英文“日本新聞”敏銳地揭露了戰爭与恢復神道之間的關係。該報說：“當兩個世界之間燃燒着戰火的時候，曾經成為日本戰爭貴族們武器的神道，正在穩步地恢復由於投降而喪失的地盤”。於是新成立了以厚生大臣黑川武夫之妻擔任會長的“神道婦女會”，以及“神道青年全國協議會”等團

⊖ 日本戰前的國歌。——譯者

体，“神道青年全國協議会”原來不过是宗教法人却打着好像是官廳名称的神社本廳的招牌的宗教团体——事实上它是前內務省神社廳的战後版，“統轄”着全國的神社——它在“童子軍”幹部講習会中也插了一手。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成立的“伊勢神宮祭祀年遷宮奉贊会”，實際上等於是强制進行神道活動。成立該会的目的是爲了在一九五四年以前籌集總額達五億二千萬日元的“祭祀年遷宮費”，會長爲參議院議長佐藤尙武，顧問或理事爲經濟团体联合会會長石川一郎、日本銀行政策委員宮島清次郎等大資本家，“朝日”“每日”“讀賣”三大報社社長以及其他舊貴族和神官，該会通过全國市、鎮、村的惡霸分子，實際上是採取了强制捐款。

軍國主義和崇拜天皇是復興神道和吉田所提倡的愛國心以及洛克菲勒所鼓吹的國粹主義的焦點。一九五一年六月舉行貞明皇太后的葬禮時，首都东京所有的学校不用說，就是工廠和營業場所也都被迫默禱致哀。雖然任何人也沒有公開發出命令，但毋庸置疑，事实上是有着权力者的統一命令的。它們動員學生參加出殯，强迫沿途的居民清掃出殯的道路。在舊金山締結單獨“和約”後，更加强推進这种“愛國心”的培养。報紙上會大力宣傳吉田首相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參拜“靖國神社”<sup>⊙</sup>的消息。儘管“首相個人”參拜神社是他的自由，但實際上他的目的是恢復國家神道，並首先从恢復祭祀供奉战死者的神社開始。文部大臣天野曾於一九五一年十月起草“國民道德實踐綱領”，認爲天皇是國民道德的中心（这是把教育敕語中的“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一段話用“民主”筆調改寫的），並把這個綱領作爲“僅供參考”的文件，以文部大臣天野貞祐個人名義發給了各學校校長。雖然口头上說这是“僅供參考”，而實際上是强迫

⊙ 靖國神社是祭祀战死者的神社。——譯者



執行。这种办法是日本的統治者在投降以前並不知道的，而是美國佔領軍对日本政府所經常使用的手段。國民道德的教條要通过这种帝國主義的虛偽的和欺騙手段强制实行，也就可以看出日本統治階級道德腐敗的深度了。它們爲甚麼要如此苦心孤詣地來復活天皇主義呢？回答是很簡單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講过，美國之所以保存天皇是爲了利用它來作爲統治日本的工具，当它們愈益迫切需要徹底利用日本、日本人以及天皇作爲美國侵略战争工具的時候，美國認爲將日本國民与天皇結合起來提高天皇的权威是最有效的办法，而對於吉田政府來說也是如此。

## 第二節 “美日經濟合作”

### 一 美日經濟合作的意義

隨着朝鮮战争的開始，日本產業淪爲美國軍需產業的包工，日本貿易从屬於美國的世界政策以及日本農業淪爲殖民地的兵站，这些情况都有了飛躍的發展。一九四九年由道奇路綫鋪平道路的、在朝鮮战争前从緊急的軍需產業部門所開始实施的工作，現在是全面地徹底地在進行了。而这件事情美日統治集团把它叫做“美日經濟合作”。过去当日本帝國主義不可一世的時侯，它們高唱“日滿經濟合作”或“日滿華經濟一体化”，如果用“美”字代替“日”字，用“日”字代替“滿”或“滿華”字樣，對於這個“美日經濟合作”的真相也就大致可以懂得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下旬，杜勒斯來日強迫吉田接受美國關於媾和的意圖（見後述）。當時杜勒斯与麥克阿瑟進行了會談，並对美國政府報告說：“麥克阿瑟關於必須製訂日本能够爲西歐的重整軍備計劃生產何種物資的名單，並將其提交美國政府一事，也与我（杜勒斯）意見一致。我們並一致認爲必須儘速復興日本軍事基礎有貢獻的日本經濟力量”。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美國

“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上述方針決定“無限制地供給日本原料，使之生產輔助性的軍需物資”。

日本資本家把美國的這一決定當作天降福音似的寄以期望。繼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美軍總司令部經濟科學局局長馬貴特發表了與本國政府協議後所製訂的“美日經濟合作”具體方案。這個具體方案使日本資本家們大失所望。因為它強調“美日經濟合作”是建立在“商業基礎上”的。如果是真正的“商業基礎”——等價交換——也就罷了，但是，日本資本家很能了解美國式的“商業基礎”就是保證美國壟斷資本獲得超額利潤的掠奪基礎。事實上，例如日立製作所根據這個“基礎”最初生產的“新特需”總額雖達十八億日元（據該公司發表為四十三至四十五億日元）之鉅，但原料係美方供給，日立製作所只收加工費，而美方則把日立製作所要求一小時六角美元的加工費壓低到四角八分美元。

此外，馬貴特聲稱：“美方擬考慮在日本設立一個全面調整採購一切物資的機關，它主要是為了統一美方的需要，並與日本政府交涉以便處理工業計劃和動員問題”。因為這等於說把日本工業作為美國戰時生產計劃的一部分來製訂計劃並進行動員，所以，這樣赤裸裸地招出了美國的意圖的例子也是罕見的。

日本工業由於這種“美日經濟合作”而淪為美國軍需生產的包工，可由如下情況窺知一斑。“美軍總司令部對五百人以上的工廠企業的生產能力曾再度進行調查，原來根據美軍總司令部備忘錄作為指定工廠者<sup>⊖</sup>總數達八百六十九所，包括範圍很廣，其中有飛機工廠（一百八十七所），鋼鐵工廠（二十一所），軍火工廠（二十一所），工作母機工廠（九十所），軸承工廠（二十七所），硫酸工廠（二十三所），蘇打工廠（十九所），電力廠（二十所），造

⊖ 指定工廠係日本投降後指定撥充賠償之用的軍需工廠。——譯者

船廠(二十四所),陸軍工廠(五十所),海軍工廠(四十六所),研究所(四十一所)等。特需訂貨是集中在从这些指定工廠中挑選出來的設備完善而又有能力的工廠,其餘的工廠則成爲包工工廠或成爲轉包工工廠。日立製作所接受的十五億日元的所謂新特需,其中的百分之八十都轉包給其他工廠,同時並使所屬的日立工廠成爲独立的工廠,其中所有人員則幾乎全採取了臨時工的形式。承造新特需的價格一經轉手就更加便宜,如日立製作所的承造價格爲美金四角八分,但一轉到包工工廠的富士工業就降低到美金三角八分了。”

“華盛頓一方面把‘美日經濟合作’的原則放在这种‘商業計算’的基礎上,同時它還表明要根據如下五個條件來決定資金、資料的範圍。

(一)製造美國政府的軍需物資;(二)製造供应駐日美軍的軍需物資;(三)製造供应日本警察後備隊的軍需物資;(四)製造換取原料所需的輸出品;(五)製造日本國內所需的物資”(高野實:“對日媾和与今後的勞工運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版)。

不僅工業如此,交通和運輸也是以美國即“聯合國軍”的軍事運輸爲首要對象的。昨天以前還是过剩的船舶,朝鮮戰爭爆發後竟立即感到不足了,於是急忙用美元對等資金——爲美國所控制的資金——來建造船隻。在鐵路方面,朝鮮戰爭爆發後,立即在國營鐵道的二萬五千輛運輸貨車中爲美國軍事需要保留了一萬二千輛。於是使日本人民和平生活物資的輸送大感困難。

美國爲了控制日本經濟而採取的強迫命令辦法,在根據“波茨坦政令”強迫將電力事業劃分爲九區這一點上最露骨地表現出來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美國佔領軍幾乎未曾運用過“禁止經濟力量集中法”,但關於電力事業,却根據該法始終要求將日本發電公司分別設在九個地方。日本大資本家在這個問題上的

利害矛盾是相当複雜的，他們強烈地反对“劃分”，並且即使要“劃分”，關於如何“劃分”的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也不一致。電氣產業工會認為“劃分”是“不顧電氣事業的公共性而有碍日本的恢復和產業的復興的。因為各個地區的電費差別很大，‘劃分’後將導致地方產業走向毀滅的道路；同時，也將延遲電源的開發”。此外還判斷“劃分”必然引起解僱、降低工資和加強勞動，因而在一九五〇年春天與工資鬥爭相結合進行了反对“劃分”的激烈鬥爭。

由於各方面的矛盾和反对，日本第七屆國會（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將政府根據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而提交國會的“改組電氣事業法案”以及其他有關法案都擱置起來了。接着於一九五〇年七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召開第八屆臨時國會時，雖然美軍總司令部又要求政府成立上述法案，但政府沒有把握可以压制國會的反对，終於沒有提出該項法案。於是美軍總司令部橫施壓力，決定在該法案成立之前不准將美元對等資金貸放為開發電源資金，甚至也不准公司用自己的資金進行開發電源的工程（這是美元對等資金如何控制日本經濟以及政治的典型例子）。日本政府对这种压迫毫無抵抗，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儘管當時第九屆臨時國會正在開會之中，而日本政府竟根據麥克阿瑟的命令發出“波茨坦政令”，決定將電力事業劃分為九區。美國佔領軍為什麼要如此強迫實行“分割”電力事業呢？如果是為了提高生產，“劃分”不僅不必要，反而是有害的。儘管如此，佔領軍之所以要求“劃分”的最終目的無非是為了強制施行所謂“分而治之”的一切專制統治的原則而已。因為如果把煤炭供應不足的日本的最重要基礎產業加以“劃分”，並在有利可圖的地區導入美國資本而掌握了控制權，那末它就可以利用較小的資本來控制日本的電力事業，並進而控制日本的全部產業。

很早以前美國就通过外匯管理以及其他措施使日本貿易从屬於它的利益，朝鮮战争的爆發更進一步地加强了这种情况。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日本与中苏之間的貿易幾乎是全面地被禁止了（由於实施了巴特爾法）。理由是因爲中國援助北朝鮮，所以不应給予任何“战略物資”。一切機器和金屬品自不待言，就是紙張和海產品也不能出口。另一方面，日本工業基本原料的鉄礦砂和煤炭則必須遠自美國或加拿大購買。日本从中國購買焦煤（製鉄用煤）每噸僅需十一美元，而現在不得不用三十一美元从美國購買；日本从中國購買鉄礦砂每噸爲七美元，而現在不得不用十八美元从美國購買。如果加上運費支出的虧損，日本經濟由於被禁止与中苏進行貿易而蒙受的損失真是無法估計的。

美國当局和吉田政府說：对中國貿易沒有什麼了不起，現在日本可以依靠東南亞市場和“美日經濟合作”就大有可爲。然而，明治以來日本資本主義是依靠中國市場才發展起來的。鄰近日本擁有五億以上人口、現在在人民政府領導下人民生活穩定和蒸蒸日上的中國，簡直是一個廣濶無垠的市場，並且是日本可以通过和平貿易增進中日兩國相互間利益的絕好友邦，這是無可辯駁的明顯事實。事實上，說对中國貿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吉田之輩，正因爲他們十分了解中國市場的無限價值，其所以反而要追隨美國，向美國一边倒，是企圖最後依靠战争來恢復過去“大日本帝國”对朝鮮、中國东北等地的殖民地統治。它們放棄了独立的日本与中國之間的善鄰友好的和平關係，選擇了从屬於美國而進行战争和恢復殖民地統治的道路。

## 二 “經濟復興”的真相

在这种“美日經濟合作”体系下，日本經濟必然是矛盾百出極端畸形的东西。乍一看來朝鮮战争似乎是大資本家的“神

風”。估計朝鮮戰爭前夕日本無法出口的存貨計達六百億日元乃至八百億日元，日本船隻的二分之一共約八十萬噸沒有生意可做。朝鮮戰爭剛一爆發，存貨一搶而空，約三十萬噸船隻為美軍所租用，不但沒有空船，而且無論造多少船也不敷使用。例如東日本重工業公司經理等人興高采烈地說：朝鮮戰爭爆發以來，“我們立即按照二十四小時一直幹下去的命令（與美軍）進行合作”（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讀賣新聞”）。如果補充一句說：“二十四小時一直幹下去”的不是經理而是工人，那麼這位經理的話豈不更正確地道出了事實嗎！

自朝鮮戰爭爆發至十月底止，包括物資和勞務的美軍特種需要（特需）共達一億三千六百四十七萬美元（四百九十一億日元），其後每月均有增加，到戰爭將近一年的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特需”的訂貨合同總額約達三億一千五百十八萬美元（一千一百三十五億日元）。

由於“特需”的推動，日本工礦業生產有了迅速的上昇。戰爭開始那一月的生產指數為戰前（以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為基準）的百分之九三點六，一年以後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五一年七月已達百分之一四一點八，成為戰後最高紀錄。同一時期，全部製造工業則從百分之九一點六增加到百分之一四三點三（參看下表）。

#### 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

（以 1932—36 年為 100，美軍總司令部調查）

	1950年6月	1951年7月	1951年11月
礦工業生產	93.6	141.8	138.3
礦業	111.5	129.9	126.7
製造工業	91.6	143.3	139.5
金屬	131.2	222.2	183.6
機械	103.8	219.9	202.9
水泥	105.6	147.1	148.8

纖維	39.8	56.0	59.2
化学	123.3	175.5	164.1
電氣・瓦斯	186.0	210.2	196.9

隨着“特需”生產的發展，日本大壟斷資本的利潤也有了急劇的增加。如果將一九五〇年度下半年与一九四九年度下半年的利潤率加以比較：三大鋼鐵公司（八幡、富士、日本鋼管）增加了二十八倍；三大礦產公司（太平、神岡、古河）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四大紡織公司（鐘紡、東洋紡織、大日本紡織、富士紡織）增加了七倍；五大化學纖維公司（公司名稱從略）增加了二十倍；四大貿易公司增加了十一倍。龐大的資本是沉醉在所謂“糸邊”“金邊”<sup>①</sup>的景氣之中了。

然而，這種生產的上昇完全是畸形的。這種上昇主要是由於金屬、機械、水泥和化學工業生產的上昇而造成的。一九五〇年六月纖維工業的生產指數僅為戰前的百分之三九點八。儘管朝鮮戰爭爆發後歌唱“糸邊景氣”，但一九五一年七月纖維工業的生產指數仍不過是戰前的百分之五六。從就業工人數字來看，戰前（一九三四——三六年）紡織業就業工人佔全體就業工人的百分之四四點二，而一九五一年則減少到百分之二四點四。這不僅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礦業和動力生產的“恢復”乃至“上昇”，這不僅主要由於礦業以及重工業的上昇所造成的，而且意味着日本產業機構毫無改變地繼續保持着太平洋戰爭年代的戰時機構，到最近日益加強了它的軍事性——作為美國軍需產業的包工工廠——所以這種生產的恢復並未穩定和提高國民的生活。這從我們親身的經驗中最容易體會的例子就是電力生產。一九五一年的發電量為四百億瓦時以上，遠遠地超過了日

① “糸邊”係指纖維和紡織工業，因它們的每個字都是糸字旁；“金邊”則指金屬工業和礦業，理由亦同。——譯者

本投降前三百四十八億瓩時（一九四三年）的最高發電量，甚至於夏天乾季也有三十億瓩時左右的電力。然而這些電力的大部分都是供應美軍設施和美軍家屬，或大軍需工業的需要，因此，一般日本人家庭和民需生產感到電力供應不足，而苦於比太平洋戰爭時期更為頻繁的停電。報紙和廣播不斷從事愚弄國民的宣傳說：停電是由於雨量不足而引起的，其實是因為“雨”<sup>⊖</sup>下得過多才停電的。

經濟恢復的偏跛狀態也表現在下列情形上：工礦業生產雖然迅速上昇，但農業生產不僅沒有達到戰前水平，而且比戰前水平還低百分之一。毋庸贅述，其所以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美國把它的農業恐慌轉嫁與日本，強迫日本以高價輸入超過需要量的糧食；日本政府不但完全不採取提高國內農業生產的政策，還通過虛假的土地改革保存了農村封建勢力的統治和剝削，堵塞了提高農民生活與農業的道路。此外，日本政府一方面以惡霸勢力為支柱，另一方則通過徵糧、徵稅和剪刀差等等實行了破壞農業的政策。

甚至在貿易方面恢復得異常緩慢的英、法、意以及西德，它們的進出口貿易也都是與工業生產相平行而恢復的。它們的工業生產較日本工業早一年半至二年就達到了戰前水平，它們的貿易在一九五一年就超過了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二〇至三〇。雖然日本工業生產由於美軍“特需”的刺激而漸漸達到了戰前水平，但是貿易仍不及戰前的二分之一。一九五一年度的輸出包括“特需”在內也不過是戰前的百分之三六，輸入僅為百分之四九。貿易恢復得這樣低且與工業生產的恢復極不均衡的原因是：第一，因為業已恢復的生產，完全是作為美國軍需包工的生產，而

⊖ 日文“雨”（アメ）字的讀音與日本對美國人的諱稱同音，此處係雙關語。——譯者



它又是畸形的；第二，因為日本貿易被迫與中國切斷關係，被迫以高價和昂貴的運費從美國購買大部分的進口物資，被迫將大部分的出口物資轉向容量狹窄的東南亞市場。

美國帝國主義通過美元對等資金和對一部分企業（如對於石油業）的直接投資而控制了這種極端畸形的軍事經濟；於是工業原料也要依賴美國供應，製成品的銷售首先也要仰賴美國的“特需”；同時，由於外匯管理和巴特爾法的限制，日本全部貿易受到了美國的統制並成為它的附庸。美國帝國主義對日本經濟進行這樣的控制，固然具有從日本榨取最大限度利潤的經濟目的，但更重要的意義是：把日本作為美國侵略朝鮮、中國和蘇聯的遠東中心基地，在軍事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經濟。所以，美國要用佔領軍或駐日軍的武力來保障這整個的體系。

在完全從屬於美國的殖民地軍事經濟下的“特需景氣”，正像前面所說的一樣只是有利於少數巨大的壟斷資本家，而對於勞動階級、中小資本家和和平工業來說則只是意味着加深了它們的犧牲和痛苦。例如上述的日立製作所“新特需”合同，它首先要保證美國壟斷資本的最大限度利潤，其次要讓日本壟斷資本獲利，然後還要讓包工資本家獲利；因此，勞動強度勢必加劇，勞動條件不得不趨於惡化。日立製作所在簽訂“特需”合同的同時，甚至使用美國憲兵和警察的暴力，強制解僱了五千五百名熟練工人，而另行雇用了六千名臨時工人。這就是在有“特需”存在期間，以最低工資殘酷使用工人的情況。日本所有的產業部門，所有的工廠和作業場所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這種傾向。所以到處都在增加臨時工而減少固定工人。此外，連臨時工也當不上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的數目已超過一千万人（統治集團注意到這一事實，認為要建立多少軍隊就可以建立多少軍隊）。而由於“特需”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一九五一年三月的物價較朝鮮戰爭前平均高漲了百分之六七，但全部製造工業部門的平均工

資僅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和平產業和中小企業受到了犧牲。它們得不到資金和電力的供應。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後，雖然壟斷資本獲得了較之過去高出二十倍、三十倍以至一百倍以上的利益，然而所有公司組織的公司和銀行，其一九五一年度的平均利益只不過是一九五〇年度的二倍。這說明了中小公司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遭到了損失。此外，規模更小的個人企業在一九五一年度的所得，則較一九五〇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經濟白皮書”）。這種矛盾勢必引起恐慌，關於這點，我們將在後面加以敘述。

### 三 地主制度的加強

日本農業的進一步殖民地化以及農村半封建統治勢力的加強，與城市產業淪為美國戰爭經濟的包工工廠和重新武裝問題是具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的。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立即於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提倡所謂“增產糧食的興農運動”；雖然口頭上說，其目的是為了戰時的糧食自給，但它不但不解決增產糧食的根本條件即滿足農民對土地的需要，使農民確保耕作權以及穩定農民生活，反而採取了與此完全相反的政策。

由於朝鮮戰爭，首先使一九五〇年麥子的徵購有所“追加”，換句話說，就是要增加徵購量的比率。這一年麥子的徵購，預定數額為八百二十七萬日石；在縣長會議上，由於縣長方面堅決要求削減二百七十萬日石，所以政府一方面答應削減縣長方面所要求的半數一百三十四萬日石，同時卻又決定超額徵購同量的一百三十四萬日石。這是根據美軍總司令部的強硬命令。於是日本政府就憑藉所謂“美軍命令”企圖把農民自用麥也一粒不剩地搶光，強制執行了“徹底徵購”和“賠本徵購”。農民組織較強的栃木、茨城、山梨、愛知和兵庫等縣的農民，對這種強奪是不容

易听从的，因此，佔領軍人員乘吉普車直接到各村督促徵購。在朝鮮戰爭開始前甚至曾說要撤銷徵購麥子制度，但爲甚麼又開始這種做法呢？那就是要把日本的麥子運到美國佔領下的朝鮮去的緣故。農林大臣廣川在第十屆國會答覆共產黨議員竹村的詢問時供認了戰爭以後已向南朝鮮出口了六萬噸麥子。但在另一方面，却強迫日本進口價格既高而又難吃的外國米。這種情況与日本帝國主義以朝鮮和中國東北爲殖民地時，掠奪朝鮮農民生產的大米送往日本，而迫使朝鮮人吃東北雜糧的情形是相似的。因此，日本農業地位也是被規定在美國对東方統治的体系中的這一事實，再沒有比這種情況表現得更明顯了。

戰爭又使得農產品價格与肥料等農業用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大大增加。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爲一百，一九五〇年六月的農產品價格爲九六點二，農業用品價格爲九六點七，大体保持着同樣的水平；然而，戰爭爆發一年後的一九五一年七月，前者爲一二〇點七，後者爲一三八點一。只要有下列情況存在，即从國外輸入超過必需量的糧食、國民大眾購買力日益降低、以及壟斷資本榨取最大限度利潤，那末就必然要產生這種結果。

農村經濟的破壞給警察後備隊——即重新武裝和警察的加強提供了它所必需的“人力資源”。現在，自由黨等正四處演說宣傳，說是重新武裝旨在救濟農村中不是長子的青年<sup>⊖</sup>——不過它們到底不敢把這種話登在正式文件上。雖然也有些單純的青年以爲這話有點道理，但這是顛倒是非的，它是爲了重新武裝而破壞農村，並迫使不是長子的農村青年認爲只有加入警察後備隊這一條路可走了。

爲了強制執行等於徵用的徵購以及把農村作爲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的根據地，就必須加強農村半封建地主的統治勢力。

⊖ 日本僅長子有繼承財產權，所以次子、三子必須出外謀生。——譯者

按照過去的慣例，農業恐慌一方面成爲趨向農民革命的轉折點，另一方面又使貧困的農民更加依賴惡霸，從而加強了他們的統治權力。解除整肅對於農村來說，在復活惡霸統治勢力問題上會起很大的作用的。因爲農村的情況不同於中央政治舞臺和大資本家集團，在農村中，舊人員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

如上所述，一九五〇年九月頒佈的、關於廢除統制土地價格而僅僅統制土地轉移的“波茨坦政令”，也就是企圖擴大反動勢力在農村的經濟地盤。農地委員會書記在報告當時農村情況時曾舉例說：“最近由於有不少地主造謠說，和約簽訂後日本將自行掌握政治，土地法也要轉而有利於地主，因此自耕農惶惶不安”，又說：“因爲波茨坦政令的頒布，一般農戶發生了誤解，以爲是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地主可以奪回出租土地，於是未經農地委員會的同意就轉移了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權”（近藤康男：“土地改革的諸問題”）。其實，日本政府正是爲了要強制實行這種“誤解”才頒佈該政令的。

結果，土地的轉讓，僅就合法進行的來說，也有迅速的增加。所有權轉讓案件在一九四九年度有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件，一九五〇年度有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一件，一九五一年度（推算）有九萬一千八百七十件，形成了幾何級數的增加。轉讓耕地的面積雖然沒有像上述比率那樣顯著地增加，但一九四九年度爲七千九百十八町步，而到一九五一年度已增加爲二萬一千零十五町步了。一九五一年度土地轉讓案件的百分之七十一是買賣關係，而在一九四九年度以前的土地轉讓則全是由家族繼承，所以兩者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如果調查一下關於土地買賣雙方的情形，則據官廳統計，出賣者多半是自己不從事耕種的地主或零星兼業農戶（半無產階級），而購買者多是租賃該地的佃戶。日本政府和美國大使館的職員（變相的佔領軍民政局）等說：土地買賣的盛行，並非舊的寄生地主制度正在大規模地復活，反而是

土地正在集中於實際上從事耕種的中農，所以土地改革並未倒退而是正在向前發展着（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朝日新聞”）。

然而，農民却不這樣看。即使是在“佃戶”購買土地時，也有偽裝的佃戶，也有黑市的買賣。並且也有這種例子，即藉地主和原來的佃戶“共同”耕種為名，而實際上則是恢復了租佃制度。還有像以前那樣出租三町、五町土地而能收入一半地租的寄生地主又在復活之中，但上述土地買賣的顯著增加，顯示着土地結果是集中於有錢人的手裏——如果農民不堅決抵抗時——的趨勢已很明顯地產生了。過去的大地主惡霸，雖然因土地改革而喪失了田地，但此外它並沒有喪失其它任何東西。他們有的成為山林主，有的控制着水利灌溉，有的變為批發商和商人，有的變為高利貸者等等，同時又以擁有一町步以內的土地出租者身分，仍然保持着對農村的控制勢力。而“波茨坦政令”則推動了這些大地主惡霸，使他們作為增長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爪牙的威力的工具。因此，農民就敏感地警惕着地主在“媾和”後的公開復辟。

由於農業委員會法的制訂和實施（一九五一年三月），農村惡霸勢力在組織機構方面也得到了鞏固。根據該法，農地委員會、農業調整委員會以及農業改良委員會等制度廢除了，而這些委員會所辦理的一切業務，概由新成立的農業委員會辦理。在農地委員會中，佃農所佔的委員人數與地主及自耕農合計起來所佔的委員人數是相等的，雖然這只是在制度上擴大佃農的發言權，但現在連這種偽裝民主的外衣也棄置不顧了。農業委員會分設在市、鎮、村和都、道、府、縣。市、鎮、村委員不是由逐層選舉而是由全村選舉十五個人，此外，再由市、鎮、村長根據過半數當選委員的推薦選任五名“具有學識和經驗者”來擔任委員。原來的市、鎮、村、農地委員可以作為“具有學識和經驗者”加以選任，但基本上以不選任這批人為原則。都、道、府、縣委員，由選

舉產生者爲十五名，規定市、鎮、村委員有選舉權，而當地任何農民（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有一反以上耕地的經營者和与之同居的親屬）均有被選舉權。此外，再加上由縣長選任的委員五名。

只要看這個選舉法便能清楚地了解農業委員會係農村惡霸對於耕地和農業的統治機構。再進一步就它的工作內容和權限來看，這個委員會不僅是辦理過去農地委員會等所辦理的工作，而且還可以辦理“關於斡旋土地等利用問題以及防止爭議事項”。於是掠奪土地就是這樣很容易地得以合法化了。一九五一年土地買賣事件有了顯著的增加，這也與這種機構從中起作用有關係的；它不僅是在農村，而且是在日本全國普遍走向反動、農民貧困和農業破產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不考慮這種情況，也就難於正確地抓住它的歷史意義。也只有有了這種鞏固的專橫的地主勢力，才能強制施行形同掠奪的虧本徵購。這一切都可以說是農村接受單獨“媾和”的準備措施。

在犧牲工人、農民和中小企業家的利益以及犧牲和平產業和發展貿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龐大軍需產業的“特需”景氣，由於財富積累和貧困加深兩者的急劇演變，於是隨着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國“經濟衰退”即恐慌的到來，也早已開始出現了恐慌的現象。一九五〇年底的“系邊景氣”和“金邊景氣”消失了，以“系邊暴跌”尤其是化學纖維的暴跌爲首，物價開始猛烈的下跌。由於一九五一年六月馬立克提議而開始的朝鮮停戰談判，使得美國資本家們叫嚷“和平恐慌”，而這給予美國附庸的日本的打擊就更爲嚴重。它的表現是繁榮衰退，生產減低，銀根吃緊，貿易不振和存貨增加等。至於恐慌的犧牲則被盡量地加在中小企業和勞動羣衆的身上。大資本家和吉田政府爲了擺脫這種恐慌，愈益加深了對美國的依賴，並選擇了依靠美國和日本本身的擴張軍備以求掙扎的道路。

### 第三節 法西斯化的進行

#### 一 加緊整肅赤色分子和“總評”的成立

日本國內外的統治勢力爲了強制執行戰爭和殖民地化的政策，於是對正在爲日本的和平、獨立、民主和生活而鬥爭的國民組織，特別是對它的前衛日本共產黨和共產主義者，進行加倍的鎮壓。朝鮮戰爭的前夕，它們整肅了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並與戰爭爆發同時，命令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報”停刊。此外，並陸續迫使地方性的和內部刊物——油印的支部新聞停刊，將羣衆政治新聞“文化時報”、“民主日本”、“自由”和“和平之聲”等非共產黨的機關報視爲赤旗報的“後繼報紙”或“類似報紙”而接連地迫使其停刊。這些報紙的發行人或編輯自不必說，甚至連販賣者也遭到全國規模的逮捕和下獄。而統治勢力還假借停刊處分之名，不根據法院的拘票就擅自搜查住宅。朝鮮戰爭爆發了一年多以後，截至一九五一年七月爲止，這些被迫停刊的報紙達一千七百三十七種。我們看到這個數字，一方面可以知道鎮壓是如何的徹底，同時也可以知道人民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力量之強大。

原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翻譯小說“查特利 夫人的戀人”，被當作邪淫書籍而禁止發行。接着發行人和譯者被起訴，毫無疑問，這是剝奪言論、發表自由和恢復檢查制度的第一個步驟，這與對赤旗報等的鎮壓不是沒有關係的。

作爲無產階級工會的結合體並與世界工聯有密切關係的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三十日根據“團體等規正令”被命令解散，十二名幹部遭到整肅並被禁止擔任公職。在所有的場所日益加緊地在強制進行“整肅赤色分子”。首先是從報紙通訊廣播機關開始——可見統治者是多麼害怕人民知道真實情況——並波及電氣產業、電影、交通運輸、煤炭、金屬礦

山、私營鐵道、車輛、造船、鋼鐵、汽車、印刷出版、電氣工業、化學、機械、電綫、非鐵金屬、糧食、纖維、木材、醫療等所有產業部門。截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為止，已有一萬零八百六十九人，因不容於資本家而被視為“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而遭到整肅撤職。同時，國內外的統治者曾積極地動員了大批武裝警察隊來協助資本家。政府本身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整肅赤色分子尚感不足，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又從農林省二百零七名職員開始，把通商產業省、電氣交通省、運輸省、郵政省以及其它政府各機關職員共計約六百名當做共產黨員或其同情者，用各種藉口加以整肅。

工人階級對於整肅赤色分子的抵抗，進行得不够十分有力。三鷹、松川事件以來的鎮壓和工會的分裂，削弱了它們的抵抗力量。但這並不是說完全沒有進行抵抗。例如京都井上電機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中小企業，就曾進行激烈的反對鬥爭，並終於迫使資方取消了解僱。井上電機公司在這次鬥爭中，有五十一名工人遭到警察的非法逮捕，但是，全體工會會員（四百名）團結到底，終於取得了勝利。在大企業中，如東日本重工業公司下丸子工廠、百恩縫紉機公司和關東電機工業公司等的工作者也發揮了前所未見的力量。

特別是在工人“背上貼着號碼、胸前帶着証章而被迫在不可想像的監視環境下勞動”的美軍直接管理的軍需工廠——東日本重工業公司下丸子工廠（擁有四千工人），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發表了整肅赤色分子四十五名後，被解僱者和全體工會會員一致不予承認；十月二十三日早晨，被解僱者在同地區工會代表等約三百人的聲援下，正預備進入工廠時，曾與約二百名武裝警察隊和美軍憲兵進行了一場大搏鬥，有的工人竟被美軍憲兵的吉普車撞倒了。最後，工人方面撤退到附近的北辰電機工廠，在警察隊包圍下召開了工廠代表會議，在“用日



本人的手來保衛日本產業”的口号下，鞏固了以大田區工联為核心的聯合鬥爭体系。另一方面，在工廠內部，全体工会會員根據工会執行部的“以實力進行反抗的鬥爭”的方針，舉行了投票，其中有一千四百一十四票贊成，一千三百九十四票反對，二百九十一票棄權。但因有人認為投票用紙不修完備，於是在次日（二十四日）再度舉行投票，然而在这次投票中，贊成票數增加到一千八百四十六票，反對票數則減少為一千二百七十九票。同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把工会執行部人員叫去，命令他們“在任何場合都不准罷工”。於是在十月二十八日又舉行了第三次的全体工会會員投票，这次投票結果依舊是一千七百七十四票對一千三百二十票，重新確定了以前兩次的決議。其後約一個月的期間，截至十二月二日鬥爭告一段落時為止，工人在美軍直接管理的軍需工廠這種艱難的環境之下，仍繼續以實力與官方進行了對抗。這種勇敢的鬥爭雖然沒有能夠取消整肅，但是“它給全國反對整肅赤色分子的鬥爭運動以很大的力量，在這一點上，得到了頗高的評價”（全國金屬產業工会機關報“工人”和“日本勞動年鑑”，二十四集）。

統治集團也企圖在學校裏進行整肅赤色分子，並且也部分地進行了；然而學生對於這種整肅所進行的強而有力的反對鬥爭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美軍總司令部教育顧問意爾斯博士到東北大學準備進行煽動反蘇、反共和在學校進行整肅赤色分子的演說的時候，學生們高喊“意爾斯不要再講”、“意爾斯住口”而拒絕了他的講演。以此為導火綫，在全國學校裏掀起了反對殖民地化教育和保衛學術思想自由的大規模學生運動。

一九五〇年秋天，與產業界的整肅赤色分子相配合，對學校也要進行整肅時，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與工会共同進行了反對鬥爭。特別是東京都“學联”指令都內全部大學於十月五

日舉行總罷課；九月二十五日，法政大學學生拒絕了考試；二十八日，早稻田大學學生舉行大會時與十個中隊的警察發生了衝突；二十九日，新制東京大學拒絕了考試，並與侵犯學校的警察隊發生了衝突。十月五日，有十一個大學，三萬九千六百學生參加了罷課。這種學生運動的力量迫使大學方面未能按照文部省等的計劃對教職員進行整肅赤色分子。

與“整肅赤色分子”同時，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十二兩日，舉行了由民主化同盟集合而成的日本工會總評議會正式成立大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代表也曾出席該會旁聽。一個多月後，“總評”的幹部島上善五郎就朝鮮戰爭問題發表了談話，認為以美軍為主的干涉為“聯合國的警察行動”，指出工人要協助“聯合國”，致力於“特需”生產和軍事運輸，並稱“赤色分子將由工會自行清除”（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讀賣新聞”）。“總評”的幹部好像也了解整肅赤色分子勢必擴大為整肅粉紅色分子，並發展到對一切工人運動的鎮壓，所以它們反對藉整肅赤色分子之名來鎮壓民主的工人運動。但日本及國際勞工運動的歷史早已屢屢證明了：如果一旦承認共產黨員是可以鎮壓的鎮壓原則，早晚就不得不承認對一切階級運動的鎮壓。當島上發表上述聲明時，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布拉蒂自誇說：“有人說總評是總司令部的工具，假使這是事實，我們引為非常榮幸”。“總評”事務局長高野實在一年之後的著作（“對日媾和與今後的工人運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版）中寫道：“對工人運動的破壞和控制，首先是鎮壓和孤立共產黨的工人運動以及團結其餘的工會勢力。因此，當‘總評’成立的時候，它們（美軍總司令部和政府）以為這是它們的功績也是理所當然的”。

實際上，美軍總司令部把民主化同盟和“總評”的組成“以為這是它們的功績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不管是整肅赤色分子或鎮壓和平運動，如果沒有右翼社會民主主義領導人的積極協

助，而僅依靠統治集团的暴力，是絕對做不好的。例加八幡製鐵所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改选工会幹部時，公司方面曾協助“民主化同盟派”進行活動，當改选獲得成功後，公司就立即開始与工会的“民主化同盟派”幹部進行集体談判（在这以前停止与工会進行集体談判），答应支付獎賞金；同時，並於十一月一日整肅了二百三十名工会的積極會員。民主化同盟的任務典型地表現在電氣產業工会之中。該工会自己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先於公司進行了对工会會員的赤色分子整肅。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布拉蒂對於这件事發表意見說：電氣產業工会“開始做到日本任何工会从未做到的事，这是值得祝賀的”；又說：其他工会仍然把整肅赤色分子的責任，“放在政府或資方身上，这對於工会本身來說，是深為遺憾的事”。但是从日本民族的前途來看，究竟是受帝國主義者的祝賀好呢？还是被它認為遺憾好呢？

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竭力使工会變為它們“引為非常榮幸”的工具，同時，對於右翼社会民主主義政党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民主党蘆田均在一九五〇年底提交美軍總司令部的關於反共及重新武裝的意見書中，曾率直地寫着这种希望：“当共產党舉行暴動和勞動攻勢高漲的時候，首先和它对立的是穩健的勞動階級。当政府以全体勞動階級為敌時，就極難在对付共產党上獲得實際效果。在这种場合，日本社会党的協助就成為極其必要的”。

社会党右派幹部們是怎樣成為蘆田等人的好朋友，这从他們不僅曾与蘆田等共同出席內閣會議，甚至曾共同進过巢鴨監獄的事實看，已充分可以証明了。因此，壟斷資本也公開以資金來援助社会党。根據自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四月提交全國選舉監察管理委員會的对政党的捐款單，对社会党的捐款總額達六百九十三萬日元，其中包括八幡製鐵所、日本硫酸銨工業協會、帝國石油公司等各五十萬日元。在这張捐款單裏，社会党左派領袖和田博雄也捐獻了六萬日元，社会党左派領袖鈴木茂三郎雖

然要出席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會議<sup>⊖</sup>，但他與和田同樣慷慨地捐出了五百万日元。和田與三井財閥等所組成的、表面是社交團體而實際是操縱政界的集團“番町會”有着密切關係（時岡坦：“政黨資金是由誰拿出來的”，見“人物往來”雜誌，一九五二年二月號）。

## 二 鎮壓的擴大

到了一九五一年，法西斯鎮壓早已超過了以“整肅赤色分子”或防止共產黨暴力革命為藉口的階段，而發展為對一切和平、民主和獨立運動實行鎮壓了。第一件重要的事實就是一九五一年三月從國會中開除了共產黨議員川上貫一。他在國會的質問演說具體而詳盡地揭露了日本殖民地化、軍事基地化的事實，因此，自由黨、民主黨狼狽不堪，終於開除了川上。議員由於在國會內的發言而被開除，過去在進行太平洋戰爭時，作為天皇制裝飾品的國會曾有過開除齋藤隆夫和西尾末廣的先例，而今天作為麥克阿瑟裝飾品的國會，也由於開除川上而自己說明了它已進入戰時體制的事實。

第二件重要的事實是，在五一勞動節禁止使用人民廣場——皇宮前廣場。戰後的日本全國勞動人民每年均曾統一慶祝五一勞動節，而一九五一年終於連這個五一勞動節也遭到了破壞。縱然是由佔領軍和政府培養出來的“總評”所主辦的五一節，但是幾十萬工人聚集於美軍司令部與皇宮之間的廣場上這件事本身，已成為政府和佔領軍恐怖的焦點。法西斯主義並不表示資本主義的強大，而只表示它的脆弱，這話確實是很有道理的。凡是要求和平、反對軍事基地和主張全面媾和的人們，不論

<sup>⊖</sup> 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會議(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是右翼社會黨的國際會議。一九五〇年六月在哥本哈根舉行，污蔑共產主義，並決議各反共國家要進行合作。——譯者

他們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全被視爲“苏联的爪牙”。一九五〇年八月，甚至連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紀念日前夕的和平節也被禁止了。一些大的報紙和雜誌不能刊載坦率地主張全面媾和、報道日本現狀及呼籲民族危机的文章。“世界”雜誌出版媾和問題專刊，使主張全面媾和的進步的大学教授和自由主義評論家等一齊發表了意見；这在給以後的新聞界開闢了道路上是具有很大的意義的，然而這也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舊金山“單獨和會”業已開幕的那天才開始出刊的。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一日，公布了三鷹事件第一審的判決。在被告和日本人民爲要求公正審判而進行鬥爭的而前，審判官也不得不斷定檢察官認爲該事件是由於共產黨員等的共謀而發生的說法是毫無事實根據的“空中樓閣”，宣判該事件係被告竹內的個人犯罪，處以無期徒刑，並判決飯田以及其他全部被告一概無罪。然而檢察官仍然堅持虛構捏造的罪名並提出上訴。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公布了第二審的判決，這次判決也否定了共謀罪名，並沒有推翻第一審關於無罪部分的判決，但是認爲對竹內的無期徒刑判處過輕，應處死刑。審判官們是利用反動氣氛的囂張，企圖通過這次判決來恫嚇工人。檢察官對此項判決仍感不滿，堅持全體被告均應有罪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竹內被告對這種不合理的判決也提出了上訴。

通過裁判而對民主勢力進行恫嚇，这在松川事件上表現得更爲殘酷無理。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福島地方法院認爲鈴木信、阿部市次和杉浦三郎三人爲共謀事件的主謀犯，本田昇和佐藤一爲實行犯，並均判處死刑，認爲武田久、二宮丰、赤間勝美、高橋晴男和大田省次五人爲共謀事件主謀犯或實行犯，均判處無期徒刑，對其餘十名被告也判處共達九十五年六個月的徒刑。當宣讀判決時，全體被告對於處理證據的極端歪曲非常憤慨，因而提出了激烈的抗議。於是，審判長竟採取了暴戾措施，強迫命

令全体被告退庭，而在沒有被告在場的法庭上宣布了上述判決。

這個判決不僅在日本人民羣衆之間，而且還在國際上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中國、蘇聯、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意大利、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美國等國家的工會和擁護人權的團體或個人對法院提出抗議及鼓舞被告的信件和電報堆積如山。特別是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以及其他團體還捐贈了三百七十七萬日元的救濟資金（一九五一年九月）。不待說，全体被告向仙台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訴。第二審從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開庭，在這法庭上，不僅有“自由法曹團”<sup>⊙</sup>，而且有當地仙台律師會全体會員主動參加法庭辯護團負責辯護。仙台律師會中的自由黨仙台地方幹部和屬於社會黨的人，儘管政治思想立場不同，也都參加了辯護。這表明了只要在法律上還有一點良心的話，任何人都不能默視這種虛構捏造的事件了。在日本及全世界輿論的抗議浪潮中，高等法院鈴木審判長終於承認了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告的原判具有嚴重的缺陷，不僅要審查文件（第二審通常是僅僅重新審查原審文件），而且還要由高等法院本身重新審查事實。

於是，福島地方法院和檢察廳的極為離奇的行爲就陸續被揭露了。例如，福島地方法院隱藏了最重要的物証——從鐵軌上拆下來而被扔掉的接縫鐵板。關於這個事實，當辯護團追問檢察官和警察時，他們撒了許多謊，但佐藤巡警終於不能掩蓋謊言，在法庭上供出了撒謊的事實。更驚人的是，福島地方法院審判長長尾隱藏着關於高橋被告的重要証件。高橋被告在數年前折斷了腰骨，腳不能完全伸開。但根據檢察官的控告以及原判決書，則誣指被告高橋曾跑步往返於從他的住宅至列車傾覆肇事地點來回有五里路的山道，而且是在雨後的泥濘道路上（以

⊙ “自由法曹團”是日本進步律師的團體。——譯者

一里路跑步三十三分至三十八分的速度)跑步往返的。長尾審判長曾向爲高橋治療的新潟医院及福島医院發出公函詢查關於高橋的身体情况。兩個医院对此均曾以公函答覆，証明高橋被告難於步行五里路。然而審判長却隱藏了該診斷書。此外，还揭露了所謂犯人曾用过單口螺絲鉗和活口螺絲鉗以及其它許多矛盾和謊言。

松川事件第一審強制施用了捏造誣陷，即使以資產階級的審判來衡量也不能稱之爲審判。這不僅是對二十名被告以及共產黨、工会的鎮壓，而應該說它是敵視人類和文明的嚴重罪行。這表明了日本統治階級和它的主子是怎樣地急於執行戰爭和殖民地法西斯主義政策。同時也表明了，它們的陰謀因遭到了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們的反对而日趨破產。

### 三 反法西斯鬥爭

任何鎮壓，任何破壞工作以及任何司法上的威脅，都不能掩蓋走上殖民地化的日本現實矛盾的發展，也不能制止人民的覺悟。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的鬥爭，隨着鎮壓的加緊，開始發生了質的變化。很久以前，美軍憲兵和日本警察就出動干涉勞動爭議和農民鬥爭，進行非法拘捕，揮舞棒棍襲擊羣衆；特別是對於旅日朝僑，滿不在乎地用手槍打死他們，但是對一般日本人，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还不曾這樣做。然而，它們現在對上述東日本重工業公司進行整肅赤色分子時，企圖以吉普車軋死工人；而這時期對電業公司進行整肅時，警察隊竟用手槍亂射手挽手的工人並使他們負了重傷。這是兇惡的白色恐怖在性質上的激變。並且它們每當向農村徵購糧食或當農民爲反对徵稅而進行鬥爭時，就立刻動員了警察隊。

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和農民也就不得不採取自衛措施，而且已經開始實行了。這種自衛組織雖然在工人方面還是罷工時所

組成的臨時性組織，並非永久性組織，但在農民鬥爭方面，自一九五一年初就在不少貧農居多的地區，特別是在山村或開拓地區自發地產生了半常設的自衛組織。當時以農民鬥爭的領導者聞名的山口武秀寫道：農民已因徵購糧食或徵稅而一年到头始終遭到政府的暴力鎮壓，在這種情況下，“新的農民鬥爭就是農民反對政府掠奪的自衛鬥爭。這種掠奪是以殘酷的鎮壓政策為武器而強制實行的。因此，農民鬥爭組織……就必須具有甚至於在基層小組也能夠制止敵人的攻擊並加以反擊的那種準備和行動力量。這種組織就是以村落為基礎的經常性的農民防衛體制。在這裏將孕育着作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者運動的政治覺悟，並進而產生真正鞏固的自衛體制。”（“前衛”雜誌，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五十五號）。

隨着重新武裝和美軍軍事基地的擴張，土地被掠奪的事件遂不斷發生。特別是把戰後數年來真正由農民流血流汗所開拓出來的原軍用土地，再奪回去作為軍用地的時候；或如以上所述，美國為了把日本糧食作為統治南朝鮮的工具而強迫農民虧本供應徵購的時候；每遇這種情況，直接受害者自不必說，連看到和聽聞這種情況的農民，特別是貧農，也都把對和平與獨立的要求積壓在樸實的農民的心裏。當然，有一天這種心情勢必會要爆發的。

不僅是美軍直接管理的軍需工廠的工人，幾乎所有的工人每天都在親身體驗到日本殖民地化、軍事基地化的禍害或遭受這種禍害的影響。因此，他們首先不得不為工資、為生活而起來鬥爭。甚至曾徹底進行過整肅赤色分子並已相當變為御用化的工會，從一九五〇年底的年終鬥爭至一九五一年之間，也興起了爭議的浪潮。一九五一年二月，以著名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武藤為委員長的日本煤礦工會同盟，也不顧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科長艾米斯關於停止罷工的勸告，以要求提高工資為中心要



求，堅決舉行了總共二十天的全國性罷工，並獲得了勝利。这次大規模的罷工造成了八十万噸煤炭的減產和二百一十萬勞動日的損失。勞動爭議在五月以後，仍然沒有趨於退潮。其中，如一九五一年三月到六月的港灣工人鬥爭，還明確地提出反戰目標而進行了鬥爭。

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在大阪港，當輸往朝鮮的大米裝上軍用船勝利號時，一個工人在搬運大米的工作中使用了“手鉤”，於是在艙口的全部工人，都被監視他們的美國兵用舊時日本式的槌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由於这次事件，使搬運工人爆發了他們的日常不滿情緒，並激起了他們的民族意識，於是要求賠償損失和要求增加不使用帶鉤工具的津貼。三月三十日，全港灣工會的富島分會提出增加工資以及其他要求而舉行了無限期罷工，其他各分會為反對武裝警察的鎮壓也相繼進行了罷工。四月六日，全港灣工會大阪地方本部發表了包括如下要點的鬥爭宣言：“这次鬥爭是要粉碎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和重新武裝，我們決不能落後於具有輝煌鬥爭傳統的世界港灣工人，我們發誓要站在日本全國工人的前列而鬥爭”。這個鬥爭宣言得到了大阪港各工會的響應，成為有一千名自由工人參加的廣泛鬥爭，繼而並擴大到神戶、名古屋、四日市、東京、北海道、門司等全國各地。其間，在名古屋還發生了表現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的事件，即碇泊於名古屋的美國船舶“海怪”號的兩名船員曾訪問日本工會並捐獻了三千日元的鬥爭資金。在室蘭港，工人在罷工結束後也故意把搬上岸的物資拋棄掉或擲入海底（“前衛”雜誌，一九五一年七月，第六十號）。

反對戰爭、反對殖民地化鬥爭的幼芽，也開始生長在統治者的堡壘——警察後備隊中。他們喊出了“拒絕被派到朝鮮去”、“反對充當僱傭兵炮灰”和“槍口不向日本人”等口號。駐紮在善通寺的警察後備隊內部的民主組織發行了機關報“鼓翼”，據說

这是爲了与官方同名報紙“鼓翼”相对抗的(“前衛”，第六十号)。

正因爲工会的態度是如此的，所以社会党的左右兩派也不得不打出媾和四原則(全面媾和、永久中立、反对軍事基地和反对重新武裝)的招牌。不过，在他們之中，認真想遵循四原則的人究竟有多少还是個疑問。

不过羣衆鬥爭的高漲勢必在“總評”中也要有所反应。这就是說，正当美軍總司令部、吉田政府和工賊們看到“總評”已變爲日本工人運動的最大組織，認爲已如願以償而興高采烈的時候，“總評”的“左派”因素也同時增加了。因爲，“總評”既然因結了三百万人而成爲工人階級的中心組織，工会幹部也就必然地要反映工人階級的情緒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一九五一年三月舉行的“總評”第二屆大会爲首，以及自一九五一年四月到七月間舉行的幾乎所有的主要工会的定期全國大会，一律决定了主張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裝和反对軍事基地的政策。如上所述，“愛國工人運動”(反動組織——譯者)的根據地國營鐵道工会也推翻了“愛國工人運動”所製定的方針，而確認了“媾和三原則”。大工会方面，只有日本煤礦工会同盟通过了武藤等社会法西斯主義者執行部所提出的“不得不及早与多數國家媾和”和“不得不要自衛权”的提案。但是這個提案也曾遭到北海道以及其他方面的激烈反对。該執行部的提案在最初表決時，因九十三票对九十三票(保留及棄权各五票)未能通过，第二次表決時，才以一百零一票对九十七票(保留一票)勉强通过了。由於右派幹部如此橫蠻地操縱大会，於是日本礦山工会也用舉手方式通过了“及早与多數國家媾和”的決定，但是熊本縣礦山联合会和嘉穗礦山联合会反对總部的變爲御用工会的方針而終於脫離了日本礦山工会。除了这些少數的例子之外，大部分工会都通过了主張全面媾和和反对軍事基地的決議。不僅如此，如日本教職員工会、全日本汽車產業工会、全國港灣工会同盟和全國瓦斯

工会联合会等組織，就沒有採納“總評”和社会党的關於“永久中立”或“与共產党劃清界綫”的方針；有的工会則对上述方針不置可否；有的工会就積極地提倡“与所有的階級政党及工会携手合作共同進行鬥爭”。

如同上面所引用过的，“總評”事務局長高野实在一旦承認“總評”係美軍總司令部的“天賜的兒子”之後，曾自誇“總評”的轉變說：“当‘總評’開始批判根據杜勒斯的意圖的对日媾和時，它們（美軍總司令部和政府）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以爲孵化出來是雞的卵，結果孵出來的是鴨子，那末它們当然是不会容忍这种味道的”。这自然很好。然而，即使高野实滿足於做鴨子，可是工会會員和日本人民羣衆却不期望“總評”味雖不如雞，但實際上同樣是被帝國主義吞食的鴨子，而期望“總評”成爲咬住帝國主義並打倒帝國主義的老鷹或兀鷹，事實上，它也在如此變化之中。

独立与和平不僅只是進步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要求，實際上是与全体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密切有關的要求。正因為如此，甚至在地方選舉中，即在保守反動勢力憑藉“地盤”和“皮包”並壟斷了一切宣傳工具因而處於有利地位的鬥爭中，例如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舉行的千葉縣縣長及參議院議員補缺選舉中，又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月舉行的廣島縣縣長選舉中，一旦以要求全面媾和、反对軍事基地爲口號，提出了統一候選人而進行鬥爭時，也就能够把自由党長期以來的“金城湯池”都推翻了。同時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要求全面媾和和反对重新武裝的投票，截至一九五一年九月爲止，已達約一千万票，組成了數百個“保衛和平會”；而截至一九五一年四月爲止，在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名的已有六百三十萬人。當然，這些成績与日本的客觀形勢相比較，还是很不够的。因此也就沒有能够粉碎“單獨媾和”。但是，这种力量至少已使美國佔領者感到不便繼續公開佔領了。

## 第八章 殖民地軍事基地日本

### 第一節 單獨“媾和”與美日安全條約

#### 一 杜勒斯与吉田

美國“新聞週刊”外交記者哈里·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即一九五〇年六月來東京時談稱：“據我這樣隔三年再來此地（東京）的人看來，顯然現在已是美國人應該離開的時候了。假使繼續維持現狀，其後果頗有掀起強烈的反美政治運動之虞。如果繼續佔領下去，就會完全喪失日本將成爲美國在太平洋的可信賴的友邦這種希望。這是精通一切情況的人們一致的意見”（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讀賣新聞”）。據他說，當時美國國防部長詹遜仍然希望繼續佔領日本，特別是永遠不願放棄“位於東京南方、曾耗費六億美元建設起來的橫須賀海軍基地”。上面所引用的話，就是這位記者自己和美國國務院對於國防部部長的意見。也就是說，日本民族要求獨立與和平的鬥爭，結束了國務院和國防部在日本佔領問題上的意見對立，迫使美國不得不從軍事佔領轉入單獨“媾和”。

一九五〇年九月，美國政府發表了“對日媾和七原則”，杜勒斯攜帶着依據“七原則”起草的對日“媾和”方案，開始與不包括中、蘇兩國在內的有關各國進行了個別交涉。既然是爲了準備締結多數國家之間的和約，却不將有關各國召集在一起舉行準備會議，而採取由一國擅自擬定草案並個別地強迫他國接受的方式，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蠻橫行爲。杜勒斯這樣大體準備

就緒後，復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下旬再度訪日，與吉田首相進行了三次會談，二月二日發表了包括六個項目的聲明。臭名遠揚的“真空論”就是在這時候提出來的。這就是說，因為日本沒有軍備，假使在對日媾和後撤退美國佔領軍，便會產生一個軍事上的“真空”狀態，於是共產主義就會以此為目標進行直接侵略或利用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者進行間接侵略；因此，美國政府為保障日本的“安全”認為可以“根據日本的希望，願意考慮在日本國內及其周圍繼續駐紮美軍”。對於杜勒斯的這個提議，“日本政府完全同意了”。於是在日本國內發表的文告中稱，日本政府請求美國政府繼續駐軍，因此美國才以善意考慮滿足日本的願望。但是，在杜勒斯於同年二月二十六日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報告書中，却坦白寫着，是杜勒斯先向日方“示意美國在媾和後仍主張保持在日本本土及其周圍駐紮陸海空軍的權限，日本政府對此表示同意”。尤其令人吃驚的是，杜勒斯甚至在這個報告書中得意忘形地寫着：他對吉田“強調主張在目前階段美國不能承受關於日本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安全的義務”。所謂保障日本的安全原來如此！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杜勒斯並在此時與麥克阿瑟取得協議，曾就欲將日本產業變為美國軍事產業的包工工廠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商談；從這時以後，所謂“美日經濟合作”才得到急速的進展。

雖然吉田政府唯杜勒斯之命是听，但是其他各國並不如此。菲律賓對於美國對日和約方案中沒有明確規定日本的賠償義務表示不滿；澳大利亞對於日本的無限制重整軍備表示不安；英國害怕日本向東南亞傾銷商品和日本海運的擴張，希望能夠對此加以限制；並且特別由於台灣的主權成為“曖昧問題”，為反對美國將台灣變成它的事實上的殖民地，英國曾經主張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和會。杜勒斯曾對這些國家施以恫嚇或進行欺騙。他首先是对菲律賓進行了恫嚇。其次，則將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

真正意圖告訴澳大利亞，說明美國只讓日本保持陸軍，至於海軍和空軍則由美國來掌握，所以日本絕不可能重新侵犯澳大利亞，於是澳大利亞也唯唯諾諾了。因此，澳大利亞工黨的伊瓦特和評論家彼得·盧梭等人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坦率地說過：“對日和約不是爲了和平的條約，相反地，它是旨在對他國人民進行戰爭的條約。與日本締結和約的唯一意義，乃是爲了使日本擔負起我們曾經期待中國來擔負的那種任務”。

蘇聯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提出一個猛烈地批評美國“對日和約草案”的意見書。要點如下：（一）美國企圖對日單獨媾和，但這是違背波茨坦公告的；（二）美國“對日和約草案”沒有規定日本非軍事化；（三）美國“對日和約草案”沒有明確規定佔領軍的撤退時期，也沒有規定對日本武裝的限制。蘇聯於提出上述批評之後，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積極的建議：（一）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美國、英國四國代表組織的外長會議，着手準備對日和約。（二）草擬對日和約的工作應以保證下列目的爲指導方針：使日本非軍事化、民主化；限制日本武裝；允許日本無限制地發展和平經濟；取消日本對外貿易上的一切限制；日本不得參加任何反對任一曾以軍隊參加對日作戰的國家的聯盟。（三）條約應明確規定在締結對日和約以後一年之內，一切佔領軍應撤出日本領土，此外，應支持日本參加聯合國。（四）日本軍隊只限於自衛軍。

但是美國對這個建議案只回答說：美國是對日戰爭的主角，因而在對日媾和問題上應該起主導作用。而蘇聯則再度強調對日媾和應忠實於“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實際上，在艱難的戰爭時期中，美國雖曾提出了公正的諾言，但戰爭一結束它便自食諾言，這就是美國的“民主主義”和“國際信義”。而且，美國在對日媾和問題上已自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這一點。因此，美國無論如何也需要英國贊同該草案，以便作爲美英共同的

和約草案加以提出，否則就太不像樣子了。美國爲了使英國收回它對美國提案的反对，與英國進行了一筆政治買賣，這就是以伊朗問題作爲交換條件。即由美國迫使伊朗的摩薩台首相對英國讓步，來換取英國在臺灣問題上對美國讓步。於是美英取得妥協：即對日和會既不邀請台灣逃亡政權參加，也不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參加。這真是多麼荒謬絕倫的和會！它竟將會與日本作戰最久，受苦最深，受日本帝國主義之殘害最慘並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方面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排除於對日和會之外！

並且，這個“和約”草案與所謂“美日安全條約”草案成爲不可分的一體。日美安全條約的內容，雖在簽字以前一直對日本國民嚴守秘密，但大體上是可以看出它的方向的。不論從美國與菲律賓的基地租借條約或從上述美國對日和約的基本方針都可以推斷：這個條約是想藉保障日本安全之名，規定美國陸海空軍在媾和之後仍舊無限期地、並且在數量上無限制地駐紮日本，以便將日本領土作爲軍事基地來加以利用；而事實上這種駐軍與佔領軍是毫無區別地仍然統治着日本，使美國人本身繼續保持佔領軍所具有的、以完全的治外法權爲首的一切特權。日本政府模仿杜勒斯的口吻，把這個“和約”草案叫做“和解與信賴的和約”，並把它作爲“史無前例的寬大和約”來宣傳。而日本一切資產階級報紙、廣播電台則就“和解與信賴的和約”對美國深表感謝。

然而，工會、民主文化團體以及全國各地保衛和平的團體紛紛舉行了集會，竭力反對這種媾和。而美軍和日本政府曾對這種集會施以肆無忌憚的鎮壓。到了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全國凡爲和平而舉行的集會一律被禁止了。僅對九月一日以“總評”、日蓮宗<sup>①</sup>及其他宗教團體爲首在東京九段的靖國神社所舉行的“推進和平國民會議”的集會未予干涉而已。這個集

會雖在武裝警察隊和美軍的嚴重監視下，然而，參加這次集會的二萬工人，聽到社會黨左派鈴木茂三郎非難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要求歸還千島和庫頁島的演講時，便紛紛加以聲討，藉此粉碎了排外的民族主義，並且表明了國際主義的態度。

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當舊金山即將舉行“和會”的前夕，日本政府突然假借反美活動的罪名，對日本共產黨臨時中央指導部推野委員長及參議員細川嘉六等十九名日共領袖發出“逮捕令”，並將細川等八人逮捕了。九月六日（一九五一年），又對以推野委員長為首的接到逮捕令的全部人員加以整肅。日本政府也不等待被捕人員究竟是否有罪的判決，僅憑檢察當局認為他們有反美活動的嫌疑，就把他們整肅了。事實究竟如何呢？甚至連檢察當局也不能證明參議員細川、東京都教育委員堀江邑一及其他所有被捕者確實犯了當初拘票上所記載的罪狀；他們知道即使起訴，在公審時也必定失敗，於是不得不予以釋放。但是，即使這樣，還對川上貫一和岩田英一兩人捏造了與拘票毫不相干的罪名而提出起訴。而一旦遭到整肅的人員，直到現在仍未能解除整肅。當日本作為“自由世界”的伙伴而參加舊金山和會的那天，日本政府竟公然如此肆無忌憚地進行了法西斯暴力鎮壓。這就暴露了欲將日本拉進去的“自由世界”的真正面目。同時，這也表明了美日統治集團由於下列的不安和恐怖而感到顫抖：它們害怕日本國民反對舊金山片面“和約”的怒火爆發，認為如果不從國民中驅除具有領導日本國民進行鬥爭的決定性勢力的共產黨領袖，它們就不能放心。

日本人民的普遍反對，使派出“全國一致”的全權代表一事受到了阻礙。吉田首相當了首席全權代表。民主黨起初裝出不大願意派遣全權代表的姿態，但終於派出了代表。然而，社會黨



甚至連右派也不敢貿然參加全權代表團。民主黨儘管參加了簽訂片面“和約”的全權代表團，但該黨也不願意參加簽訂“美日安全條約”的全權代表團，結果這個條約是由吉田一人簽字的。

## 二 舊金山會議

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在舊金山舉行了對日“和會”。這真是一個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的、荒謬絕倫的“和會”。如上所述，在對日媾和上應為頭一名主角的中國，竟完全被排除於這次和會之外了。在解決亞洲問題上不能忽視的亞洲大國印度，也以美英強制日本和各國接受的條約，不僅不能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反而更要加深戰爭的危機，以及認為該條約並沒有結束戰爭（如排除了中國）等正當的理由，而沒有參加舊金山“和會”。曾經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殘酷侵略的緬甸也同樣地沒有參加，因此，這個“和會”不但將三個最重要的國家排除在外，而且各國代表的發言權也受到極端的限制，討論完全陷於不可能的狀態，代表們只得到是否願意在美製“和約”草案上簽字的發言機會。

美國總統杜魯門在開會時曾經發表演說。他說日本在麥克阿瑟和李奇微的領導下已經成為完全民主化的和平國家，“但是美國決不能忘記珍珠港和巴丹島的經驗”；他除了沒有忘記用這樣的話威脅日本外，並且就“將來日本的安全保障”發表了長篇大論。他說，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美國與菲律賓締結了一個“联防條約”，同年九月一日美國復與澳大利亞、新西蘭間又締結了一個同樣的條約。杜魯門繼續說“在締結一個旨在保衛太平洋和平的適當的安全條約時，能及早將日本包括在內是絕對需要的”。“如果將來日本建立自衛軍時，這支日本軍隊必將與太平洋其他國家的軍隊成為一個有机的整體。換句話說，將來保障日本安全的任務並非僅靠日本軍隊担負，而是必須依賴於與日本有互相關聯的其他國家共同約定保障安全”。這就是說，

杜魯門公開要求日本重新武裝，並向全世界公開宣稱：日本軍隊絕不能單獨保衛日本，必須與“太平洋其他各國”首先是與美軍成爲“有機的整體”；而日本軍隊只能作爲附屬於“有機整體”的“人的資源”——地面部隊而存在。關於杜魯門和杜勒斯假借安全之名，企圖在對日“媾和”後仍在日本無限制地駐紮美軍一點，甚至連贊成這個“和約”的埃及代表也曾對日本發出警告說：“本國領土至今仍違反本國人民願望地被外國軍隊佔領着的埃及，最有資格來判斷：日本領土在被外國軍隊佔領期間，日本是沒有充分條件來自由選擇的。假如日本人爲了使外國軍隊駐紮日本並受其保護而希望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締結協定，那麼日本人就應該和本來與此無關的和約分開，另訂協定”。

全面反對美製和約草案的，只有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國代表。蘇聯代表葛羅米柯指出：美國企圖利用這個條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以便充當它的爪牙；這個條約“並不是和平的條約而是在遠東準備發動新戰爭的條約”。葛羅米柯除了就九個項目詳細地揭穿了美製“和約”的實質外，並且提出了包括十三個項目的修改案。修改案的基本精神與從前蘇聯致美國政府的意見書相同，只是使它變成具有具體條款方案而已。它的要點如下：第一、第二條：遵循開羅宣言、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條款，確定將千島羣島、庫頁島南部歸還蘇聯，將台灣等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沖繩島、小笠原羣島和南鳥島等規定爲日本領土；第三條：對日媾和後，撤退全部佔領軍，任何外國軍隊均不得駐留日本；第四條：明確規定日本的賠償義務，召開必須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緬甸參加的有關各國會議，決定賠償總額和支付方法；第五條：本條約必須有美國、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英國四國批准才生效；第六、第七條：日本政府應負責恢復日本人民的民主趨勢，並負有絕對不使法西斯軍國主義團體復活的義務；第八條：日本不得加入任何反對任一會

以軍隊參加對日作戰的國家的軍事聯盟；第九、第十、第十一條：日本武裝應限於自衛軍，即陸軍不得超過十五萬人，海軍總噸數不得超過七萬五千噸，空軍不得擁有轟炸機，除轟炸機外，其他飛機包括後備飛機在內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架，其他軍備亦應予以限制；第十條：除上述規定外，禁止對國民進行軍事訓練；第十一條：禁止使用包括原子武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在內的大規模殺人的工具，對其他武器亦應予以限制；第十二條：日本的和平企業、貿易和商業性海運業應保證其無限制的發展；第十三條：規定日本宗谷海峽和根室海峽的全部沿海以及津輕海峽和對馬海峽為非武裝地區。這些修改條款是真正結束對日戰爭的條款，而不是使日本與外國進行戰爭的條款，但是美英及其僕從國家却對此置之不理。

出席舊金山“和會”的日本全權代表吉田茂在大會最後一天始獲得一個作簡單演說的機會。據說，從他到了舊金山以後，他的一舉一動均被置於監視之下，絲毫不能自由行動；甚至連他的演說內容，事前也被加以檢查。吉田在他的演說中把這個條約稱為“史無前例的公正條約”，而且還進行了露骨的反蘇演說，主張日本對擇捉和國後兩島有領土權，說是日本因面臨着來自北方共產主義侵略的危險，希望美軍繼續駐紮。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舊金山會議閉幕了。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國拒絕簽字，而美、英及其四十八個僕從國家和日本則簽了字。這正如印度輿論所說，完全是“白種人的條約”。甚至連馬來亞的英國系統報紙都說“在太平洋戰爭中遭受損害最嚴重的雖然是亞洲人，但是舊金山和約並沒有听取八億五千萬亞洲人的意見”便簽字了（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朝日新聞”）。在舊金山簽訂了片面“和約”之後，吉田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緊接着在舊金山下級軍官的集會所簽訂了一個所謂“美日安全條約”，並完成了換文手續。在簽訂“美日安全條約”時，美國甚至

不願提供一個將校集會的地方來作簽字的場所，而撥給一間下級軍官使用的集會所，這件事也多少是含有象徵意義的。

這個“和約”看不出任何有一些作為和約的根本必要條件。首先、它沒有完全結束過去的戰爭狀態（排除中、蘇、印度和緬甸，沒有解決領土和賠償問題）；第二、沒有恢復戰敗國（日本）的主權（美國繼續佔領）；第三、不但沒有阻止復活戰敗國（日本）的軍國主義，反而助長了軍國主義。這個條約的本質是美國企圖動員和利用日本來對蘇聯、對中國、對朝鮮進行戰爭的戰爭條約；這不但早已由蘇聯和中國人指出，即使澳大利亞人甚至連美國的評論家也都毫不含糊地承認了。關於這點我們在此無需反覆論證，只要將製訂該條約的經過並將蘇聯修改方案與原來的方案比較一下，只要看看杜魯門總統的開會演說，就可以明白了。

具有這種本質的“和約”是與“美日安全條約”有着不可分開的關係的。我們從“安全條約”之所以不叫做美日“相互”安全條約這一點上，已經可以窺知它的底細了。“美日安全條約”規定：美軍有權利無限期地無限制地在日本領土及其周圍駐軍；日本不得將同樣的權利給予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並規定駐日美軍“得用以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和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安全，包括根據日本政府的明顯要求，為鎮壓由於一個或多個外國之煽動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規模暴動和騷亂所給予的援助。”這只是說“得使用”，因此，美國並不負必須使用的義務。不論在這個條約的序文或本文中，說明美國負有保障日本安全義務的連一個字也沒有提起。這就是說，正如條約起草人杜勒斯曾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所強調的那樣，這個條約的基本精神是貫串着這樣一個原則，即美國雖在日本有駐軍及其他權利，但卻不承担保障日本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任何義務。在這個簡短條約中，沒有任何關於美軍應在日本何地駐紮多少、美軍的行動應經

过什麼手續，以及駐日美軍与日本法律及日本國民的關係等問題的規定；这一切都留在日美兩國政府間的“行政協定”中解决。这等於日本交給美軍一張足以左右日本國家命運的空白委託書。

艾奇遜和吉田在“美日安全條約”簽字時，互相交換了照會。吉田在其照會裏說：“日本在‘和約’生效後，將承擔聯合國憲章第二條所要求的義務，即對於聯合國依本憲章規定而採取之行動，應盡力予以協助”。根據這個說法，日本在朝鮮戰爭中不僅應對聯合國軍提供基地、物資和勞務；並且假使聯合國提出要求，日本還有出兵的義務。日本憲法雖然禁止日本保持軍備，但在吉田照會中甚至連“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這樣的保留條件都沒有。如果說到這時為止“聯合國軍”將日本作為軍事基地進行侵略戰爭並非出於日本的願望，而是因為日本处在美軍——“聯合國軍”——佔領下，必然會發生的事情，那末在“和約”生效後，却變成日本出於自己的意志積極地參加了屠殺朝鮮人民的勾当了。

日本雖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曾經是亞洲唯一完全獨立的國家，但在二十世紀中葉，正当亞洲各民族為擺脫歐美長期的殖民地統治而進行解放自己的鬥爭時，日本却單單日益加深地變成美國的殖民地。自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前半期，日本作為帝國主義侵略者，使亞洲各民族遭受了痛苦；然而，現在一方面日本自身已淪為美國的殖民地而遭受苦難，另一方面却充當美國的爪牙企圖再度侵害鄰邦各民族，日本民族的悲劇和危機，還有比上述情形更嚴重的嗎？這就是舊金山“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以及艾奇遜与吉田所交換的照會強加於我們日本人身上的東西。

## 第二節 “日蔣條約”与行政協定

### 一 兩個條約的批准、社会党的分裂

当兩個條約在舊金山簽字之日，“讀賣新聞”特派記者自舊金山發出如下的報道：

“对日‘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簽字後，吉田首相在当天即前去訪問艾奇遜國務卿，並在杜勒斯顧問和魯斯克助理國務卿的陪同下与艾奇遜共進午餐。与此相關联的，吉田首相私人顧問白洲次郎与当时正在舊金山的陸軍次長詹遜進行了數次會談。據消息靈通人士觀測，这次會談是就吉田首相赴美的主要目的：就將來建立日本的‘自衛軍’即重新武裝問題，以及与此表裏一体的日美經濟合作問題，也就是借款問題，進行了初步商談。”假使改成容易明白的話來說，就是吉田和白洲，与美國当局立即開始了關於這兩個條約以及由此而必然產生的日本重新武裝問題的談判，即如何向美國高價出賣日本的獨立、領土、財富及國民的談判。這項交易才是使懶惰的吉田首相率領日本銀行總裁一萬田等親自前往舊金山的最大目的。因此，再沒有比這個報道更公開地承認兩個條約的賣國性質的文章了。但是吉田到了舊金山後，立刻發現美國的還價遠不及吉田等人所期望的條件和價格。“讀賣新聞”特派記者接着報道說：“關於对日貸款問題，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的主要見解是以改造日本產業構造為前提的，‘从長遠的眼光來看，缺乏原料的日本勢難原封不動地維持如同过去的獨立產業体系，日本在美國產業体系的控制下承担一部分生產，即扮演充当美國產業一部分的角色，不但對於日本（1）即使對於美國也是有利的。因此，日本如果不採取这种方針，美國对日的大量投資是困难的’”（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讀賣新聞”）。但被迫不得不成為美國一部分的，不僅僅是產業機構，

而是日本的一切。這就是兩個條約所要決定的日本的命運。美國政府當局爲使日本人不要發生絲毫誤解，所以就在簽字的瞬息之間特別把它毫無掩飾地講了出來。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日本衆議院竟批准了如此可恥的“和約”。投票贊成的有自由黨、民主黨、右派社會黨以及其他議員共三百零七名，表示反對的共有四十七票，其中包括左派社會黨、共產黨、勞農黨全體議員和民主黨石田一松等四位議員。至於“美日安全條約”，甚至連右派社會黨也沒有贊成。自然，他們是明知會通過而故意裝作反對的姿態而已。民主黨中有三位議員也對“美日安全條約”表示反對。但這個條約結果也是以二百八十九票對七十一票終於通過了。民主黨最高首領之一的北村德太郎雖然主張反對該兩條約，但是他在表決時却棄權了。四百六十六名衆議院議員中，對於批准“和約”的表決，有一百二十二名棄權或缺席，對於“美日安全條約”的表決，有一百名棄權或缺席。繼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日本參議院也通過了這兩個條約。在參議院中，同樣反對這兩個條約的是左派社會黨、共產黨、勞農黨、第一俱樂部的大山郁夫、羽仁五郎等六位議員以及綠風會高良富等共四十五位議員（投票贊成“和約”的有一百七十四票，反對的有四十五票；投票贊成“美日安全條約”的有一百四十七票，反對的有七十六票）。

兩個條約是這樣地獲得了批准，但重要的不在於獲得批准，而在於它未能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贊成票，連議員也有三分之一以上反對或棄權以至於不出席表決的。這反映了日本國民中的進步的分子固然反對這兩個條約，而其他的國民也消極地反對這兩個條約。

儘管日本政府、執政黨派、大報紙和廣播電台竭盡各種計謀和物力來宣傳這是“史無前例的寬大媾和”，但日本人民却毫不因此而感覺興奮。特別是有組織的工人表明了堅決反對批准兩

個條約。於是，社會黨在議會開幕之前，召開了黨臨時大會，藉以決定對兩個條約贊成與否的態度。右派認為應該把“和約”與“安全條約”分開處理，贊成前者而反對後者；左派則主張兩個條約都反對。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兩派終於宣告分裂。主張兩個條約可以分開處理的說法完全是詭辯。我們已經充分敘述過兩個條約成立的过程，所以無須對此再加批評。社會黨左派認為兩個條約不可分而表明了反對任何一個條約的態度，這可以說還是符合國民羣衆的要求的。然而奇怪的是，社會黨大會雖然有過半數的代表（總數三百五十四名中的一百九十三名）簽名反對兩個條約，尤其是有了代表着廣泛的黨員們意見的府縣聯合會絕對多數代表的支持；但左派幹部竟不認真與右派鬥爭，甚至容許右派的暴力團闖入大會毆打，結果也不把反對兩個條約作為社會黨大會的正式決定，竟輕易地使大會宣告流產。並且在黨大會流產以後，左派委員長鈴木茂三郎試圖與右派書記長淺沼妥協，發表了如下談話：“對於在國會投票批准和約的態度，各議員可根據議員應有的信仰行動”（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朝日”新聞）。這樣就使得社會黨黨員們和國民都不得不懷疑左派幹部究竟有沒有為認真反對兩個條約而奮鬥的決心。

## 二 “日蔣條約”

杜勒斯看到日本國會批准了該兩條約後，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第三次訪問日本。他在日本住到十二月二十日，曾與吉田首相等舉行秘密談判。杜勒斯照例強調“美日友好”，但其真正意圖卻在於加速重新武裝日本，要吉田確實答應絕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媾和，而必須選擇台灣逃亡政權為媾和對象；雖然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可自由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逃亡政權的任何一方作為它對中國媾和的對象。吉田必恭必敬地按照杜勒斯的命令，除答應加緊重新武裝日本外（詳見後述）；同



時，在他十二月二十四日致“美國國務院杜勒斯”的信件中，公然答應完全按照杜勒斯的命令，日本只和“中華民國政府”媾和。並聲稱：“日蔣和約”“適用於現在以及將來應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管轄下的一切領域”。吉田在這封信件中並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爲“中共政權”，聲明今後仍然支持聯合國譴責中國政府爲“侵略者”的決定，認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係“針對日本的軍事同盟”，和“確有理由相信‘中共政權’正在支持企圖以暴力推翻日本憲法制度及現政府的日本共產黨”，所以日本政府絕不與“中共政權”締結條約。

這一信件不僅引起中國人民，而且引起了日本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憤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發表聲明說：“我們認爲，這一信件是戰敗後的日本反動政府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起來，對中國人民與中國領土重新準備侵略戰爭的鐵証。這一信件是美帝國主義政府與戰敗後的日本反動政府，繼一九五一年九月舊金山對日和約之後，又一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嚴重、最露骨的挑釁行爲”。蘇聯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指出：日本與台灣逃亡政權簽訂的協定“不僅露骨地表示了敵視中國人民的態度，同時也是對於遠東及全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並且說：“日本或與日本勾結的一切勢力如果進攻中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將發生效力”。中立的印度報紙（“每日快報”）提出警告說：日本與台灣逃亡政權結合而與中國隔絕，“這將造成政治上、經濟上的悲慘後果”。英國政府也非難杜勒斯對日本施以壓力。甚至連美國“華盛頓郵報”也加以批評說：“吉田的信件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動搖。十二月二十四日這個日子將成爲戰後遠東歷史上劃時代的可記憶的日子（中略）。據稱，吉田首相簽發這一信件保證了他的政治生命的完結。料想繼承吉田的首相恐怕不會像吉田那樣順從於美國。不管怎樣，吉田的信件將使中日今後的關係惡化，這是無可置疑的”（據一九五二

年三月的共同通信社“世界資料”）。

實際上，吉田的信件表明了侵略中國的意圖，這一點不僅表現在露骨攻擊中國政府以及料想將來台灣逃亡政權要侵犯中國大陸的文字上，而且由杜勒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所作的著名的電視廣播也能得到旁証。他說：“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是不可能人為地隔絕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因此，大陸政權的性質必須予以改變”。這也就是說，為了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建立帝國主義的傀儡政府，日本應侵略中國（調布三郎：“杜勒斯的皮包”一文，載“改造”月刊，一九五二年增刊號）。吉田的信件是與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的這個見解有關聯的，這在客觀上自可毋庸置疑。從這裏更清楚地看到片面“和約”的本質就是戰爭條約。吉田政府本着這封信，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即“和約”生效的那天）便與台灣逃亡政府之間締結了“日蔣條約”。

### 三 美日行政協定

吉田信件雖暴露了對日“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的本質，但這兩個條約將給日本國內帶來什麼後果，却由於具體規定“美日安全條約”內容的“美日行政協定”而使所有日本國民更加清楚了。杜勒斯回國一個多月之後，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魯斯克來日。魯斯克儘管說他到日本只是為了規定“美日安全條約”的“實施細則”，但實際上他的任務乃是強迫日本簽訂規定“美日安全條約”中心內容的“美日行政協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等人公開聲稱：如果不能製訂令人滿意的“行政協定”，美國將不批准對日“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美國如何重視“美日行政協定”了。

“行政協定”的談判，由魯斯克和國務大臣岡崎勝男進行了

一個月。談判是在秘密中進行的。當時日本國會正在開會中，於是在野黨不斷要求政府說明“行政協定”的談判經過，但吉田首相和岡崎國務相都矢口不談重要問題；他們在協定簽字前，一直未能發表這個勢必引起國民憤怒的“行政協定”內容。日本政府雖然宣傳說：談判是站在“日美平等”的立場進行的，但是實際上日本方面對於魯斯克提出的美國方案，只是在枝枝節節的地方提出一些希望而已。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所簽訂和發表的“美日行政協定”，是將日本置於“如同越南對於法國、菲律賓對於美國的地位”（見神川彥松博士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在參議院的發言）。不，是使日本處於比它們更悲慘的殖民地境遇。

（一）行政協定規定美國可在日本全國所有地方無限制地建立陸海空三軍軍事基地（第二、第三、第四條），並且由日本分攤駐軍費用。至於款額，則未作規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雖從世界各國取得了建立軍事基地權，但只有對其殖民地菲律賓擁有建立陸海空軍一切基地的權利。而且，即使是菲律賓，也不允許美國像在日本那樣無限制地建立基地。

（二）日本必須與美軍“緊密合作”“發展”“一切非軍用、軍用航空交通管理及通訊的體系”，並且加以調整使之符合於美軍的利益。此外，美軍得以不比一般條件為壞的條件優先使用“屬於日本政府或由日本政府管理及規定的一切公用事業和公共勞務”。因此，不論是鐵路或電訊，美軍的運輸和通訊均優先於日本旅客和貨物的運輸或通訊。至於電力，首先也要供應美軍設施或其家屬的需要，日本人只能利用它的剩餘部分而已。日本的氣象業務也是如此，必須首先為美軍服務。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按“軍、官、民”的次序，軍部優於一切，而現在外國軍隊的美軍却擁有恰如過去日本軍部所享有的一切特權（見“行政協定”第六、第七、第八條）。

(三)“屬於美國軍隊的成員和文職人員及其家屬”，不論在基地內或基地外所犯的任何罪行，均不受日本法律制裁，一切按照美國法律受美國的審判。雖然吉田政府說這是裁判管轄權的屬人主義而非治外法權，想藉此來欺騙愚昧的議員和國民；然而，不僅美國軍人和文職人員而且連其家屬都逍遙於日本法權之外，這也就是說他們都享有治外法權。一個獨立國家對於其他獨立國家的國民給予如此廣泛的治外法權，世界史上還未曾有過這樣的先例。這一切都是統治國家強加於殖民地和附屬國身上的東西。甚至連在菲律賓也沒有承認關於美軍在軍事基地外犯罪的治外法權。

(四)美國軍人和文職人員及其家屬享有免除“私人用品”的進口關稅權及其他許多經濟特權。規定這種特權的條文既複雜又廣泛，雖然協定本文一見恰似並無損於日本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却附有例外，使本文宗旨完全歸於無效。例如關於民事，一方面規定美國軍人及其用人与日本人發生糾紛時應由日本裁判所處理，但同時，不僅附有許多例外，而且还規定：關於“由美國軍隊的或為美國軍隊的物資、商品、儲備品、勞務及勞務的供應合同所發生的糾紛”，簽訂合同的當事者“可提出民事起訴”。其中沒有明文規定往哪個裁判所起訴，美軍抓住這一點，單方面地強硬解釋說只能向美國裁判所起訴。國務大臣岡崎也罷，外務省條約局長西村也罷，都自吹自擂，以為是外交能手或人材，其實他們不過是昏庸懦弱之輩，連這種欺騙的條文也未能加以反對。

(五)為了維護駐日美軍的利益和安全，日本必須採取特別措施。這就是說為美軍制定曾經在日本軍閥全盛時代旨在維護軍閥專制獨裁而制定過的“防諜法”或“軍機保護法”。吉田政府和自由黨等根據這個規定於四月制定了“刑事特別法”、“民事特別法”以及其他法令。他們為了美國佔領軍的安全和利益，可根據該法律肆無忌憚地犧牲日本國民的自由、安全和利益。

(六)無論“美日行政協定”或“美日安全條約”，對於美軍爲與外國作戰而出動時的條件和手續，都未作任何規定。“美日安全條約”第一條規定：駐日美軍“得用以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和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安全(包括協助鎮壓內亂)”。 “行政協定”第二十四條也只規定：“在日本區域內發生敵對行爲或受到敵對行爲的急迫威脅時，日本國政府及美國政府必須採取必要的共同措施以防禦日本區域並立即協議以完成安全條約第一條的目的”。實際上這是意味什麼呢？這就是說，美軍可憑“爲遠東的和平”或“爲日本國的安全”的藉口，隨時可以按其所欲發動戰爭。而日本對於這種戰爭則須承擔協助的義務。所謂日美兩國進行“協議”以防禦日本領土，實際上就是使日本完全成爲美軍的附庸，只不過在外表上採取了出於日本自由意志的“共同”形式而已。這種把靠美軍壓力的強迫命令當做日本的主動請求的做法，實際不過是把杜勒斯迫使吉田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接受美軍永遠佔領日本、在同年十二月迫使吉田選擇台灣逃亡政權爲“媾和”對象的同樣做法成文化而已。

上述情形只是表示“行政協定”真實面貌的重要部分，但這並不是說除此之外美軍再沒有其他特權了。根據條文來列舉不利於日本之處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協定是在何種歷史和政治的條件下簽訂的(這種條件已通過全書充分地敘述過)。“行政協定”是強迫日本人將土地、財產甚至於自由、幸福和生存完全交給美帝國主義處理的空白委託書。由“行政協定”承認美國軍人等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權這一事實，足使所有的日本人想起一世紀前同樣是美國培利艦隊<sup>①</sup>和哈里斯強迫簽訂的“安政條約”<sup>②</sup>的治外法權，以及日本人祖先爲廢除該不平等條約而進

<sup>①</sup> 培利是美國海軍准將，一八五三年率艦隊至日本強迫日本締結日美和親條約，打破了日本幕府的鎖國政策。——譯者

行的艱苦鬥爭。然而，“安政條約”的治外法权与这次的治外法权是不能相比的。“安政條約”規定外僑居住地區及自由行動地區僅限於開放港口的十平方日里(每日里約合七點八五四五華里——譯者)以內，而治外法权只適用於居住在該地區內的外僑。而根據这次的條約，凡美國軍人和文職人員及其家屬在日本國內任何地方，都要比日本人自由得多、優越得多，到处橫行無阻，並且享有治外法权。此外，“安政條約”規定享有治外法权的，照例並非軍人而是商人，但这次享受治外法权的則是軍人——並且是帝國主義的軍人。美國軍人和具有軍籍的文職人員及其家屬對於日本人民所享有的特权，正与德川時代武士及其僕从和家屬、以特权統治階級身分對於平民所具有的“格殺勿論”的特权相同。

總而言之，把这次的兩個條約和行政協定与“安政條約”等做比較，容易引起錯誤認識。“安政條約”雖然也是不平等條約，但畢竟还是通商條約，而这次的條約則是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利用和榨取日本的軍事條約。就“安政條約”來說，如果把二、三條文加以修改，如取消治外法权並恢復稅权等，那末还可以維持民族獨立。然而这次的行政協定，即使今後能够修改治外法权的規定，即使把第二十四條有關美軍出動的規定更加具体化，但是只要不能名副其實地廢除美軍在日本的基地及其駐兵权，只要美軍不自日本全部撤退，並且只要不廢除兩個條約而締結一個公正的全面和約，那末日本就不能獲得獨立。所以問題在於美國龐大的陸海空軍繼續盤據日本，使日本政府和統治階級完全屈服於其軍事压力，而不是在於條文的末端。

不待說，“行政協定”並非只是有關行政事務上的簡單規定，

---

⑤ 哈里斯是美國第一任駐日總領事，一八五五年至日本，強迫日本締結不平等的日美通商條約和貿易章程，被稱為“安政條約”。——譯者

而是具有明治以來日本與外國所締結的一切條約均不能與之比擬的嚴重內容。然而，日本政府却把它稱爲“行政協定”，不但未經國會的批准和承認，吉田和岡崎甚至也未對國會做過認真的報告。雖然民主黨和左右派社會黨等裝出攻擊政府的姿態，但連左派社會黨也始終未觸及問題的本質，只是在條文上發一通議論而已。由於日本政府明確表示只和台灣逃亡政權締結和約的態度並在行政協定上簽過字，美國才批准了對日“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而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也先後把對日“媾和”條約批准書送交美國國務院，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這些國家與日本的“媾和”條約開始生效。這個條約自簽訂時即遭到了國際上的批評，認爲是漠視亞洲十億人民的意志，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雖曾在條約上簽過字，但是並未加以批准。同時，儘管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說，日本由此已經正式獲得獨立，企圖以此欺騙日本人民，但是日本人民並沒有被騙。當日本人民看到“美日行政協定”之類的條約，看到“媾和”後美軍仍舊作爲日本的主人在日本橫行霸道，看到日本政府連和外國貿易的自由都沒有的事實，誰還能真正相信日本已經獨立了呢？即使根據“朝日新聞”的輿論調查（所謂報社的輿論調查並不在於闡明真實的輿論，只不過把它作爲一種測驗報紙宣傳效果的標準而已，所以大抵都是捏造出該報社所希望的輿論）也顯示了：由於“和約”生效認爲日本業已獨立的人僅佔百分之四十一，其他百分之四十四回答說並未獨立，百分之十九說不知道（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七日發表）。工人、學生以及進步的農民們不但並未認爲日本已經“獨立”，反而把“和約”生效日，即“美日安全條約”與“行政協定”生效日作爲日本正式喪失獨立的日子而加以哀悼，並爲恢復獨立，已經堅決展開了大規模的實力鬥爭。

### 第三節 殖民地法西斯體制

#### 一 重新武裝的進行

日本在簽訂舊金山片面和約與美日安全條約後，日益公開並日益加速地進行重新武裝。儘管吉田首相顛倒黑白，硬說警察後備隊不是軍隊，但在他繼續愚弄國民的期間，由於美國統治者的督促，吉田等日本反動勢力也不得不急忙開始重新武裝。自一九五一年秋以來，李奇微與吉田曾就日本“逐漸增加防衛力量”即就加速擴充日本軍備問題不斷進行談判，而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即當決定新年度預算案的前夕，“一致認為應在一九五二年度內將日本警察後備隊增加到十一萬人（同時給予諸如大砲、高射砲等重武器裝備），而在一九五三年度內則應增加到三十一萬人”。海軍方面，則將“海上保安廳”加以改編，從美國“租借”二千噸級驅逐艦十艘和五百噸級艦艇約五十艘，用以加強“沿海警備力量”（更正確地說來，就是建立一支為了對潛水艇作戰，掃除海面魚雷，護送敵前登陸部隊以及在日本國內大規模地移動和集中兵力的海軍）。決定這類事情時，採取了恰似決定普通事務的形式（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過去在制度上不過是作為補充國家警察與地方警察力量的警察後備隊，後來被改為“旨在維持日本和平與秩序並保護生命與財產”的“保安隊”。此外，使海上警備隊脫離海上保安廳而獨立，從美國“租借”最新式的驅逐艦，並設立保安廳，以便統一指揮保安隊與海上警備隊。吉田政府已決定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成立保安廳（見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朝日新聞”）。

圍繞着重新武裝問題，舊軍人、反動政客及資本家們的策劃莫衷一是。有的支持政府的方針，有的則責難警察後備隊等為“美國的私生子”，企圖復活從前的“皇軍”。然而目前日本的重



新武裝，想要保持獨立國的軍備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這種重新武裝是為美軍提供“砲灰”，因此主要是建立沒有重型坦克裝備的大的地面部隊。而美國海軍、空軍及坦克部隊把這種地面部隊當做消耗品加以利用，並監視它不至於叛變。這就是目前日本的重新武裝。實際上，李奇微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以對美國新聞記者談話的形式聲稱：“在軍事上，美國希望日本能建立為了自衛的陸軍，警察後備隊最後必須發展為陸軍。這在條約中已被暗中列入日本應承擔的義務之內。但在作為現代國防制度的陸海空軍中的空軍與海軍，在經濟上，目前日本還無力建立。認為日本在不久將來可以建立現代化的空軍與海軍的想法，是不正確的。但是地面部隊則又另當別論”（見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英文“日本時報”和“讀賣新聞”）。

目前在日本之所以不能建立海軍與空軍，並非如李奇微所說的，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而是在於政治上的原因。其根本原因乃是一方面由於美國不允許那樣做，另一方面則因為日本國民的反對。目前日本從經濟上來說既沒有建立陸軍的力量，而且假使為了日本真正的自衛，則重要的並不是在於建立軍隊，而是首先應當確保真正的獨立，這一點前面已說得很清楚了。李奇微企圖通過這次談話，命令日本公開建立地面軍隊，並想藉此禁止舊軍人和政客企圖建立海軍與空軍的活動。這也是杜勒斯使害怕日本重新武裝的澳大利亞和菲律賓接受對日片面“和約”的條件之一。此外，日本壟斷資本家、天皇制官僚和大地主雖然想藉利用和從屬於美軍的機會將日本人民出賣給美軍充當“砲灰”，使日本成為侵略亞洲的爪牙，以便多少能夠恢復過去“大日本帝國的光榮”，但是目前它們還沒有違背美國意旨獨自有所作為的力量。因此，不管舊軍人怎樣叫嚷，“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是建立不起來的。並且，即使美國與日本反動集團決定建立正規的海軍和空軍，以日本工人階級為首的國民大眾也決不會允

許。吉田等人之所以不敢公開將警察後備隊稱爲陸軍，也是因爲他們压制不住國民大眾的反对的緣故。既然如此，怎麼又能建立大規模的空軍和海軍呢？

於是，吉田政府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採取自以爲可以蒙混國民的形式，來迅速加強殖民地土著部隊性質的重新武裝。在一九五二年度預算的一般會計項下歲出八千五百二十七億日元中，警察後備隊費爲五百四十億日元（此外還有一九五一年度的結餘三十億日元）；海上保安廳費爲八十六億日元；供美國佔領軍使用的所謂“防衛分捐費”爲六百五十億日元；此外還有所謂“安全保障費”五百六十億日元。這是爲了警察後備隊在一九五二年度雖在表面上說是十一萬人，但實際估計將增至十八萬人的費用以及爲了其他軍事目的的預備費。以上純粹的直接軍事費共計一千八百二十億日元，佔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一；它比一九五一年度的戰爭結束處理費、警察後備隊費等純粹的直接軍事費，增加了約百分之四十五。其他所謂購和關係費或公共事業費（主要是軍用道路建設費）自不必說，連產業投資方面，如電源開發、通訊、運輸設施的整理配備等也沒有一項不是軍事開支。從上述行政協定條文也可以了解，氣象台的工作也是首先要爲美軍服務的，因此這筆經費也應該算是軍事費用。而警察費（僅僅是國家地方警察費也有一百八十七億日元，比一九五一年度增加二十九億日元）自然也是軍事費。總之要區別預算中的軍事費項目與非軍事費項目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純粹的直接軍事費用的激增不僅只是說明了它本身的急劇增加，而是說明了整個預算軍事化的速度。正像這種軍事化是從屬於美軍的軍事化一樣，整個的預算也變成較過去更深刻的殖民地預算了。

## 二 殖民地軍事經濟

日本的產業體系也日益公開地走向殖民地軍事產業化的道

路。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駐日美軍司令部允許日本製造武器（值得注意的是這還在“和約”生效之前），三月十九日對指定作賠償的民營工廠也解除其充賠償的指定，使之可能自由地從事軍火生產。據“工商經濟”雜誌（一九五二年四月號）稱：據傳四月間美軍向大阪機工公司訂購了數達四百一十門的迫擊砲，“現在已接受訂貨或確實將接受訂貨的軍需品項目及廠商名單如下：火藥——日本油脂公司、日本火藥公司、日本化成公司和三井化學公司；火藥加工——日本火工公司和帝國火工公司；槍枝——東洋機械公司、新中央工業公司、西日本重工業公司、日本製鋼公司、日平產業公司、日本特殊鋼公司和日立工機公司；大砲——日本製鋼公司、中日本重工業公司、大阪機工公司和神戶製鋼公司；炸彈殼——新扶桑金屬公司、日本鋼管公司、神戶製鋼公司和日本製鋼公司；子彈——日平產業公司和大隈工業公司；電波武器——日本電氣公司、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和東京計器公司；車輛——日產公司、豐田公司和中日本重工業公司；載重車輛——小松製作所和日立重機公司。

被解除作賠償指定工廠的民營工廠共達七百零七家，包括三百十九個飛機工廠，一百八十九個軍火製造廠，八十九個工作母機工廠，二十六個軸承製造廠，十九個鋼鐵工廠，二十個硫酸廠，十九個蘇打工廠，六個橡膠工廠，二十個電力廠。這些工廠正為美軍的訂貨和日本的重新武裝而大感興奮。在飛機工業方面，中日本重工業公司（原三菱飛機公司）、富士工業公司（原中島飛機公司、三鷹工廠和太田工廠）、川崎機械公司（原川崎飛機公司）、新明和興業公司（原川西飛機公司）和昭和飛機公司這五大公司早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已應美國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的要求，提出了關於包工修理的計劃書。

此外，所有從前的巨大軍需工廠都在陸續準備恢復和重建。如果把这些工廠和美軍直接管理的工廠（美軍特需工廠）和 LR

工廠 (Labour Requirement 的簡稱, 工廠經營完全由美軍操縱, 日本人只提供勞務) 加在一起來看, 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日本工業正在徹底軍事化的情況, 它幾乎將達到可與太平洋戰爭時期相比的程度了。與過去不同的是, 這些軍需品的訂貨者首先是美軍, 這種生產是為美國做包工, 其中以飛機生產最為典型, 而石油等工業則完全受美國資本的控制 (已如前述)。總而言之,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 這些產業都是隸屬於美國軍需產業的。也就是說, 正如在本章開頭所講的那樣, 美國當局在舊金山會議閉幕的那一天向吉田、白洲和一万田所提出的要求, 已如願以償正在順利地進行着。

日本經濟變為美國的附庸, 從美國在金融方面、在對日直接投資方面、在貿易方面以及在所謂“開發東南亞”方面來利用日本產業的問題上, 也可以加以證明。但關於這類事實這裏不一一列舉了。關於美國資本直接對日投資問題,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和四月二十一日日本“經濟學人”雜誌刊載了題為“‘和約’生效與外國資本的動態”一文, 報告了具體的事實。在貿易方面, 我只想指出一些人所共知的事實, 如愈益加緊禁止日本對中蘇的貿易, 禁止日本代表出席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 從而正在迫使日本對外貿易更加依賴美國。“開發東南亞”被叫囂得好像是日本資本和商品的出路, 但只是大聲叫喊, 而未見具體化, 也不可能具體化。因為不管是印度尼西亞或馬來亞, 對於復活日本帝國主義的警惕性, 當然是很高的。因此, 所謂“開發東南亞”不過是美國資本通過控制日本橡膠工業和石油工業讓日本資本冒着經濟上的風險而讓美國純受利益的方式, 來廉價地掠奪東南亞的這類最重要的戰略物資。其結果只是把東南亞的原料市場和銷售市場在日本結合起來而已。所以這當然不是什麼開發。

經濟的軍事化和殖民地化, 同時也就是壟斷資本的加強和

舊財閥的公開復活，關於這一點从前面的叙述看來已可以明白了。

爲使日本的領土軍事基地化和進行重新武裝，所以美軍到处佔用土地和在上海奪用漁區以便作爲基地、兵營、陸海空軍演習場以及其他軍事目的之用。據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朝日新聞”報道，內定作爲駐日美軍設施和區域的處所如下：飛機場——北海道二處，東北五處，關東七處，中部四處，近畿三處，中國二處，九州七處，全國共有三十處（不包括四國在內）；部隊駐紮地——北海道四處，東北四處，關東七處（包括橫須賀軍港在內），中部四處，近畿三處，中國二處，九州六處（包括佐世保在內）；演習場——全國有三十三處（其中海上演習場十三處）（地名从略）。此後，在日本各地仍在不斷地設立基地。於是從北海道起至薩南羣島爲止，日本全國領土都遭受着美軍的蹂躪了。

甚至日本民族自古以來就心嚮往之的富士山地帶，也爲了再行擴大現有的演習場等等而將被佔用數万町步土地，因此，行將喪失生活根據的當地人民自不必說，並且引起了日本全國人民的反對。人們從九十九里濱事件<sup>○</sup>就已經清楚地了解到，一旦成爲海上演習場，這處海面就幾乎或完全不能捕魚。並且有時也禁止或限制漁民出海捕魚。這豈不是連山帶海都從我們日本人手中奪過去了嗎！在戰後宣揚“民主化”“非軍國主義化”的情況下，由回國同胞以及其他入等辛勤開墾出來的舊日本軍用地，好容易有了收成，而當他們剛剛鬆一口氣的時候，又到处都在發生爲外國軍隊和警察後備隊而徵用土地的悲慘事件。滲透了祖先万代血汗的耕地，連合理的代價都得不到就被徵用了。從舊兵營改成的學校，由於學生和教授的一致努力，好容易有了學園

<sup>○</sup> 九十九里濱是日本千葉縣東岸的大漁場，因爲美軍把它佔用爲海上演習場，因而引起漁民的反對。——譯者

的氣氛時，却像一場春夢一樣又陸續被警察後備隊徵去作兵營了。日本政府把爲美國統治者及其僱傭兵供應設備看得比農業、漁業以及學校教育都要重要得多。

並且，美軍所在之地，成羣結隊地聚集着由老鴿拉來的梆梆女郎。污穢的魔窟櫛比林立，於是附近的民房也立即變爲梆梆女郎的寓所了。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竟然被迫到向梆梆女郎出租房屋的境地。鄉村的孩子們不論是在家中或在街上行走都得看到猥褻的景象。把孩子們拋棄在狗的世界裏，怎麼能夠對他們進行像人的教育呢？而且，像橫須賀商業會議所，竟編製向外國人介紹梆梆女郎的歌曲而大肆宣傳。一九五一年度日本的外匯收入中，梆梆女郎的收入僅次於“特需”，據說爲數達二億美元，這個數字等於曾在數十年間佔日本輸出貿易首位的生絲輸出額的三倍。誠然，日本已變爲梆梆女郎的國家了，日本經濟也被“梆梆經濟化”了。一九五〇年四月，大藏大臣池田肆無忌憚地公開說：“日本是美國的小老婆，既然是小老婆，就應該向老板諂媚”。而日本現在正在名副其實地被迫走向他所說的道路。

### 三 防止破壞活動法案及其他

這種走向殖民地奴隸化和戰爭的道路，勢必將莫大的苦難和犧牲強加於國民大眾的身上，因此当然要引起爭取獨立、和平與民主的、激烈的民族的階級鬥爭。吉田政府及其主子也預見到日本國民勢必起來抵抗，因此，爲着鎮壓這種鬥爭，便不惜採取各種手段；結果，就加強了法西斯的法律制度。

成爲各種法西斯立法核心的，就是現在遭到全國人民猛烈反對的防止破壞活動法法案。在舊金山簽訂了兩個條約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爲了“維持獨立後的治安”將提出特別的公安立法。在公開的佔領期間，日本國民爭取獨立與和平的鬥爭，都是憑第三二五號政令（處罰妨害佔領目的行爲的政令）和根據佔

領軍命令的“团体等規正令”而实行鎮压的，或由佔領軍直接下指令、發表聲明書及憑“新聞編輯規則”等实行鎮压的。然而，在名義上“媾和”後，就不能再公開使用那些佔領法規了。因此，日本政府企圖把那些佔領法規改爲統一的純粹的國內法形式，以便掌握超越憲法的佔領法規——換句話說，這種形式如作爲國內法是明明違反憲法的——權限，這就是日本政府企圖提出所謂特別治安立法的原因。

一九五一年九月間，報紙上報道了日本政府預備製訂“國家安全保障法”、“總罷工禁止法”、“集團示威取締法”、“防諜法”及將“新聞編輯規則完成立法手續”的等等消息。不久，防諜法案成爲上述的刑事特別法，總罷工禁止法案成爲“勞動關係三法修正案”而提出於國會（一九五二年五月）。一九五二年十月，將“國家安全保障法”和“新聞編輯規則完成立法手續”等計劃，暫且作爲“团体等規正令”案予以發表。這個計劃一經發表，甚至平常是政府忠實僕從的資產階級各大報紙也一齊加以反對。有組織的工人、各民主团体、知識分子和學生都曾激烈地加以反對自不待言。弄清楚法案各項條文的意義如何固然是重要的，然而，更根本的重要事實是，該法案是要使日本政府原封不動地繼承會爲佔領軍掌握的超憲法權能，這也正是說明了該法案的驚人的殖民地法西斯性。

日本政府爲規避輿論的反對，調換了擔任起草該法案的大臣（法務總裁），並宣傳說該法案已修改了三十多次等；然後，於一九五二年三月把該法案改名爲“防止破壞活動法案”而與有關法案一起正式向國會提出。

根據“防止破壞活動法案”的條文，它具有兩個目的：“補充”處罰“暴力主義破壞活動”的刑法的缺陷以及規定對团体的“規則”。所謂“暴力主義破壞活動”包括如下：（一）（甲）刑法上的內亂以及從事內亂的準備、陰謀、幫兇等行爲；（乙）對上述行爲的

“教唆或煽動”，以及爲使上述行爲“易於實現而主張其實現的正當性或必要性的文件和圖畫的印刷、頒布與公開揭示，或具有頒布及公開揭示之目的而攜帶上述文件和圖畫”。(二)“爲促進、支持或反對政治上的主張和措施”而從事觸犯刑法所規定的騷擾、放火、施放爆炸物、使火車及電車等行駛發生危險、顛覆火車及電車等、殺人、盜劫、使用爆炸物、妨害執行公務、對職務上施以強迫行爲，以及從事這些行爲之一的“準備、陰謀、教唆或煽動”。凡被“公安審查委員會”認爲進行這些“破壞活動”的“團體”（“爲達到特定的共同目的由多數人組織的繼續性結合體及其聯合體”，即不限於政治團體，而連工會、社交俱樂部、學術團體和營利公司——例如報社和出版社——都在本法案所指的“團體”之列）可以將其解散，或禁止其集會及示威遊行，停止其機關刊物的發行，整肅其幹部職員。同時對進行這種活動的個人則可處以七年以下的徒刑。

爲調查上述團體及個人的“破壞活動”，爲限制團體的活動和解散團體，便設立了公安調查廳和公安審查委員會，並由公安調查官“根據該法律的規定進行必要的調查”。這就是說行政官廳對團體進行處分和整肅其幹部時，可以不經過審判而施以處罰。這不僅從正面否定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原則，而且對團體進行處罰也是違反資產階級刑法的原則的。公安調查廳是特別審查局的後身，也就是舊“特高”警察的公開復活。

日本政府辯解說：“防止破壞活動法”是爲了預防共產黨暴力革命的法案，不是鎮壓工會、侵犯基本人權以及限制言論、學術、思想自由的法案。然而，共產黨、社會黨、有良心的政治家和工會不用說，幾乎所有的學術團體、文化團體、教授、學生、法律家、作家、學者以及其他一切或多或少關心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和自由的人們，儘管他們的一般立場、思想和信仰不同，却一致



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它們會批判說：很顯然的，這個法案与过去的“治安維持法”一樣，其目的也在鎮壓共產黨以及其他一切民主主義的团体的活動和思想。“防止破壞活動法”还不僅僅是“治安維持法”的復活，因為“治安維持法”只是禁止以“變革团体”“否定私有財產制”為目的的团体活動，而“防止破壞活動法”則可以鎮壓任何团体和個人的一切反政府活動（甚至可以鎮壓維護憲法、反对重新武裝的運動）。“防止破壞活動法”与所謂“大韓民國”的南朝鮮美國傀儡政府及國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製定的“國家保安法”一樣，是迫使國民殖民地奴隸化並變成外國戰爭政策爪牙的法律。

日本政府、自由黨及國會的多數議員不顧空前未有的輿論反对，只憑它們在國會的多數議席，企圖強迫成立這個殖民地法西斯法案。這只能使日本走向“大韓民國”的命運，並重踏从前以“治安維持法”為支柱的“大日本帝國”所走过的道路，也就是說要更悲慘地重複侵略戰爭，使國民陷於毀滅，並使那些負責人走上絞刑台的道路。賣國法西斯主義應該說是已經達到頂點了。

繼“防止破壞活動法案”而企圖成立的重要法西斯法案，就是警察法“修改”案、勞動基準法及勞動關係調整法“修改”案以及居民登記法。

日本政府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聲稱：為“徹底掃除社会的不安狀態”向國會提出了警察法“修改”案。其要點如下：（一）把任命東京都警察廳廳長以及“特別區警察長官”的权限从東京都特別區公安委員會剝奪過來歸首相掌握。（二）把國家地方警察長官的任免權，也同樣由國家公安委員會移交給首相。（三）首相認為在維持公安上有必要時，有权向公安委員會或其長官發出指示和命令。這些是它的要點。總之，政府是企圖以這個法律把警察的全部权限名副其實地集中於政府手中。事實上，过

去也存在著非法的中央集權警察，現在是使之合法化，以便對政府更加方便。在執筆寫這一章時（一九五二年五月底），這個法案還沒有在國會通過。然而吉田政府和自由黨却硬要成立該法案。

把勞工法規修改得更為惡劣的中心目的在於：第一、把勞動基準法修改得更惡毒，降低工人的待遇，使資本家易於從工資裏預先扣除工人的“儲蓄金”（事實上是遲發或不發工資的制度），禁止和限制取消或放寬對婦女和兒童有害的勞動。簡言之，是大肆恢復過去的封建性、奴隸性的剝削制度。也就是藉低廉工資來降低成本，以便使日本“加入國際社會”。第二、把工會法修改得更為惡毒。第三、把有關公共企業單位等的勞動關係法修改得更為惡毒。第四、與上述有關而且是最重要的，是在勞工法中制定所謂緊急調查制度，以便廣泛地剝奪罷工權利。最初所計劃的是成立“禁止總罷工法”，後因要緩和工會的反對而改變了方式。這就是說，關於電氣、瓦斯、水道、鐵道、軌道等有關公共事業的爭議以及大規模爭議（各產業的同時總罷工不用說，即使是一種產業的全國性能工，或比它更小的罷工政府也都可以認為它是“大規模”罷工）而被認為是“嚴重地妨害公共利益”的爭議，則由政府出面干涉，並予政府以勒令在五十天內停止爭議行為的權限。勒令在五十天內停止爭議行為，事實上具有等於禁止爭議行為的效果。日本政府為該法律辯解說：這是“為公共福利”而限制工人的權利，也是出於不得已。其實，日本政府之所以需要這種緊急調整權，只不過是因“獨立”後不能如同公開佔領時期可以憑藉麥克阿瑟命令或馬貴特聲明書等佔領軍命令，隨時禁止和鎮壓工人罷工，所以政府才企圖保有過去佔領軍曾經保有的超憲法的權限，以便破壞人民福利。該法案與“防止破壞活動法案”同樣，毫無辦法可以騙人說它並不是限制工會的正当活動，因此，政府企圖先通過“防止破壞活動法案”之後，再

把該法案提交國會討論。

當日本國民的目光集中注意着這些法案的時候，日本政府和國會裝着沒有看見，而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通過了居民登記法施行法，並決定從同年七月一日起付諸實施。居民登記法是根據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美軍總司令部民事部赫魯普斯科長在法務府戶口委員會上鼓勵制定該法時開始準備的，並於朝鮮戰爭爆發將近一年後的一九五一年六月的第十屆國會中加以通過的。它規定全國國民應在市、鎮、村政府登記住址，當轉移住址時，當然要登記新地址。不僅如此，連作一星期以上的旅行時也必須申報。這就是要把每一個國民不斷地置於政府監視之下。如果拒絕這種登記要罰款五萬日元以下。第十屆國會討論該法案時，共產黨議員上村發表了如下反對意見：“該法案所隱蔽的目的是爲了……（原文如此，連國會的速記也故意掉字！剝奪言論自由已達到如此地步）的準備。而且，應該說它是有名譽的日本人的……（鼓掌）。原來，諸如身份證、居民證等是經過嚴密調查而發給外國人或殖民地人民的。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當納粹德國侵略法國並爲鞏固它的統治時，用殘酷的刑罰來恫嚇強迫法國人接受的就是這個居民登記和身份證（中略）。應該說這是吉田自由黨內閣爲重新武裝日本和單獨媾和而採取的一連串的……立法措施”。顯而易見，這個法案的制定，首先是要代替以往在戶主制度下的原籍貫地主義的戶口法，爲準備徵兵而經常追究國民的住址；其次，爲代替以往警察所進行的戶口調查而便於警察取締國民。在近代，正如上村議員所說的，這種措施是殖民地統治者爲管制反抗它們的民族鬥士而開始實行的；在往昔，則類似於沙皇俄國等專制警察國家所實行的國內護照法，或類似日本德川時代爲限制形同農奴的農民旅行、遷移的自由而制定的由寺廟掌管的戶籍及宗門的登記制度。

總的說來，“防止破壞活動法”以及其他這些法律，是旨在水

洩不通地、周密地建立殖民地法西斯主義鎮壓國民的體制而制定的。

#### 四 “開倒車”和“唱復古論調”

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以作為美國的遠東下級軍官身份而復活，勢必使在社會、文化領域內的所謂“開倒車”和“唱復古論調”現象更加速發展，由於這種發展則又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後，舊天皇制法西斯統治的基層“鄰居組織”制度事實上並未消滅，例如“紅羽毛”募捐（紅十字會募捐——譯者）也是通過舊日的“鄰居組織”強迫攤派的。“防止犯罪協會”和“消防援助會”等組織仍以各種名稱繼續存在，它們無論在城市或在農村中，都成為地方惡霸統治居民和維持選舉地盤的機構而起了有力的作用。並且這些組織在“和約”簽訂後，已開始公開復活了。日本政府曾肆無忌憚地公開聲稱：不擬阻礙“鄰居組織”制度的復活（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在地方惡霸的操縱下，各地恢復了地區婦女會和青年團等組織，有的人是半強制性地加入了該組織的。而另一方面，民主的婦女和青年團體只要一提起和平或民主，立刻就被套上“赤色”的名義而受到迫害。

最近在農村中，正在迅速普及設立根據社會教育法的“公民館”。設立“公民館”運動是從一九四六年開始的，到一九五〇年全國共設立了二萬零二百八十處，即全國百分之五十七的市、鎮、村都設立了“公民館”，估計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已增加到二萬四千處左右。關於設立“公民館”的效果，據文部省自誇稱，有如下四大成就：（一）提高了居民的“公務意識”，也就是改善了納稅、徵購糧食、儲蓄等方面的成績；（二）提高了居民的文化水平。地方文化已有別於都市文化和崇外文化——“公民館”方面的人稱之為“月光文化”——而開始萌芽；（三）改善了鎮、村中各種團

體活動的聯系和調整；(四) 提高了青年的文化。其中第一條正是極其雄辯地說明了文部省等所期望的“公民館”事業的本質。於是對這種成績優秀的“公民館”每年一次由文部省加以表揚，並給館長等以“拜謁天皇陛下的光榮”。顯而易見，既然“公民館”是與這種方向相結合的，那末所謂“地方文化”就是走向反動的國粹主義，而所謂各種團體活動的調整就是意味着反動的統治。

這種反動的“公民館”，例如在著者居住的東京都郊外的一個小鎮的“公民館”，甚至竟由於東京都官吏的推薦而任命了曾居山口縣的與該小鎮毫無相干的人為該館的主事，並毫不介意地讓無知識無經驗的鎮議會議員冠以“有學識經驗者”及其他名義獨佔該館半數管理委員（這是違反社會教育法的非法行為）。這位主事最初着手的工作就是設立柔術劍術練武場和地區婦女會——這是舊“大日本婦女會”下層組織的復活。“公民館”成立的初期，各地有許多“公民館”會以青年為中心進行了民主管理，作為鄉村的民主文化的中心機關而進行了積極活動，並成為維護和發展真正的鄉土文化以至抗拒美帝國主義者的世界主義的民族文化的堡壘。今天在民主力量強大而館長或主事又所用得人的地方，“公民館”也還在積極活動，然而這類“公民館”由於不斷遭受壓迫正在日益減少。

與“公民館”的反動規劃同時，最近文部省一方面大量削減學童膳費，一方面則以“滿足好學心”為名，企圖新設立青年學校。無疑地，這是在準備復活太平洋戰爭前的青年學校和士兵的預備訓練所。這與承認大學生有資格當保安隊、海上警備隊的候補幹部學員並鼓勵他們志願加入的措施是互相配合的。此外，大學當局也一方面鎮壓和平民主主義的學生，另一方面則藉“學術思想自由”的美名保護提倡重新武裝的“軍事科學研究會”之類的組織（京都大學、近畿大學及其他學校）。

作為這類反動的軍國主義“文化”的支柱，文部大臣天野曾於“和約”簽訂後立即提出了以天皇為國民道德標誌的“國民道德實踐要旨”，並準備作為文部大臣天野貞佑的個人著作分送給全國各學校。但這種“天野教育勅語”遭到了猛烈的反對。因此，這個計劃，被迫不得不暫時收回。但是，文部大臣進而企圖在高等學校恢復漢文課，實際上是恢復儒教道德課程為必修課。這也同樣遭到輿論的猛烈反對因而暫且取消了。然而，“天野勅語”也罷，恢復漢文課也罷，事實上這種精神已在許多學校裏實踐了。文部省和自由黨還企圖在一九五二年一月恢復“紀元節”（日本神武天皇即位日的紀念節——譯者），但一九五二年沒有來得及舉行。此外，例如在學校及其他公眾集會時恢復“君之代”的舊國歌，“軍艦進行曲”等也開始流行。這些例子不勝枚舉，而其目的何在，是不言而喻的。

鼓吹這種反動思想及軍國主義精神的焦點，集中在天皇神威的復活上。天皇的旅行又被稱為“行幸”。“行幸”的行列好像舊時代的“鹵簿”（天皇出門時的儀仗隊——譯者）那樣戒備森嚴。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當這種“鹵簿”到京都大學時，學生不唱“君之代”而高唱“和平歌”來迎接天皇。學生們還準備向天皇提出天皇有否為和平與民族獨立而努力的意志的質問書。這時，約有七百名警察隊揮起木棍闖入校內。這種情況引起了更多的學生更響亮地高唱起和平歌來。天皇就在這種情形下回去了。當天傍晚，東京的宮內廳（掌管皇室一切事務的機構——譯者）和日本政府早已接獲這個事件的報告；當地的京都自不待說，日本全國各地的報紙齊聲責難，好像學生對天皇作出什麼暴行似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同學會被迫解散，同學會的數名幹事僅僅因為是幹事之故而受了停學的處分。

他們究竟對誰做了壞事呢？在號稱是和平國家的國家裏，學生歌唱和平歌迎接天皇，向作為和平國家“象徵”的是人而非

神的天皇提出表示熱望和平的質問書，這有什麼壞處呢？把這件事說成好像是一件重大的犯罪行爲，這是由於企圖再度把天皇目爲神聖化，視學生爲不敬者。

重新把天皇神聖化是意味着什麼呢？這是很清楚的。這是爲天皇“大元帥陛下”的復活掃清道路。許多重新武裝論者都期待着恢復天皇的統帥權。天皇究竟會不會再成爲“大元帥陛下”，現在還很難說，雖然如此，可是天皇殆必將成爲重建軍隊的精神中心。這與教導警察仍應作爲“陛下的警察”是一樣的。從日本投降以來的美國全部政策看，証明了美國的希望也是如此。如果日本國內外的統治集團能順利地迫使日本國民熱中於崇拜天皇，並使天皇變成美國的傀儡（現在的天皇已經是如此），那末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案能如此簡單地操縱日本國民爲美國服務的了。在加強天皇主義的過程中，我們看見“復古論調”、“國粹主義”與殖民地化、世界主義等極巧妙地統一於帝國主義之中。

有人說：“復古論調”不足爲憂，從這裏可使日本人民大眾增加對具有民族性的東西的愛好，這也可以使無產階級利用它作爲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武器。然而，顯而易見地現在的所謂“復古論調”，不管是日本歌劇、栽花、茶道以及其他所謂“日本文化”的獎勵，儒教倫理的復活，或者神道的復活都形成一個體系，那就是以加強復活天皇主義、軍國主義爲其最高目標，並且顯然地也成爲日本殖民地化的手段之一。洛克菲勒獎勵“復古論調”，李奇微也說日本即將喪失它的特徵（“日本特徵”的典型就是畸形的殖民地軍隊）。因此不能認爲獎勵作爲這種體系的一部分的“民族的”色彩即“復古論調”不足爲憂。不言而喻，與在政治經濟方面，外國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制度及壟斷資本相勾結而壓抑着日本民族一樣；在文化方面，外國帝國主義文化也與國內封建文化及壟斷資本主義文化結成同盟而力圖削弱日本民族的力量。“復古論調”便是其形式之一。另外的形式則是世界主義和

荒淫怪誕以及奇怪的美國話的流行。這兩者是一物的兩面。因此，要真正負責說“復古論調”“國粹主義”不足為憂，就必須指出既具体又科学的有系統的方法，即指出如何用不同於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做法，把所謂“日本民族色彩的东西”變為打擊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武器。單單說“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怎樣做都可以”，那不過是說只要做得正確就行而已，而問題在於要具体指示如何做才是正確的。如果認為可以發現或創造這種方法，那末它的方向就不是原封不動地復活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日本民族色彩的东西”即“復古論調”的方向，而將是對“日本民族色彩的东西”進行徹底改造的方向。這樣才能够現实地、具体地擺脫天皇主義、軍國主義以至於目前的殖民地化体系。



## 第九章 獨立、和平與民主勢力的發展

### 第一節 日本統治階級走投無路

國際帝國主義不論在殖民地或其本國，也不論在亞洲或西歐，都被迫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唯其如此，它們才窮兇極惡地拚命地企圖從戰爭中找出路。它們強迫日本簽訂諸如“行政協定”之類的露骨的殖民地化條約，督促日本重新武裝，以及要求對反對重新武裝的愛國的和平人民加強法西斯鎮壓，是由於它們的危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遠東逐年擴大的緣故。而吉田政府與日本反動勢力之所以忠實地遵循其主子的意旨，拚命推進重新武裝，並千方百計地企圖使國會把防止破壞活動法及勞動關係法修改得更惡毒，以便繼承佔領法令，也不外乎因為它們的危機不論在經濟上或在政治上都是越來越深刻，而日本國民的反抗運動不但日益高漲，並且含有新的性質的緣故。

充當美國軍事產業承包商的極端畸形的日本經濟，自一九五一年秋季開始，加深了它的恐慌的程度。在這一年的秋季，紡織業和貿易公司繼續不斷地破產倒閉。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底，這類行業倒閉的計有二百六十家，其中負債一千万日元以上的七十家，負債總額竟達七十五億日元。出口數量最大的纖維製品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為頂點而走向下坡路。特別是棉紗的出口合同從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七百七十八萬九千英鎊銳減到一九五二年三月的一百三十一萬六千英鎊。一九五二年三月棉布出口也比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約減少了一半。特別是在一九五

二年三月十一日英國政府宣佈將進口削減三億英鎊，而禁止日本的未經漂白的棉布進口後，以此為開端，馬來亞、澳大利亞、新嘉坡、錫蘭、巴基斯坦以及南非聯邦相繼採取了限制進口的措施。因此使一向宣傳日本經濟靠開發東南亞便可維持而把東南亞說成好像是日本殖民地的日本政府及買辦資本家，大為狼狽不堪。与此相反，鋼鐵製品的出口則有了顯著的增加，一九五二年三月出口合同从同年一月的十六萬噸增加到將近三百萬噸，但在同樣鋼鐵製品中的薄板和鋅板等用於和平產業製品的出口則大為減少了。在對美出口方面，由於美國採取了限制日本金槍魚罐頭和陶器進口的政策，以致日本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日本不但出口的前途日益黯淡，而且對國內市場也不能寄以希望。根據官方統計，被服品的消費水平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二月平均比一九五〇年同一時期降低了百分之四點一。而這種情況在一九五二年也絲毫沒有改善的希望。由於纖維製品陷於恐慌，製造纖維品的機械也不再需要，因此鑄造這種機械的生鐵也完全賣不出去了。

生產过剩不僅發生在纖維製品和紡織機器等方面，而且波及染料、塗料、肥皂、橡膠、皮革以及紙漿、造紙、肥料、工作母機、鋼鐵等幾乎所有產業部門。其結果，使通商產業省終於不得不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對一百零六家紡織公司發出勸告，勸它們自同年三月開始的三個月內將生產縮減百分之四十。因此有三千名女工被解僱；在農村因找不到工作而出賣肉體的婦女也日益增加，這使人們大為痛心。生產縮減繼續擴大到橡膠、化學纖維、蘇打、油脂等部門；而在鋼鐵部門，到了一九五二年四月也不得不將薄板和鋼絲的生產縮減十分之四到一半。即使是資本家們所仰賴的美軍“特需”訂貨，自一九五二年以後也開始逐月銳減。

為了擺脫這種日益深刻的經濟恐慌，大壟斷資本所選擇的

道路，是日益加強其對美國戰爭經濟的依賴——不獨依賴不穩定的美軍“特需”訂貨，而且依賴強制推行日本重新武裝，從而依賴軍需生產——的道路。它們“夢想再一度”藉戰爭經濟大發其財，即使不能復活舊日的“大日本帝國”，但是希望能從美國多少分沾些利潤。它們為着要硬把日本國民帶到戰爭道路上，不得不進行法西斯的鎮壓。這也就是說：它們所以採取片面依靠美國的賣國的、戰爭与法西斯的政策，並非由於它們在經濟上的強大，而是因為它們在經濟上的日益削弱。

然而日本買辦勢力在全國人民的激烈反抗下，其內部已開始分裂了。它們之中的第一個集團主張修改憲法以便公開重新武裝，它們企圖憑藉重新武裝的軍事力量使人認為，雖然是奴隸，但對其主人似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發言權。它們利用國民大眾的民族意識，進行“自衛”和“獨立”的虛偽宣傳，夢想將舊“大日本帝國”復活到某種程度。代表這一集團的，有自由黨的鳩山派和民主黨的蘆田派。代表第二個集團的，則為目前的吉田政府。這個集團正如大藏大臣池田所公開表明的一樣，是恬不知恥地企圖出賣日本以便充當“美國的小老婆”，並想尽可能索得較高的價錢。它們一面聲稱“決不重新武裝”，實際上却用最大的速度擴充殖民地土著軍；而目前推行“防止破壞活動法”及其他一切法西斯政策的，也正是這批人。在推進法西斯政策這一點上，第一個集團也不亞於吉田政府；但因為它們目前是在野黨，所以還對吉田政府的拙劣做法進行“批判”。兩個集團均以巨大的壟斷資本、天皇、上層官僚及農村的封建勢力為基礎，當第二個集團因遭受國民的憤恨和憎惡而無能為力時，扮演着後備軍角色的第一個集團將出面取而代之。

傲慢不遜誇稱為“唯我獨尊”的吉田對自由黨的統治目前已經很不順利，而鳩山等人正在展開積極活動，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美國之所以在“和約”的名義下允許給予日本表面上的“獨

立”，只是在表面上裝出對於日本人民日益高漲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讓步，但實際上却想藉此建立新形式的殖民地統治。因此美國不但認為如吉田和池田這類公開甘願充當“小老婆”的人物有用，同時也需要像鳩山和蘆田這類偽裝的民族主義者。因此，究竟是哪一派能夠更好地服務於其主人，能夠更巧妙地欺騙日本國民，這種無恥的鬥爭就不得不日益加劇了。

自從簽訂兩個條約以來，在久未執政的民主黨內部，就曾發生了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集團與類似自由黨鳩山派的集團之間的对立。而這種对立雖在“反對吉田政府”的目標下掩蔽了一陣，但到了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終於在煽動政治家的指揮下，並吸收了新政俱樂部和農民協同黨的大部分成員，而改組為“改進黨”。改進黨的政綱雖然標榜所謂“民族的自衛與獨立”和“糾正資本主義的弊害”等，但不久即在一九五二年五月決定將被判處七年苦役而刑期剛滿的甲級戰犯重光葵擁為該黨的總裁，並且公開主張重新武裝。這就完全証明了改進黨的主力派是鼓吹戰爭之輩，因而也就是要將日本變為美國附庸國的人物。在這種情況下，諸如北村派（指北村德太郎一派——譯者）等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集團，早晚將脫離該黨，否則就是屈服於主力派。他們究竟選擇哪一條道路將取決於他們的良心和今後國民鬥爭的發展如何而定。

美國經濟危機的加深，與美國迫使日本簽訂“美日行政協定”及“日蔣條約”等欲將日本變成美國奴隸化的極端露骨的高壓政策的實施，其所以在時間上完全一致，不外說明這兩者之間，即經濟危機與使日本殖民地化及軍事基地化之間，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這已經給予全體日本人民以非常明顯的印象。因此甚至連資本家之中，那些日益強烈反對吉田政府的片面依靠美國政策、反對戰爭政策、開始要求與中蘇兩國進行貿易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這表現在資本家們對於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

的深切關心上、表現在高良富女士的訪問蘇聯及簽訂中日貿易協定上。而這竟使民主黨及參議院綠風會的一部分議員對於批准對日片面“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甚至曾公開表示反對或在投票時棄權。即使是那些倣效杜勒斯和吉田口吻大肆稱讚兩個條約的資產階級大報社，也不得不对“行政協定”多少吐露一些不滿的論調。這是因為國民大眾為爭取獨立與和平的鬥爭已經成長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所致。

## 第二節 革命勢力的新開端

### 一 日本共產黨的新綱領

一九五一年八月，日本共產黨針對着對日片面“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欲使日本永久變為美國的附屬國和戰爭基地的意圖，向黨內提出一個日本共產黨的“當前要求”的草案，並令全黨進行討論。同年十月日本共產黨召開第五次全國協議會，正式決定將該草案作為綱領，並把它貫徹到國民中去。新綱領分為如下四章：（一）“美國的佔領怎樣使日本人遭受痛苦？”（二）“吉田政府是美國佔領制度的精神的、政治的支柱”，（三）“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不可避免”，（四）“革命的力量——民族解放民主統一戰綫”。新綱領除分析了日本的形勢和日本共產黨應與國民共同爭取當前的要求外，並說明了應如何達到這個目標。新綱領明確規定了目前日本的革命是從美國佔領制度下爭取日本民族解放的革命。並且認為在這個革命“過程中第一個決定性步驟”是打倒充當佔領制度的“支柱”和“幕布”的、背叛民族利益的日本反動勢力，即打倒“天皇、舊的反動軍閥、特權官僚、地主和壟斷資本家這些剝削和鼓勵剝削日本國民的人們”的政府，而建立新的民主政府。

新綱領規定，這個為爭取民族解放的民主政府在對外政策

方面應實現：(一)根據波茨坦公告實行全面媾和，以保證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主權，(二)取消在日本的佔領制度，從速由日本撤退一切佔領軍，(三)和一切國家建立和平關係並在經濟與貿易上自由合作，(四)擁護和平、禁止戰爭宣傳。在“國家制度”方面則實現：廢除天皇制，建立民主共和國，採取人民具有罷免權的一院制國會及其他民主主義制度，保障基本人權等。在對“農民問題”上應實現：“沒收一切寄生地主、皇室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並無代價地分配給農民”；予農民以“無償使用水利和水利設備的權利”；並採取“旨在發展農業生產力和提高農民生活的各項政策”，以及“取消半封建的漁業權”及其他有利於漁民和漁業的政策。新綱領特別強調的是採取革命手段在農村中徹底廢除各種半封建關係及其核心的大地主制度。新綱領把大地主視為美國佔領制度和日本賣國反動統治的最重要的支柱。在“工人問題”上新綱領主張：“規定工人和職員的最低工資，同工同酬，無性別、民族的區別”；“實行一切工人八小時工作制。坑內勞動六小時制”。此外諸如徹底改善工人生活，廢除半封建性的剝削制度，保障工會的自由發展和集體合同權等，均必須予以實現。

如果認為實現上述“當前要求”和建立旨在完成這個任務的民族解放民主政府，可以“不受阻礙地採取和平辦法”達到目的那就完全錯了。吉田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和繼續維持美國佔領制度，“不但擁有軍隊和警察，而且還有美國佔領當局、地主、壟斷資本家、天皇及其周圍勢力的援助”。因此，新綱領認為針對這種情況“必須組織國民進行嚴重的革命鬥爭”。而“這個解放鬥爭的主要力量是工人、農民，他們是日本國民的絕大多數，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這個聯盟將“決定吉田政府及佔領制度的命運”。但是“需要聯合起來反對反動勢力的階級不僅是工人與農民。受佔領制度及吉田政府反動法律壓迫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會參加工農聯盟。而且參加這個聯盟的還有中小企

業主和很多大企業主，甚至大商人，他們同樣受到佔領制度和吉田反動法律的害處。”不問其社會地位如何，凡是熱望日本獲得自由與獨立，希望日本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能獲得獨立自主權的一切人們，都會參加工農聯盟。日本共產黨認為加強和發展這個“民族解放民主統一戰綫”是它的緊急任務，並且號召一切進步人士，特別是工人和農民，立即加強和發展這個統一戰綫。

這個新綱領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革命的目標和途徑。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第十八次擴大全體會議上，決定黨的緊急任務是應為結束美國佔領制度和打倒吉田政府所代表的國內反動勢力而鬥爭。但是這些決議未能對當時的日本情勢作充分明確的估計，因此就未能決定革命的主要行動。但目前這種模糊不清和認識不足的情況已不復存在了。

## 二 統一行動的發展

當日本共產黨開始以新綱領號召建立民族解放民主戰綫時，即自兩個條約簽訂後到同年（一九五一年）年底，在煤礦、金屬礦山、電氣工業、交通運輸、造紙及纖維工業等各部門，工人以要求提高工資為中心的罷工繼續不斷地擴大。這種工人大眾本身的鬥爭，已經不是墮落的右翼幹部的壓力所能限制的。一九五一年年底甚至在三越百貨公司，即在這種封建性的傳統和壓迫最厲害的、連職員都要特別謹慎地從小市民階層中選擇的地方，也發生了以女職員為主力的連續二日的罷工。這時候，數百名武裝警察隊襲擊了柔弱的女售貨員組成的糾察綫，並恣意加以拳打、腳踢及其他一切暴行。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東京最繁華的街道上，當着數萬市民面前所犯下的暴行，使一切小市民也都看清楚了日本警察的真正面目。

雖然這些爭議是經濟鬥爭，但與此同時，反對兩個條約，反對殖民地化，反對重新武裝和反對法西斯的宣傳也擴大了。一

九五一年十一月，“總評”宣佈“非常狀態”，對吉田政府發出警告說：工人階級對政府所製訂的“團體等規正令”、“禁止總罷工法”等計劃，將以全力進行鬥爭，並在全國範圍內召開了抗議集會。以“總評”為中心組織了“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簡稱“勞鬥”），並着手準備採取行動。因此，吉田政府不得不暫緩將這些反動法案提交國會討論。

對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具有決心的先進工人們，開始在工作場所建立抵抗和自衛的組織。在軍需工廠，以反對戰爭的明確意識、製造不合規格的成品或拖延生產的鬥爭也開始萌芽了。

在農村中比過去更加深刻的鬥爭開始在各地展開了。例如長野縣南佐久郡，自一九五一年十月起以貧農和山林工人為主，廣泛的統一鬥爭開始發展起來了。由於五月的霜災、夏季的旱災、九月以後的凍災和稻熱病災，這個地方的農作物有的全部遭災，有的減收三成至四成。貧苦的鄉民苦於沒有米吃。然而不但捐稅照常徵收，還削減了地方平衡財政津貼，使鄉民的生活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陷於嚴重的苦境。於是根據日本共產黨的號召，一九五一年十月成立了包括幾個村議會議長也一起參加的地方自治研究會，決議除要求國家對災荒給予賑濟和減免稅收外，並反對批准當時已提交國會的對日片面“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地方自治研究會的要求得到了南佐久郡內各種團體的普遍同情，於是不僅在災荒賑濟和豁免稅收等問題上進行鬥爭，而且還進行了解放國有山林和爭取自行支配郡內產米的鬥爭。於是縣政府當局動員全部警察到南佐久郡進行鎮壓。站在鬥爭前列的共產黨員不斷橫遭非法逮捕。抗議這種非法鎮壓的鄉民與力圖鎮壓這些鄉民的警察隊之間發生了小衝突。而各報則將這場衝突稱為日本共產黨對警察的集體暴行而大肆宣傳。

不論是在東京西部的山村地帶、九州的大部分地區、北海道各地、富士山麓及其他各地的貧農地區和山村，凡是在土地被徵



爲美軍或警察後備隊的基地和演習地的地方，農民的鬥爭都是相當尖銳的。在漁村方面，如在九十九里濱及其他各地，漁民爲了維護生活，不得不羣起對將海面奪去充當美軍的海上演習地進行鬥爭。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爲了強行擴軍備戰不得不佔用土地；換句話說，民族壓迫已以盡人皆知的形式波及到了土地，這勢必引起農民展開民族鬥爭。

這些在工廠裏和農村中的自衛和反抗鬥爭，還在萌芽時期，還沒有發展到全部羣衆都有了政治覺悟而加入鬥爭的階段。然而已經顯出這樣的方向，這是值得注意的。

日本國民爭取和平與獨立的鬥爭，博得了國際性的崇高的聲譽和鼓勵。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的大山郁夫——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常務委員，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作爲“反對戰爭、爭取和平”代表人之一獲得了“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以“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贈予大山郁夫，不僅是表揚他個人在悠久的時期以來特別是戰後在日本領導和平運動的傑出貢獻，同時也是對日本國民和平運動的一種評價和鼓勵。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駐日美軍總司令李奇微在其對日本國民的新年致辭中說：“在新的一年中將看到對日‘和約’的生效和日本將作爲‘自由國家’的一員，而創造日本歷史上的新局面。這個新地位無疑地將帶來新的問題和新的責任”。他用這種抽象的語言巧妙地暗示了“自由國家之一員”也就是成爲美國附屬國的日本，應承擔諸如重新武裝等“新的問題和新的責任”。與此同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應共同通訊社的請求，對日本國民發出了如下的公開信：

“請轉告日本人民，我祝他們自由幸福，我祝他們爲爭取他們的祖國的獨立而進行的英勇鬥爭獲得完全勝利。

以往蘇聯人民自己曾經歷過被外國佔領的痛苦；這種佔領

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曾參加過的。因此蘇聯人民完全理解日本人民的苦難，深切同情他們，相信他們一定能夠像蘇聯人民過去曾經做到的那樣求得他們的祖國的新生和獨立。

我祝日本工人能夠免除失業和工資低微的痛苦，消除大眾消費品價格高昂的現象，並祝他們維護和平的鬥爭得到勝利。

我祝日本農民能夠免除無地和少地的痛苦，取消重稅，並祝他們維護和平的鬥爭得到勝利。

我向全體日本人民和知識分子祝賀，願日本的民主力量完全勝利，這個國家的經濟生活得以恢復和發展，民族文化、科學和藝術得以發揚光大，並祝他們維護和平的鬥爭得到勝利。”

斯大林深切地理解到全體日本國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所最關心的中心問題，並鼓舞日本國民爲此而鬥爭。共同通訊社曾要求世界十八個國家的領袖對日本國民發表新年獻詞，其中只有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一個人給予了答覆。而這是不論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都絕對無話可說的。

在這新的一年中，爭取獨立與和平的信心增強了，鬥爭也有了新的發展。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東京大學的學生在東京澁谷車站前，徵求市民在爲反對重新武裝和反對預料中的徵兵法上簽名，曾遭受二百名武裝警察的鎮壓。警察對於法西斯主義者每天在這個車站前的廣場上進行促進重新武裝的演說，絲毫不加干涉，然而它決不允許發表反對重新武裝和呼籲維護憲法的演說。本應以維護憲法爲職責的警察竟公然來禁止呼籲維護憲法的演說！這就是美國式、吉田式的“自由”和“和平”。平日就對這種情況感到憤慨的學生，看到連簽名運動也遭到鎮壓，於是毅然進行了抵抗。當學生進行抵抗時，立即聚集了二萬市民，他們都對學生加以支持，於是警察隊失敗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東京大學學生發現了三個便衣警察潛入該校演劇會場進行特務活動。特務警察的筆記本落入学

生的手中。根據這個筆記本，發現不僅學生運動不斷遭受偵察，而且特務警察還對愛好和平的民主教授的歷史進行調查，甚至基督教團體也被秘密加以偵察。對“赤色分子”和“共產黨”的迫害與鎮壓是決不止於此的，這意味着是對一切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鎮壓。這種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西斯主義歷史所証實了的事實，豈非又在日本出現了嗎？對於這種事實，學生和知識分子原已略有所知，而這種確鑿證據的出現，益使學生和知識分子痛切地感覺到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重要性。

此外，在資本家之間要求促進中日貿易和要求參加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的運動也逐漸擴大了。

隨着吉田首相致函杜勒斯公開表明只和“台灣政權”締結和約，以及“美日行政協定”正在談判的消息有所傳聞以後，日本全國國民的不安和不滿逐漸增高了，而在舊金山所簽訂的兩個條約的本質也越來越被人們認識清楚了。於是組織廣大的國民統一戰綫的客觀條件已開始成長起來了。

統治階級爲了轉移在國民中逐漸高漲的反抗情緒，爲了削弱和分裂國民統一的可能性，首先必須割斷共產黨與國民的聯系，於是它們捏造了一個“日共暴行”事件。當時常常發生向警察署或稅務局等——平常被國民所憎恨的中心——政府機關投擲火油瓶的事件。因此，政府和所有宣傳機關盡量地鑽這個空子，事實却被巧妙地歪曲，進行了好像人民曾遭受襲擊的宣傳。並進一步捏造了毫無事實根據的“日共暗殺警察”事件。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發生了札幌警察署白鳥警佐被人槍殺的事件。於是統治集團蠻不講理地把共產黨員和工會積極分子作爲這個事件的“犯人”加以檢舉。從檢舉數月後還不能起訴的事實來看，可以了解該事件與一九四九年的下山事件、三鷹事件以及松川事件同樣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吉田政府一面捏造事件力圖使輿論轉移到於自己有利的方

面，同時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將前述的“團體等規正令”法案改為“防止破壞活動法”案而提交國會討論。不管政府用什麼樣的藉口，國民是不會受騙的。甚至反對共產黨的人也已經從戰前的“治安維持法”的經驗和最近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中，充分了解到這個鎮壓共產黨的法案就是立刻要鎮壓全體國民的法案。所有的人都一致奮起進行了粉碎“防止破壞活動法”的鬥爭。

以“總評”為中心的“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所領導的四百萬工人是這個鬥爭的主力。私營鐵道工會總聯合會、鋼鐵工會聯合會、全日本汽車產業工會、化學工會、全日本金屬礦山工會聯合會等大工會，都把一九五一年底的鬥爭繼續下來，自一九五二年初起，為反抗資本家的反攻進行了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總評”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發表了“工資綱領”，力圖以此為基礎統一各廠礦的要求。工資綱領算出了保證生活的最低工資，要求實現這個最低工資和給予一般性的社會保障。據稱：這是為了反對國內外統治者通過殖民地的、封建的職務等級工資制來分化工人階級和試圖保持殖民地軍事監獄般工資的束縛，而製定出來的統一工人階級鬥爭的綱領。然而最低工資的一般性抽象要求，反而會混淆賣國性的壟斷資本與非壟斷資本之間的區別，而成為阻礙工資鬥爭向反帝鬥爭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實現工資綱領，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為爭取和平與民族獨立而鬥爭，保障包括工人團結罷工的權利各種民主權利，取消重新武裝費用和佔領費，以及對中蘇進行自由貿易等等。這就是說，鬥爭形勢已發展到沒有政治鬥爭便不能實現經濟要求的階段。而工會會員羣眾從殖民地奴隸生活的痛苦體驗中懂得了這個道理。在這種羣眾的壓力下，“總評”幹部也就決定把反對重新武裝和反對修改勞工法規的政治要求與提高工資及其他經濟要求，同時列為春季勞動攻勢的中心口號。

在這個時期，吉田政府簽訂了“美日行政協定”，並與台灣逃

亡政權進行談判一個準備將來與人民中國進行戰爭的所謂“和約”，這使國民愈益痛恨日本的殖民地化與戰爭基地化。因此，有組織的工人怎麼能不與之進行鬥爭呢？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由“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主持，在全國召開了“粉碎鎮壓法規總奮起大會”；這個大會在東京錦糸町公園舉行，有六萬工人參加，大會結束後並舉行了示威遊行。這是反對“防止破壞活動法”鬥爭的前哨戰，也是工人階級向反對戰爭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前進的標誌。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即當內閣會議正式通過“防止破壞活動法草案”之日，吉田政府勒令共產黨非公開報刊“和平與獨立”停刊，不按照法院的法律手續非法搜查了一千八百五十家住宅，並以違反第三二五號政令為理由逮捕了許多人。據警察發表稱：“和平與獨立”是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二日發行的週刊報。最初發行三千份，而在这次遭到大舉鎮壓時，已改為日刊發行到第一百三十號，銷數已達十萬份左右。這是作為“赤旗報”的後繼報第二十五次被勒令停刊的全國性報紙。截至一九五二年二月底，全國被勒令停刊的報紙包括地方性報紙在內計達一千八百一十八種（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朝日新聞”）。不管怎樣遭到鎮壓和迫害，被迫停刊的報紙接連復刊到二十五次甚至到三十次之多，而這種日報的銷數一會兒就達十萬份。在以世界上最嚴密的警察制度見稱的而且又在帝國主義佔領下的日本，怎麼能夠進行這種鬥爭呢？那是因為這種鬥爭代表着日本國民要求和平與獨立的難於抑制的願望，而且這種願望又為鬥爭所鼓勵與保護的緣故。

“防止破壞活動法案”不外是美帝國主義及日本賣國勢力用以鎮壓日本全國人民要求和平與獨立的武器，以便代替佔領時期根據美軍當局命令所製訂的第三二五號政令和“團體等規正令”。在這個法案剛剛提交國會後，“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

員會”立即發表聲明，預備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舉行反對該法案的罷工，並要求政府撤回該法案。政府則以勞動大臣吉武爲中心着手瓦解“總評”幹部。鍋山、三田村、星加等“愛國勞工運動”派與內閣官房長官保利茂相勾結，千方百計地策動瓦解工會；社會黨左派的一部分幹部則與勞動大臣吉武試行談交易。根據第六十九期“前衛”雜誌揭露：四月十日夜十二時許，政府方面的勞動大臣吉武和勞政局局長賀來、日本煤礦工會同盟的委員長武藤（“總評”主席），事務局局長小椿和副委員長柴田，以及中間人國營鐵道工會的愛國勞工運動派星加要 and 加藤閑男等人曾聚集於東京“築地”的三井寮。當時政府方面提出了如下方案：日本煤礦工會同盟幹部應採取實質上取消罷工的行動，並由三井財閥捐出三千萬日元作爲活動經費，而政府保證這筆款項可以由他們自由支配。武藤提出的方案是：如果政府將“防止破壞活動法”修改成僅限於鎮壓共產黨，則不舉行罷工。這也是社會黨左派議員赤松等人的方案。於是這筆交易就以吉武接受了上述要求結束了。會後他們就陶醉在醇酒與藝妓之間了。

日本政府和資本家一方面進行收買，另一方面則威脅說：政治罷工將以違法論而加以禁止，並解雇其負責人。“朝日”“每日”“讀賣”等各報紙雖然也批評“防止破壞活動法案”將起與從前治安維持法同樣的作用，而對於工會的罷工則站在政府的立場，責難罷工是破壞議會政治的行爲。但是正因爲這種“議會政治”不僅不能確實保證民主主義，反之，却要通過這種法西斯法案，因此工人才不得已舉行罷工。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吉田政府向“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的幹部約定，將以明文規定“防止破壞活動法”不致壓迫工會的“正當行爲”並答應從事其他的“修改”而要求停止第二天即將舉行的罷工。“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研究了這個“修改”，認爲這是不值得稱爲“修改”的無意義的東西，因此決

定堅決舉行罷工。然而武藤等人主張應該先看一看政府是否修改，然後再決定罷工與否。他們完全背叛了工人和國民，使得日本煤礦工會同盟及全日本金屬礦山工會聯合會的三十三萬工人脫離了四月十二日舉行的首次罷工。因此四月十二日先由全日本汽車產業工會和全國金屬產業工會的十萬工人開始舉行二十四小時罷工；參加這次鬥爭的，包括一小時至四小時限期罷工和抗議集會在內，總共才有三十萬人左右。於是吉武得意洋洋，而自由黨幹部們則評論說：“武藤是勞工運動的國寶”（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朝日新聞”）。

武藤一派的背叛行為引起了全體工人階級的憤怒。由日本煤礦工會同盟所屬礦山地帶的北海道和九州各工會，對武藤紛紛發出抗議電報，礦山代表於四月十六日抱着堅強的決心來到東京，徹底地斥責了武藤等人的背叛行為。另一方面，政府和資本家看到首次罷工的挫折，進而採取積極的攻勢，決定如果工會舉行第二次罷工則徹底加以鎮壓，並對“總評”幹部進行了收買和威脅。據說，包括武藤在內，所謂“總評”“委員長集團”的大同業工會委員長們也開始退縮了。然而在廠礦工作崗位上的羣衆的憤怒非常強烈，由於來自下層的压力，“總評”也不得不於十八日發出舉行罷工的指令。因此，日本煤礦工會同盟、全日本金屬礦山工會聯合會、私營鐵道工會總聯合會、鋼鐵、海員、全日本汽車產業、全國港灣等各工會於十八日開始了二十四小時罷工，參加人數有一百零七萬人。此外，如“全國官公廳工會”等被剝奪了罷工權的工會以及其他廠礦，則採取召開抗議大會、請假戰術、拒絕超額勤務等方式，參加這個鬥爭的約有二百萬人，總共超過了三百萬人。與一九四七年“二·一”鬥爭相比，不僅廣泛地動員了有組織的工人，而且是以更為具體的、更為明確的政治目標動員起來的。實際上這已成為日本從未有過的規模最大的政治罷工。

这是工人羣衆自下而上爆發起來的罷工。工人通过这次的行動，開始具体地体会到了爲完成維護民主主義、反对战争和民族解放任務而鬥爭的目標。日本煤礦工会同盟由於出現了叛徒武藤，於是自四月二十三日開始召開了歷時三日的臨時大會。武藤等人企圖操縱大會，將警察和暴力团引入會場來阻碍旁听者入場，但這個陰謀被粉碎了。他們企圖阻擋代表們提出質問的陰謀也被粉碎了。因此，代表們對於工会幹部加以徹底地追究，將預定舉行三天的大會延長了兩天，否認了四月十二日延緩罷工的決議，也否認了對要求撤回“防止破壞活動法”這種原先決定加以修改的決議，明確認定必須爲撤回“防止破壞活動法”而鬥爭到底，並改選了工会幹部，清除了武藤、小椿以及其他六名叛徒。日本煤礦工会工人的這個勝利不僅只是日本煤礦工会同盟本身的勝利，而且是日本工人階級驅逐賣國的領導人的鬥爭第一階段的勝利。

在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的總罷工中蘊藏着一種巨大的力量，它必將激起國民對於民族獨立被剝奪的怒火，並使之發展成爲爭取獨立的鬥爭。早就苦於分裂的工人階級，通过这次鬥爭，開始發出了自下而上的統一行動的萌芽。日本煤礦工会同盟大會也是其表現之一。不久，要求“在人民廣場舉行和平與獨立的統一五一節”就高漲起來了。

“反对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所領導的罷工，對國民全體也起了很大的啓蒙、教育和鼓勵作用。學生、知識分子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的運動也日益加劇。日本文化人會議、自由人權協會、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日本律師會、日本新聞協會、日本文藝工作者協會以及日本作家協會等文化團體也發出了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的聲明，各大學頻繁地召開了學生抗議集會。甚至連日本學術會議這樣一個保守的國家機關，也在第十二次總會的最後一天——四月二十三日，以贊成一百零五票、



反对四十九票，棄权一票通过了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的声明。

### 第三節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

——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新階段——

#### 一 从“和約”生效到五一節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和約”生效日及五月一日的五一勞動節在日本全國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高漲中即將來臨了。一九五一年的五一節曾遭受分裂，並被禁止使用人民廣場，但在羣衆強烈要求一九五二年一定要舉行一個統一的五一勞動節的壓力下，“總評”的幹部也不得不压制一下愛國勞工運動派的氣焰，表示擁護舉行統一的五一勞動節。“總評”並且認為政府禁止使用皇宮前廣場作為五一勞動節會場是非法的，因此向法院提出了請求撤回禁令的控訴。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在東京後樂園舉行了中央五一節前夕的慶祝晚會。參加晚會的計有三萬五千人，要求在人民廣場舉行爭取和平与独立的統一五一勞動節的呼声响徹了整個會場。散會之後有數千工人和学生自然而然地組成了遊行隊伍，向水道橋方向前進，並与武裝警察隊發生了衝突。兩天以後，東京地方法院判決禁止使用皇宮前廣場是非法的，但吉田政府仍然不准使用廣場。這是因為數十萬國民聚集於位置在駐日美軍總司令部与日本反動勢力中心地點的皇宮之間的廣場上舉行爭取和平、独立与民主的大規模示威集會這件事情本身，使吉田政府感到战慄的緣故。日本政府甚至無視它的夥伴——法院的判決，愈益加深了工人和一般國民羣衆的憤怒。

恰在這時，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藉对日片面“和約”的生效，吉田政府和統治階級為了慶祝日本的“独立”，頒佈了一次大赦。於是一切寡廉鮮恥的罪犯均被釋放，而資本家們數千

万日元數億日元的巨額漏稅也被一筆勾銷了。然而國民中爲了活命而出售黑市大米等的輕微經濟犯以及因違反佔領法規即第三二五號政令而被投獄的或正在受審的人們，却不在大赦之列。又如被美軍軍事法庭非法判以間諜罪的飯田七三等人，雖一度被美軍釋放出來，但立即又被日本政府逮捕了。這個“大赦”千真萬確地暴露了“和約”的本質。大資本家和賣國勢力戰爭罪犯等雖被美國“大赦”，但要求民族獨立與和平的日本國民和靠勞動生活的一般國民，却依然被關在美日反動派的軍事監獄裏。與片面“和約”生效同時，“美日安全條約”及“行政協定”也一齊生效，這就是宣告祖國的滅亡。因此，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的学生們以罷課向祖國的敵人表示抗議，他們羣集於東京大學舉行了東京都全體學生奮起大會，號召工人和學生爲爭取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合作。會後當學生隊伍向日本製鋼公司赤羽工廠和石川島造船所等地行進的途中，因遭武裝警察的干涉而發生了衝突。當愛祖國而要求和平與民主的人們經常遭受日本政府的暴力鎮壓時，一切愛國者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不論在什麼意義上來說，“和約”生效不僅未使日本獲得獨立，反而驅使日本永遠走上殖民地奴隸化的道路，這是不必反覆重述的。只是從這一天起，美國佔領軍改稱爲駐日美軍，而將從前由佔領軍最高司令官兼任政治最高權力者的職權，分由駐日美軍司令官與美國駐日大使來掌握而已。在法律上和形式上，美國駐日大使的地位，當然與其他各國大使毫無不同之處，他也完全沒有像原佔領軍最高司令官那種可對日本政府發號施令的權限。然而在事實上他却具有自由操縱日本政府的力量。

美國首任駐日大使羅伯特·墨菲是以總督的身分來日本的。墨菲在第二次大戰前，曾在瑞士、德國、西班牙和法國歷任副領事或領事的職務，他在間諜活動和陰謀工作方面在美國人中也是最有手腕的一個。他自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開始曾在北非

从事陰謀与間諜活動達二年餘，他在北非用收買或威脅的方法迫使維希派的法國將軍停止抵抗聯合國軍，對於美軍在北非登陸的作戰準備有過“貢獻”。當時的美軍司令官就是現任駐日美軍即美國佔領軍司令官的克拉克上將。其後墨菲參加過聯合國軍（美軍）對意大利和西德的管理工作，他在一九四九年出任駐比利時大使，曾以迫使比利時重整軍備而馳名。与墨菲勾結起來統治日本的另一人物的克拉克上將也是一個冷酷的陰謀家。他在北非登陸作戰時，曾藉墨菲之助利用過法國軍隊。關於此事，他自己寫道：“我最需要的是使法國軍隊來參加共同作戰的工具。這個工具，不管他叫做達爾朗（法國駐北非總督），吉羅德（法國將軍）或是貝當（投降的法國總統），無論叫什麼名字都可以。為達到目的而利用了工具之後，應如何處理被利用者等問題，就無暇及此了”（“朝日週刊”雜誌，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而現在，克拉克也許想說：“我最需要的是驅使日本人走上戰場的工具。這個工具不管是叫做吉田茂、重光葵，或社會主義者，以及天皇，無論叫什麼名字都可以……”。然而日本人民決不會允許他們的計謀得逞的。他剛剛到任就在駐日美軍即佔領軍司令部門前所發生的事件，就保證了這一點。

爭取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舉行一個統一的五一勞動節終於實現了。然而中央五一勞動節的會場不是在人民廣場，而是在青山明治神宮外苑。四十萬工人、學生、旅日朝鮮僑民、近郊農民、勞動市民都滿懷着鬥爭的勇氣和信心陸續不斷地集合起來，日本全國有三百萬人參加了五一勞動節的鬥爭。以“總評”為中心的五一勞動節執行委員會經過羣眾討論所決定的中心口號，除“反對重新武裝、爭取民族獨立”、“以統一鬥爭打倒低工資制”外，還有口號二十三條，這些口號獲得了全體勞動人民的衷心響應。此外，在中央五一勞動節會場上特別通過了“反對非法強制遣送朝僑和華僑！”“促進勞動戰綫的統一！”“堅持締結全面

和約，廢除行政協定！”三條補充口號，並在全場鼓掌聲中正式通過了粉碎“防止破壞活動法”以及“配合反對‘防止破壞活動法’和修改勞工法規的羣衆鬥爭，繼續爲爭取使用人民廣場而鬥爭”的決議。必須強調這些決議並非根據什麼人的陰謀“利用羣衆的心理”強加於大會的，而是與其他一切決議相同，先由執行委員會同意和提出，並經大會正式通過了的。

一九五二年五一節，紅旗、工會旗和各自精心設計的標語牌淹沒了葉綠風和的青山會場；這些標語牌的絕大部分都是當天的中心口號；也就是當天所高喊的口號，即反對重新武裝，爭取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廢除片面“和約”、“美日安全條約”和“美日行政協定”，美軍立即全部撤退——“美國佬滾回去”，以及打倒吉田賣國政府。許多人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首相的畫像報以掌聲。在這一天復刊的“赤旗報”飛快地賣完了。當大會進行中間，要求“到人民廣場去示威遊行”、“用實力奪回人民廣場”的呼聲，不斷地從參加大會的羣衆中發出來。實際上來到這個容納四十萬人未免太小、連演說都不易聽到的會場一看，羣衆迫切要求以實力奪回人民廣場的決意就越來越高了。政府禁止使用人民廣場這件事，在這一瞬息之間不僅只是一個集會方便的問題，而是具有一種象徵性的意義。這就是，它使日本人民深切地体会到，被奪去自己的廣場和自己的祖國的日本人民已經變爲殖民地法西斯主義的奴隸了。因此奪回人民廣場，就是爲奪回獨立與民主而鬥爭的具體鬥爭之一。

## 二 在廣場上的鬥爭

過了中午，結束了大會而轉入示威遊行。指定了以日比谷公園爲目的地的中部和南部地區的工人們，以東京交通工會爲前列開始行進；但在青山一丁目附近，約有七、八千名的學生、自

由工人(未加入工会的工人——譯者)和民主青年团员等的示威遊行隊伍却追过东京交通工会而成爲前鋒。他們高喊“美國佬滾回去”、“打倒吉田內閣”的口号，並对乘坐着美國人的汽車和美國人的住宅，大叫“美國佬滾回去！”他們在自由党本部和首相官邸前面把隊伍變成彎彎曲曲的蛇形行列舉行示威，並且更高聲地大叫：“反对重新武裝”、“打倒吉田內閣”。自由工人充滿憤怒，曾用石子投擲玻璃窗。於是，在午後二點鐘左右，約有兩萬人的示威遊行隊伍到達了日比谷公園。

示威遊行隊伍未曾在日比谷公園停留下來。他們响应了羣衆之間有一個人的提議：應該立即实行大会的決議奪回人民廣場，於是就離開了公園。他們以民主青年团和打着蓆子旗的自由工人爲前列，下面接着是高舉着國際学生联合会旗子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總联合会的學生、舉着金日成首相的肖像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旗的旅日朝僑、以及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会、印刷出版工会、全遞信从業員工会等八個工会的隊伍，一共約五千入。他們排成嚴整的陣容向前行進。在日比谷的電車交叉點，約有一百名武裝警察隊曾揮舞棍棒襲擊示威遊行隊伍，但示威隊伍用旗竿和標語牌的柄趕散了他們，並繼續向馬場先門的方向前進。街道的右边是駐日美軍——佔領軍總司令部的某棟建築物。於是羣衆喊着“美國佬滾回去”的口号，並把街道左边排列着的美軍高級人員的汽車玻璃窗打破了。在美軍司令部前面街道正中間，一位激昂的、披頭散髮的、自由工人模樣的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狂熱地揮舞着手，啞着嗓子，鼓勵着示威遊行隊伍。在街道上走过的公司職員們，也对青年們的勇敢表示感嘆。

在馬場先門的人民廣場入口，有二列橫隊約一百名的武裝警察站在那裏。在警亭旁邊的數輛警察汽車也來回開動阻塞了道路。在午後二時二十分左右，一度停止前進的示威遊行隊伍，

把隊伍緊緊地連在一起與警察隊對峙起來了。示威遊行隊伍被後面繼續到來的隊伍不斷推擠，像漲潮似地前進。被這種團結似鐵的嚴整隊伍所壓倒，警察和警車後退了。當時，警察指揮官曾對他的部下說：“讓他們通過這兒，放他們進去後再揍他們”。這些話和後來警視總監田中在衆議院法務委員會上所作的証言是一致的。田中作証時說：“這件事（奪回人民廣場）是預先就知道了的。因為考慮到在外面馬路上幹起來會使一般行人受傷，所以採取了放他們進入廣場後再幹的方針”。但是警察們在這個廣場入口的鬥爭中，決不只是進行了預定的退却，他們也是被壓倒而退的。當時，羣衆中響起了“已經進入了人民廣場！”的喊聲。於是示威遊行隊和着“使勁！使勁！”的嚷着，立刻向着二重橋附近突進。這時，從意外的方向對示威遊行隊伍送來了如雷的掌聲和聲援。在廣場的護城河旁邊、在河堤上、在草地上，嚥着吐沫想看個究竟的年輕婦女、夾雜着許多公司職員和行人的數百名羣衆，一齊對示威遊行隊伍的成功，發出歡喜的呼聲。其中有些人一面拍手，一面和示威隊伍同向二重橋旁邊前進。

午後兩點三十分，在二重橋豎起了紅旗，國際歌響徹天空。先頭的示威隊伍剛剛鬆一口氣，後繼隊伍就進來了。在這一瞬息間，在廣場前面俟隙以乘的、誇稱爲警視廳第一方面預備隊的最精銳的三個中隊，從示威遊行隊伍的右邊跑過去，向二重橋前的坡上突進。當他們剛剛進到示威遊行隊伍的側面時，隊長一發出“進攻”的號令，數百名警察就像野獸一樣揮舞着櫛木的棍棒襲擊起來了。從馬場先門到這裏，既沒有受到任何警告，又沒有受到任何撤退勸告而受到意外襲擊的學生和工人們，譁然崩潰了。警察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學生任意撲毆，用棍棒打開了頭，絆倒婦女，對倒在地上的還乘勢毆打。大約有三十名男女被亂打倒地了。

附近一帶都染滿了鮮血，呻吟聲震驚着人們的心胸。工人和学生清醒過來，又整理好了隊伍。於是，除了拿着標語牌的柄和投擲落在當地的小石頭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利用的民衆，不禁燃燒起對兇惡殘暴的賣國警察的無比怒火和憎恨，就用肉搏開始反擊。在敵友混雜的大格鬥中，捲入了羣衆中間的警察，被許多工人和学生圍着用標語牌的柄亂打了一通。警察一面流着血，一面抱着頭，發出“嘻嘻”的無恥笑聲。這樣，警察隊也搖搖幌幌地一直被追到二重橋附近去了。這時從馬場先門進來的示威遊行隊伍的後繼隊伍也陸續集合上來，總共達到一萬人左右。警察軍方面也以第一方面預備隊的全体人員（六個中隊）和由第二、第三、第五、第六方面預備隊中各抽二至五個中隊，總共十九個中隊約有三千人投入進來了。警察軍突然向示威遊行隊伍投擲了數十發催淚彈。勇敢的青年們拾起催淚彈投回到警察方面去。但因警察準備有防毒面具，並且根據他們的戰術計劃處在逆風的位置；所以處在順風的民衆就被青白煙所包圍，以致眼皮紅腫，禁不住淚水直流，而喉嚨和鼻子也喘得受不住。警察軍看見示威遊行隊伍有些萎縮，於是拿着手槍追趕上來了。在催淚彈和手槍的攻擊下，示威遊行隊伍節節後退。不斷有人受到重傷。被打傷了腳而倒下來的女學生和不能動彈的工人，被警察們痛加毆打，並要帶上手銬逮捕他們。對於這種殘忍暴虐的程度，連資產階級報紙的採訪記者也看不下去而提出了抗議。儘管如此，警察們還是把染滿了鮮血倒在地上的人用警車帶走了。

一度實行了大退却的民衆，重新整理好了陣容。警察軍一面背着二重橋的護城河，一面向着日比谷公園採取了鑰匙型的隊形。民衆與警察軍之間隔着約三十公尺，也採取了同樣的隊形彼此相持不下。可是不久，警察軍的一個中隊長——好像是加藤警部——從隊伍中跨前幾步，向密集着的示威遊行隊伍開了四發手槍。這並不是爲了“威嚇”而朝天開槍或對脚開槍，却

是對着胸膛開槍。於是以此爲信號，警察軍又一面揮舞棍棒、投擲手榴彈、亂射手槍，一面對羣衆進行了襲擊。這又使許多人民流下了鮮血。國民救援會的人們，以救人性命爲目的，拚命地從事治療負傷者的工作。但惡鬼般的警察甚至對他們也曾加以襲擊。民衆越過通往祝田橋的中央大道，退至楠公銅像附近，在那裏又恢復了原來的隊伍，於是夾着中央大道與警察軍對峙起來。每當有美國的汽車通過的時候，民衆就照準它投擲如雨般的石子。

這時候，從祝田橋方面來的第二批人們——以南部地區的工人爲主——又陸續到來了。午後三點多鐘，民衆的數目，把示威遊行隊伍和來“看熱鬧”而與示威隊伍合流的市民加在一起已達數萬人（據報告，對人數的估計，有三萬至十萬之差）。而發生最大的混戰是在午後三點半鐘左右。估計警察軍的人數也超過了五千人。警察軍在這時候，已經像饑餓的狼羣看見了鮮血似地發狂了。他們投擲催淚彈，亂開手槍，對民衆進行了襲擊。民衆中有帶着大鼓的工會隊伍，那正好像打得及時的戰鼓一樣。在廣場的日比谷公園附近一帶，展開了大規模的混戰。數百名民衆受了傷。東京都職員工會的高橋正夫，在楠公銅像附近，當與數名警察格鬥時，因子彈從背後穿過心臟和肺部而致死。美國人統治菲律賓時，爲了鎮壓這個勇敢的民族的抵抗，曾經特別製造了大型的手槍；這種大型手槍比日本三八式步槍所射出的子彈還要大。年輕的事務勞動人員高橋正夫，就是被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用這種大型手槍所殺死的。

其後，就變成了分散在廣場各處的流動戰鬥。從午後四點多鐘起，民衆就走过祝田橋向日比谷公園移動。當時已將排列在街道兩旁的美國佔領軍高級官員們的汽車和警視廳的汽車，共計燒毀了十四輛。由幾個人口中喊着一、二、三同時用力，很簡單地就把汽車翻過來，於是在汽油浸流出來的地方用火柴點



燃，汽車就立刻燒起來了。一般市民也是一面看着一面拍手；或者是和示威遊行隊伍一同來推翻汽車。從這時候起，民衆雖已在各自解散，但在日比谷公園，混戰仍繼續至傍晚。

警視廳和檢察局，在這天立即給這般民衆加上“騷擾罪”的罪名，戴上“暴徒”的帽子，並開始逮捕他們。警察在所有的電車、火車站以及交通要道都佈下羅網；凡衣服上染有血跡的人，凡頭部或他處有外傷的人，不管是誰都被突然逮捕並投入牢獄。無論是憲法、刑事訴訟法或人權都不曾在他們的眼中，他們是硬要越多製造一個“嫌疑犯”越好！他們並曾命令東京及其近郊的一切醫院——外科不用說，甚至小兒科、產科、眼科、大概是一切醫生——對該晚以後的外傷病人都要向警察告密。雖然按照醫生法的規定，醫生有為病人保守秘密的義務；但是希望越多製造一個“暴徒”越好的檢察官和警察，却毫無人道主義、民主主義、法治主義的觀念，竟肆無忌憚地強迫醫生違反其法律上的義務，來犯出賣民族英雄這種人類最可恥的罪惡。

警察對在廣場上身受重傷已頻死去的人，還加以踢打；對不能動彈的人還加以毆撲；他們真是極盡了殘暴兇惡的能事。我們相信，至少有七個人是被警察這樣殺死了的，但警察却極力地加以隱瞞。不僅如此，警察甚至闖入醫院，對必須絕對安靜的重傷病人，由數名警察在病牀邊進行兇暴的、長達數小時的訊問。對於因受重傷住在醫院的、既不能逃走又不能隱藏的日本人，究竟有什麼必要必須爭一刻的時間到病牀邊來進行深夜數小時的訊問呢？警察並不是為了搜查上的必要而這樣幹的，只是為了能多一個也好，能早一點鐘也好製造出“暴徒的首魁”，對無法抵抗而倒下去的人們大肆中午的報復。即使是昔日的封建武士道，對受傷而倒下的敵人，也認為應該親切地加以扶抱。並且認為去砍業已倒下了的人是武士的最卑怯的行爲。而今日的美國走狗——警察和檢察官，竟對受重傷不能動彈的人民還要加以

襲擊，以圖滿足他們卑劣野蠻的殘虐性。因此，法政大學的學生近藤巨士，就出於在病牀上受到深夜的訊問，以致腦內出血病狀惡化而死了。這樣在人民當中，就有兩名已知的死者，還有數名連姓名也不明、遺骸也不知弄到何處的死者；此外，則有數百名重傷者。警察軍方面，據說有八十三名負重傷，有七百餘名負輕傷。此外，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有十二人負傷。人民被檢舉者，至五月底止，已超過一千人。

資產階級報紙對於警察如此程度的兇惡殘酷的無數暴行，居然完全不作報道。不僅如此，还把示威遊行隊伍將警察和美國兵投入護城河、當他們向上爬的時候會棒打石擲之類的事情，形容得簡直像是天人所不容的大暴行似地來大肆宣傳。因此，只看資產階級報紙的人，即使是平常相當進步而且對資產階級報紙給以輕蔑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居然也說是警察固然不好，而人民也不見得好等等。但是親眼看到那一場面的人們，不能不確信，警察是徹頭徹尾地壞，而人民方面則是完全沒有過失的。廣場的鬥士們顯示了爭取民族獨立與和平的勇氣，作出了自我犧牲和同志愛的無比模範。被殺死的高橋正夫，就是在為援救同伴而以一人與數名警察交手時被從背後開槍打死的。近藤巨士是看見警察去踐踏倒在地下的女學生，因救她們而被警察的棍棒打傷致死的。他們在那一瞬息間成了怎樣崇高的人物，請看看新時代社發行、“赤旗報”編輯部編輯的“血的五一節照片集”就可以知道了。在照片集上，顯出在這以前日本人表情中完全沒有過的、美麗的、有力的、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和對民族的熱愛的感動人的人們的姿態。

## 譯者後記

本書原名為“現代日本歷史”，但主要內容是分析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情況。為節省篇幅，特將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部分刪去，將書名改為“戰後日本”。

本書有許多章節專門敘述冷戰、北大西洋公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美國侵朝戰爭、殖民體系危機、帝國主義矛盾等，與本書主題關係不甚密切，在翻譯時也都略去。

